



## 革命與建國

吳景超

蔣廷黻先生在本刊第八十號裏，寫了一篇「革命與專制」，在他文章的結尾，有句話說：「現在在中國作國民，應該把內戰用客觀的態度，當作一種歷史的過程看，如同醫生研究生理一樣。」

他那文章裏的意見，我有一部份是不能表同情的，但這一句話我却十二分的贊成。我對於他提出的問題，也會下了一點工夫。幾年以前，我受了西方講革命理論者的暗示，便想從中國的內亂史上去下一番分析，看看能否找出一種內亂的法則來。兩年以前，曾在金陵學報一卷二期中發表了我的研究成績的一部，題為「一個內亂的分析——漢楚之爭。」在那篇文章的結論裏，我曾說過：

「內亂有起點，有歸宿，有中間的過程。總之內亂的頭緒并不繁雜，而有系統可尋。這個系統，有如下表：苛政——人民不安——革命——現狀推翻——群雄爭權——統一完成——善政——和平恢復。」

我這兒所提出的系統，便是蔣先生所說的歷史的過程。這個系統，經過好些朋友的討論，以及我本人兩年來的

思考，覺得字面上還有可以修改的地方，但大體還是可以保存的。現在為討論的方便起見，我願意把上面所說的八個階段，分作三個時期：

第一期自苛政至現狀推翻，可以稱為打倒舊政權的時期，又可稱為革命第一時期。

第二期自群雄爭權至統一完成，可以稱為創立新政權的時期，又可稱為革命第二時期。

第三期自善政至和平恢復，可以稱為建國時期，又可稱為革命第三時期。

假如用這個觀點來觀察時局，我個人的私見，以為自清室推翻以後，這二十餘年，我們鬧來鬧去，還沒有跳出革命的第三時期。本來這個時期，在歷史上長短是不一定的。短的如秦政權的推翻，到漢政權的創立，中間不過五年。長的如東漢末年董卓政權之推翻，到晉政權的創立，中間竟鬧了八十八年。所以我們如用歷史的眼光來看，中國近二十餘年來的混亂，乃是革命中必走的過程，而且二十餘年還不能算是最長久的。也許有人要問：革命為什麼

一定要經過第二個時期？打倒舊政權之後便進行建國的事業，不是最經濟的辦法麼，爲什麼革命者都不走這條捷徑呢？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但我們從歷史的研究，也可得到一個局部的答案。我們以爲舊政權推翻之後，便有群雄割據的情形發生的原因，第一是因爲參加推翻舊政權的人，除推翻現狀之外，對於別種主張，別種政策，并不一定有一致的信仰，所以每于現狀推翻之後，便分道揚鑣了。項羽與劉邦，在推翻秦室之前，是合作的，秦室推翻之後，便分裂了。劉秀與劉玄，在王莽的政權未推翻之前，是合作的，王莽推翻之後，便分手了。其他類似的例，不勝枚舉。第二是因爲參加推翻舊政權的人，各人都有野心，誰都願意作領袖，誰也不甘居人下，所以在野心與野心相衝突的時候，自然革命的勢力便分裂了。上面所說的項羽與劉邦，兩個都是有野心的人，一個看見秦始皇，便說「彼可取而代之」；另外一個看見秦皇帝，便喟然太息，說是「大丈夫當如此也。」試問這兩個有野心的人，如何可以合作？即使當首領的人沒有野心，那些「攀龍鱗，附鳳翼」（用耿純勸劉秀語）的人天天從旁慫恿，也可把首領的野心培植起來。此外如人民的智識愚陋，組織的能力薄弱，都可使群雄割據的時期，必然的在舊政權推翻之後出現。

群雄割據的時期，無論久暫，總要演化到統一的途徑上去，而在中國歷史上，幾乎沒有例外，統一是以武力的方式完成的。舉幾個顯著的例：如東漢的統一，是以武力平赤眉，平漁陽，平齊，平隴蜀之後完成的；唐的統一，是以武力平東都，平河朔，平隴右，平河西，平河東，平江陵；平江淮，平山東之後完成的；宋的統一，是以武力平荆湖，平蜀，平南漢，平江南之後完成的；明的統一，是以武力平漢，平吳，平閩，平兩廣，平夏，平滇之後完成的。不過武力雖然重要，而運用此武力的，還要一個能幹的領袖。這位領袖，至少應具下列幾個條件：第一，他要有爲國爲民的聲望，這種聲望，是建築在領袖的行爲上面的，不是空口說白話或開空頭支票所可奏效的，因爲中國的人民，雖然是愚笨得可憐，但是自從讀了四書之後，都學會了「今吾于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的秘訣，不容易永久上當的。第二，他要有知人善用之明，要網羅國內第一流的人物，來與他在革命上合作。假如他的左右，只有二三等的人物，那麼統一決不會由他完成的。第三，他要有開誠布公的胸懷，要使得與他接近的人，都覺得這位領袖，真是「推赤心，置人腹中」，然後才可以感動他的同僚，使得與他合作的人，都肯爲革命而投死效命。現在

的革命事業，有國際的背景在內，所以當領袖的人，尤為不易。除却上面所說的條件之外，還應當有現代的眼光，以及一個高明的外交政策。假如我們現在有這樣一位領袖，革命的第二時期，便可早日結束，否則不知道要延長到那一年。不過我們對於中國統一的前途，並不悲觀，因為根據時勢造英雄的原則，這種領袖，遲早總要出現的。

在群雄割據的時期內，除却武力統一的方式外，我們看不出還有什麼別的方式，可以完成統一的使命。雖然現在有人提倡以開放政權的方式來統一，但是據我看來，開放政權之後，一部份的官僚，一部份的政客，一部份以學者而兼政客的人，可以躊躇滿志了，但于統一是一無補的，對於大多數人民的福利，更是風馬牛不相及。我們細想，開放政權之後，國民黨與共產黨，便可停戰于疆場，相戰于議場麼？武力便可受政治的支配麼？在各軍閥所管轄的範圍中所舉出的議員，能反抗各該地軍閥的意旨麼？以前議會中所演的把戲，現在不再重演麼？假如我們對於以上的答案都是否定的，那麼我們便可看出在這個時候談開放政權，未免是不識時務。此外還有人提倡以聯省自治的方式來統一的，這種論調，在過去二十年來，時起時歇，但提倡這種方式的，大多數是各地軍閥的代言人。這些軍閥

，實力既不足以統一中國，同時又不希望有別人來統一中國，因而消滅他們的實力，所以每唱聯邦自治之說，以為他們的護身符。假如我們現在要擁護這種主張，實際便是擁護群雄割據的局面，這是明眼者都看得出來的。聯邦自治的理論，固然不可一筆抹殺，但真正的聯邦自治，也是要統一後才可以實行，決不能以此為手段，而達到統一的目的。因為既然談到聯邦，中央與地方的權限，便要實行劃分，此中最緊要的軍權，便應劃歸中央，但在這個時候，要各地軍閥，拱手而讓軍權與中央，豈非與虎謀皮嗎？假如地方擁有龐大的軍權，豈非還是群雄割據的局面，與統一有何相干。除了以上的二說之外，還有一說，現在也佔有相當勢力的，便是以建設謀統一。換句話說，主張以建設謀統一的人，想在第二個革命時期中，便行第三個革命時期的事，以為這樣中國便可統一了。

兩千年前，齊國的人就有一句俗語說：「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我也願意對這些講以建設謀統一的人說：你們雖有那些建設的方案，還是放下等等罷，現在並不是談建設的時候！歷年來的建設方案，自孫中山先生的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以及報章雜誌上所發表的，私人函件中所討論的，以及這個會議那個會議中

所閉門創製的，真是用得着古人的形容詞來說，雖不能汗牛充棟，也可以車載斗量。但是建設的成績在什麼地方？我們的答案是「一點也沒有！」建設方案之不能實行，原因雖然很多，但據我看來，主因還是因為現在乃是一個群雄割據的時期，而不是一個建國的時期。我們得設法早日脫離群雄割據的時期，然後可以進行建國的事業。我很贊同蔣廷黻先生的說法：「中國的基本形勢是：政權不統一，政府不得好。」

我們試舉幾個例子，便可知建設須以統一為前提。現在大家最注意的一件建設事業，便是救濟農村。救濟農村的頭一件事，便是廢除苛捐雜稅。但在未統一的時期內，中央與各地軍閥，都要培植兵力，于是不得不籌餉，于是不得不加苛捐雜稅，于是救濟農村便等于空談。又如普及教育，也是建國的一件事業。但普及教育，便須經費，而在群雄割據時期內，一切的經費，都用在軍事上面，原有的教育機關，已不能維持下去，那有餘費來發展教育，于是普及教育又等于空談。又如經濟統制，乃是近來最時

髦的一種建設口號，但在未統一之先，山西的煤，中央能統制麼？江西的米糧，中央能統制麼？四川的石油，中央能統制麼？在四分八裂的局面之下，來談經濟統制，豈非畫餅充飢？又如近來有許多愛國之士，覺得中國沿海的發展太速，頗為危險，于是陶希聖先生，主張今後中國要與內地能夠避開敵人主力攻擊的地點做中心，建築經濟的政治的組織。兩星期前翁詠霓先生在清華演講，不約而同的也注意這點，他還以四川為例，以為四川值得開發。這都是很好的見解，但在中國未統一之前，這類的計畫，都無實現的可能，乃是我們所敢斷言的。

總之，我們根據中國歷史的分析，革命實分三個時期，現在還是一個群雄割據的時期，說不上建國的大事業。我們當前最大的問題，是統一問題。國家統一之後，一切的建設計畫，才能實行。此時來研究建國的計畫，是無妨的，此時來談建設的實行，未免超越時代。

二二，十二，二三。

## 參加福州人民代表大會記

小招

以下的話只是我自己的話，寫出來並不希望，反而是怕，第二人看到。這些話當然我敢保證牠的忠實，但是我所

存的意見，我不敢說對，因為我只能照着自己，根據自己的環境，自己所受的教育，所得的理性和所蓄的感情說話。整個的自己若是錯誤，說的話就不能保了。

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早晨，天氣很好，我服務的地方又放假，我悶着沒事，就去參加今天南較場開的人民代表大會。

早就風聞福建要發生改變，想不到是這樣的大變，從今天起，福州該有盛大的戲看，今天的一幕是開場，也該去看看。我就信步一個人走去，在街上看見一大隊兵也去赴會，還有一堆堆公務員也去參加，店舖有的是奉公安局的命令半閉着門，夥計都站在門口看熱鬧。一會又有學生的隊，大家都是奉令而來。

快走到的時候，加入有人力車夫的隊。他們從人力車夫工會出來，一大串都拿着小旗。他們沒拉着車，都顯着很不自然的姿勢。我不敢看輕他們，他們是光榮強壯的勞動者，應該是世界的主人翁，然而受了委曲，受了冤，變成最可憐的人。每回在我坐一輛車的時候，我的車夫在急忙的跑路，遇到他的同伴，那同伴總要問他賺了多少錢，他也匆促的回答，我不到他們誠意的友情，精懇的表情，純真的面孔，壯實的身體，我思想一下，心中就要發痛。

他們大多是鄉下的農民，或是因為發生土匪，或是因為發生災情，所以跑到城裏。但是城裏也是荒涼，市面近來更是不好，市民也都貧窮，竟至很少人坐車，拉車的又多，不得不降低車錢，他們拉了一天，常有還不够車租的時候，再有染上壞嗜好，抽鴉片的，你說不很可憐嗎？而他們所以可憐的直接原因，我看還不是地主，資本家，（固然土豪劣紳也壞，不能不去掉）而是不安定的環境。所以中國目前最最需要的是安定，是安定，是安定。其次呢，是改良，改良，改良。安定和改良能救中國。要有誠心愛民的人來幹，真愛勞動者而懂得實情的人，懂得實情而不貪心於自己的財富和功名的人纔能救中國。今天我看到這一些純正的勞動者去做某一些政客的工具，我真不能相信，這一些政客如真要成功之後，能記着他們這些拉車的嗎？後來聽人說這些拉車的今天每人得到二毛大洋，那總算優待了。

今天參加會的人極多，會場佈置很簡單，沒有黨國旗。總理遺像遺囑都去掉。他們不但要打倒蔣介石，還要打倒國民黨，打倒孫中山。台上站着許多要人，我所認得有丘兆琛公安局長，丘國珍團務主任，蔡廷楷綏靖主任。還有林知淵鄭貞文兩個委員也在台上站了一會，又走下台下

去站著，這兩位在今天以前都是省委，又是中央方面的人物，新組織裏大概沒有分，所以今天很沒趣的樣子，然而又不能不去，後來站在台下，又跟着民衆坐在地下，但是在喊着打倒蔣介石，打倒國民黨的時候，又不能不動動嘴，舉舉手，樣子却也可憐得很。

後來從前的省長薩鎮冰老頭也到場，以七十多歲的老人家也來參與這非常的行動，大概也是被請無法，不得不來湊熱鬧。可是大家都歡迎他的樣子，有的請他坐，有的給他介紹給各人談話。他給外交家陳友仁說了很多話，老薩面前已經脫牙，說話很困難的樣子。接着蔣光鼐李濟琛都來到，後來才開會。（陳銘樞沒有來。）

照紙單上的人名一念，一個人就拿着一個「招待員」的錦標向那人身上一掛，這就推舉出主席團了。

後來報告開會宗旨，主要是打倒蔣介石。大家就要薩鎮冰演說。他說：「今天是不不得已的舉動。」頓了許多時候，又說一句「今天是不不得已的舉動。」又頓了許多時候，我都害怕這位老頭不能接着說下來，他又來一句「今天是不不得已的舉動。……這舉動是要改良現在的現狀。……」他這樣說了幾句，就說：「希望大功告成，」深深的鞠躬了下去。

來了許多演講，都沒有好聽的話。還是各處代表——像方振武，馮玉祥的代表，說話還能連貫。他們都說一些救國要倒蔣，倒蔣就救國，抗日即倒蔣，倒蔣即抗日，非倒蔣不能抗日救國的話。在演說的當中，台上台下的人羣喊喊口號。大多數是「打倒蔣中正」「打倒蔣介石」「打倒賣國殘民的蔣中正」「打倒……的蔣介石。」站在我前面的一個西裝青年，爲要表示他特別熱心起見，會自己個人喊出一聲，後來又高聲喊出「打倒渾蛋忘八蛋的蔣介石」，引起四圍的好笑。

這回他們剛設備好福州無線電播音台，正好今天有發音器放在棹子上，大概南京上海有許多人能聽到他們的演說。

飛機飛來好多，飛得非常的低，表演極其威武的形狀。我想中國人的事真有點滑稽，對外則膽怯，不敢抵抗，忍辱屈服，對內則勇敢非常，二三句話沒有說完就要動起武來。動起武來，犧牲還不是一樣的嗎？然而對內他敢動，對外就不敢動，心理的作用竟至如此。內戰起來，陸軍海軍空軍都起了作用，殺的是中國同胞，毀的是中國地方，你說這不是很慘痛的事嗎？我看見四五架的戰鬥機，滿天的飛，發出很沉重的憂心。

蔣光鼐說：「……兄弟今天起不是南京政府的省主席了，是人民代表了。」今天他說不是，昨天他當然還是。他的是不是於他沒有關係，只可惜中國的民衆永沒有安定，而外患日急，亡國就在眼前了。

何公敢說：「……福建青年在上回辛亥革命很能犧牲，希望我們做第二次第三次的犧牲，打倒蔣介石，打倒國民黨。」這回新政府裏，福建人只有何公敢一個。聽說他給陳銘樞是最莫逆的。他本是一個大膽的政客，到處受人反對，上次他做福建省委兼財政廳廳長，省黨部就反對，說他是國家主義派，不是國民黨。他那時出來給人爭着說是國民黨。後來立法院院長胡漢民的電報，說他在中央某次會議的時候，曾通過他是忠實同志，以後他才做了省委兼廳長。如今他才忠實呢！

有人說，何公敢這回是因為中央監察院把他停職四年，他大氣起來，加入革命。停職是因為他長財時所定稅率不合財政部所規定，然而那時的省政府要他這樣，財政情形要這樣，而監察院獨罰他停職四年，也是怪難堪的。但繼他任財廳廳長的十九路軍范其務，所行的稅則也照着他的，並不聞監察院監察到。是因為監察院看勢力說話呢，還是福建人敢告發何公敢而不敢告發范其務呢？我也不知

道了。

蔡廷鍇說話，形狀很激烈，大有非倒蔣不能抗日的氣概。

陳友仁說是因為語言關係，只叫別人說他非常榮幸，非常歡喜這次舉動。

李濟琛等以及各處人民代表也都是那一套的話。

還有一個馮恩定也來演說。他以前是省黨部委員兼部長，當然是一個開口國民黨，閉口三民主義的人，前兩天他還是這樣，忽然他今天登台，就說國民黨一向不好，蔣介石也一向很壞。

我細細看着這一些的人，大多是失意政客軍人的集團，他們連合起來起事，我也不敢說一定不能成功。中國古話有句說「逆得順守」。他們這回起事，在中央方面看當然是「叛逆」是「逆得」，不過他們「割據」「獨立」之後，如果肯好好的幹，吃苦的幹，將不驕，兵不惰，軍人好好練兵，政治家好好澄清吏治，整理財政，綏靖地方，建設實業而後幹起大事，誰也不敢說他們到底如何。

假如他們「獨立」以後，產生許多新貴，變出許多新官僚，新政客，新軍閥，而他們的根據地的福建又是非常的貧瘠，那新政府能站的長久嗎？



還有也看他們對手的蔣介石怎樣呢。在老百姓眼裏看去，大家都是壞蛋，他們沒法子，只有找一個壞得差一點的來擁護，去打倒更壞的一個。這是中國老百姓可憐的實情。誰要稍得民心，還要做稍差點的壞蛋。這是說要得民心方面的道德力，再有經濟力和武力，那就必定成功了。

主席念人民代表宣言完，升起新國旗，台上的人歡躍得不可名狀，大家隨着行三鞠躬禮。我心中急促的跳動，想不到不得了的大事竟這樣舉行了。這真是滑稽：福建一省，聽說別省還都不贊成，三萬多人的十九路軍，要創立新國，實行新的經濟政策，他們能不能成功，不敢斷定，成功了確是「奇蹟」，天下就有這樣的「奇蹟」呢！

後來主席團還接受不知那裏人民代表的提案就負責組織新政府。

## 民族的優生

常說亡國滅種。自從九一八以後，國人時刻感覺到亡國的恐怖。但是很少人注意到吾們民族的前途！誰都知道的，民族的衰敗，要比國家的滅亡更悲慘。猶太亡了國，但是猶太民族的優越，尤其是猶太科學家對於文化上的貢獻

散會以後，人山人海的倒出來，大馬路上滿了人，壘集得不能走一步，我擠在中間，通不出氣來，跟着勦彈幾十步，才能漸漸鬆開。我想「起事」「爭天下」中國老早就這樣。「陳涉起澤中」，「沛公起沛」原也不過這樣。但是歷代中國是閉關着門，屢次的換朝代，大亂，只是殺剩餘的，沒有米養活的人民，並沒有外國在旁邊。就是後來有外族，也是文化較中國爲落後的民族，所以中國亡過，還能生存。但是呢？大家豈忘記了嗎？國難！國難！不留心就是亡國滅種，大家豈有不知道的呢？我們百姓怎麼辦呢？

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續完

「元年」十二月十三日抄寄

沈同

獻，使得猶太民族，在亡國之餘，還能得到人類間大多數的同情和尊敬。現在我們中華民族怎樣？有多少人真真顧慮到民族的前途，像他顧慮到國家前途一樣深切呢？

這已經是沒有異議了，劣等民族在生存競爭中，必定

要絕滅的。就是世界是大同了，人道和正誼統制着全人類，劣等民族可以苟安生存了，但是爲全人類的進化一點上着想，留着這些劣等民族存在又何用呢？何況所謂人類間的和乎正誼究屬是子虛的。

有沒有人曾經爲吾們民族仔細想過它的命運？吾們的民族究竟具有何種品質？民族譬諸個人，他有什樣的稟賦？他對於這受諸先人的品質，在斲傷着呢？還是在改進？他也曾經爲他後代的品質着想過麼？

吾們民族原有品質是什樣的？這問題不好回答，遺傳學的知識還很淺薄，所能研究清楚的祇是幾種實驗用的生物的形體，顏色上的性質。至於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種種性質，（所謂心理上的性質也就是生理上的。）就不容易着手研究了，所知道的也就很少。關於人類的種種複雜性質像疾病智慧，德性等等的遺傳，所知道的祇是些統計的結果，詳細的遺傳法則，就不很清楚。所以我們要有一支尺，一種測量器，用來量度一個民族遺傳本質的高下，還有待於將來遺傳學的發展。現在有許多偏見的人種學者，以爲有色人種要比無色人種低下。這有什麼根據呢？有什麼證據，證明吾們的民族是低下的？吾們倒有證據，使吾們自信，吾們民族原來是並不壞的。吾們祇要想到中華民族

悠久的歷史，光耀的文化，吾們很可以自信中華民族原先的品質是不會壞的。

民族固有品質的好壞，倒不是重要問題，假如有堅強的證據，證明中華民族是屬於劣等的，難道吾們就個個人自殺不成？假如吾們能夠知道中華民族的品質是優異的，難道吾們可以恃以無恐，以爲優異的民族不會絕滅的麼？希臘羅馬的滅亡，也有些歷史家歸原於優良份子的減少和低下階級的增多。一個民族的品質並不能固定不變。原有的優良品質有時會失傳；不良的品質會增多。並且優良品質有時也因為受了外界不良的影響而變壞。一種優良品質的小麥純種，常因為後天環境的不好而變壞。優生學者所稱種族中毒，也認爲煙酒，性病等等可以使得一個種族的品質變壞。所以現在吾們倒並不在乎急急要知道吾們民族原有品質的好壞。吾們該注意到現在吾們民族的品質是在變壞，還是在改良？

吾們不必問，吾們會不會在努力着民族的優生；把不良的品質除去，叫優良的增多。吾們還不必問到這些。吾們該先問吾們現在是不是正在斲傷已有的優良品質？是不是正在添出許多惡劣的，不合於生存的品質？雖然吾們沒有精確的統計材料，但是祇要一想到年年不斷的連歲省的

大饑饉，種遍各地的鴉片，和流遍民間的海洛英等毒物，還有流行青年男女間的性病等等。吾們能對於吾們民族未來的品質抱着樂觀麼？關於民族品質降落的程度，吾們沒有什麼數目字可以舉出來。沒有像丟失了十數萬方里的國土這樣容易驚人；也沒有像一年流出了九萬萬銀元到外洋去那樣容易觸目。國家有形的滅亡，容易使人膽寒，民族無形的衰敗，吾們對它可以不顧慮了麼？

吾們也曾爲中華民族未來的品質打算過？無論現在當務之急是政治，是經濟，是教育，是……。究竟萬事全靠人來做的，吾們的遠祖，造成了吾們現在據以爲榮的文化。數十年前吾們的前幾代在舞台上時造下了中國衰弱的局面。現在這一代在舞台上的人，又正在造成中國這樣一個局面。吾們希望中華民族和國家的未來情形好些，吾們該希望將來舞台上主人翁的品質先得優良些才是。想改進農業，吾們知道先注重育種。養牛養雞的也知道先選擇好種。爲國家民族前途着想的人，什麼不在改良後代品質一點上去着想呢？

吾們該改良政治，吾們該發展經濟，吾們該提倡教育，那全對的。但是倘若吾們有了一份惡劣的品質，萬千的

努力都是沒用的。舉個例吧：說是吾們該提倡教育，誰都明白，因爲有先天稟賦的限制，教育並不是萬能的。白癡教育不成某種材具。吾們能讓白癡無限地增殖；然後將來爲無數的白癡，設立無數特殊的學校麼？吾們能讓梅毒無限制的流傳到後代，造成了千萬的先天盲者，然後再設立了無數的盲人學校去教育他們麼？這些都能算做人遺麼？吾們知道提倡科學教育，吾們也盼望造就出三數個大科學家，藉了他們對於文化的偉大貢獻，民族地位也可以提高些。但是偉大科學家的造成，並不完全靠優良的環境，更不是祇靠個人的努力和志願。大科學家需要特殊優良的遺傳性質，才有發展成偉大的可能。吾們希望將來能出一兩個大科學家，吾們該先注意優良遺傳性的傳遞才是。此外提倡體育，造就人才等等問題，全要跟民族的優生，同時進行，才有效果。

最近德國快要通過關於斷絕生育的法律，法律通過後，將有四十萬人應該斷絕生育。不管德國這種方法妥當不妥當；德國這種注重國民遺傳品質的精神，是可以使得吾們警惕的。

(完)

☆

☆

☆

☆

## 漫游散記 (二十)

丁文江

金沙江 (續)

東川巧家

我當晚僱好了一隻小船。第二天一早放船順流下去，因為從鹽井過江是沒有路的。鹽井到沙坪子是六公里。我

本來想放船到沙坪子的，因為那邊是半大路，比上游好走。但是從鹽井三公里以下就有大灘，船不能過，只好在半路上岸。鹽井附近金沙江是東西的；下流一公里纔轉向東北。我下船的時候剛出太陽，江東暗西明，兩相對照，別有奇景。江面寬不到三百公尺，水流的速度很急。小船六分鐘走一公里，三公里路不到二十分鐘已經走到。上岸先向東北斜上兩公里到樹節村。過樹節一公里坡忽然變陡。路是一條灣曲的盤道。牲口馱著已經難上，再加之盤道又短又窄，拐灣的時候，帳棚柱子太長，往往要碰在岩子上，幾乎把牲口摔下坡去。沒有法子只好把柱子卸了下來，叫馬夫鄉導拿着。如是者四公里纔上到新山，與從沙坪子來的大路會合。新山高度為二千〇六二公尺，已經到了象鼻嶺頂上。從此三公里到拖布卡都是平路。在江邊早上六

點鐘溫度為二十六度半。樹節村以下沿途有仙人掌，芭蕉等熱帶植物。再上岩石含有鹽滷，不生樹木，而溫度漸低。到了新山正午的溫度只有二十四度，已經是高原的氣候了。

拖布卡是象鼻嶺高原的中心，附近也產銅鑛。我從那裏向南經過麻標坡二十公里到大水。麻標坡平均出海面二千六百公尺——越向南越高。大水在一條溝裏仍然高出海面二千五百公尺。溝兩邊的山都在三千公尺左右。大水是東川銅鑛四大名廠之一——其餘三廠是湯丹，落雪，茂麓。湯丹最重要，在大雪山高山區的東北端，茂麓最不重要，在大雪山的西北坡，距金沙江很近。大水落雪，相距不過八公里，都在琪王山（琪是鑛的意思有時寫作卅）東西一條溝中。關於東川銅鑛我另有記錄。本文單講金沙江東兩岸的地形。

我因為要看看大雪山，所以不走近路，走遠路；不走平路，走山路。由大水到茂麓，先向西上坡到二千九百餘尺——這已經是大雪山最東北的一部份。從此西南下兩處

紙廠（二千五百公尺），再向西北上坡到二千八百公尺，再下到青龍山（二千四百二十三公尺）。路不過十四公里，上下坡各兩次。從青龍山向北上坡到帽盒山，再下坡到大牛洞，四棵樹各鎮，轉向西南下坡到茂麓。一共路不過十三四公里，而帽盒山高二千七百二十八公尺，茂麓高只有一千〇三五公尺。上下將近一千七百公尺。這一帶的風景絕佳：山頂大部分是石灰岩成功的，有許多奇形的山峯；坡上有天然的山洞；北坡下就是二千公尺深的金沙江谷。從帽盒山四棵樹看下去，比在江西岸還要駭人，因為石灰山的坡比任何岩石的坡還陡。從四棵樹下金沙江，是一個絕壁走不下去的。

從茂麓到落雪廠正走着大雪山的北邊，路離山頂不過幾百公尺。可惜我走過的時候，下雨下霧，觀察異常的困難。從茂麓一直向南六公里到腰蓬子，從一千〇三五公尺上到二千三百五十一公尺，坡還不能算陡。從此路向東南不到二公里上坡到二千九百公尺。坡既奇陡奇窄，下雨以後又奇滑，真正是普天之下最難走的路！從此直向東南，到了一個高原，平均高三千公尺。走了四公里天已昏黑，在一個沒有人家的地方，叫做長海子，搭起帳棚過夜。在長海子西北三千一百公尺的高點瞭望，東南却有烟霧，西

北望金沙江南岸則異常的清楚：江兩岸的懸崖絕壁，江心的將軍石，江心石，江外的大山都在目前。因為峽江太深了，却望不見江水。跟著我指儀器的夫子，望了半天，指著江外一個山道，「這不是大麥地嗎？我們走了六七天，還望得見以前的宿處。這是一種甚麼走路的法子！」

從茂麓到長海子，溫度和植物的變遷，也可注意。在茂麓早上九點溫度已經到二十七度。植物都是熱帶的樣子。到腰蓬子正午的溫度降到二十二度，到了高原上下午的溫度降到十五度！沿途完全是叢山，因為樹木連根帶幹都被鑛廠工人挖了燒炭煉銅。一直到了高原上纔看見有一二尺高的矮松樹。松樹底下生着很多的野楊梅。我從前在瑞士留學常常同朋友到山上採野楊梅吃，這是亞爾帕斯山披的美味，七八年沒有嘗着了。在帽盒山頂上我第一次再看見牠。到了長海子，滿山都是。我叫馬夫，鄉導大家去採。不到半點鐘，採了好幾斤。於是開了一罐瑞士的牛奶，加上白糖，飽吃一頓，非常的痛快。不料吃的太多了，到了夜間大瀉起來！

從長海子先向東南，再向東，經過三風口，二風口，到大風口，八公里多，都在大雪山前坡上，高度平均在三千五百公尺左右。大風口最高——三千七百公尺，比大露

山頂低得很有有限了。從大風口到落雪廠，三公里，下四百多公尺。落雪到大水不過八公里。要不是繞茂麓和大雪山，不要半天就可以到的。因為繞路，一走就是四天。

從落雪到湯丹（又叫做老廠）有兩條路：北路是走小江口，新甸房一直到湯丹；南路是走腰帶，濼泥坪先到白錫臘再到湯丹。兩條路的遠近差不多，而北路較平。我因為要研究大雪山的東部，所以走南路。從落雪向南不過三公里，又走上了大雪山。再向南四公里到腰帶，高三千七百公尺，是我在大雪山所到最高之點。從此先向南再向轉東，七公里，就到了大雪山東北端。然後一直向東走十公里，不過七百公尺，就到了白錫臘（高二千八百公尺）。從白錫臘向東八公里就到湯丹。沿途在大雪山北半坡走，路線頗有起伏。將到湯丹纔再下四百公尺。腰帶一帶的風景完全和長海子大風口一樣，都是石灰石的奇峯，與各峯之間的窪地和間錯。可惜沿途下雨下霧，觀察極其潦草。

我于六月二十七日在鹽井過江，七月十日離開湯丹。

先後在產銅的地方調查了十二天。因為地形複雜，路極難走，常常下雨，成績極其不佳。但為七八兩月是雨期，勢不能久待，只好匆匆的去東川。大路應該從湯丹向北，順小江的西岸下到小江口，過江向東北經尖山熱水塘到縣城

。我要上古牛寨絕頂看看，所以一直向東，不走大路。從湯丹到小江不過六公里有零。湯丹高二千四百公尺，小江高一千〇九十一公尺，下降一千三百公尺，而從湯丹四公里到馬房，坡度頗平；陡坡在馬房到小江邊的兩公里。幸虧都是土路，還不甚難走。過江的地點正在中廠河與小江會合的地方。江面寬約二百公尺，由中廠河上船，逆流到對岸的沙海村上岸。岸是一個極陡的坡：五百公尺的盤道要上二百公尺。又走一公里半，剛到坡頂（高一千五百四十公尺），又下向一條自北向南的大溝。溝底高一千二百三十公尺，比較的寬闊；橄欖坪，大橋，大寨附近的幾個大村子，都在一千二百六十公尺到一千三百公尺之間。從大寨一直往東，十公里有零，就到古牛寨山頂。但是古牛寨高出溝底二千九百多公尺，比從海面到五台山頂只低二百公尺，山頂又無宿處。所以我從湯丹第一日趕到半山的箐口村；第二天再由箐口上山，當晚下來仍住箐口。

從大寨算起，到山頂的路可分為四段。第一段從大寨到葫蘆口，一，二公里，上八三公尺，坡度為百分之七。第二段從葫蘆口到箐口，五，三公里，上九百六十二公尺，坡度為百分之十八。第三段自箐口到三，三五九公尺的一點，三，六公里，上一千公尺，坡度為百分之二十八。

第四段到古牛寨絕頂，直線不過一·六公里而要上高七百八十六公尺，坡度爲百分之四十九！第一第二兩段都在土裏面，所以比較的平；尤其是第一段是順山走的所以更平。第三段在石灰岩裏面，已經很陡。第四段是玄武岩（火山岩）所成的絕壁：百分之四十九的坡度，當然是無法可上的，所以我們跑到最後這一段，先向東南，再向東北，曲曲灣灣的繞着，到山北面，再向山頂。直線一，六〇〇公尺，灣曲走的盤道長二·四公尺，上不到一半，已經找不着道，只好手足並用，慢慢的斜着上。上到頂一看古牛寨是一個五百公尺直徑的圓頂，最高的點偏在西邊，高出海面四千一百四十五公尺，是我在中國所登的最高的山峯。

從古牛寨四望，除去正南正北兩面爲本山所掩以外，都望得很遠。向西看時最遠最高的是一百二十公里以外會理西北的龍爪山。魯南山比較的近得多，而却看不見，或是不認識。此外金沙江以西的望鄉台，大銀廠，大麥地三道梁子都看得很清楚。江的東岸從北向南是象鼻嶺，麻標坡，琪王山，以及大琴山的高山帶。我雖然從西到東在大雪山的北坡走過一道，但是離頂太近了，反看不見牠。在大銀廠，大麥地又因爲有霧不能望得很遠。在古牛寨山頂

恰好遇見晴天。纔看明白大雪山是一個高山地帶或是高山區（*High*）：不成脈，不成梁子。下半是個斜坡，越上越陡，最後是石灰岩的絕壁。頂上是個平台，台上又有許多尖峯，錯雜高下，不易名狀。再近一點的是小江。江上游是三條水所成的：最西的是四甲河，中間是柳樹河，東面是小江。三條水會合的地方叫三江口，江東一個大村子叫糯姑田。從糯姑田向北一直到大寨的北面，約十公里長是一個比較低的平谷，谷裏種着有許多水田；從谷底向上，一層一層砌得有平台。大寨河是好幾條水會合的：最遠的源是紫牛坡。這條水與小江會合的地方許多亂石堆成一個極大的三角礫洲。這是山西面所看得見的地形。不是我自己認識，就是背口來的鄉導指示我的。山以東則只看見無數的不連續的山，比古牛寨的絕頂要低一千到一千五六百公尺。萬山中隱約看見一條淺谷。鄉導說是野馬川，是伊里河的上游。川以上是許多不規則的小峯，看去好像石灰岩，但是太遠了，看不十分明白。

小江底高一千〇九十公尺，比金沙江要高到二百多公尺，而且江谷以寬，空氣流通容易，溫度應該比金沙江爲低。然而我七月十日過小江，早上十一點溫度已經到三十四度，比在鹽井過金沙江的時候還要高。大概是因爲我

過鹽井的時候是六月，又是雨後的原故。早上八點鐘從灣口出發，溫度是十六度。到了古牛寨山頂，下午一點，溫

度只有八度，由北坡還有一大塊雪沒有化完！

## 冒險過偽國記

陳運煌

先是運煌於首途之初，即蓄意在沿途諸大城市村鎮於可能範圍內，分別作短時期逗留。及在道中始感到各種危險相襲而來（當時雖有感覺，但毫不懼怯，事後回憶，始覺悚然）。於是兼跑帶藏，狼狽載道。但於此中已可窺其大略。俟有暇日，擬將行歷寫作短篇日記，或可與亡命脫逃等情形作一例觀也。

上時間不過十晝夜之譜。

運煌以九月二十日清晨五點自滬首途，以雙十節後三日抵 Darmstadt。沿途在大連曾留半日，南滿路上之奉天長春綫中兩天一晚，長春（現改稱新京，為南滿線與中東路之交點）一宿，哈爾濱兩小時，滿洲里三天四晚，赤塔（俄境西伯利亞極東大鎮）一晝夜，伊爾庫次克（西伯利亞中部。截至此處止原係中國土地，近二三十年，先後被帝俄蠶食，故目前為俄境，但中國人仍極多，中國式建築用具之遺跡隨處可以見到）半日，莫斯科四小時，瓦薩（波京）六小時，柏林三天，全在船上及車

運煌最初到大連，即遵鴻濟隆旅行社所囑（旅行社所說總不可盡信）向偽國外部辦事處請給護照，但該部拒而不與，對於國內護照亦不作何表示，此種情形已能窺運煌感到前途之無保障，惟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乃決計搭特快車以最快速度通過滿洲。詎料行抵瀋陽，倭人竟將運煌行李中途擲下，在車開離車站時運煌始發覺該項行李已在站台，比即擬於車抵次站時下車，而時值深夜，適又有另一列車自瀋海路開到，車身滿布彈孔，並有傷兵運下，情形殊感嚴重，遇此各站亦均軍衛如林，沙袋砲壘高出屋簷，倘無故下車必觸偵騎之忌，於是決乘該車直達長春，另行購票折回瀋陽查詢行李，倭站員謾為中夜遺誤，捋鬚一笑，譁言微中，惡意畢露。如運煌貿然在該棧小站中途下車，倭軍不難認為義軍偵探，即有百口豈容分說。此時運煌雖覺倭心巨測，仍信者實



不敢於稠人廣衆中，無故加害，而不知厥後危險更有過於此者也。

離瀋站之次日車抵長春，例須由南滿路車改乘中東路車。運煌往返瀋長間，所乘已非通車，乃藉口候車在該處勾留一宵，欲藉此察視偽政府招搖之首都建築底裏究竟如何。故於旅館覓定後，即行趨出至所謂執政府附近及新在建築中之官舍區與原有之日租界等地作一度徘徊。事實上之滑稽幾無處不表示倭刺之可笑。一言以蔽之，所謂建築云云者，隨處宗倭，而又不能謂倭。察視歸來，偽警已倚門鵠候，手鎗傳牒，赫然在目，並有倭兵偕來，於是運煌乃以留德某校學生自居而登偽警署之堂。凡檢驗行李，查驗護照，應有盡有，居然認真，（均由偽警執行，倭兵似僅居監視地位）倭軍唔呀在側，似懂非懂。及其既去，偽警乃送運煌回旅館，闔門下鍵，改容敬禮低詢國內太平否，政府有意恢復滿洲否（此種問語，處處可以聽到，可見亡國後人民始感到國家存在之必要，亦可見滿洲人民眷念祖國的一斑也），並取所佩手鎗及倭軍給與之鎗彈指示其口徑不符，徒具形式。最後囑翌朝有軍作速離長，沿途勿再停留，即行辭去。運煌知已惹人注目，翌早搭車，目不斜視，蓋恐倭軍再

予留難也。車抵哈爾濱，意欲在彼小作勾留，購置皮手套，水果，乾糧數事，以備西伯利亞長途需用。但於下車存寄行李時，點寄行李之管理員（中國人）即知運煌來自國內，即囑立刻轉車赴滿洲里，並云此間危險，請去探聽即知；言時意態誠摯，若不勝其隱憂者。運煌聽爲事有危疑，從命如響，因此雖曾在哈站逗留兩小時，卒未出站門一步，所感到者，近站屋宇較勝於長春而車馬往來則遠不及耳。

此後經一晝夜而達滿洲里。該處爲滿洲最西一站，西行七里即入俄境。在站駐有倭軍及海關查驗處護照檢驗所等等。查驗行李之嚴幾至無紙不翻，無字不讀。運煌所携行李雖不多，所帶筆記正不少，於是即查驗一項已超出一小時，加以護照檢驗處之對簿問官，軍警書記，繙譯，兼俄倭僞三者而有之，高坐堂皇儼然問案，運煌周旋其間又約一小時，而西行之特快車已開行矣。

由滿入俄車輛每週僅兩班，特快車居最後。運煌既誤班，其勢非在該站逗留半星期不可。方疑權間，適有在護照檢驗處任口口與口口之XY二君會同前來照料，將運煌所有行李代存站中，並派一聽差小童導余至一中國澡堂後樓（滿洲里一面爲俄人住宅區，一面爲中俄日商

民混合區，余之所居即在混合區內）。堅囑留彼暫候，以俟二君來訪。此種做作，不能不使運煌奇異疑慮，但度其意良不惡，因亦安之。移時X君來訪，接談之次，即告運煌處境如何危險，應如何迴避，並述該地前為梁忠甲抗俄戰後所在地（當時為砲所毀之破瓦敗垣，尙歷歷在目），又為去年馬蘇李反倭起義策動地。在去歲九月二十七日曾將倭駐軍一聯隊繳械（不出兩小時），當場擊斃倭軍十六人，並向東推進幾至攻克哈埠。該地民衆激於屢次愛國戰役之刺激，讎倭心理極深，當日尤感情慨，與軍隊相與爲守，及馬軍敗退，倭軍捲土重來，乃大施其報復手段，自去年十一月至今年九月滿站居民先後失蹤者行近四百人（最先爲青年智識界，次及資產富裕之商人，最次及於居民）。運煌到滿站前一日即有二青年失蹤。運煌到站之次日即爲九月二十七日，是日倭軍已定爲哀悼紀念日，限令全市罷市，並舉行公祭，道場，會操，飛機表演，民衆學校運動會等事，人民若偶不經意，則又可以性命供彼輩兒戲。X君言時款款至於自比如燒鴨舖中之鴨，不知何日供彼犧牲。並問國內情形甚詳。臨去再三叮囑高臥勿出，以避外人耳目，蓋該樓房已經X君租下作余住處也。

此後余即鎮日臥此，整三四晚，未越雷池一步，凡一切飲食均由XY二君囑人送來。二君每日必來少坐片刻（由澡堂前門進，無人知其爲訪友也），縱談滿州目前紛亂情形及倭軍如何虐待奴視滿洲人民與一切亡國苦痛。據云，目今從交通線說滿洲則全滿已入倭軍掌握，但從各農村說，則滿洲仍爲中國之滿洲也。運煌聆之凜如●當再叩以哈埠情形。據云，哈埠原爲滿洲商業中心，事變以後，商情頓形慘淡，目前已成爲北滿之恐怖區域，蓋義勇軍爲擾亂倭人商場起見，常派少數便衣隊襲入該埠，截斷一部份交通，檢查行人，凡察覺其爲倭人口音者即鎗殺之，其行徑殆等於上海之搶匪，事後遽颺即同黃鶴，倭人極感防範之無法，但爲對付起見，亦常派巡軍斷絕某處交通，檢查行人，凡遇非本地口音者即鎗殺之。因此哈埠幾已成互相屠殺之黑暗市場。倘余之不幸遇此，固不可免，即倭人有意摧殘，亦莫奈何。危險之大，視滿洲里有過之無不及也。

在運煌離滿站以前，二君曾代購車票，食物，並代送行李上車，及運煌到站上車，與二君相值，轉若毫不相識者。亡國慘痛，觸目刺心！狼狽情形非片言所能盡述！

# 編輯後記

適之

△本期裏最有趣味的一篇文字，自然要算小招先生的「參加福州人民代表大會記」了。這篇文章是從福州寄來的。

△小招先生提到福州大會時空中飛的飛機，使我們想到這幾天中外報紙上記載着飛機在南昌福州漳州轟炸的消息，更使我們回想到去年五六月裏北平空中每天飛着的日本飛機。當日本飛機在北平市空中成隊飛行的時候，南苑清河的中國飛機都不知道飛到那兒去了！

△我們也知道打仗是打仗，說不上什麼人道不人道。但我們終不忍不希望各方面飛機上的勇士要想想「殺的是中國同胞，毀的是中國地方」。

△吳景超先生的「革命與建國」也是討論蔣廷黻先生和我在本刊前幾期討論的「革命，專制，建國」的問題的。吳先生是清華大學的社會學教授，這半年中他在本刊發表過許多篇重要的論文。

△陳運煌先生的「冒險過僞國記」是他從德國寫給他

的朋友吳學蘭錢臨照兩先生的長信的一部分。承吳錢兩君鈔寫送給我們發表，我們很感激。

△清華大學沈同先生的短文「民族的優生」，提醒我們一個很迫切的大問題。三十多年前，嚴復先生譯完天演論，在自序中說：「祖父雖聖，何救子孫之童昏也哉？」一個民族決不能依靠祖宗的光榮過日。祖宗的光榮是祖宗的；救不了我們亡國滅種的大禍。我們這個民族現在走的沒有一條不是民族自毀的路！

△何德明先生寄贈一冊「幸福的哀歌」，（北新書局，價二角半）薄薄的小冊子，只有十五首詩，都是很清麗的情詩。我們鈔一首我們喜歡念的「你問我」：

你問我對你有多少愛？

這話叫我怎樣回答；

正如問天有多少大，

誰也不易知一個梗概。

你問我對你有多少情？  
這也叫我無法說明；  
正如問海有多少深，  
誰個也不會衡量得清。

請你別再問我一個字，  
你的心也別這樣痴；  
我要愛你愛你到死，  
你不要不要我再起個誓？

近來做詩的人好像努力求人不讀，很少有這樣流利可喜的詩句了。

(適)

### ◎獨立評論合訂本出售

本刊第一至二五期和第二六至五十期及第五一期至七十五期，現在補印齊全，分別裝訂成冊。極適於圖書館及私人收藏之用。價目：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 外交

## 月報

第三卷第六期

中國東北問題在國際間的出路.....張忠絨	零售 每册大洋三角 國外五角
西南邊疆問題與雲南.....張鳳岐	半年六期 國內一元五角 國外二元五角
國際公法與武力解決國際糾紛.....姚會慶	全年十二期 國內三元 國外五元
最近日本侵略華北之急進.....方秋章	郵票代價不折不扣
上海租界外馬路問題.....金重威	社址 北平府右街運料門裏外交月報社
美俄外交關係與中國(續本卷五期).....張慎修	
最近日本外交之演變.....東帆譯	
莫斯科的外交關係.....王樹濤譯	
顧代表在本屆(第十四屆)國聯大會演說全文批民譯	
美俄復交關係文件.....拙民輯	
由對外關係史上檢點來路瞻望出路.....老馬	
從國際現實情形觀察中國外交的出路.....野漁	

##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圃」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 定價

本市	每月一元
朝鮮台灣日本及	每月一元二角
其租借地	每月一元三角
香港	每月一元四角
澳門	每月一元五角
南洋	每月一元六角
歐美	每月一元八角
四元	每月一元



# 武力統一論

胡適

——跋蔣廷黻吳景超兩先生的論文——

在本刊的第八十三期，蔣廷黻先生有一篇「論專制，並答胡適之先生」。同時吳景超先生也寄了一篇「革命與建國」來，登在本刊的第八十四期。這兩篇文章雖然是各不相謀的，其中有許多互相發明的地方，所以我把這兩篇參合起來討論。

蔣先生說：

近代國家每有革命，其結果之一總是統一愈加鞏固及中央政府權力的提高。……我們的革命反把統一的局面革失了，而產生了二十餘年的割據內亂。這又是什麼緣故呢？

他這一問，吳景超先生已代他回答了。吳先生根據歷史的先例，說中國每一次革命可分作八個小階段，合成三個大階段：（一）從苛政到革命，為舊政權打倒的時期；（二）從群雄割據到統一完成，為新政權創立的時期；（三）從施行善政到和平恢復，為建國的時期。他說：

我個人的私見，以為自清室推翻以後，這二十餘年

，我們鬧來鬧去，還沒有跳出革命的第二期。……我們如用歷史的眼光來看，中國近二十餘年來的混亂，乃是革命中必走的過程，而且二十餘年還不算是最長久的。

中國革命只做到了兩三次推翻舊政權，還沒有做到統一的新政權的建立；這一點我想蔣吳兩先生都會同意。可是一問「為什麼舊政權推翻之後必須經過一個群雄割據的階段？」他們兩位的解釋就不同了。吳景超先生根據中國歷史，說：

舊政權推翻之後便有群雄割據的情形發生的原因，第一是因為參加推翻舊政權的人，除推翻現狀之外，對於別種主張，別種政策，并不一定有一致的信仰，所以每于現狀推翻之後，便分道揚鑣了。……第二是因為各人都有野心，所以在野心與野心相衝突的時候，革命的勢力便分裂了。……

蔣廷黻先生另有他的解釋，他說：

不是軍閥把中國弄到這種田地，是這樣的中國始能

產生軍閥。……因為中國人有省界縣界的觀念，所以割據得成家常便飯；又因為中國人的窮，所以軍閥得養私有的軍隊。……總而言之，軍閥的割據是環境的產物。環境一日不變，割據就難免。……

可是蔣先生在下文又提出一個比較簡單的解釋：

統一的敵人是二等軍閥和附和二等軍閥的政客。每逢統一有成功可能的時候，二等軍閥就連合起來，假打倒專制的名，來破壞統一。

這就和吳先生的解釋很接近了。

現在姑且不討論這些解釋是不是正確，我們先看他們兩位提出的統一方法。吳先生根據歷史的先例，說：

在中國歷史上，幾乎沒有例外，統一是以武力的方式完成的。……

在群雄割據的時期內，除却武力統一的方式外，我們看不出還有什麼別的方式可以完成統一的使命。

……

蔣廷黻先生說：

破壞統一的既是二等軍閥，不是人民，統一的問題就成爲取消二等軍閥的問題。他們既以握兵柄而割據地方，那末，惟獨更大的武力能打倒他們。……

這樣看來，蔣先生所要的「專制」，原來並不是獨裁的政治制度，原來不過是希望一個頭等軍閥用武力去打倒一切二等軍閥，原來就是吳先生說的「武力統一」。這還是吳先生說的三期革命的第二期的事業。即使我們完全讓步，承認武力統一的必要，那也還只是承認了一個「馬上得天下」罷了，還談不到「馬上得天下」以後應否用專制或用民主憲政。換句話說，武力統一是一軍事問題，在孫中山先生的三期革命裏只屬於第一期的「軍政時代」的「肅清反側」的事業。（吳先生的第一第二兩個階段，都屬於中山先生的軍政時代。）我們姑且放下那政治制度的專制問題，先來談談眼前的統一工作的方式。

我們先要溫習一點現代史，先要記得武力統一是在這二十餘年中已做到好幾次的了。民國三四年的袁世凱，豈不是做到武力統一了？民國十七年北伐完成時，又豈不是做到統一了？蔣廷黻先生也曾說過：

我們更加要注意：以袁世凱及吳佩孚一流的人物，離統一的目的，僅功虧一簣了。

我們何不更進一步問問：袁世凱及吳佩孚，以至於民國十七八年的蔣介石，爲什麼離統一的目標終于「功虧一簣」呢？是不是因爲這幾個人的武力不夠大呢？是不是因

爲他們的個人專制還不够專呢？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原因呢？究竟這「一贊」的關鍵在什麼地方呢？

蔣先生說：

每逢統一有成功可能的時候，二等軍閥就連合起來，假打倒專制的名，來破壞統一。

這是說二等軍閥。他又說：

士大夫階級反對專制的議論，不是背西洋教科書，就是二等軍閥恐懼心，忌妬心的反映。

這是說士大夫階級。我們要問蔣先生：那抓住中央政權的頭等軍閥有沒有失政，應不應負一部分責任呢？在那些「西洋教科書」還沒有出世之前，司馬氏父子三代平蜀平吳，做到了武力統一，爲什麼不上二十年，就鬧成「八王構兵」「五胡亂華」，鬧的中國分裂到三百年之久呢？隋朝的楊氏篡周平陳，統一了中國，爲什麼也不到二十年，就鬧到群雄蜂起，天下分裂呢？遠史且不談，袁世凱的「功虧一簣」是不是他自己和他手下的梁士詒一流人應負責任呢？吳佩孚的「功虧一簣」是不是他自己和他所擁戴的曹錕一黨也應負責任呢？

最可惜的，自然是民國十七八年的統一局面的崩壞。民國十五六年的國民革命軍北伐，真是能號召全國感情的

一件空前大壯舉：許多少年人的投效黃埔軍官學校，更多少年人在各地的秘密活動；還有許多中年老年人也受了那個運動的震盪，都期望它的成功；那種精神上的統一，是中華民族史上絕無僅有的。如果民十五年的一些幼稚舉動引起了士大夫與商人階級的疑慮，至少在南京政府成立以後，絕大多數人的心理是贊助新政權並且渴望統一的。在那個全國精神上一致的大運動之下，張作霖也不能不退出關外，張學良也不能不承認新政權。民國十七八年的統一，不是全靠武力的，是靠那武力背後的全國比較的一致的新精神——可以叫做新興的民族主義的精神。

然而這個新統一的中國是怎樣又破碎了呢？破壞統一的罪惡是不是全在「二等軍閥和附和二等軍閥的政客」呢？是不是因爲士大夫階級讀死了西洋教科書因而反對專制，所以助成統一的崩壞呢？是不是頭等軍閥也應該分擔一部分或一大部分的責任呢？是不是那些不背西洋教科書而夢想個人專制的政客黨員也應該分擔不少的責任呢？

說起「二等軍閥」，我們應該還記得，兩個月削平了桂系，六個月打倒了閻馮，似乎二等軍閥也算不得怎樣難對付。可是當日那些最可怕的二等軍閥打倒之後，統一在那裏？和平又在那裏？今日割據的局面是不是比民國十七八



年減低多少了嗎？福建的變局不用說了。馮玉祥倒了；起來的是韓復榘宋哲元等等。閻錫山倒了；現在又在娘子關裏努力他的模範省了。桂系倒了；現在李宗仁白崇禧又在廣西第二次造成他們的模範省了。四川的割據如故，雲南貴州的鞭長莫及如故。廣東是比李濟琛時代更獨立了。難道我們到了今天還只能提出一個「惟獨更大的武力能打倒他們」的方案嗎？

「武力統一」，「用更大的武力打倒二等軍閥」，這種理想，當然有人在那兒夢想實現的，用不着我們去教猴子上樹。我們的責任是要研究這條路究竟走得通不，是要看看是不是真的「除却武力統一的方式外，沒有什麼別的方式可以完成統一的使命。」

老實說，我不信武力統一。是走得通的路。我的理由，其實蔣廷黻先生已代我說過了。他說：

毛病不在軍閥，在中國人的意態和物質狀況。

他說的「意態」是說「中國人的頭腦裏有省界」；他說的「物質狀況」是說「中國人的窮」。然而蔣先生却又主張「唯一的過渡方法」是個人專制，是用武力打倒二等軍閥。難道武力統一就可以破除「中國人頭腦裏的省界」，就可以打倒「中國人的窮」了嗎？既然「毛病不在軍閥」

，蔣先生如何又說「統一的敵人是二等軍閥」呢？

我要套用他的話，說武力統一所以行不通：

毛病不在軍閥，在中國人的意態和物質狀況。

先說「毛病不在軍閥」：現在的二三等軍閥，實不啻中央軍隊的一打，我想這是他們自己也知道的。如果十九路軍這回也失敗了，中央軍隊的武力的優越，更不成問題了。所以若單以武力而論，中國今日的統一應該可以不戰而成功的了。次說「在中國人的意態和物質狀況」：意態不是蔣先生說的「省界」；二十餘年前，中國的省界何嘗不比現在更深？何以那時的省界無礙於統一呢？何以當日建立帝國的政治家能造出科舉的方法和迴避本省的制度，使省界觀念反成爲統一的基礎呢？我所說的「意態」是指中國智識思想界的種種衝突矛盾的社會政治潮流。例如昔日的汪精衛一派，今日的胡漢民，可以作政治上的妥協，而不是武力所能打倒。又如今日的共產黨以及無數左傾的青年，也不是單靠武力所能掃淨。武力也許可以破滅紅軍，特務隊也許可以多捉幾個共產黨，但那種種左衝右決的社會潮流（包括種種蔣先生說的「反對專制的議論」）是不是武力所能統一的呢？何況中國今日最有力的新意態是外患壓迫之下造成的一種新民族觀念，它決不容許任何頭等軍閥用

他的武力去征服全國。這種新意識一面能使張學良下野，一面也能使蔣介石不能挽救韓復榘的驅逐劉珍年。

我說的「物質狀況」也不單指貧窮，雖然貧窮也不是武力統一所能掃除的。我所謂「物質狀況」是說中國疆域之大，和交通之不便。這都是武力統一的絕大障礙。四川雲南，貴州，今日中央軍隊有何辦法？新疆的混戰，中央軍隊有何辦法？廣東廣西的獨立，中央軍隊又有何辦法？韓復榘打劉珍年，中央軍隊又有何辦法？閻錫山閉關自守，中央軍隊又有何辦法？即使半年或一年之內，福建與江西都解決了，難道這幾十萬的中央軍就可以抽出來南征北剿，東征西討了嗎？

所以我說，今日武力統一是一是走不通的：

毛病不在軍閥，在中國人的意態和物質狀況。

蔣先生和吳先生都曾指出種種「別的方式」，「從事實上看起來」都絕不能行。我們在上文指出「武力統一」的行不通，難道不是事實？例如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如果他們不造反，不出兵，只努力做「保境安民」的事業，難道中央政府好意思下令討伐廣西嗎？又如四川的大小軍閥，既不保境，又不安民，確應該如蔣先生說的「拿一個大專制來取消這一些小專制」了。然而「從事實上看起來」

，今日的頭等軍閥是否能下決心用武力去平定四川呢？爲什麼不可以討伐兩廣？爲什麼不可以討伐四川呢？簡單的很，中國人今日的新意識不容許無名的內戰；中國的物質狀況也不容許那一點子中央軍隊去做西征南伐的武力統一工作。

最後，我對於蔣吳兩先生的論文，還有一點根本上的質疑。蔣先生很嚴厲的說：

西洋的政治和中國的政治截然是兩件事。在我的眼光裏，這是一件明明白白的事實，排在我們的面前

然而蔣先生有時也不免引證西洋政治史的事實。在同一篇內，他也曾引證英國的頓頭，法國的布彭，俄國的羅馬羅夫，說「君主專制在這些國內曾受人民的歡迎」，他因此判定「從〔中國〕人民的立場看，個人的大專制是有利的」。我們依據蔣先生的中西政治截然兩事的立場：不是也可以說：

西洋的政治和中國的政治截然是兩件事。十五六世紀的英國頓頭朝，十六七世紀的法國布彭朝，十八九世紀的俄國羅馬羅夫朝，和二十世紀的中國史載

然是四件事。所以者何？地理不同，民族不同，時代更絕不同，似未可相提並論。

關於吳先生的歷史方法，我也有點懷疑，歷史是「不再來的」，所以一切公式比例，都不能普遍適用。即以中國歷史上朝代革命來說，秦亡於民間的革命，而齊民革命的劉氏享國四百年，以後就沒有同樣成功的革命了，直到明朝的革命成功，才有個略相似的例子。此外如魏之代漢，如晉之代魏，如隋唐之代周隋，如五代之相繼，如宋之代周，如元清之代宋明，皆不是同比。即以漢比明，也有截然不同之點。如楚漢是先推翻秦的政權，而後相爭；而明太祖則是先削平群雄而後打倒蒙古的政權。又如自王莽曹丕至趙匡胤，政權移轉都由于權臣篡位。而自從宋以後，大概是因為理學的影響，權臣篡位竟全絕跡了。二千年來，政權轉移的方法實在太簡單。古之所有，今未必有；古之所無，今何妨有；吳先生因為「在中國歷史上，

幾乎沒有例外，統一是以武力的方式完成的」，就以爲今日除了武力統一之外，沒有別的方式可以完成統一的使命。這未免太拘泥于歷史例證了。

吳先生說：

我們根據中國歷史的分析，革命實分三個時期；現在還是一個群雄割據時期，說不上建國的大事業。這是迷信歷史重演的態度，我認爲最不合邏輯，並且含有最大危險性。即如「善政」一項在吳先生的八個階段中，列在第七。如果中國五十年不能完成統一，難道這五十年之中就不能有「善政」嗎？

今日政治家與政治學家應該研究的問題正是如何能縮短這個割據的時期，如何在能這個割據時期做到建國的大事業。

一九三四，一，七。

## 福州經濟的崩潰

小招

福州現在是另一個國家的首都。這個國家除了十幾個這裏的中委至於數十個次要人物以外，誰也都知道給一

般民衆是毫無關係的。有關係，那就是要拿出錢來。本來人民錢總是要拿出的，那個政府也是都要錢的。所以，國

民政府也罷，人民政府也罷，反正人民拿出錢過苦日子就是了。不過要錢的程度也有凶不凶的分別。好比說，現在的街上雖然還掛着布條的標語說「取消一切苛捐雜稅」，可是家家戶戶的門口都貼着「城防捐收訖」和房舖捐的「收到冬季」的小條。房舖捐在楊樹莊方聲濤時代就要舉辦，但是商民反對，至於連救火會都出來反抗。但是十九路軍來到以後，收捐沒有困難，綏靖公署可以出佈告勸人民快快納捐到房舖捐局的，房屋的估價也任憑官廳規定，不因爲別的，因爲後面有救國抗日的十九路軍。

十九路軍開進福建，福州人到現在才知道後悔。當時福建人歡迎他們，京滬福建同鄉去請他們，大家看他們是救國的軍隊。蔡廷鍇蔣光鼐進城的時候，小巷裏的婦人也跑出來看看所謂民族英雄，有的舖子擺出香案（是接神的儀式）來接十九路軍。那時連我看到軍隊背着的草笠上寫着「十九路軍」，心中都感到興奮。

十九路軍到福建不久以後，福州各機關大多改組，後來省政府也改組，各機關全都是廣東人和外省人，於是各機關的主要人員也跟着換了，從前福州人好多做「科秘」的，這時一律回家，一百塊錢以上的薪水在福州很難得到，連在街上都很少看見坐包車的了，當然連車夫都要喊苦

了。

一個地方有一個地方的經濟狀況。好比說廈門的經濟狀況是受南洋華僑生意的影響，南洋生意好，能够賺錢，廈門的市況也好；否則也壞。福州人做官的極多，靠做官吃飯的極多，所以福州的經濟基礎有大部分靠在做官上，現在官做不成，還有不影響嗎？

幾月前，根據南街郵政局某局員的統計：只那一所郵局平均每天匯往廣東四千塊錢。南台還有一所郵政總局，各銀行各錢莊都能匯款，總數去那裏去計算？滙別處的更無法統計。福州人後悔了，但是晚了。

於是街上大拍賣了，從前一塊多錢一尺的綢緞現在只賣四五毛錢也少有人過問。成衣舖的老板，因爲辭退夥計，被夥計搶了，也沒敢還手。其他百業，按此類推。

但是拍賣還是拍賣。館子也拍賣，葯材舖也拍賣，老年人都說沒看見過，大概人病都不吃葯了麼？拍賣，拍賣！讀書人的廉恥也拍賣，女子的嬌媚和貞操也必須拍賣。最後把國家拍賣了完了。

什麼生意都蕭條。當舖一向算是最好的買賣，但是現在呢！滿當的貨，十八個月二分四釐的利息不算以外，平均按照當價的七成發賣。有人說現在還不够七成呢！現在

有的當舖是限制每天贖當的錢當出，錢用完當舖也關門，資本家不肯投資，是真可惡，該打倒！

我聽說有人拿二兩重的金鐲去當，當舖夥計隨口說當二十塊，奇怪是那人竟也首肯，「二十塊就二十塊」。結果當舖的櫃裏竟還不够二十塊錢，夥計說：「對不住，請你到別間鋪子，這裏剩一點錢要分給當二毛錢四毛錢的窮人。」

城市如是，鄉村更壞。

以前上游每年中可以供給福州幾個月的米，現在上游鬧共匪，不能出米。福州全吃海米以外，還要運進海米供給上游。

福州有什麼的出產！這時能出一點橘子，但是船被封鎖，運出不易，將來一擔擔的橘子爛了，也不能變出一點的錢。

地主聽說新政府實行土地公有，計口授田，倒都歡喜，希望快點實行。因為許多田地於他沒有好處。因土匪荒年的關係多年來收不到東西，還有因交通斷絕（大多是收成時鬧匪）不能過去收米，只得白給佃農或土匪。但是錢糧田賦不能少一個。常有沒人耕種，不出一毛的田，官廳照樣的收到錢糧。還有預繳錢糧，那更是普遍的現象。所

以地主現在倒怕維持現況，還喜歡打破現況，犧牲土地，免去繳錢糧。由是看來，新政府是向自己不上算的事去做——地主暗裏好笑。

許多學者念些根據外國情形而寫的書本，回到中國來，就大喊大資小產，階級鬥爭，有一個真考察過中國實地經濟狀況嗎？考察過中國內地的經濟狀況嗎？真的弊病在那裏？救濟方法如何？真和書本相符嗎？我看滿不是那回事！（中國的階級情形大反乎外國，我以為在中國要分帝國主義者，軍閥，資本家和地主，勞動者四個階級。根據經濟上的壓迫和剝削情形，確是如此。）可憐的社會主義者！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病，看了別人的醫方固然可做參攷，豈有照別人的藥拿來硬要自己吃！時髦的主義者，你們還是再用一點實踐的功夫，拿出科學精神來！

新政府雜湊的成立，也不知道用什麼主義，大概總是做官搶錢，設立許多委員會，製成許多新貴。一個省政府，福建人供給不起，現在要供給一個人民革命政府，軍事委員會，經濟委員會，文化委員會，財政部外交部，四個省政府，好多個方面軍，還有許多機關，連我在福州的人都數不清。這些機關當然開銷錢，錢當然向人民拿。房鋪捐再捐三個月，契稅也在舉辦，土地稅也在籌備，別的捐

稅名目，只要字典上還有字，怕有什麼不能成立的呢？

昨天財政部佈告說，正當捐稅照舊繳納，人民豈得誤會，影響稅收！一面部長蔣光鼐談話，爲保障不動產而舉辦契稅。好極了，全閩人民敬聞命矣！

陳銘樞在人民革命政府中央委員會提議設立人民劇場，設備費三千元，每月經費五百元，派歐陽予倩籌備。你看這位人民革命的領袖，多麼會替人民謀利益，怕到人民

## 常識與考古

劉 咸

常識是一切智識的根本，應用最廣，人生自識事以至於無論研究何項學問，沒一處可以離開常識的。一個人生在社會上，儘可以沒有專門學問，但不能沒有常識，因爲專門學問不是人人可以有的，而常識則爲人人所不可缺。專門學問要經過特種的訓練，和學習，然後才可以得着，常識則只要隨時隨地留心，凡事用一己的聰明智慧，理解判斷，就可以得着的。所以常識豐富的人，不一定有專門學問，反之，要有專門學問的人，必須要有豐富的常識爲根基，二者的關係，是異常密切的。

推廣來說，各種專門科學起始，都不過是一部分常識

沒有戲劇看，拿出這麼多錢來用，請許多藝術家，給人民散散心。這只是一例，其他的領袖當然也隨時如法泡製着許多或大或小的機關，如此這般的爲人民謀利益。

新政府有新的經濟政策和變動的政治方案，如同換旗，改元，改服裝，縮小省治等等。大家都說是好看的真戲。戲好看，票價當然要貴。人民是不得不看的。

「元年」十二月十六日，福州。

的特殊化，因爲殊特化的程度愈來愈大，於是乎離開常識的範圍也愈來愈遠了。所以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說：『科學非他，有系統的常識而已。』赫胥黎 (T.H. Huxley) 也說得好：『科學是有訓練，有組織的常識。』可見科學和常識的分界，是很微細的。要是有人能把某種科學的常識，有組織的，有系統的認識他，就立刻可成爲某種科學家了。

科學常識，我國人最缺乏，其原因很多，一方面由於科學不是我國固有的，社會上沒有科學智識的留傳。另一方面是由於受過科學洗禮的，有相當科學訓練的太少。所

以每逢遇到有關科學的問題時，經過一個沒科學常識的來轉述，不是囫圇吞棗，就是畫蛇添足，結果往往真相全非，謬誤百出，所以我覺得處在現在二十世紀科學萬能的時代，我們中國人求常識要緊，求科學的常識更要緊。

考古在我國是件老東西，不過用科學方法來考古，到是近年來所有事。我國已往的考古，嚴格講起來，不能算是考古，只可說是玩古。就是以蒐集古器，作種種文字上，記載上的攷斷而論，充其量，也不過是作了考古學上的一小部分工作，結果產生了金石學。金石學的目的，是在研究器物上面的文字，以作研究經史的參攷，和考古學的性质，很不相同。猶之本草經和植物學，占星術和天文學，堪輿術和地理學，煉丹術和化學的關係罷了。換句話說，金石學多半是作書本考據的工夫，不是作鍬鏟的工作，向地下求真實的證據。

因有上述的背景，近年來從事考古學研究的，往往仍被一般人所誤解，不認考古學有闡揚文化，延長歷史，追求人類進化程序的貢獻。尤以在田野工作時，更被一班人所議論，不說是挖墳掘墓，暴露白骨，有傷忠厚，即說是利取葬物，到處「挖寶」，想發「洋財」。鄉愚無知，認考古為挖寶，固不必說，往往智識分子，也認考古是件太

平盛世的事，無關國計民生，不加重視，仍以從前玩古的態度看待，那未免沒有認識近代考古學的重要，和他闡揚一國文化的功能，增加民族自信心的使命。並且我們還要明瞭的，就是要解決目前中國的國計民生問題，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也不是幾門應用科學所能奏效的。應用是倚仗純粹科學的，考古學是門純粹科學，同時可應用的地方也很廣，所以不要把他當作科學上的一件古玩，是粉飾太平的一回事。他直接的，間接的，關係國計民生的地方很多，至於他增進我們已往的知識，那更是和歷史學，歷史地質學有同樣的價值。尤其在中國，要想把疑古和信古兩派的官司，得看個最後的公平判決，更非仰仗科學的考古學不成。

至於說到挖墳掘墓，法所不許，暴露白骨，有傷忠厚一類的話，也應當有個相當的解釋。我們要知道鍬鏟考古工作，不一定就是掘墓，凡是認為於考古智識上有關係的，都得發掘，像一個河底，一個山洞，一個土丘，一座古城，祇要包藏了洪荒時代，或古史時代的遺物，可以證明文明進化的痕跡，我們都得發掘他。同理，要是某處古代墓葬，關係某一時期的文化，我們當然也得發掘他。考古學家發掘古墓，是有目的，有方法的，不是隨便亂挖，更

不是利取葬物，是要由這古墓的蘊藏中，研究當時的文物，典章，制度，人情，風俗，殉葬物的貴賤，在考古學家眼光中，是一樣看待的。甚至一件石器，比一個鐘鼎還要更有價值，一片碎陶，比一件玉器還重要。至於利用朽爛的枯骨，來作科學研究，本說不上有傷忠厚，否則年代久遠的枯骨也不過是化塵土了。所以考古的掘墓，本係出於不得已的舉動，爲的是找智識，求學問，別無目的。

近代科學的考古學，不是一門簡單的學問，除有他本身的立場，得稱爲科學外，和其他科學的關係，異常密切，像人類學，（包括人種學，民俗學，）地質學，歷史學，化學，建築學等等，都於考古學有極大的幫助。所以一個考古團，除了考古學家以外，同時得請許多別的有關係的科學家，參加工作。近代的考古工作，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個個人可以做的，和以前玩古的性質，大不相同了。

這次魯南滕縣的考古，報紙上的記載，可說是詳細得很。什麼談話啦，專電啦，長篇大簡，不斷地登載。其實呢，這次發掘，因爲範圍很小，並沒有什麼特別重要的發現，值得擴大宣傳的。在新聞記者，採訪不厭求詳，在湖風瀛洲中，熱心地追隨在考古場所，記載發的掘情形，發爲

新聞，宜之報章，引起國人對於考古的注意，這種精神和立場，當然值得我們贊佩的。不過言過其實，往往足失真相，描寫入微，不免畫蛇添足，所以上月各報喧騰的滕縣考古記事，有許多地方，和原來事實，頗有出入，應該更正，以明真相，免得以訛傳訛，致失科學記載的確實性。

我所要特別指出來的，就是關於人骨的問題，因爲他超出常識範圍的錯誤太多。此次安上村一共發現了比較完整的人骨五副，就有老年男子一個，青年女子一個，未成年三人。此外還有些破碎的骨骼，分屬於兩人或三人。因爲不完整，性別很難說。就地層的深度和出土的物器說，這些骨骼，至少可分爲兩個不同的時期：一個據說是石銅並用時期，那老年男子和三個未成年人都屬這一期。因爲在他們墓穴的鄰近地層裏，發現了些石器和銅器。他們的葬法，都沒棺槨，只用葦席，殉葬物除在那老年人頭邊找出兩個被繩紋陶器外，一點什麼也沒有。還有個時期，無疑地是春秋戰國期，那青年女子屬於這一期。除她身旁殉葬的九件陶器，有豆，鬲，敦，盤，鼎，匜等器皿，可以證明外，還有今年春間最先由鄉人發現的那十四件銅器，離開她雖有一丈多遠路，可是在同一個平面上，同一個直綫的地層，也可以證明與她的時期有關係。那十四件



銅器的主人，因被鄉人發掘，骨骼已散佚不全，僅存腳頭蓋骨一小塊，下連眼眶一部分，斷了的大腿骨兩根，餘均破碎，似爲女性。再由銅器上銘詞考證，是邾夷父爲嬴氏而作，其年代斑斑可考。

這五副骨骼，由體質方面看來，並沒有不正常，或表現一點特異的地方，就是那石銅並用時期，或冒險一點說，新石器後期的老年男子，自頭到腳，他的骨骼和我們現在的人，並無二致。這些，是我對於此次安上遺址出土的人骨，所要負責發表的意見。

凡是略有演化論初步知識，或是學過人類學概論的人，都不曾相信人類在幾萬年的短期內，走路是手足同用的。我們知道人類體質的進化，是異常之慢的，要想在體質方面看出古人和今人的不同來，至少是幾萬年或幾十萬年的事。至於人類祖先解放了手，專用腳走路，那時代更悠遠了。十一月二十二日前後，各報載稱：『人骨中有一脛骨，較今人細而彎，足見上古人行路，手足同用，以後進化，漸分手足』云云，實爲超出常識範圍的絕大錯誤，非鄙人對於本問題而發的意見。這一段笑話的來由，是在安上村的一天晚上閒談，曾說到由猴猿到人類的一段故事，曾說到猴猿行路，手足同用，我們的老祖先也經過這階段

。（這裏讀者又不要誤會，由猴猿到人類，並不是說人類是由猴猿進化來的，我們曉得人類和猴猿是共祖宗的，彼此的關係，是堂兄堂弟，或者是表兄表弟。）專電上弄得牛頭不對馬嘴，只有讓專電負責去，這是我頭一要聲明的。

還有同月二十五六日前後，各報復載掘出國色遺骸的一段故事，可說是香艷極了。我們都知道一個人美的醜是要靠顏面膚色表現的。憑幾根枯骨，來推斷她是國色的遺骸，恐怕大解剖學家，大藝術家，也未必有辦法。但引出「國色」兩個字來，却又有段故事。前面所說的那十四件銅器，據專家攷證，斷爲爲嬴氏而作的。按公羊傳云：『邾之世系爲曹姓，係子爵，周武王封陸終之後曹挾於邾爲附庸，後六傳至曹父，生夷父及叔術二人，夷父名顏，居長，承國，爲魯大夫鮑廣父及梁買子僇訴於周天子所殺，以叔術承國。夷父顏娶於嬴氏，嬴氏國色也，謂有能殺顏者，卽爲其妻。叔術爲之殺廣父及買子，嬴氏遂再嫁於叔術，而生盱，嬴氏前已生子夏父，由叔術并養之。……』在寒夜的鄉村中，萬籟俱寂，一燈如豆，只有說說笑話，可以聊破岑寂。我們的總指揮董先生，是一向妙語天下的，爲引起工作人員的興趣起見，就說了這一段國色嬴父

氏的故事，原也不過是當作茶餘飯後的笑話談談。誰知被有聞必錄者聽見，又添加了好材料，認為掘出的遺骸，就是國色鳳氏。寫來有聲有色，造成這一段考古學上的佳話，却也很有意思。至於『嗅之猶有餘香，』到不是指那枯骨而言，是說那爛餘的棺木屑，這是在場嗅過的人，都知道的，並不是一句假話。這一段故事的來源，也是值得聲明的。

## 漫游散記(二十一)

### 東川銅鑛

#### ●歷史

三十年前嚴又陵論鑄銅元的害說，中國是以銅為本位的國家。這是極有見解的一句話，因為國家鼓鑄的貨幣，是銅的。前清一代銅政是行政上絕大的問題。從乾隆三年到咸豐初年，戶部每年撥庫銀一百萬兩向雲南辦銅。那時中央政府的支出每年不過幾千萬兩。辦銅的費用要佔中央支出百分之一以上。雲南是銅惟一的來源，而雲南的銅百分之八十以上出在東川。其實大多數的銅廠屬于巧家廳。因為東川府是辦銅行政的中心，所以東川銅鑛變為公私文牘

此外小一點的記載錯誤，像說瓦缶就是古樂器，曹玉墓的石壙，是漢人避亂的石室之類，不必多舉了。總而言之，讀此項記載的人，不必以詞害意，深文周納，更不要斷章取義，曲為解說，要曉得報紙上的說話，有許多並不是談話的人所說的；更要曉得考古的定論，是要看最後的正式報告。請看將來騰縣考古最後的報告是如何！

二十二年雲南起義紀念日，於青島。

丁文江

上通用的名詞。我民國四年從雲南回來會做了一篇「東川鑛政沿革攷。」因為種種的關係始終沒有發表。現在我把牠節錄在這裏。

一，乾隆三年以前 東川一府，舊為祿氏土司所屬，明洪武中始受節制。雍正以前，皆歸四川管轄。現時所開各廠，究創始於何時，求之典籍，皆無可攷。直至前清康熙三十六年，東川銅廠，始見於公牘。自三十六年至雍正四年，聽民納課開採，初與官吏無涉。其稅額產數，皆不可攷。雍正四年，東川府改隸滇省，遂由滇委道府總理其事，招集商民開採。先發資本，

後收所出之銅作抵。是爲東川官辦銅礦之始。是時課稅值百抽十；每出銅百觔抽課十觔，餘九十觔，以銀六分一觔，由公家收買。所買之銅，運貯東川銅店，或委員運赴江廣發賣，或轉運四川永寧，貴州威寧撥賣各省糧道總理。故自雍正四年至乾隆三年，官辦東川各廠，實爲完全專利營業性質；資本出之於官，採煉任之於民，營業之利，又歸之於官。用意與鹽法略同，故亦有槽戶爐戶炭戶之稱；開採者爲槽戶，煉冶者爲爐戶，採薪者爲炭戶。資本由官出，銅價由官定。驟觀之槽爐炭三戶似無大利可圖，然攷其實際，當日東川各廠，每年產銅不下六百萬。歸官採買者，纔不過八九十萬，故此八九十萬之銅，雖祇可領官價，其所餘之銅，仍可自由貿易，而當時滇銅市價，每百觔已在十兩以上，爲鑛商者，固仍不以官價爲困也。

(見王大岳銅政議)

二，乾隆三年至咸豐初年 乾隆三年以前，京師鑄錢所用之銅，大悉採自外洋（見戶部原奏）。及滇省產銅日旺，銅價頗賤，（洋銅價百觔十六兩，滇銅約十兩餘）乃有停辦洋銅，改採滇銅運京供鑄之議。於是京歲撥銀一百萬兩，每年由東川各廠，額解京銅四百四

十四萬斤。六年增至六百三十三萬一千四百四十斤。半由廠發運尋甸，至威寧轉運鎮雄南廣；半由東川轉運昭通瀘州。收銅之法，每銅百觔，抽課十觔，收耗銅五觔（未幾改爲四觔二兩）。每銅三百五十觔，收捐銅一觔。所謂耗銅者，本以備沿途磨擦折耗之用。按銅質堅硬，初無折耗之可言。蓋當日馬夫船戶，沿途偷漏，損失頗多，解運官時有被累者，故以此補之。後因爲數過多，乃酌提一斤爲糧道養廉，三斤歸公，故當日京運，常有正耗銅名目。由是觀之，爐戶出銅百斤，其可以向公家領價者，不過八十四斤十二兩有奇。以雍正五年所定六分一斤計算，每銅百斤，官價五兩八分五釐。後乾隆十九年，廿一年，廿七年，三十三年，迭次增加至七兩。越三年，復減爲六兩四錢，遂以之爲定價。然據廠中父老言，當日官價雖爲六兩四錢，爐戶實收不過五兩二錢八分三釐，故有「五二八三」之通稱。是爲滇銅官價最低時代，然亦爲滇銅產額最高時代。蓋京運六百三十餘萬斤以外，各省採買歲約三百餘萬，本省鼓鑄亦且數十萬，故每年產銅，必在一千萬以上。其確數之見於公牘者，則乾隆三十八三十九年，每年官買之銅，皆在一千三百五十

萬斤以上；較之現時產額，幾及十倍，可謂盛矣！終乾嘉之世，銅價未增，產額亦未大減。道咸以降，紀籍過略，不能知其確數。所可知者，惟滇省回甯以前，銅價每百斤爲七兩四錢五分二釐。按其時京運未停，運額未減，則每年產額，至少亦在六百萬以上。自乾隆三年始，至回亂之時止，東川銅礦皆歸糧道及東川府經營，各廠復分設委員。京運不足，不特廠員獲咎，總督以下各長官亦與有責焉。乾隆中功令尤嚴；廠官繳銅，以少報多，致有遭極刑者，其他可知。然當日廠務旺盛；京運以外，惟本省鼓鑄外省採買爲正項，不可缺乏其餘之銅，則往往由經理者私售之商人。蓋官價收銅，百斤五兩有奇。市價售銅，則十一兩以外。一反手間其利倍蓰，故皆視爲利藪。雖間被累，不以爲懼。且官價每百斤雖不過五六兩，而開支時浮濫捏報，平均統以九兩二錢奏銷（見唐炯光緒十八年奏案）。合計其他雜費運脚，每銅百斤，運京交納，所費在十八兩以外。較之當日洋銅，價反稍昂，其弊可知矣。

三，同治十三年至光緒十三年 自成豐中葉，滇回仇殺，釀成巨變；兵禍蔓延，及於全省。滇省礦廠，均皆

停歇，東川亦被其禍。直至同治十三年滇事大定，始有興復之議。於是年定爲官督商辦，委本省紳士牟昌包辦全省各廠，（順甯，易門，永北亦在其列）每年認解京銅二百萬斤。行之數年，迄無成效。每年所產，總不足數十萬。遂於光緒五年改歸官辦，責成地方官經理。然滇省自大亂之後，戶口零落，存者不尾十分之一；貧困流離，救死不贖；舊有礦洞，傾覆蕪沒，存者無幾。加之長官督責過嚴，胥吏從中舞弊，紳士認辦者，無不受累。一旦歸官辦，凡所經營之權洞房屋器具，皆爲官有，而積欠之款，尙須追繳，遂至有傾家破產者。地方官鑑於其事，無復敢負此重責。一經受委，輒以洞老山空呈報，希圖規避免累。至光緒八年，乃改用藩司唐炯議，仍招紳商承辦，由官發本收銅。行之三年，仍無起色。唐炯時任滇撫，乃痛論官辦之弊。建議招商開採，完全商辦，設局滬上，招攬商股。然信用不著，商買裹足；招股數年，僅得款七萬餘兩。復領帑本十二萬，每年出銅，不過六十萬斤。適越南兵事起，唐炯因事被逮。滇政府不暇兼顧，乃奏派唐炯爲督辦礦務大臣。此光緒十三年事也。計自同治十三年起，試辦東川銅礦，凡十有六年，

雲南全省出銅纔八百三十七萬斤，東川各廠約居十分之八。是平均每年產額，不過四十一萬斤有奇。推求其故，固由亂後戶口凋落，恢復不易，其大原因，則在資本不充，銅價太低，有以致之。蓋同治十三年起，至光緒十三年止，銅課雖暫停收，耗銅仍未裁撤，餘銅官價每百斤只十兩三錢。與當日成本相較，實已無利可圖，且先後幣本商股皆在二十萬以下，實不足以供各廠之用也。

四，光緒十三年至宣統三年 滇省銅政，自同治十三年籌辦恢復，迄無成效，既如上所言。乃於光緒十三年，特派前滇撫唐炯專任其事。唐炯久官於滇，深知官辦之弊。至滇以後，即設立招商礦務公司，與滇商號天順祥聯絡，厚集股本，自行開採，並延聘日本人多名爲工程師，購置機器，籌畫自設煉爐。當風氣未開之時，毅然爲此創舉，不可謂非具有特識。惜其所延日人，程度過低；經理其事者，殆皆貪刻無賴，祇知自利。聞其與辦白錫臘（地名）銅礦，先後不及二年，耗資本十餘萬，出銅纔二十萬斤，而總辦黔人于某，遂因之致富。其所延工程師坐享厚俸，無所事事，至今廠中人猶傳爲笑柄。新法開採，既全歸失敗，不得

已乃復招本地爐戶，給以成本，聽其自行開採。出銅後責其歸公司收買，銅價則仍以十兩零三錢計算。備耗銅課銅，皆暫停收納。至十八年乃奏明每銅百斤加價一兩。二十一年請再加二兩，格於部議未准。二十三年復以爲請，始得部同意。二十五年前滇督王文韶入掌戶部，熟於該省情形，始允唐炯之請，破格加價；每銅百斤，發價二十兩。官價與本省市價，幾不甚相遠。然計唐炯於光緒十三年接辦，十六年始接濟京運。自十六年至二十四年，九年中約共運京銅一千萬斤。自二十五年加價以後，至三十二年唐炯交卸時止，共計八年，共運京銅八百餘萬。是加價以後，每年所出之銅，不過一百萬餘斤；與未加價以前，初無增減。推原其故，實因唐炯接辦之初，內格於部議，外蔽於廠員；二三年間，耗費銀七十餘萬兩。雖於光緒十六年支借帑項四十萬兩，然原奏十年扣還；故至光緒二十五年加價二十兩時，業已扣還殆盡。而此十年中，辦銅一百斤，運京納部，運脚銅價，得費不足十七兩。歷年虧折，幾及百萬。而所謂招商礦務公司者，並無實在商股，其資本皆由唐炯以個人名義向商號挪借。其所恃以彌補者，惟以官價在個舊買錫，以民

價銷之於川，頗獲厚利。旋個舊有周雲祥之亂，錫鑛分局，因之停歇，無利可圖，虧缺無着。故二十五年奏定加價爲二十兩以後，藉口銅色過低，改鑄須費，祇以十四兩發給爐戶，直至三十二年未嘗少變。此八年中，出銅共八百餘萬。是其中飽之款，約四十八萬有奇，故交卸之日，得免虧累。據其二十五年奏請加價原摺，東川出銅成本，每百斤約須銀十五萬兩，而實發官價，不過十四，其不能發達也，又何足怪乎？光緒三十二年唐炯辭職以後，東川銅鑛，改歸本省藩司經理。其辦法一仍其舊。是年出銅僅一百零三萬斤。明年度支部派余主事督方到滇，爲造幣分廠會辦，與勸業道劉孝祚同查銅廠情形。謂部價二十兩，不能全數發商。商人無利可圖，故致衰歇。而部價所以不能全發之故，實因部發之運腳局費，概不敷用，故不得不私扣銅價，以補其缺。乃建議一律加價，改煉淨銅。蓋終唐督辦之世，所運京銅，皆係毛銅；未經提淨。每百斤含銅僅百分之八十有五。運京以後，始轉運天津造幣廠淨煉。不特虧折甚多，且所耗之銅斤，亦須加入運腳。不如在滇自設煉局，改鑄銅磚運京，以節運費也。余劉原議以二十兩爲銅價，實發

爐商。淨銅折耗，運京運腳，局員薪用，每百斤合計十七兩。旋部核謂銅價過昂，減爲十五兩。故每百斤運京交納，共費銀三十五兩。銅廠事務，改歸勸業道經理。計自光緒三十四年至宣統三年，滇銅率以每百斤三十五兩支銷。而此五年中，實發爐戶之價，不過十七兩，與報銷不符。故自勸業道承辦以後，廠事雖稍有起色，每年所產，仍在一百五十萬斤以下也。

五，民國元年至民國三年 東川各礦：既全爲國有。自成同以後，餘銅過少，不准通商。爐戶無利可圖，大抵窮困。故其資本全恃協款，銷路專資京運。及辛亥革命，京運忽停，協款無着，所積之銅無路可銷，以致各廠失業，秩序混亂。滇政府乃陸續湊款數萬，暫委東川府嚴慶祺原任廠員鄭燾銜接續辦理。時滇紳劉盛堂建議官商合辦，設立公司，吸收商股，自行開採，以圖改良。實業司吳珉贊成之，蔡都督即因之批准。因議定公司股本爲六十萬元，官商各半。一面由實業司印發章程，於省城東川昭通筒舊香港海防六處，分設收股處；一面即委劉盛堂暫行充任東川鑛務公司臨時總理，以官本接續經理。此民國元年二月事也。是年六月，東川各廠爐商，以減少銅價，（劉盛堂定價爲

每百觔十四兩四錢，揀選成色過嚴，具控劉盛堂濶職敗廠。七月劉盛堂辭職，實業司另委陳鳳鳴專辦湯丹各廠銅鑛。每百斤定價為二十一元。時各處招股，應者絕少，自春徂冬，毫無成效。而川省開鑄銅元，需銅孔急，滇銅銷路因之大暢。陳劉接辦，日有起色。計自民國元年二月，至二年三月，出銅一百三十餘萬，共獲淨利二十餘萬元。合之前清所積鉛銅變賣之價，及革命初實業司陸續撥款，當日實存現款，可以為資本金者，約四十七萬元。（此款除撥為股本及其他用度外，至民國三年六月底尚有餘款二十六萬五千餘元，實存富滇銀行。聞此後撥用甚多，現餘無幾矣。）此外尚有陳劉兩總辦放給爐戶墊本七萬三千餘兩。是距原定股本六十餘萬元之數，相差無幾。滇政府遂派實業司副司長華封祝赴日，購買機器，聘請技師，以謀擴充。蓋自同治十三年以來，出產之多，獲利之豐，當以是年為最，而原議官商合辦者幾已改定為完全官辦矣。不謂是年冬十月底，乃有東川紳商學界代表唐學曾等數十人援據成案，呈請公舉黃德潤（東川人，是時為省議會會長，）為臨時總經理，組織公司，擔任招股事宜。並聲明商股未經招足以前，所有東川鑛

務，仍由公家辦理。當時主持其事最力者，除東川紳士外，商界為馬啓華，軍界為李鴻祥謝汝翼，皆新驛州人也。及公司章程發布，則蔡都督錕，華副司長封祝，羅民政長佩金，亦皆列名於創辦者十一人之中。政界中之反對最力者，惟實業司司長吳現，故唐學曾等初次呈請合辦，即經批駁。及再呈請時，吳迫於衆議，勉允其請，然猶以三事相約：（一）商股三十萬未經招足以前，公司不能成立。（二）所有房屋器具貨物項，皆須估計作價，作為股本。如價在三十萬以上，則須新公司於商股三十萬之外，另籌款墊還。（三）各廠所欠公款，應由新公司承認一定辦法，分期清還。以上三項，皆吳所力爭者，然其後皆完全失敗。因黃德潤倡議商股三期分招，第一期招足，即當成立。至二年三月，即催實業司移交，謂商股已在十萬元以上。實業司乃派保延樑王政齊驗股，（保後為股東名列分紅表中）覆謂現款合存貯米糧柴炭，已足十萬元。然據該公司民國二年分紅表計之，則是時所收現股，實為三千八百九十一股，合銀三萬八千九百一十元，與原報之數，固不符也。房屋項機件器具貨物，原估價約二十一萬元。公司皆不承認。後由審計分處

改派東川府保廷樑（股東）審計分處科員蕭珍（審計分處處長陳价亦公司股東）另估。僅將房屋器皿，估為一萬八千四十一兩；凡礮碓機器藥，皆未作價也。各廠所欠公款，分新舊兩欠：舊欠者係革命以前之欠款；新欠者係革命以後陳劉兩總辦所放之欠款，共計二十萬零五千三百二十二兩有奇。其中新欠約三分之一。公司初成立時，實業司亦有作為公家股分之議。旋與新公司訂立合同，每出銅百斤提三十斤為扣收新欠，十斤為扣收舊欠。然公司成立以後，并未實行此約。直至民國三年二月公司成立一年以後，始訂章每銅百斤，扣銀三錢，以償前欠。計自民國三年二月，至民國四年二月，所收欠款，不過四千餘兩。是新舊欠二十萬兩，非五十年不能扣清，且新欠七萬，即以常年六釐起息，則尚在四千兩以外。是新公司每年代收之款，祇足供新欠利息也。

以上三事，實業司所力爭者，既完全失敗。東川鑛業有限公司，於民國二年三月成立。而公家遂以一萬八千餘兩之代價，將需時二百餘年，費款數十萬元所經營之鉛鋅銅鑛，移交於私人之手！且據公司章程第一章第三條，公司專利之權，雖僅限定於舊日官辦之銅

鉛鑛各鑛，而公司成立以後，凡東川一府之鑛，幾無不為其所壟斷。若以蘆之琉璃，黃栗樹之煤炭，其尤著者也。不特此也，東川鑛業有限公司，名為官商合辦，而照公司章程，凡選舉會議，公家所派代表，必須有商股股票二十股以上者，方為合格；有五十股以上者，方可被舉為總協理；三十股以上者，方可被舉為董事。故公司成立以後，凡一切總理監督之權，悉操之商股東之手，公家不得過問焉。

公司成立以後，定銅價為十六兩。凡舊有自煉之鉛銅煉爐，悉行停歇；完全以放本收銅為事。時滇銅銷路大暢，每百斤市價在三十二兩以上，公司坐享厚利，無用改良。乃一反實業司以前計畫；華封祝所購機器，所延技師，概不承認，且謂原定資本六十萬，為數過多，改減為三十萬元。時本省紳商之未與聞其事者，見其利極厚，爭欲入股，皆為公司拒絕。適滇中大吏更替，不平者欲藉之為推翻公司之機會。公司中人大懼，乃退還官股五萬元，另招商股以補其缺！於是新來滇之軍政界多為股東，而公司之勢力乃益鞏固。此民國二年終三年初事也。計公司自民國三年四月開辦起，至十二月底止，凡九閱月，以賤價發之於商



，以市價售之於川。共溢利銀十三萬元有奇；滇政府所分，祇三萬四千五百一十元。較之民國元年官辦時公家所獲之利，不足四分之一，而爐槽各戶，反益困焉。至三年二月，乃有漢回仇殺之亂。為首者，為湯丹廠之李正平，以攻公司所派湯丹廠經理回人馬正雲

為號召，聚衆至數千人。調兵剿殺，月餘始平。事後報復，累及無辜，附廠各村，被禍甚慘。論者謂雖肇禍之因，頗甚複雜，實亦公司任事者橫霸過甚，廠民積忿不平有以致之。事定後公司乃加價為十六兩四錢，然是時市價已達三十三兩，廠民之不平固如故也。

## 編輯後記

編者

△本期「小招」先生的「福州經濟的崩潰」一篇，也是從福州寄來的。他的一篇「參加福州人民代表大會記」登在第八十四期的本刊。

篇文字。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讀者可以參看本刊第八十四期至第八十四期的文字。

△本期的「武力統一論」也是討論「專制」問題的一

的生物學教授。本刊曾發表過他的兩次投稿。

△寫「常識與考古」的劉成先生，是青島國立山東大學

## 外國民交雜誌

第三卷第三期要目

國民心中所想說的話……劉美若  
 杉村陽太郎歸國後之建議……星桂  
 英國勢力之侵入西藏……胡文炳  
 日本對中國一吞一吐之外交政策……郭家偉  
 美俄復興運動的展望……潘家偉  
 美國復興運動的展望……潘家偉  
 古巴革命與美國關係……潘家偉  
 胡佛主義之真意……王邦治

極東赤軍強化的與共產主義戰爭理論……平田晉策著  
 朝鮮亡國慘史(三續)……馬于天譯  
 貢獻仲尼等言藏書書……貢獻仲尼  
 定價：每册一角五分。預定：半年六册九角，全年十二册一元八角。  
 國外加郵費：半年一元一角，全年二元二角。郵票代洋九五折計算。  
 社址：南京馬府街五十號

## 日本論

第三卷第三期要目

日本政治之明日……楊玉清  
 日本經濟之前瞻……趙南柔  
 再論美俄交與日俄關係……周伊武  
 最近日本政黨之苦悶與掙扎……張一凡  
 最近十年來日本經濟活動之清算……謝勁健  
 最近十年來日本之農業政策……柯蓬洲  
 日本銀行統治之進展……

帝國主義統治下的朝鮮教育……張浩平  
 日本人種研究……李昭  
 總發行所 南京將軍巷日本研究會  
 定價 全年十二册 國幣三元 郵費三角  
 半年六册 一元五角 郵費一角五分

# ◎獨立評論合訂本出售

本刊第一至二五期和第二六至五十期及第五一期至七十五期，現在補印齊全，分別裝訂成冊。極適於圖書館及私人收藏之用。價目：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圃」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目	價	報	定
本市	每月一元	國內	每月一元
朝鮮	每月一元	日本	每月一元
其租地	每月一元	香港	每月一元
澳門	每月一元	汕頭	每月一元
元九角	每月一元	廣州	每月一元
蒙古	每月一元	海參	每月一元
南洋	每月一元	歐美	每月一元
四元一角	每月一元		

## 第三卷 學風月刊 第十期 目要

民國二十二年安徽先賢紀念  
金氏花近樓書目解題(十)  
城南草堂曝書記(一)  
文學觀的檢討  
讀書執是錄  
讀朱許論語劄記  
陳東原  
金 濤  
王立中  
王 璠  
孫傳瑗  
韓難海  
青陽風土誌  
休甯縣著述人物攷略  
讀劉譯荒木員夫告全日本國民書  
評王去非民法物權論  
李紱  
蔣元嘯  
吳景賢  
岳揚

## 外交 評論 第二卷 第二期 目要

所謂一九三六年世界危機之檢討  
美俄復交之意義  
日俄關係惡化與中國  
德國退出國聯與羅加諾協約  
再論美國經濟恐慌與貨幣政策  
美國對中日事件之政策及與國聯合作之經過(上)  
英國政府及輿論界現況之一瞥  
美國新外交政策  
吳頌皋  
高宗武  
徐公肅  
袁道豐  
趙蘭坪  
譚紹華  
吾行健  
趙迦德  
日人眼中之美俄復交問題  
希特勒之後台人物  
愛斯加拉教授關於滿洲問題之公論  
德國退出日內瓦以後之軍縮談判  
書報介紹與批評  
沈鍾靈  
李 榮  
陶 平  
歐 漁

## 山東民衆教育月刊 第四卷 第九期 目要

中國之地方自治問題  
美俄成人教育比較觀  
圖書館教育研究  
各國缺陷兒童的保護與教育  
民教文籍分類之商榷  
梁漱溟  
孫月平  
張顯之  
徐 棟  
蘇盈川  
定縣參觀記  
民衆學校的行政  
定價：每册一角五分、全年十册、一元五角  
發行：濟南山東省立民衆教育館



# 政治統一的途徑

胡適

凡夢想「武力統一」的人，大概都是對於別的統一方法都抱悲觀了。例如吳景超先生（本刊八十四號）指出三種其他方式的不可能：第一「開放政權」于統一是一無補的；第二「聯省自治」實際上便是擁護群雄割據的局面；第三「以建設謀統一」也得先設法早日脫離割據的時期。因為吳先生認這幾條路都走不通，所以他說：

在群雄割據的時期內，除却武力統一的方式外，我們看不出還有什麼別的方式可以完成統一的使命。

又如蔣廷黻先生（本刊八十三號）也指出其他方法的絕不能行：第一是「維多利亞時代的自由主義和代表制度」絕不能行；第二是「割據的妥協」也絕不能成立；第三是「再來一次的革命」也行不通。因為這些方法都絕不能行，所以他說「唯一的過渡方法是個人專制」，是「拿一個大專制來取消一些小專制」，是拿更大的武力打倒一切二等軍閥。

武力統一的困難，我在上一期（八十五號）已經說過了。其實這種統一方式的困難，蔣吳兩先生也都感覺得到了。

。蔣先生說：

中國人的私忠既過於公忠，以個人為中心比較容易產生大武力。

他應該料得到：馮玉祥也會這樣想過，也會這樣做過；張作霖張學良也會這樣想過做過；現在的許多割據領袖也都在那兒如法泡製，「以個人為中心，產生大武力」。人人都要造成那「更大的武力」，所以武力統一終不可能。蔣先生又說：

這個為中心的個人必須具有相當的資格。

既然說是「必須」，這就是一個必要的條件了。我說中國沒有能專制的人；蔣先生也只能說：

中國今日有無其人，我也不知道。

那麼，蔣先生也不知道今日中國有無具備那「必須」條件的中心人物，他的統一武力論也就很脆弱了。

吳先生的武力統一論也有同樣的困難。他也承認：

武力雖然重要，而運用此武力的，還要一個能幹的領袖。這位領袖至少應具下列幾個條件：

第一，他要有為國為民的聲望，這種聲望是建築在

領袖的行爲上面的。……

第二，他要有知人善用之明，要網羅國內第一流人物，來與他合作。……

第三，他要有開誠布公的胸懷，要使得與他接近的人都覺得他真是「推赤心置人腹中」。……

現有的革命事業有國際背景在內，所以當領袖的人……還應當有現代的眼光，以及一個高明的外交政策。

可是吳先生也不能指出我們現在已有了這樣一位領袖。他只能說：

根據時勢造英雄的原則，這種領袖早總要出現的。

假如我們大家每夜焚香告天的祈禱終無靈應，這種領袖終不出現，那麼，中國又怎麼辦呢？這樣看來，吳先生的武力統一論的希望也是很脆弱的。

總而言之，武力統一的困難，依我們三個人這回討論的結果，至少有三點：

第一是中國今日的「意態」不容許。（看第八十五號）

第二是中國今日的「物質狀況」不容許。（看第八十

五號）

第三是中國今日還沒有具備那些「必須」條件的領袖。

✧ ✧ ✧

獨立評論 第八十六號 政治統一的途徑

我們現在可以回到我上次提出的問題：如何能縮短這個割據時期？如何能在這個割據時期做到建國的大事業？換句話說，假如此時沒有用武力統一全國的希望，我們還有法子建設起一個統一的國家來嗎？

我所設想的統一方法，簡單說來，只是用政治制度來逐漸養成全國的向心力，來逐漸造成一種對國家「公忠」去替代今日的「私忠」。

中國統一的破壞，由於各省缺乏向心力，就成了一個割據的局面。這個局面的形成，不完全是這二十多年的事，是太平天國亂後逐漸造成的。清朝盛時，督撫都不用武人，而各地駐軍甚少。當時所以能維繫住一個統一局面，全靠制度的運用。任官全出於中央，而中央任官有一定的制度；科舉是全國一致的，升遷調轉是有一定的資格限制的，而文官統轄武官（自中央以至各省）也是一致的。科舉制度雖然不切實用，但人人都承認它的公道無私；老生宿儒應攷到頭髮白了，也只能嘆口氣說「場中不論文！」他不怨那科舉制度本身的不公。智識階級都感覺有「正途出身」：貧家子弟，用了苦工夫，都可以希冀狀元宰相的光榮。重名輕武的風氣造成之後，武官自覺得他們應該受文人的統治，所以文人管兵部，巡撫掌兵權，人人都認為

當然的道理。

太平天國之亂，把那個「紙老虎」打破了。政府的軍隊不能平亂，而平亂的大功全靠新起的鄉兵與募兵。湘軍雖然多數退散了，准軍繼續存在，成爲新式軍隊的起點。平亂之後，各省督撫雖然仍是文人，可是這些封疆大吏多是帶過兵立過戰功的，又往往負一時盛名，他們的聲望遠在中央政府的「班班碌碌大官」之上。從此以後，「內輕外重」的局勢已造成了。到了庚子年（一九〇〇），宮廷與政府失信於國，造成了國際大禍，內旨令沿江沿海各省督撫招集義和團攻打洋人，北方有山東巡撫袁世凱不受命，南方兩江總督劉坤一與兩湖總督張之洞也都不奉詔，並且提倡保障東南的政策。當時端王與剛毅都主張要嚴厲的懲罰劉張，但想不出執行的有效方法來。這是各省對中央獨立的起點。十年之後，辛亥（一九一一）革命起來，各省相繼響應，主共事的雖有文人，但反止的新軍將領往往成爲實際上的領袖。南北統一之後，北方政權漸歸北洋的將領；南方各省的有力量軍人也漸漸成爲各省的領袖。民國三四年以後，雖有軍民分治的試驗，而各省大權都移歸軍人，就成割據的局面。

辛亥革命以後，從前所有一切維繫統一的制度都崩壞

了。中央政府沒有任官權，沒有軍權，沒有賦稅權；而各省的督軍都自由招兵，自由作戰，自由扣留國稅，自由任命官吏。到了後來，有力的督軍還要干預中央的政治，中央政府就變成軍人的附屬品了。离心力的極端發展，造成了一個四分五裂的局面。

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打開了一個新的局面。當時的主要旗幟是民族主義，對外是打倒帝國主義，對內是建立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統一的中心在國民黨，要以黨治軍，以黨當政，黨權高於一切。這一套的新組織與新紀律，在當時真有「無堅不摧」的威風。無主義又無組織的舊勢力，都抵不住這新潮流的震撼。不到三年，就做到了統一全國的大事業。

但這一回的新統一裏也含有不少的離心勢力。政權屬於黨，而黨不幸分裂了。黨中本有從極右到極左的成分，後來一分爲國共，再分爲國民黨內的各派，三分爲以個人爲中心的各系。黨中又因爲原來沒有計畫到分派的處理方法，從沒有準備怎樣用和平法律手段來移轉政權的方法，所以一到分裂時就不能不互相鬥爭，而鬥爭的方法又有時各各倚靠一部分的軍人，用機關鎗對打。黨爭要倚靠軍隊，黨就不能治軍了。新起的軍事領袖，雖然比舊日北洋

軍閥高明的多了，然而其中始終沒有出一個像劉邦那樣「恢廓大度」或像劉秀那樣「推赤心置人腹中」的偉大人物。所以黨爭之外，又加上了領袖與領袖的鬥爭。其中雖有比較優勝的領袖至今還能保持最優勝的勢力，然而那分裂的局勢終無法收拾：第一是黨爭無法解決，第二是私怨無法消滅，從黨爭變到個人恩怨，從黨中心變到個人中心，越變離心力越大了。

在這個割據局勢之下，有什麼法子可以逐漸滅除各省的離心力，而逐漸養成全國的向心力呢？有什麼法子可以逐漸造一種對國家的「公忠」來替代今日的「私忠」呢？

我們要認清，幾十年來割據的局勢的造成是因為舊日維繫統一的種種制度完全崩壞了，而我們至今還沒有建立起什麼可以替代他們的新制度。當日「以黨治國」的制度，確是一個新制度，如果行得通，也許可以維繫一個統一的政權。但民國十六年國共的分裂，就早已顯示這個制度的自身無法維持下去了，因為黨已不能治黨了，也不能治軍了，如何還能治國呢？黨的自身已不能統一了，如何能維繫一國的統一呢？

古人說的好：「時移則事異，事異則備變」。舊制度已崩壞了，我們就應該研究新的需要，建立新的制度去替代那無法挽回的舊制度。今日政治上的許多毛病，都只是

制度不良的結果。即如蔣廷黻先生指出的：

中央政府的各部，無論在北京時代，或在現在的南京，部長是那省的人，部中的職員就以他同省的人居多，甚至於一部成爲一省的會館。

他說這是因爲中國人的頭腦裏有省界。其實省界是人有的，並不限於中國人。美國國會的議員，那一個不替他的選舉區爭權利？不過他們的國家有較好的制度，所以他一旦做了部長，他決不能把他的貴部變成他的同鄉會館。蔣先生指出的笑柄，只消一點點制度上的改革就可以消滅了。

回到國家統一的問題，我們主張，今日必須建立一個中央與各省互相聯繫的中央政府制度，方才有一個統一國家的起點。

從前的帝國時代，中央與各省的聯貫，全靠任官權之在中央：不但督撫藩臬是由中央派出的，州縣官也是由中央分發到省的；外官可以回中央去做京官，京官可以派出去做外官；江蘇人可以做甘肅的官，雲南人也可以做山東的官。自從割據的局勢形成以後，割據的區域裏中央不能任官，至多只能追認原有的官吏，加以任命而已。任官權分在各省之後，中央與各省就沒有聯貫的方法了。省與

中央越離越遠，所以只有小割據，而沒有統一國家的形態了。

我們相信有許多的政治方法可以逐漸挽回這種分裂的趨勢。這篇短文裏不能詳細多舉例子。我們可以舉出「國會」一個制度來做一個最重要的例。國會不是蔣廷黻先生所嘲笑的「維多利亞時代的自由主義和代表制度」。國會的功用是要建立一個中央與各省交通聯貫的中樞。它是統一國家的一個最明顯的象徵，是全國向心力的起點。舊日的統一全靠中央任命官吏去統治各省。如今此事既然做不到了，統一的方式應是反其道而行之，要各省選出人來統治中央，要各省的人來參加中央的政治，來監督中央，幫助中央統治全國。這是國會的原本意義。

蔣廷黻先生一定不贊成這個主張，他曾說：

人民不要選舉代表，代表也不代表什麼人。代表在議會說的話，不過是話而已。中國近二十年的內爭，是任何議會所能制止的嗎？假若我們能够產生國會，而這國會又通過議案，要某軍人解除兵柄，你想這個議案能發生效力嗎？只要政權在軍人手裏，……你的國會有一連兵就可解散了。

這些話都是過慮，有成見的過慮。第一，人民最不要

納租稅，然而他也居然納租稅，豈非怪事？所以蔣先生也不必過慮人民不要選舉代表。第二，議會能有多少權力，如今談不到。不過我們前幾天還看見報上記載着，立法院「在悲憤中」勉強通過了一萬萬元的公債案。一個確然「不代表什麼人」的立法院也會「悲憤」，蔣先生也許可以看見一個代表全國的議會發起大「悲憤」來制止內戰，誰敢保沒有這一天呢？第三，一連兵誠然可以解散國會，正如一個警察可以封閉你我的獨立評論一樣容易。然而曹錕要做大總統，他用一連兵也就可以包圍國會了，何必要花五千元一票去賄選呢？馬君武先生曾說：曹錕肯花五千元一票去賄選，正可以使我們對於民主憲政抱樂觀，因為那個國會的選舉票在曹錕的眼裏至少還值得四十萬元的代價。況且有了賄選的國會，也就可以有動不動的國會；有了一連兵解散得的國會，也就可以有動不動的國會；有了一連兵

不過這都不是眼前的話。現在我要請大家注意的只是要一個連貫中央與各省的國家機關，要建立一個象徵全國全民族的機關。各省要搗亂，就請到國會裏來大家一塊兒搗亂。各省要建設，就請到國會裏來大家一塊兒建設。無論如何，總比「機關鎗對打」要文明一點。讓各省的人到中央來參加全國的政治，這是養成各地方向心力的最有效的



一步。

十八世紀的英國政治家貝爾克 (Burke) 曾說，「若要人愛國，國家須要可愛。」若要全國人擁護國家，國家也須要全國人擁護。現在最奇怪的現狀是把黨放在國家上面。這樣如何能養成「公忠」？國會是代表全國的議會，是一個有形的國家象徵，人民參加國會的選舉，就是直接對那個高於一切的國家盡義務。現在全國沒有一個可以代表

整個國家的機關，也沒有一個國家可以使人民有參加干預的機會，人民又從何處去報效他的「公忠」呢？

我只舉這一個國會制度，已佔了這許多篇幅了。我的意思只是要說明今日需要這種挽救全國離心力的政治制度，國會不過是一實例而已。其他促進統一的制度，將來有機會再談。

二十三，一，十六晨。

## 試談專制問題

壽生

吾人可說：從前的專制，是「權力的專制」，現時所謂的專制，是「旨趣的專制。」不管拿破崙也好，成吉思汗也好，明也好，清也好，他們統一的基業，都是建在權力上的，他們所以行使其專制，多是靠其權力的。現在則不然了，意大利，蘇俄，德意志的獨裁從表面上看，似是個人專制，是似由權力所得，其實是不然的！希特拉，墨梭里尼，史丹林的行動，實不是他個人的行動，而是許多人願望的行動，不過以他們作政令的發出者而已。他們的同黨，他們的羽翼，不是服從他們的權力，不是受他們僱買，乃是他們的同志。他們共同信奉的主義，雖出于個人，

或數人的思想，乃為其同黨者所滿意，既如此，此主張已非個人或數人的主張，而成為同黨公共主張了。所以，吾人敢說：現時代，個人的獨裁已經行不通了，建立在權力上的獨裁，已經過時了。如像上說三國的政治情形，而必要說是獨裁，那只好說是「旨趣的獨裁。」

權力的獨裁時代，只要時來運到，流氓，光棍可以作皇帝。旨趣的專制，沒有思想，熱情，偉大的人格，是不會發生的。即或你盜竊他人的東西，來玩點小把戲，時光的沖洗會把你的真面目現出來，自會為人唾棄。故依「旨趣專制」的意義講，與其說蘇俄是共黨專政，無甯說是

馬克思獨裁。

英，美，法的議會制度，實也是「旨趣專制。」他們各黨有各黨的領袖，各黨有各黨的黨綱，各黨有各黨的意向，各黨員在同一的意見下活動。他們是以理論來征服人民，是取獲人民的信心，是以他們的意見釀成全國的意見，不是用槍口指定人的胸膛，叫人服從。也不是全國人各異其心，混亂一團的政治。這不可說牠是「旨趣專制」嗎？不過，英，美的「旨趣專制」，是多元的，互換的；而俄意是一尊的，欲無限的延長其「旨趣」罷了。由此，吾人可知，人類文化愈高，權力的用途益小，人民的智識越豐富，古典式的專制越不可能，「旨趣的專制」將益顯。因在此種情勢下，一有力的思潮發動，易取得人的共鳴；理論不充分的，將無法存在，理論充足者，勢必將整個社會籠罩，以等待新的替身。這並不武斷，只要看現在那些資本主義者，在明地里，不敢直表其意向的那種狼狽相，就可明白一時代的主幹思潮，一時代的要求，其力量之偉大了。

那麼，我們現在的情勢怎樣？吾人還能容忍古典式的獨裁嗎？一般人只從皮面看，以為中國的混亂，只在軍閥搗鬼，而忽視智識青年的行動。只認為是槍炮的交戰時期

，而忘了也是思想的交戰時期。槍炮上取得勝利了，在信仰上未取得勝利，也不能堅固其統一的。

蔣胡二先生，為「專制」二字所迷惑，于是一個說，專制是必要的，一個說是不可行的。而蔣先生甚至於懷念我們民國的錫福者，袁世凱了！所以他很明顯的說：

中國的現狀是數十人的專制。市是專制的，省也是專制的。人民在國內行動不過從一個專制區域行到另一個專制區域。至于權利的保障，處處都是沒有的。我所提倡的是拿一個大專制來取消這些小專制。中國現在專制的對象不是人民，是二等軍閥。從人民的立場看，個人的大專制是有利的。

蔣先生說得十分對，中國的現狀是數十人的專制，人民毫無保障。可是小專制是罪惡，人民無保障，所謂的大專制也不過是小專制的一員發展的，在此大專制下就可以得福利嗎？老虎豺狼獅子同是吃羊的。待獅子把老虎豺狼平服後，羊就得安全了嗎？我們所要求的如是而已？而這樣的局面，能够維持下去嗎？所謂的大專制，小專制，實不過五十步笑百步的玩意。小專制，給人民的痛苦，是不定的，瘡疾的。大專制給人民的痛苦，不過是有層序的，肺炎的罷了，又何有利之足云！蔣先生所舉的英，法，俄

那時國人很歡迎君主專制的例子，本身就是推翻蔣先生的理論，因為時代已不同了。我們的祖先，從前打敵人的東西是箭與刀；現在要拿野炮，小加籠了。現在還叫一個有心性的人，去跪在溥儀馬蹄腳下三呼萬歲，我看不見得辦得到的吧。蔣先生雖愛國心切，惜未將專制分清楚，又忽視了時代。他說「反對袁吳的不是人民，是二等軍閥。」不知二等軍閥之能反對袁吳，正是人民意向的反映呢。

在中山先生開辦黃埔軍校，革命軍還未北伐時，那陣全國青年旨趣的同一，實在令人驚嚇。各省的學生，好些不顧一切去投考黃埔。廣東一舉一動，一呼一吸，全國人都關懷。就在學者方面，從私人的信件，發表的文章上，也可以看出那時對廣東之同情。直奉的內部，早已為軍情所搖動，故北伐軍一出，而直奉軍披靡。那時革命軍的兵力能敵直奉軍嗎？這已可以透一點「旨趣專端與權力專制」的消息了。而二等軍閥能以打倒的「權力專制」，是倒而不足惜的。俗語說：「真金不怕火來燒。」

我們以為個人的專制來統一中國的可能比任何其他方式可能性較高。破壞統一的就是二等軍閥，不是人民，統一的問題就成為取消二等軍閥的問題。他們既以握兵而割據地方，那末，惟獨更大的武力能

打倒他們。

「二等軍閥」這幾個字，蔣先生用得很好。破壞統一者為二等軍閥。那末，統一者為誰呢？真是「此中有人呼之欲出」了。就是「頭等軍閥呀！」蔣先生雖未明白的說出，但「我們更加要注意，以袁世凱吳佩孚一流的人物雖統一的目的僅功虧一篑了。」還不够嗎？想頭等軍閥用武力統一中國，其背時代與于國家有益否且不說。單講他能否成功，亦是問題。我們看袁世凱那時的威勢是何等利害，但終因雲南貴州兩個邊鄙小省的反對而倒台。吳佩孚盛時，其勢力已達于四川貴州了。但廣東軍一出，他特識的袁祖銘亦張起革命軍的旗幟了。武力之不足憑如此。武力的獨裁是只有戰亂，不會統一的。現在的事實還不够嗎？至于私忠與公忠的問題，也免皮毛的規察了。在這幾年的內戰裏，很可看出他們的真，不是白額（革命軍北伐性質不同）的，是強迫的，是督戰者，大刀機關槍指着上面的。現在出名的軍將，那一個不是會用大刀機關槍殺幾後退的兵士的人，你如去問一個小兵願打內戰不，其回答包管是「不。」九一八後漢軍固多，但是各兵士對這次戰爭的認識是不可厚非的。事實昭然，只要會看報的人就知道。他們何曾只是知私忠，不有國家觀念，不過為飢寒所迫，不能不如此罷了。而真正無恥的，倒是「士大夫。」

蔣先生的專制論，很明顯的是武力專制。只要有一個人能行使其武力專制，他就滿意了，專制的結果如何，他是不問的。就是胡先生所引出的開明專制，他亦不屑一顧。這真令人奇異。難道一旦如蔣先生所謂的專制實現，只要他不拒絕科學機械能維持治安，就叫我們重新把辮子留起，吸鴉片，踱方步都可以嗎？

去年暑假回南在鄉裏常聽得村夫野老嘆恨：「這個命真革得糟從前皇帝在的時候，那里像這個樣子，就是在長毛反的時候也沒有現在這樣混亂呀，不曉得要那一天，真命人主才登位啦！」這才是「厭亂之心」朝野共同？然而不足怪也，只要翻開各國的革命史一看，在革命過程中，人心不固是常有的事。就是革命者在中途疲乏了，變成反革命也很有趣。革命本是一件煩難的事，那里若吃口香糖那樣適意，又那里如寫一篇演講稿那樣簡單呢。若中華民國，經二十二年的試驗，就叫來不起了，就要開倒車，那才真是可傷呢。俄國人不求局部的偏安，非達到理想的目的不可，這是可敬的。我們如若二十二年的變動，就受不了，就要反回老家，這才真不堪與人相提並論呢。如若要依蔣先生的指使，效俄人的精神，那末我們就宜咬定牙關忍受革命的煩難，不當稍不如意，就望皇陵而興悲！

蔣先生最痛心的是東一革西一革毫無益處徒使人民塗炭的局面。這是誰也痛心的。不過，要明白其所以這樣東一革西一革的原因，是還未能做到「旨趣專制」，未取得人民多數的信心，未能順導人民的要求。這固是可悲的現象，同時也是可喜的。因為，假面具已經戴不了人了，無異本領的政府已取不得人民的信心了，人民已堪作水，政治活動者，是金沙江的金與沙，在一個淘泯中炒子終歸是要被淘汰的！經這二十二年的洗滌，人民已有了認識力，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在現在欲想統一中國，而行古典式的專制，真是做夢。路走不通，當求討不通的原因，想法打開才是。負手走回去，不是辦法。

中國已經亂得够格了。而想做土皇帝的人，在在都有。故吾人不願愚昧來討論此問題，希望人知道做土皇帝已不可能；全憑武力來統一徒延長戰禍。欲行專制，只有「旨趣專制」一途可走。因「旨趣專制」是積極的，今時代的、順人情的。非欲與胡蔣二先生爭辯也。行文間有欠溫和的地方，乃筆勢所致，非有心也，望諒之。

獨評八十期，八一期已寄給人了，又因脚痛，不使出街，故只就近兩期胡蔣二先生的論文說話，且是擇要言之。如有機會將再說。若專就胡蔣二先生的意見，問吾同

情誰，吾人甯肯同情胡先生了。

壽生 二十三年一月四號

## 關於科學種子的討論（歐洲通信） 詞仁

在貴刊第六五至六六兩號上，刊布了叔永先生和我關

的立場而已。）

於國聯教育考察團報告書的一段討論。這討論的要點是：

頃讀叔永先生的答覆，知彼完全同意於我對考察團報

考察團說，中國人不當僅采歐美各國科學上和專門技術上的設備，而應注意其所以產生科學和專門技術的心理。因爲：『近代的科學與專門技術，並不會產生現代的歐美；

告書所云心理二字的解釋。牠是指對於人生的態度，對於自然的態度，或者是指某幾種他們（西方人）所通有對於治學行事作人的態度，而不是指他們的天賦能力。他又贊同意於這種態度的結果是科學的出現，發達，與其民族的繁昌；不幸國人態度與之相反，結果便是科學無，受罪深

反之，歐美人的心理，實產生近代科學與專門技術，並使其達到今日優越的程度』。叔永先生說：『此種雞與雞蛋先後產生的爭論，似乎使我們大大的失望。如其近代的歐美

，在昔已然，於今爲烈。這個要點亦明白了，心中十分高興。因爲我從此堅信：此後中國人要想自拔於苦海——指對

的文明，不是由科學得來；反之，近代的科學，是由歐美人的特殊心理發生，那末，我們提倡科學的主張，還有實現的可能嗎？』（六十五號一四至一五頁）我那篇小文的一

內消滅由大自然的壓迫而來的災荒，饑寒，貧窮，疾病，擾亂等等，對外抵禦兼弱攻昧者的剝削與欺凌等——並能站起來與人平肩携手，正堂堂體體面面地從新在世界上做

大半，是本於個人的觀感所得，要證明：『近代的科學，是由歐美人的特殊心理發生』即只是雞生雞子的簡單關係而不是一個無謂的爭論。所以我原來的標題是：『歐美人的心理，成績，與……』（附白：編輯先生的改題，很感謝。此處所說，不過爲歷史事實的追述，以明個人

個『人』，非采法高鼻子對於治學行事作人的優點不可。大家此後如多人向這方努力，我也堅信：中國目前雖然使人悲觀，將來却很有希望。蓋青勝於藍，冰寒於水，事理之常，自無足怪。所喜者，這關鍵在未經前次討論以前

，似乎很是模糊；因之對於考察團的說法，尙在將信將疑之列。今則恍然大悟了，我狠感謝叔永先生對於我及國人的指示。

不過叔永先生於答文中，又提出了一個附帶的問題——學種子的問題——來和我討論。我自然也狠樂意於妄參末議。什麼是科學的種子？我原來的定義是：「顧名思義，似乎應當解作科學智識的微粒，胚子，至多是初步的ABC，而不是指有統系的大著作」。叔永先生不以爲然，有狠長三段的議論。從這三段中，可以取出三個關於科學種子的判斷：（一）科學的種子是西方中世和近世幾位科學大師的方法和理論（按第一段）；（二）科學的種子是那些新方法新論理的起點（按第二段）；（三）科學的種子是西方科學的方法（按第三段）。這三個判斷可以歸併成兩條如次：

（甲）科學的種子是西方中世和近世大師的新方法（因爲新論理便是新方法）；

（乙）科學的種子是西方近世大師如蓋理略等的理論。

以下即依此次序開始討論：

我承認：西洋近三世紀科學界的開化結實，可相當歸功於培根（Francis Bacon）的歸納論理。我也承認：他的

「蜜蜂的方法」確比單純蜘蛛的印山蟻的方法好。（參閱適之先生的「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的首段，便可明瞭我所說「相當」二字的意義。）但科學的種子是一回事，科學的方法又是一回事。兩者似乎不能混爲一談。爲什麼呢？種子是質量上的問題，方法是技術上的問題。譬如農業，種子是稻粱菽麥黍稷的少許細粒，方法是選擇，改良，耕耘，加肥，別壤，息地等等技術。當然，有了好種，還要有好技術，方能有好收穫。否則雖然播種，或澆而不育，或育而不花，或花而不實，或實而不豐。中國與西洋中世紀以前的科學，就像如此。到了技術比從前進步了，所得自種子的數量，也自然比從前多了。現代俄國和美國科學化電氣化的農業，就是如此。吾人生於晚季，目眩於這壘壘的新貨，於是說：這纔是稻，這纔是麥，這纔是粱，……。而從前的種子呢？則新陳代謝，已把他丟到九霄雲外去了，不算數了。誠然，以倉箱與種子相較，種子自是微乎其微不足掛齒。數學上接近於○者，本可以認作等於○。不過若精細計算，則小數點以下若干位者，也還可以積少成多，不宜忽視。

但這還是譬喻，如今再回到正面瞧瞧。關於科學的種子是否即是科學的方法一問題，我們最好拿叔永先生自己

所下的科學定義來看。叔永先生道：

科學是根據於自然現象，依論理方法的研究，發現其關係法則的有統系的智識。（科學概論上篇第一

頁）

玩味這個定義，似乎狠可以證明我所說科學的種子是質量上的問題，不是技術上的問題。爲什麼呢？因爲上面明白地說過了，科學不是別的東西，是依論理方法的研究所產出來的有統系的智識。這智識是工作的結果，是成品，不是方法。於研究時所用的論理方法是工具，是過程，不是目的。因爲工具不同，成品便因之而異。吾人將今昔比較，見其量有多少，質有優劣，於是爲之區別，說最早的不成套的是科學種子，說後來的有條有理的是科學。這是我的看法。

討論到這裏，叔永先生或者要說說科學是智識，不是方法，誠然。但你所說的科學方法是籠統的，是兼舉新舊的方法而言，非我所指。我所指只是自中世紀和近世幾位大師的新方法，不是老法子。這樣，科學方法與科學間便有親屬關係。若然，則吾人可將捕魚爲喻。漁翁舊的用小筌，新的使大網。舊者所獲甚微，新者每舉輒衆。漁人誠由網而得多魚，但魚固非自網出也。明此，則科學新方法

之不及爲科學的種子一問題，似乎可以確定。

如果這問題確定了，如果科學的種子不即是科學的新方法了，然則是西方近世科學大師如蓋埋略等的理論嗎？這大概是了。因爲叔永先生曾說：「我們的意思，不但中國的墨子莊子淮南子抱朴子之流，中間偶然有幾句講到力學物理化學的話，算不得甚麼科學的種子；就是文藝復興以前的歐洲，文化燦爛的古希臘，他們的成就，也合近代的科學截然兩事。因爲他們的觀點與方法和近代科學不同，所以發達的路徑，也就不免分道揚鑣了」。這裏牽涉的問題較大，較複雜。詳細說起來，恐怕占獨評的篇幅太多。茲只作一個概括的討論。

在未入本節以前，先聲明我的觀點。我是一個頗醉心於胡適之先生所謂「祖孫方法」（即歷史的方法）者。根據這個方法去研究，即什麼事都愛去找牠的來龍去脈，看牠進化的歷程。看的結果，往往認識了事非偶然，宇宙間確有廣義的因果聯系，很少有無頭公案，神秘稀奇。如以此法應用到本題來說，便是：學術的進化，是一步一步地提高的；世間沒有毫無憑藉的發明與創造。舉例來證——

牛頓的三大定律，普通都說是他發明的。其實第一個是開普烈（Kepler），第二個是蓋埋略所發現；第三個在他

未發表Principia以前，Hooke, Huyghens, Wallis, Wren等以及其他，已經多少知道了。大家所以歸功於牛頓，因為三律由他正式規定，並且有系統地在他有名的 Principia裏發表。瓦特 (James Watt) 之於蒸氣機，富爾敦 (Robert Fulton) 之於輪船，也是如此。

同姓，我們大都只曉得哥白尼 (Nicolas Copernicus) 在十六世紀的天體進行論是近世天文學的開路先鋒，誰注意在紀元前二八〇年，薩摩斯的亞里士塔卡斯 (Aristarchus of Samos)，已經發明了太陽中心說 (The heliocentric theory)？我們如果要驚讚十九世紀末士同來 (G. J. Stoney) 和湯姆生 (J. J. Thomson) 所提出的電子說 (據 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Vol. IX, P. 237, 11th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ngland) 是近世理化上的一個基本假定，同時切不可忘了遠在二千三百多年以前，希臘的原子論者們 (The Atomists)，已經奠定了相當的基礎。爲什麼他們會有這樣的蛛絲馬迹呢？個人的解釋是：西洋文化，開始使注意宇宙的問題。中世紀雖曾一度衰落，但文藝復興，卻又緊接上去，繼續對於宇宙探尋寶藏的精神。成績積累因久而多，所以成了現代洋洋大觀的科學文化。追根溯源，我們可以發現希臘的第一個哲學家泰爾士

(Chales, about 624—551 B. C.) 宣言道：水是組成世界的原料。他是所謂『伊阿尼亞的物理學者們』(The Ionian physicists) 之一分子。這些學者共通問題是：甚麼是世界所以組成的基本材料？(Thilly.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p. 14—32) 換句話說：即什麼是天地萬物的本源？自泰爾士開端以後，繼起的人們，有的說是無限 (The infinite)，有的說是空氣，有的說是火，有的說是地水火風四種原素這些說法的荒謬，在二十世紀石來，誠然是可笑已極。但他們那種研究自然的精神，確是很值得注意的。我不是說他們的那些說法已是科學的種子，我是說：近世西洋科學的發達，上天下地的鑽求，追因溯源，科學的種子，可以說是從那裏演變出來的。

本於這個觀點，我不贊成叔永先生將文藝復興以後的歐洲和古希臘一概截爲兩段。我的理由是：他們的方法誠然有異，但對象則主要仍是自然；他們的觀點與成績的多少雖是各別，但發展的途徑，則似乎並未另行掉向人事。將希臘與文藝復興以後的歐洲相連，這是多人承認的看法。因爲文藝復興的原義爲『再生』(Renaissance)，就從這字的本義，便可證明，無待另覓。若將中世紀與文藝復興以後看成也有關係，則叔永先生的本文中——『說到科



學的種子，歷史家雖然常常溯源到希臘的亞基米德，亞里士多德等等。但嚴格地說起來，我們以為須推重中世紀以實驗爲學的洛皆培根……」（按此君生於一二一四，死於一二九四）——就已經給我們以良好的證據了，原來社會文化譬如一條大河。從發源以至入海，河身雖然有高有低，有轉灣，有瀑布，甚至有暗流，但總是節節相涵，殊難截爲兩段。

回頭看中國。爲什麼我們在上古雖然與希臘相似——也有科學的微粒——何以近世却沒有科學的開展呢？這問題說起來也很長很複雜。茲僅略提個人昔日所得的一點結論，一個解釋：『打開中西哲學史一石，我們可以發現：西洋的哲學家，差不多都不是倫理思想家；而中國的以前所謂哲學家，却差不多都是倫理思想家。從大體來說，中國以前的學者，對於人生問題（廣義的）狠感興趣，所以他們的學問，不是爲宇宙而研究宇宙，乃是有時爲人生而研究宇宙。換言之，即宇宙的研究是手段，人生的研究乃是目的。西洋人不同。他們的學者，大都對於宇宙問題狠感興趣，所以他們的學問，每是爲宇宙而研究宇宙，不是爲人生而研究宇宙。換言之，即宇宙的研究是目的，不是手段』。因爲恐怕又來萬言書，所以中國的例證，就恕

不一列舉了。

我狠相信：人的聰明智慧是中立的可能性，看用法如何，則得結果如何。西人與國人的智慧，在先天方面，確在『伯仲之間』。所差者從前一個主要向自然方面進攻，一個主要向人事方面發展而已。緣於起首的哲人領導不同，後學的目光所射遂異。久而久之，蒸爲習尚，個例難逃。此即我前次所謂相差者是環境不同，設備不同，教育不同，方法不同而已者。叔永先生說：『一個民族在智識上的進步，各有所偏，這是天生的差別。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我不贊成這種先天的神秘的解釋。至於將向內與向外發展兩事來區別，我亦有點不贊成。因非屬本文範圍，評論從略。

總結起來，科學的種子，似乎不當解作中世或近世的科學方法，也不能認爲只是近世的科學大師所持的理論。因爲這些理論，非突如其來，更非從天而降，乃是木有水，水有源。要看種子，還需從本源上去找，不能在半身上去摸。古代哲學包羅萬有，後來各科逐漸獨立，逐漸分化，這是證明。『由簡而之賾，進程本是如此。叔永先生說：『凡是一個種子，在牠的本身上必須具有發達生長的生機與潛能，不僅是一些零星片斷的微粒』。是的，不過

這本身具有發達生長的機能者，不是方法而乃是智識本身，理論本身，由簡單而進於繁複者的本身。科學本身現已千門萬戶，而方法本身則並無大異。對於不同的材料，可以相同的方法治之。這可見工具本身單純而少變化。至於材料則愈集愈多，理論則愈傾愈密。這可見智識本身複雜而有生長。演進無止境，科學的前程尚遙——尤其是尚在乳臭時代的社會科學。叔永先生道：『牠的（指科學）領域正在逐日擴大，絕不見有止境』。此意與吾人所見正同。本此以觀，如說希臘時代的科學知識太幼稚太零星片段，不配算做種子；則若干世紀以後，恐十六七世紀的所謂科學大師所持的理論，在此刻認為滿够格者，將來恐亦同受剝奪為種子的權利。王羲之說得好：『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

所以，我覺得科學的種子，似乎還是當解作：『科學智識的微粒，胚子，至多是初步的ABC，而不是有統系的大著作』。我也還是相信：『西洋科學之有今日，也是由零星片段的科學知識，經多人長時間的努力，漸漸集會

整理擴大進化分演收進而成，非從上古即有又精又詳，蓋然扶然的完滿系統在也。假如不幸西方也和中國一樣，——沒有人繼續向這方努力追求，任其塵封，置之高閣——難道我們生於今日，也可說西洋也沒有科學的種子麼？難道我們可以將他們上古所傳的些微者，也一筆鉤銷不算麼？』（六十六號第十六頁）歷史家說到科學的種子，常常溯源到希臘的亞基默德，亞里士多德等等，蓋有由也。我們對於這宗見解，如以進化的眼光來看，以祖孫的方法來論，似乎不能不認為是對。

昔人道：真理愈辨愈明。本於科學認真，直率，不苟且，不馬虎，實事求是的態度，謹合如石。甚盼叔永先生以尤進的資格，再為解惑釋疑，則不勝感謝之至。

二十二，十一，八。

附啓者，適之先生如已返國，尚冀其對六八至六九號所載『我們還需要提倡無為的政治哲學嗎？』一文作答。

☆

☆

☆

☆

☆

# 再答 閔仁先生

叔永

我們相信許多學術思想上的爭論，都是由於彼此之間，對於所用的術語未能有一個共同的了解。閔仁先生此次再提出科學種子的問題，也是一例。閔仁先生說：

所謂科學種子也者，顧名思義，似乎應當解釋作科學智識的微粒，胚子，至多是初步的ABC，而不是指有統系的大著作

這是閔仁先生關於「科學種子」的了解。我的意思，以為單從量的方面來解釋科學種子，尚嫌不夠，必須於質的方面，也具有相當的條件。所以我們說：

凡是一個種子，在牠的本身必須具有發達生長的生機與潛能，不僅是一些零星片斷的微粒。

我們把這兩種了解，排列起來，便可了然於我們所爭論的，並不是因為牠的「量有多少，質有優劣」，而是因為近世的科學在根本上和古代的科學有不同的地方。

說到「具有發達生長的生機與潛能」，讀者不要誤會我們所指的是甚麼神秘不可思議的力量。我們所指的，只是近代科學家所常用的歸納論理方法。歸納方法，雖然常

常與弗蘭西斯培根的名字聯合不分，但是我們曉得這理論的成立並不關重要。重要的，是從洛皆培根以後的科學家都用了試驗的方法來探討天然的奧妙。試驗的方法於近代科學有兩個大貢獻：一方面是避去一切玄理空想，在宇宙間的自然現象上去尋求研究的材料，一方面是這種探討的路徑可以腳踏實地的，一步一步的，引伸到高深的地步，不至於如其他的哲學方法，常常成了一個絕潢斷港，永遠沒有發達滋長的可能。再拿閔仁先生所舉的原子論來說

罷。雖然在紀元前的希臘時代已產生了原子論的學說，雖然現時談科學史的說到原子論還要提到希臘的底說克原里托斯(Democritus)，但是我們曉得希臘的原子論和現代的子論絕對不是一件事。但皮爾魏商姆在他的科學史中說得好：希臘學說，不過是他們哲學中宇宙論的一部份，且永久是一個學說，同古往今來許久形上哲學一樣，要看牠發明者及信奉者的心的態度而定。他們很容易從根本上推翻，為一個相反的新哲學系統取而代替。這就是希臘原子論的命運。

可是晚近的原子論就完全兩樣了。牠的根據了許多化學上分析比量的事實，得到的一個綜合的結論。牠的原子，不一定是一個兩個或四個；牠們可以由八十幾加到九十幾，或者再由九十幾減到一個兩個（如近代的電子論）。但是牠都是根據事實的結論，不是因為新哲學統系來把牠推翻或代替。

我引証這一點，只是要說明無論那一門科學：從歷史上說來，都可以溯源到什麼希臘，羅馬，或者再遠一點到埃及，和我們中國，若是你願意的話。不過我在這樣做的時候，不要忘記我們討論的是現代科學。現代的科學和古代所謂科學，題目雖是一樣，性質却大大的兩樣了。所以從歷史上看來，雖不妨把每一種智識追溯到上古時代以見牠來源的悠遠，但從科學的本質看來，似乎斷代取義，反足以表示近代科學的特性。這是我要說明的第一點。

其次，科學方法，是不是可以認為科學的種子？這一層閔仁先生以為不能，我以為是能的。我們要曉得，現代的科學與牠的方法已經合而為一，不能指出某部份是方法，某部份是科學。因為方法只是研究科學的一些過程。我

們不能說結果是科學，過程不是科學，因為廣義的說來，所有的科學都是在過程中的。閔仁先生以為方法只是一種技術，所以配不上稱科學。我想閔仁先生所謂技術，或者是指施行試驗及計算結果種種而言。可是這些不能包括科學方法的全部。如設立假設，計畫實驗，解釋結果等等也是科學方法的一部份，這些，我們能稱之為技術嗎？老實說來，有許多科學，現在還在假設及實驗的過程中間，我們沒有法子不承認這些是科學，就沒有法子不承認一部份的方法是科學。明乎此，則閔仁先生所舉的新漁翁用大網，舊漁翁用小罾的話，可以說是不甚了解近代科學的性質。

科學的種子問題，本來不關重要，我們的討論也就此為止。又在本刊的七十五期中，有趙究靈先生的『我也來談談心理與科學』文章一篇，中間所說，有的頗與鄙見互相發明，有的自然大有異同。我因南下旅行，直到最近才看見趙先生的文章。現在并以此文附答趙先生，不知趙先生以為何如？

二十二，十二，二十五。

☆

☆

☆

☆

☆

# 編輯後記

編者

△北平郵政管理局通知我們說：『茲准南京郵局驗單內稱：「由北平寄交南京，如皋，太倉，鹽城，金山，儀徵，漣水，崑山，海門，揚中，阜甯，橫林，正義，黃渡，各地之獨立評論，共一百二十一件，業經首都憲兵司令部郵電檢查員扣留，應請通知寄件人。」』我們現在才知道扣的是第八十一期。這些地方的閱者收不到本刊時，請通知本社。

☆ ☆ ☆ ☆

△本期有「閔仁」先生從歐洲寄來討論「科學種子」的長文，和任叔永先生的答復。他們討論的原文，題目是「還是心理與人的問題」。我讀了他們的辯論，忍不住要唱兩句我們做小孩子時慣聽着的神童詩：「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無論他們的爭點誰是誰非，我們總得努力追上前去，做我們在世界科學裏能貢獻的貢獻。

△平心說來，「閔仁」先生和叔永先生都是有非，有得有失。在大體上，我贊成「閔仁」先生的說法：西洋近代科學的種子確是種在西洋古代「那種研究自然的精神」

。我們不要忘了，歐克里得的「幾何原本」是希臘文化留給後世科學的最大遺產；亞基米德的物理學，亞里士多德的搜集研究動植物，也都是實驗科學的重要先例。這種科學遺產，在中古的大學裏得着了「再生」的機會，就繼續造成近世的科學。反過來看，中國古代傳給我們的文化，實在太側重倫理而太忽略自然了；實在太偏重文字而太不注意實物了。雖有鍊丹採藥的方士，終敵不過那養神坐忘的道家；雖有格物致知的科學理想，終于因為沒有一點研究自然的風氣，所以「即物窮理」不久就變成了「讀書窮理」。所以我是贊成「閔仁」先生的科學種子說的。

△任叔永先生太看重論理學書上所謂「歸納」方法了。科學的方法並不全靠歸納，耶方斯以來早已有許多人說過。幾何學就是很明顯的例。最重要的一點是要知道：單有了科學方法，未必產生自然科學。三百年來的考證學方法是無可疑的科學方法，然而所以終不產生自然科學，只是因為科學方法只用在文字書本上，而不曾用在自然界的實物上。方法固然重要，材料的性質更重要。科學方法用





## 輿論在中國何以不發達

吳景超

國聞週報十一卷二期，載有胡政之先生的一篇論文，題爲中國何以沒有輿論，大意以爲中國沒有輿論，是因爲言論不自由。我對於胡先生這篇文章，雖然是贊同的，但覺得他的分析，還未能十分詳盡，所以做這篇文章來補充他。

在討論正題之先，我願意把輿論的過程，分析一下。抽象的說，輿論的歷史，可以分作四步。第一步是批評。假如世界上一切的人，對於一切的事，都感覺到滿意，世間便聽不見批評了。批評之起，一定是有一部份人，對於某一種社會問題，發生了不滿意的感覺。他們把身受的或觀察到的社會缺點，盡情發洩出來，以引起社會人士的注意，這便是輿論的第一步。第二步便是建議。批評是消極的，而建議乃是積極的。批評是破壞的，而建議乃是創造的。社會的缺點既已有人指出，于是便有一些人士根據他們的經驗，學理，信仰，或主義，提出改良的方法。這些方法提出之後，輿論便走到第三步了。第三步是討論。這個時候，有人贊成甲的主張，有人贊成乙的主張，有人覺

得甲乙的主張都不對，他提出第三者的主張。又有人覺得甲乙丙的主張都有相當的道理，他把這些都歸納起來而成爲一種調和的主張。這許多主張，彼此抵消，彼此補充，彼此修改，經過相當的時期，便有一種或幾種比較成熟的見解出現。這種成熟的見解，不是某甲個人的意見，也不是某乙個人的主張，而是許多人經過長期討論後的一種結晶品，是大衆心血的出產物，所以可以稱之爲輿論。在民治的國家裏，輿論到了這個時期，人民的代表，沒有不加以注意的道理。于是輿論所要求的，便成爲議會中的議案了。到這個時候，得到多數擁護的輿論，便有成爲法律的可能。法律實施之後，便可把大家認爲不滿意的問題，照多數的意見解決了。所以輿論的法律化，可以說是輿論的第四步，也就是輿論的最後一步。輿論做到這一步，輿論的大功便算告成了。

以這個分析爲背景，我們便可進一步來討論中國的輿論何以不發達。依我的觀察，中國的輿論所以不發達，便是在輿論發展的過程中，遇到很多的障礙。這些障礙，有



的起于制度方面，有的起于心理方面，有的起于人材方面，并不只胡先生所說的一端。胡先生所說的言論不能自由，誠然有一部份道理。我們上面所說輿論的第一步是批評，而在今日批評社會，并不是完全自由的，誠如胡先生所說。但是反過來說，我們并不能說，現在批評任何事物，都不自由。只看胡先生等主辦的大公報社論欄中，今天批評這件事，明天批評那件事，便可知我所說的，并非過分。不過政府把輿論的範圍縮小，把批評的對象，加以限制，使輿論的職權，不能充分行使，的確是中國輿論不發達的一個原因，我們不能否認的。

但是這兒我們要問一句：在我們可以批評的範圍裏，在言論可以自由的園地裏，我們是否總可以聽到輿論？經濟統制問題，是我們可以討論的，我們聽到了什麼輿論？黃河水災，是我們可以討論的，我們聽到了什麼輿論？苛捐雜稅，是我們可以討論的，我們聽到了什麼輿論？我們聽到的有一些呼號，一些謾罵，也還夾着一些譏笑，及海上傳來的幽默。這都是感情的發洩，而不是以理智為基礎的輿論。中國今日所以有這種現象，并非言論的不自由，而是沒有人材，沒有智識的領袖，來充分利用這種自由。譬如拿經濟統制來說，中國人民的經濟生活，應當如何統

制，外國的情形，有那些可以參攷，關於這些問題，中國就很少有人，能以中國事實為根據，參以外國的經驗及理論，發揮他的真知灼見的。所以經濟統制這動點出之變，便沒有幾個人敢跑上輿論的舞台上去沖刺的。其他類此的問題，不勝枚舉。我們缺乏專家，缺乏學者，缺乏作積極建議的人材，乃是中國輿論不發達的第二個原因。

即使一個問題，能够征服上述的兩層困難，而到了討論時期，輿論還是難于長成，因為在這個階段中，還要遇到許多心理上的阻礙。所謂心理上的阻礙，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國人缺乏討論的態度。我們如提出一種見解或主張來與別人討論，最要緊的，是不可固執己見，要虛心傾聽別人的理論及其主張。假如從別人的批評中，發現自己主張或見解的錯誤，便應立刻矯正。所以有討論態度的人，是歡迎別人批評的，他們時刻想發現別人的長處來修改自己的短處。但在中國的論壇上，似乎很少遇到這種態度。某甲假如提出一種主張來，似乎便與這種主張發生戀愛，要終身與他作伴，再也不肯分離。有這種態度的人，對於贊同他的主張的人，便欣然色喜，稱之為友，稱之為同志。假如有人批評他的主張，便勃然色怒，原來是朋友的，現在也要變成仇敵。對待仇敵當然可以不必客氣，所以在

反攻的時候，不但要說批評他的如何沒有學問，還要說批評他的如何沒有人格。所以甲乙討論一種問題，結果每是甲呼乙爲走狗，乙呼甲爲敗類收場。這種討論，是沒有價值的，也沒有結果的，決不能產生成熟的輿論。我們如想產生輿論，一定要養成一種討論的態度，來掃除現在論壇上的烏煙瘴氣。我們雖然要謹慎的提出自己的主張，但在討論的過程中，如發現新的事實，新的理論，也可以隨時修改我們的主張。同時還要尊重對方的人格，討論時要保持論壇上的禮貌。在這種心理狀態之下，意見才可以自由交換，自由修正。私的意見，才有演化成爲輿論的可能。

最後，我以爲中國輿論所以不發達的第四個原因，便是輿論缺乏發揮威權的工具。在民治的國家裏，輿論的工具，是議會制度。輿論以爲是，議會中的議員不敢以爲非。輿論以爲非，議會中的議員不敢以爲是。輿論左傾，雖

以大總統及大皇帝的威嚴，也不敢固執向右。違背輿論的政府，在選舉的時候，便要受到制裁的。所以在這種國家裏作文章或者演說，是與實際政治分不開的。創造輿論，指導輿論的人，便是從事政治，因爲他可以影響政治。在中國則不然。我們對於一個問題，無論怎樣談得起勁，似乎總有點「紙上談兵」的感覺。在政治舞台上活動的人，并不必要對輿論負責，所以他對於輿論，有時可以置若罔聞。在這種時候，許多人覺得作文章不過白費心血，說話也是白費精力，於是無論什麼大問題來到，他們也是啞若寒蟬，一句話也不肯說。這些人假如有參政的機會，假如覺得自己所說的話不是白說，那麼有什麼問題發生，一定會踴躍加入討論的。所以我說輿論缺乏發揮威權的工具，是中國輿論不發達的第四個原因。

二三，一，二十。

## 政府應以一種新精神領導全國

君 達

近代政府的力量不盡在紙片上的法統，亦不能靠幾個軍人的武力，最要緊的基礎是要建築在全國人民的心理上。一個政府如果沒有這個國民心理上的基礎，無論如何合

法，或擁有如何武力，即使不立即崩潰，終也不會鞏固而有力的。但我所謂國民心理上的基礎，不是表面的輿論，更不是少數士大夫的意見。消極的跟著輿論走，或是敷衍

著一般自鳴先覺的士大夫，並不一定能够發生真正力量。尤其是在國勢危急的時候，只靠通常的尊重輿論，往往是緩不濟急的了。試看明末的崇禎時代，未始不曾重當時的士論清議，但終不免亡國。即如前清的季年，也未始不跟著當時的輿論，籌備立憲，辦理新政，設廠造路，猶如現在所說的建設事業，但終也救不了亡國。我以為在時局危急的時候，政府當局不應跟在輿論的後面，必須站在輿論的前頭，不但要尊重，而且要能領導。換句話說，救時的政府應該體察國家的需要，定出滿足這種需要的途徑，提起全國的精神，向那選定的一條路上跑，不管暫時的困難，或淺見的議論。只要那條選定的途徑是對的，政府自身能用精誠純一的精神來領導，一定能在很短的時間，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引動全體國民的鼓舞興奮，跟著向同一方向努力。到了那時，不但政府，整個國家都會得到了一種意想不到的新的力量。

這種起衰振敝的現象，在近代歷史上，實例甚多。日本的明治維新，蘇俄的共產革命，意大利德意志的法西斯帝政治，雖然性質不同，都是靠幾位政治家，或一個政治集團，針對他們國家那時代的最迫切的需要，奮起領導。因為他們的領導者都能認清前進的方向，勇往直前，又能

處處表顯他們的精誠純一的精神，所以能够感動國民心理，使懷疑者逐漸相信，反對者逐漸消極，全體國民知道有一條出路共同努力的向前。可惜我們中國歷史上很不容易找出這樣實例，那當然因為中國向來是帝政專制，以國家為帝皇私產，故不容易發生領導民衆的領袖。比較相近的還是近年的國民革命，雖然有許多幼稚的言論舉動難免有識者的批評，雖然有許多政治上的措施不一定合於中國的國情，但因為在那時軍閥連年混戰民衆找不到出路的苦悶環境中，國民黨能够指示出一條新的途徑，又的確有幾位中心人物對於這新途徑有幾分真實信仰，所以能够鼓舞起大多數的人心，欣然向上。不幸北伐成功之後，新政府中缺乏真正的政治領導者，例如種種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實在是應付當時已被引起過份虛矯的輿論，而沒有定識更沒有勇氣提出一種適應全國團結建設的需要的新口號來領導全國。又因為新政府內免不了舊軍閥舊官僚的壞習慣，政治上只有許多新門面而顯不出幾多新精神，所以即使有幾位領袖確有救國救民的誠心，也就失去領導人心的能力了。

中國人無論對於什麼，信仰心向來是很薄弱的。何況經過目前這樣的外患摧殘，又有許多矛盾主義的入主出奴

的宣傳，弄得一時人心徬徨苦悶，幾乎陷於絕對悲觀，百不相信。在這種環境中只有希望真正政治領袖，細心考察國家最迫切的需要，毅然揭其所信，精誠貫徹，做全體國民的領導。其實在這樣徬徨苦悶的境地中，也是政治領袖最容易起來領導的機會。

現在中國有一種可樂觀的現象，便是國民有相當覺悟，大家感覺有一個統一政府的必要，所以幾次分裂或反對中央的運動都不能成功。但同時又有一種可悲觀的現象，便是大家對於中央政府並不十分信仰，只是維持著一種不即不離的態度。其結果是中央政府在內政外交上都缺乏真實力量，只能在表面上發表若干迎合人心的空言，不能在事實上阻止中國社會的崩解，或應付國際愈迫愈緊的危機。這樣下去，還是有不能維持的一天。我以為我們要免此危險必須使我們政府有真實的力量，但要使政府能有真實力量，必須政府當局能表顯領導全國的精神。

現在所說的和平統一，生產建設，也未始不是一條出路。但要引起國民鼓舞興奮的心理，還要政府當局多表顯一些精誠純一的精神。如何表示這種精神呢？當然空言不如實事。不揣冒昧，我想上幾個具體條陳。（一）黨國當局立刻停止及取消黨內的小組織或以個人為中心的一切特殊

組織，將此類小組織的一切權力及財力交付于國家正當機關，而完全受其支配。（二）當局要人如有在香港上海等外國勢力下置有私人財產者，悉數自動變賣，移充軍國要需，或經營內地生產事業。（三）厲行官吏就職時「不引用私人，不妄費公帑」的誓言，而重其德綱。（四）外交上力求和平，但迅速建設國防要塞及戰時自守的必要設備，使國民相信忍辱正是負重。只此寥寥數著，定可以引起國民信仰，恢復國民革命初期的力量，而使中央政府成為真正領導全國的政府。有了這種力量，各省封建軍閥也有所畏憚而容易壓服了。其中一二兩條在常例說來，不無期待太苛，有些不近人情。但在中國民族生命危如累卵的現狀之下，尤其是在這個國民心理迷糊麻木之中，政府當局必須有深刻動人的表示，庶能引起心悅誠服的感動。一則表示「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的信心，二則表示信仰國運破釜沉舟的決意。我們要信中國還來得及救，現在便是起死回生絕好的機會。

無論何種團體，做領袖的人必須能實行領導。例如各處大學，做校長的如能有領導全校的政策及精神，或是延聘名師提倡研究，或是增加設備提高程度，淺至於擴充建築推廣校址，只要言行一致誠心為公，必能提起學生精

神，取得他們的信仰。反之，如校長人格不修，或縱容左右私人，借公濟私，只知操縱各派教授，或取媚于一部份學生，希望敷衍現狀，維持地位，即使操術甚工，終不免

釀成風潮，一敗塗地。國事也是如此。中央政府決不能專靠彌縫應付，敷衍度日，必須拿出精誠爲國的精神，揭出領導全國的方針，纔能得國民安心信仰與盡力擁護。

## 中國革命與歐洲革命

徐旭生

在陝西政務研究會講演稿

今天胡廳長教我來和大家談談話，我一面很覺榮幸，一面也很覺慚愧。因爲諸位研究的是政治，我對於政治，不但沒有專門的研究，即相淺的知識，也沒有具備。我過去是學哲學的人，近來專從事於考古工作。不過我所研究的，總近于歷史。近來從歷史方面，看出來中國今日政治上，有一個異常困難，我個人怎麼樣也想不通的問題。今天趁此機會，提出來，供諸位的研究。

革命。在革命過程中，不能不有破壞，於是民衆方面，就不能不有暫時的痛苦。因爲有痛苦，一般人就免不了要悲觀起來。我覺着如果單是這些，是無庸悲觀的。

唯物史觀的論理，我覺得它大體是對的。我說它大體是對，是承認它有個百分之九十幾的是處。可是在極小一部分，却並不是不要緊的一部分，人類的心理，也還很有關係。我個人堅確相信，無論一個社會，怎麼樣的興盛，如果它的分子，全是玩時愒日，存一個逸恤我後的心理，那個社會，一定很快的衰落下去。無論一個社會，處境怎

我在說話以前預先須有一句聲明：就是我在說話推論

的中間，有時候，好像異常悲觀，請大家不要誤會：我個人就全體講，並不是悲觀的。並且就是這一部份的好像悲觀，也並不是指人民暫時的苦痛。因爲通常政治上生了不可解的矛盾，統治階級掙扎著無法維繫時，就起了革命。如外國的政治不好，就發生革命；中國政治不好，也發生

麼樣的艱困，如果它的分子，全能堅苦奮厲，不畏挫折，不憚艱困，那一個社會總還可以復興起來。艱辛固可以給無勇氣的人以挫折，也可以給有勇氣的人以激勵。爲禍爲福，全看自己有勇氣沒有。所以我們中國今日的問題，雖說異常艱困，好像不大容易找出來出路，可是這正是志士

應當奮發的時機，殊無所用其悲觀。

拿近二百年來歐洲革命史來說：在歐洲未發生革命以前，他們的統治階級，差不多完全是以打仗爲職業的人——即武士，亦即貴族。他們的被統治階級呢？是農人，工商業者，讀書人等等。他們的工商業者，都從事海外貿易。因貿易的結果，而工商人勢力都漸漸擴大，可以說已經成了一種新富族。他們當時的讀書人呢？因文藝復興，受希臘人的影響，不自限于研究人生，並且能更進一步，不死跟著希臘人跑，却直接去研究天地萬物，——自然界的大學問。於是自然科學異常發達。此時統治階級，只會打仗，不會理財的武士，經濟窘迫的很；對於新富族，工商業者，不得不加以壓榨。這一般的新富族，雖在數目上，不能占全國的大多數，而役物之力，實已占有全國頂重要的部分。並且他們的組織力也很大。——大家罵我國的農民無組織，其實外國的農民，也全是一樣的。東歐以農民佔多數的國家，不容易成民治，也就是一個明證。因爲什麼呢？因爲一直到現在的農業制度，全與家族制度有不可分離的關係。一家祖孫父子兄弟，共同務農，絕不需要特別的組織。工商業所聚起來的，全是些東西南北不相干的人，沒有組織，一天也辦不下去。歐洲這樣的新富族

，既有役物的偉大勢力，又已有善于組織的習慣，所以他們就起來領導着革命，由被統治的地位，達到統治者的地位。因爲新統治者，本身就是生產階級，所以革命以後，生產愈處有利的地位。至于他們的讀書人，也能拿他們從天地萬物所得的知識，——自然科學，——幫助新統治階級，而機器愈益發達，工商業愈益進步，國富愈益增加。開始是發展都市的文化；及有餘力，乃更出其資產以發展農村，因而各樣的生產事業，均得長足的進步：這是歐洲革命所走的路。

反過來看我們中國呢？我們在革命以前，舊有的統治階級，并不是以打仗爲職業的人，而是士大夫階級。武人是不過處於附屬的地位。俗語常說「文官動動筆，武官把馬催」，就是這種現象的表現。並且士大夫階級在中國統治了數千年，高位厚祿好像是他們的本分。所謂「治人者食人，治於人者食於人；」孔子也說：「耕也，飫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並不是什麼特殊的情形，止是他們的活該！還有一件，就是中國數千年來，聖賢豪傑所研究的對象，也止拘拘于人生所應該作的事體。至對於天地萬物，他們的興趣，不很發達，所以對於自然界的知識，異常貧乏。這是革命以前的大約

情形。

最近外患來了，舊有的組織，很難維持下去。開明的士大夫，自己也看出這樣的形勢，於是舊統治階級自行分裂。他們也沒有看出歐陸革命的真實內容，止看見他們革命以後，愈益富強，以爲我國也一革命，就可以有救了。

可是中國的革命，由誰去革呢？中國內部，沒有新富族——資本家——產生。雖有福建廣東的華僑，經商各國各地，有點新富族的雛形，但對於全中國人數的比例，占極微的數目，故其勢力甚小。至於大多數的農民，毫無組織，絕無革命的能力。大家雖然感覺到非革命不足以圖存，可是不能像歐洲之以工商業者領導革命，而是讀書人引導着革命。因爲舊統治階級的腐敗，革命有意外很快的成功。但是因爲中國沒有新興的工商業，沒有新富族，統治的重擔，還是落在不能生產，不知生產的士大夫的肩頭上。並且還有壞的：就是由于很多的鬥爭，統治權漸漸移到以戰爭爲職業的人的手中，士大夫反處於附屬的狀態。袁世凱時期，就是統治權由士大夫漸移于軍人手中的關鍵。以後革命軍北伐的時期，雖然有很短的時候，好像士大夫又取得了統治權，文人可以指揮動武人，而卒因士大夫後面，不是真正有群眾，歸結還是武人擅權，文人附屬！

中國這兩種人，——武士和讀書人——作了統治階級，

懸于上，民治萬無成功的希望。他們全不知生產爲何物，不能發展很大的富力以圖建設。並且像這樣以戰爭作職業的人，使他們作了統治者，不惟在中國是禍國殃民，其實在外國又何嘗不如是？中國的軍人，知識尤其幼稚的可笑：他們不惟不能輔助生產者的發展，並且專會殺雞子找蛋，把新興工商業的萌芽摧毀盡！把舊有農業的根基破壞盡！至于士大夫，不惟因爲知識簡陋，不能幫助農商工業的進步，並且還有更壞的：因爲從前的士大夫，雖然覺得安富尊榮是他們的本分，可是另外還有一種與之相矛盾的勢力；——就是說：古聖賢還提出一種節儉刻苦的學說，以爲補救。現在的士大夫，生產的能力，一點未能增加，可是因爲有物質文化一說作他們的護符，從前「刻苦自勵」的美德，一洗而空！既不能幫助生產，反而要大量的消費，結果還是祇有盡量剝削農民！至於中國的商業，都是寄生在外商身上，作了買辦階級，祇能把中國的原料收買出去，幫忙外商向內地傾銷製造品而已。中國的工業，則手工業已經被打倒，機器工業又發展的很微細。加以世界經濟恐慌，各國關稅壁壘高築，只好向無防禦的我國進攻。所以我國極幼稚的工業，最近已達到極危險的境地。譬如河

南新鄉，今年的布業，完全被山東濰縣的布業打倒。而濰縣廠之所以能打倒新鄉及其他的廠，就因為他用日本人傾銷的洋紗。並且聽說，河北高陽縣，在去年經營布業者，損失在三百萬元以上。至於中國的絲綢，現在也幾乎不能出口了。聽說中國的廠絲，被日本絲業的壓迫，價值從每包一百二三十兩，跌到不及四十兩！以後政府力為保障，始勉強把絲價定到八十餘兩。絲商僅可以不立時破產，可是往下支持，仍是極困難的。

要之歐洲的革命，是由生產階級，代替了不生產階級，作了統治階級，所以社會的生產力有高速度的增加。先繁榮了都市，又以餘力繁榮農村。至於中國的革命，是一不生產階級代替他一不生產階級，更可以說，是一個更壞的不生產階級替代了一個次壞的不生產階級，作統治階級，所以社會的生產力，更加消縮。他們也做效著人家去繁榮都市。但是都市的一點繁榮完全是由農村破產換來的。都市中多了一座新建樓房有二三十個人住著比較舒服，可是同時農村裏面，就要拆毀了幾百間房屋，幾百農人全要凍死！這就是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大不同的地方！

中國現在的社會環境，同歐洲革命前的環境完全不同。但是和俄國革命以前的情勢，却異常相像。土地遼闊和

農民之無組織，無知識，都是一樣。從前重要的不同點，就是俄國有很大的地主，——即領主對於農民非常暴虐，和中國原先士大夫對於農民的情形大不相同。但是中國現在的武人，對於農民之苛虐，又已經趕得上！我看見大公報上載了一齣慘痛的故事，說：某地方有宣傳隊到民間去宣傳兵民的合作，農民聽見非常之急的說：還叫我們怎樣合作呢？我們的女人和閨女，已經得隨便同他們老總睡覺！還叫我們怎麼進一步的合作呢！這樣極極極苦的情形，又同俄國革命的前夕完全相似。這時候，一定有人說：那有什麼要緊呢？俄國自改了共產，國勢蒸蒸日上。就是對於強鄰，也敢挺起腰板，說一聲：你再來，我就同你拚！我們中國的忍氣吞聲好多了！我們也改了共產，不也就好了嗎？可不知道，這樣還是辦不到的。俄國在革命以前，地方雖遼闊，而交通系統，大致完成。讀書人所受的，仍是歐洲的正統文化。對於自然界的知識，比較中國士大夫的知識，豐富的多。且沒有「士為四民首」，必須安尊富榮的腐敗觀念。而中國呢？首先是交通不便，幾條大幹路，還沒有完成。其次就是讀書人的觀念不正確，對於自然界的學問，異常貧乏。而必須舒舒服服的過日子，又是他們數千年來牢不可破的積習。若要它來作破壞工作是很難



易，但是壞事雖有餘，成事却嫌不足。

並且共產主義，又名集產主義（Collectivist），就是因爲他不單是要剷除富民，爲貧民出氣，却是要合理鉅量的生產，以建樹新組織，新社會。想達到這樣的目的，必須將生產的組織集中起來。專從農業來講，想鉅量的生產，以增加農民的福利，必須使農業工業化。可是如果去掉別的，專就農業工業化說，有大地主，或者還可以有辦法，而每人三畝五畝，十畝八畝却絕對不可能。中國的共產黨，爲爭奪民衆起見，暫時行了分產的辦法。現時出無限的代價，費鉅大的犧牲，由不平均產，達到了分產。將來由分產想要走到集產，恐怕還需要再出無限的代價，費鉅大的犧牲。如此的一翻再翻，我們的人民，是否能受得了？那可真成很大的問題呢。

現在中國的現狀是壞極了，萬不能不改革。可是想要革命，是誰能領導呢？這不能靠以打仗爲職業的人，也不能靠散漫無紀的農人，也不能靠自顧不暇的工商業者。現在頂需要的是要把民衆組織起來。但誰來組織民衆，這是一個極困難的點。難道這就到了絕望的境地了麼？我看也不必。我們的知識有惟一的方式就是由已知以推未知。如果果用這個方式，詳察我們的過去，推測我們的將來，中國

數千年中間，曾經過極困難之時。由于吾先民的聖賢豪傑極困難的，毫無退縮的努力，中國的文化系統，中間雖稍受打擊，但數千年來，却能永續的綿延。如果我們能廣續我先民的精神，不畏艱辛的進行，說我們的民族，絕對過不了目前的難關，那也未免太武斷了。我國今日惟一的出路，是要把這佔全民百分之八九十的農民，組織起來。但誰能來組織農民，這真是一件大疑問了。

無論由何方面看：止有讀書人應負此責任。可是這件事在現在又不可能。第一因爲中國的士大夫與農民的生活太隔絕；第二，因爲他們的利害，與農民的利害相衝突。美國農人工人的收入，與大學教授薪資相差，最大不過兩三倍，中國則相差數十百倍，而未有已。而且讀書人愈舒服，農人愈痛苦。中國的農人組織不起來，中國恐怕再沒有另外的出路。我這一個沒有學過政治的人，對於這個問題，怎麼樣也想不通。並且這個問題，不是一個可以研究，可以不研究的問題，這是關係我們自身的生死問題；關係我們父老兄弟姊妹的生死問題；關係到我們的子孫的生死問題！我們如果想死，儘可以不必管他；如果還想活，那却沒有法子不去研究！所以我今天特別鄭重的，將這個問題，提出于諸位之前，請諸位加以研究。

## 論所謂擇師自由

叔 永

近幾星期以來，南北各大學內乎似發生了一個甚麼運動。運動的形式最激然的，要算暨南大學。據報載暨南中學部的學生們，因為不滿意中學主任鄺嵩齡辦事嚴厲，拿着宿舍內的銅床鐵柱，一直把鄺先生趕出校門。後來大學部學生也起而響應，暨南校長鄭洪年出來干涉，他們便又如法泡製，要趕鄭校長。這個風潮，聽說最近還不會解決。

在新曆年前，北京大學的學生會議決了一個議案，向學校當局提出了幾個要求。這些要求中最重要的一個，便是學生應有擇師的自由。聽說其他大學的學生們，也有同樣的舉動，只是還未至於表面化罷了。

擇師自由這四個字，可以代表許多學校風潮的動機，雖然他們的動機不一定是純一的，他們表現的方式也不一定是一致的。這個題目，看來既是新鮮，自然很容易引起青年的熱情不知不覺的起而為牠奮鬥。不過牠在理論上是否講得通，在事實上是否做得到，似乎值得我們研究一下。

說也奇怪，我們中國人神龕上供的五位尊神，只有師

的一位，是有選擇的餘地的。天地與親不消說了。古人對於君，雖在列國并立的時代，便有『君命天也，天可逃乎？』的信條，便有『一旦委贄，終身不改』的道德觀念。所以雖說『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事』，但這個擇的自由也就有限得狠了。獨至從師一道，我們自來不聞有限制選擇的規定。所以陳良之徒陳相見許行而大悅，可以盡棄其學而學焉。孟子說，『逃楊必歸於墨，逃墨必歸於儒』，都可以證明自來求學之士，對於擇師是絕對自由的。擇師既然本是自由的，所以向來就沒有人想到『擇師自由』的話。如此說來，『擇師自由』這一句話，即使不是舶來的物品，至少也是近時的發明。

擇師自由這句話，既是近代的發明，我們要問牠是牠究竟是從甚麼地方發生的。這無疑地，是有了近代學校之後，這個問題纔會發生。因為學校的組織，一方面固然是代表國家或社會的意志，要給社會上將來的分子一個受教育訓練的便利，一方面包羅衆派，蒼萃羣流，又如大都會的百貨商店，把各種商品都陳列在玻璃窗內，讓顧客去自由選擇。所謂擇師自由這句話，如其還有相當的意義，必

定是與學校的組織不能分離的。但是一說到學校，我們不要忘記，由小學以至大學，都在學校範圍之內。如其大學的學生有爭擇師自由的必要，我們以為小學的學生更有充分的理由來爭這個自由。這是因為：

一，小學教育多半是強迫的。教育既不自由了，不得已而思其次，唯有得到擇師的自由，還可以使學生們有一個調劑的地方。

二，小學教育多尚興趣，教師與學生既有成人與兒童的分別，他們的興趣自然彼此衝突的更多了。因此，學生對於教師，愈有選擇的必要。

可是我們最奇怪的，乃是所謂擇師問題，絕不發生於初等小學的強迫教育，而常常發生於中學以至大學的自由教育，這又是甚麼原故？

小學生有擇師的必要，而不發生擇師問題，這是因為小孩子容易壓制，使他們不敢有自由表示意志的機會嗎？我想這未必然。實際上說來，我們若承認小學生們有自由擇師的權利，我想他們也能鬧得不亦樂乎。不過無論怎樣持放任主義的教育家，從來不聞有主張小學生要有擇師自由的。這不是剝奪小朋友們的權利，這是直捷了當的不承認他們有選擇的智識與能力。同樣的理由，可以應用於中

學及大學的學生。因為中學與大學的學生與小學生比起來，他們的智識程度自然高得多了，可是他們對於他們要學的學問，對於他們的教師，其無能力去加以判別選擇，和小學生對於他們的學問教師一樣，所以我們可以說，中學或大學的學生儘管有擇師的自由，但他們能擇不能擇，乃是一個事實的問題。

我說這句話，也許有些大學及中學的學生不能承認。他們可以說，他們對於教師學問的深淺，雖然不能判斷，但教師教法的良否，是他們直接經驗的，應該有判斷的權利。我們以為這話有對有不對。對的是在大學高年級以上的學生，他們不但能判斷教師的良否，並且能知教師學問的底細。不對的是大學低年級及中學的學生，他們不但不知教師學問的底蘊，並不能判斷教師的良否。這有以下的理由。

第一，大學高年級及研究院的學生，他們功課已漸進於特別專門，他們對於所從學的教授，平時也有了相當的知識與信仰，所以說他們對於教師不能有一個相當的判別是不對的。不過在這一類的學生，他們對於自己的學問前途早已經過了相當的考慮，擇師的問題，可以說是早已解決的了。我們只看近年來學校的風潮，從沒有由大學高年

或研究院發生過，便可明白我們此言不是隨便說的。

以供參考。

第二，大學低年級及中學的學生，他們的功課，不外乎各門科學的引論及某種功課的練習。關於引論的功課，他們不容易知道教師的深淺，這是自然的道理。我們不難舉出許多有名的科學家而同時又是很壞的講演家的例子，設如讓低級的學生去選擇，這一類的學者必定在應該排斥之中了。然而同時在指導研究及幫助學業上，他們是謙途的良馬。又如關於練習的功課，學生們每喜歡寬大鬆懈而厭惡嚴厲認真的教師。設如拿這樣的標準去擇師，那豈不是與教育的目的背道而馳嗎？我們只要看看許多不主張嚴格訓練的學校，教員與學生倒可相安無事，而鬧風潮的每每出於比較認真的學校，這中間的原因何在，可以推想過半了。

照上面所說的看來，擇師自由這件東西，用得着的似乎已不必要，而鬧着要的似乎又用不着。這大約可以說明，無論在我們不自由的古時代，或在現今極自由的任何國度內，這一種自由，還不會被人提出為爭人權的一種口號罷。可是自由是好東西。若是現今的學生們，覺得現今學校的組織不能滿意，教師的選擇，實於個人的學業前途有不可分離的關係，那末，我們不妨提出一兩個擇師的方法

第一，擇師自由，既係因有學校組織而後發生，那末，我們以為與其擇師，不如擇學校。因為在現今學校林立的時代，某校長於某種課程，大概在社會上是有定評的。而說某校長於某種課程，即無異說某種功課有某某著名學者在那裏擔任教課。一個學生要投考甚麼學校，完全是自由的。所以以選擇學校為擇師的手段，即是行使擇師自由的一個最簡便的方法。這個方法，在外國的學生間，可說是日用而不知的。所以他們沒有甚麼擇師自由的口號，他們却實實在在享受了擇師自由的好處。我們國內像樣的學校已漸漸多起來了，大可供學生們的選擇，我們何妨試行一下呢？

第二，如進了學校之後，再發見教師的怎樣的不行，這當然還可以向學校當局提出合理的要求。如其學校當局不聽我們的話，我以為唯一的方法是退出學校，然後在校外以個人的資格，發表學校的腐敗或教師的不稱職，以求社會上的公正評判。這樣，在個人方面固可以達到擇師的目的，在學校方面也不至演出學生選舉教員的怪現象！至少不至於如羅蘭夫人所云『自由，自由，天下許多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 「舊瓶不能裝新酒」嗎？

適之

近人愛用一句西洋古話：「舊瓶不能裝新酒」。我們稍稍想一想，就可以知道這句話一定是翻譯錯了，以訛傳訛，鬧成了一句大笑話。一個不識字的老媽子也會笑你：「誰說舊瓶子裝不了新酒？您府上裝新酒的瓶子，那一個不是老啤酒瓶子呢？您打那兒聽來的奇談？」

這句話的英文是「No man putteth new wine into old bottles」，譯成了「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瓶子裏」，好像一個字不錯，其實是大錯了。錯在那個「瓶子」上，因為這句話是猶太人的古話，猶太人裝酒是用山羊皮袋的。這句古話出于馬可福音第二章，二十二節，全文是：

也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裏，恐怕酒把皮袋裂開，酒和皮袋就都壞了。只有把新酒裝在新皮袋裏。

這是用一八二三年的官話譯本。一八〇四年的文言譯本用

「舊革囊」譯 Old bottles。皮袋用久了，禁不起新酒，往往要裂開。（此項裝酒皮袋是用山羊皮做的，光的一面做裏子。耶路撒冷人至今用這法子。見聖經字典 Bottles 一條。）若用瓦瓶子，磁瓶子，玻璃瓶子，就不怕裝新酒了。

。百年前翻譯新約的人知道這個道理，所以不用「瓶」字，而用「舊皮袋」「舊革囊」。今人不曉得猶太人的酒囊做法，見了 Bottles 就胡亂翻作「瓶子」，所以鬧出「舊瓶不能裝新酒」的傻話來了。

這番話不僅僅是做「酒瓶子」的考據，其中頗有一點道理值得我們想想。

不能裝新酒，要看是舊皮袋，還是舊磁瓶。「舊瓶不能裝新酒」是錯的；可是「舊皮囊裝不得新酒」是不錯的。

昨天在大公報上看見我的朋友蔣廷黻先生的星期論文，題目是「新名詞，舊事情」。他的大意是說：

總而言之，近代的日本是拿舊名詞來幹新政治，近代的中國是拿新名詞來玩舊政論。日本托古以維新，我們則假新以復舊。其結果的優劣，早已為世人所共知共認。推其故，我們就知道這不是偶然的。第一，舊名詞如同市場上的舊貨牌，已得社會信仰。……所以善於經商者情願換貨不換牌子。第二，

新名詞的來源既多且雜，……正如市上的雜牌偽牌太多了，顧客就不顧牌子了。所以新名詞既無號召之力，又使社會紛亂。第三，意態是環境的產物。……環境不變而努力於新形態新名詞的製造，所得成績一定是皮毛。

他在這一篇裏也提到舊瓶裝新酒的西諺。他說：

日本人於名詞不嫌其舊，於事業則求其新。他們維新的初步是尊王廢藩。他們說這是復古。但是他們在這復古的標語之下建設了新民族國家。……日本政治家一把新酒攔在舊瓶子裏，日本人只歎其味之美，所以得有事半功倍之效。

我想，蔣先生大概也不會細考酒瓶子有種種的不同。日本人用的大概是瓦瓶子，瓶底子不容易瀝乾淨，陳年酒瀝積久了，新酒裝進去，也就沾其餘香，所以倒出來令人歎其味之美。鴉片烟鬼愛用老煙斗，吸淡巴菰的老煙也愛用多年的老菸斗，都是同一道理。可是二三十年前，階們中國人也曾提出不少「復古」的標語。「共和」比「尊王廢藩」古的多了，據說是西曆紀元前八百多年就實行過四十年的「共和」；更推上去，還可以上溯堯舜的禪讓。「維新」「革命」也都有古經的根據。祭天，祀孔，復辟，也都是道地的老牌子。孫中山先生也曾提出「王道」和忠孝

仁愛等等老牌子。陳濟棠先生和鄒魯先生在廣東還正在提倡人人讀孝經哩！奇怪的很，這些「老牌子」怎麼也和「新名詞」一樣「無號召之力」呢？我想，大概階們用來裝新酒的，不是瓦瓦，不是玻璃，只是古猶太人的「舊皮袋」，所以恰恰應了猶太聖人說的「舊皮囊裝不得新酒」的古話。

蔣先生說：

問題是這些新主義與我們這個舊社會合適不合適。是的！這確是一個問題。不過同時我們也可以對蔣先生說：問題是那些老牌子與我們這個新社會合適不合適。這也是一個真實的問題。因為，無論蔣先生如何抹殺新事情，眼前的中國已不是「舊社會」一個名詞能包括的了。千不該，萬不該，西洋鬼子打上門來，逼我們鑽進這新世界，強迫我們劃一個新時代。若說我們還不够新，那是無可諱的。若說這還是一個「舊社會」，還是應該要倚靠「有些舊名詞的號召力」，那就未免太抹殺事實了。

平心而論，近代的日本也並不是「拿舊名詞來幹新政治」。因為日本的皇室在那一千二百年之中全無實權，只有空名，所以「尊王」在當日不是舊名詞。因為幕府專政

藩閥割據已有了七百年之久，所以『覆轡廢藩』在當日也不是舊名詞。這都是新政治，不是舊名詞。

我們今日需要的是新政治，即是合適於今日中國的需

要的政治。我們要學人家『幹新政治』，不必問他們用的是新的或舊的名詞。

二十三年，一，二十三。

## 閒談

汪敬熙

### (一)

自從中國和外國打過幾次仗，打敗了幾次之後，大家都知道輸入科學的重要。十五年前方才有人說，輸入科學不可只是竊取他人已得的知識，要去學科學方法。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覺悟。但是現在回想起這十五年內的情形，不禁使人覺到，我們既然是吵了十五年科學方法，我們却仍然是未曾捉着了科學方法的真意。

完全靠着實驗方法的應用。

實驗法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在有意的設法去管理使一個自然現象發生的情形。我們要看看這個現象在何種情形之下發生，更要看看如果情形之中有一點改變，這個現象起何變化。我們不只是旁觀的觀察自然現象：我們是要設法逼迫着自然將真理吐露出來。

科學方法最重要的一個就是實驗法。物理學的進步始自 Galileo, Galilei 用實驗法去研究力學問題。化學自從 Joseph Black, Joseph Priestley, Henry Cavendish 等人用實驗方法發現碳酸，養氣及水的成分，始一天一天的進步。近數十年內生物學的進步，大半是因爲盡量用實驗法去研究遺傳，胚胎，生理等問題。在應用一方面，醫藥，衛生，農業，鑛業，尤其是工業，近二百餘年來的進步，

這一點是我國講科學方法的所素不注意的。民國十二年那一場科學與玄學的大辯論，擁護科學的人和崇拜玄學的人都說了些關於科學方法的話。但是我們總覺的他們對於實驗法都不了了：他們不明白實驗法的意義，也看不見實驗法的重要。這是十年前的情形。近幾年也未見有大的進步。

民國八年的時候，杜威先生到中國講學。杜威先生是哲學家，但是他對於實驗方法有甚深的了解。這是一件很

可驚異的事。他講了不少的論實驗方法的話。這些講演似乎是有發生什麼影響。

但是杜威先生的講學不是沒有影響。第一個影響是使我們不信歷代傳下來的傳說，使我們懷疑。最足以代表這種精神的一部著作就是十五年出版的顧頡剛先生編輯的「古史辨」第一冊。

第二個影響是使我們只相信實在的證據。我們不只懷疑傳說，並且要找出實物來看看從前的歷史究竟是什麼樣子。從前的「古董」成了現在的重要的史料；從前爲「盜寶」而偷墳，現在爲考古而發掘了。這比只是懷疑更進一步了。

這種求實物證明的精神，也影響了對於他種學問的認識。地質學，古生物學，動植物分類學，頗爲大家所尊崇，正是受此種精神的影響。我們不要空言，我們要看實物。這些學問可以給我們許多標本看！

我們現在應該再進一步了。我們不應只限於求實物的證明；我們應該求着運用實驗方法，去求自然現象間的相互關係。

近十年來，實驗的科學在國內不是沒有成績。在物理學，藥物學，生理學，生物化學各方面，都有很好的成績

。這些成績不爲我國學術界所注意。一小半可以說是因爲研究的問題太專門不易爲「外行」所了解。但是大半可以說因爲我國學術界尚不知實驗法之重要，不知其中甘苦。對於學術界以外的人，實驗所得的結果，更難引起注意。標本之美麗，可以使普通人贊許；標本之多，可以使普通人驚異。幾行數目，幾條曲線，幾個數學公式，幾張實驗紙載的照片，在普通人眼裏那有看的價值。並且實驗的結果決不是可以大量生產出來的。

學術界之不注意，普通人之不理，當然不能影響研究學問的人之努力的。並且由他國科學發達的歷史程序上看來，實驗法是必爲學術界所信任的。不過野地的生長，總沒有人工加意培養的好。我們是不是應該有意的培植這些實驗科學的萌芽，使他們長大開花結果？

(二)

現在國內生物學界有一種見解，說從歷史上看來，分類及形態學是根本，實驗生物學只是一個後起的新奇的枝葉罷了。去年夏天，在中國科學社，秉志先生所講演的生物學史就足以代表此種見解。



這個了解只是國內學術界尚未了解實驗方法的象徵之一。在歷史上說來，這個見解也是不對的。

以實驗方法研究遺傳，胚胎，等等，固然是二十世紀初年突起的。H. S. Jennings說的好，這是那時一些生物學家，對於當日那些只從比較解剖學，胚胎學，古生物學，推論生物進化史的一種反動。這些生物學家不願只推論生物以前如何進化；這些生物學家却要自己親眼看看生物如何進化。

但是生物學家之研究運用實驗方法來源甚久。Vesalius (1514—1567)，黑暗時代以後，生物學創始的人，在他那部不朽名著「人體組織論」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最末一章就述說了些他自己對於神經，脊髓，肺的實驗。生理學的祖先 Harvey (1578—1657) 之研究心血運動，Sanctorius (1561—1636) 之研究新陳代謝作用，都是用的實驗方法。文藝復興時代的天才 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8) 之用實驗法研究肺的氣管與心臟相通

與否及心的鍵瓣的功用，更在這些人之前了。

這是一個不足驚異的事。如果不只以分清生物の種類，同知道他們的構造和生長，就滿足了，而要知道他們各部分的功用，他們如何生長，同他們如何進化；人自然就不能只是「坐而論道」，就須去動手實驗。並且非拋去空想及坐待自然賜與証明，而去由實驗逼着自然將証據拿出來，我們的智識是不能有進步的。

物理學及化學今日的進步，都是用實驗法的結果。生物學因為所研究的現象太複雜，難找管理實驗情形的方法，難尋計算的標準，所以能充分利用實驗方法的時期比物理學化學後的多。

這樣，我們能說實驗生物學只是個後起的新奇的枝葉？我國的生物學家如只以認得種類，曉得構造，就心滿意足了，那當然不用再說。如不只自限於此，我們應該不應該提倡實驗生物學？

## 編輯後記

編者

「君達」是一位社員的筆名。我們讀了他的文章之

後，在報紙上看見汪精衛先生在四中全會開幕的演說，末

尾有兩句警句：『我們要拿十二分的勇氣來擔當一切，拿十二分的虛心來接受一切。』君達先生此文裏的幾條建議，也不過是希望政府『拿十二分的勇氣來擔當一切』而已。不知有人能拿十二分的虛心來接受否。

△徐旭生先生即是前北京大學哲學教授，前北平師範大學校長，徐炳昶先生。他現在西安做致古的工作。

△汪敬熙先生是北京大學心理學教授。他在本刊第十二，第十五，第十九，第二十六，第三十八，第四十，第四十九等期，發表過討論中國科學的現狀與將來的文章。

我們希望他今回發起的科學「閒談」可以繼續寫下去。

△丁文江先生又旅行去了，他的「漫遊散記」暫時停

兩期。寒假後他要把「東川銅礦」一事寫完，就把「漫遊散記」暫時停止了。以後他要在本刊裏陸續發表他去年遊歷歐美考察蘇俄的新遊記。全篇的標題大概是「蘇俄見聞錄」；他說要用美國遊記作引子，用德國遊記作尾聲。好一個大結構，值得我們大吹大擂的預告！

△我們每年只出五十期，在舊曆新年的前後，要休刊兩期。下一期（第八十八號）出版之後，二月十一日和十八日為本刊休刊之期。第八十九號在二月二十五日繼續出版。

△我們盼望福州的「小招」先生把最近的住址告訴我們。  
(適之)

### ◎獨立評論合訂本出售

本刊第一至二五期和第二六至五十期及第五一期至七十五期，現在補印齊全，分別裝訂成冊，極適於圖書館及私人收藏之用。每冊價目：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圃」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 定價

本市	每月一元	國內	每月一元
朝鮮	每月一元	日本	每月一元
租界	每月一元	香港	每月一元
澳門	每月一元	汕頭	每月一元
廣州	每月一元	上海	每月一元
天津	每月一元	漢口	每月一元
北京	每月一元	南京	每月一元
濟南	每月一元	青島	每月一元
徐州	每月一元	蘇州	每月一元
無錫	每月一元	常州	每月一元
南通	每月一元	揚州	每月一元
蕪湖	每月一元	安慶	每月一元
九江	每月一元	長沙	每月一元
重慶	每月一元	成都	每月一元
西安	每月一元	蘭州	每月一元
西寧	每月一元	昆明	每月一元
貴陽	每月一元	海口	每月一元
香港	每月一元	澳門	每月一元
廣州	每月一元	汕頭	每月一元
天津	每月一元	北京	每月一元
濟南	每月一元	徐州	每月一元
無錫	每月一元	南通	每月一元
蕪湖	每月一元	九江	每月一元
重慶	每月一元	西安	每月一元
西寧	每月一元	蘭州	每月一元
昆明	每月一元	貴陽	每月一元
海口	每月一元	香港	每月一元
澳門	每月一元	廣州	每月一元
汕頭	每月一元	天津	每月一元
北京	每月一元	濟南	每月一元
徐州	每月一元	無錫	每月一元
南通	每月一元	蕪湖	每月一元
九江	每月一元	重慶	每月一元
西安	每月一元	西寧	每月一元
蘭州	每月一元	昆明	每月一元
貴陽	每月一元	海口	每月一元
香港	每月一元	澳門	每月一元
廣州	每月一元	汕頭	每月一元
天津	每月一元	北京	每月一元
濟南	每月一元	徐州	每月一元
無錫	每月一元	南通	每月一元
蕪湖	每月一元	九江	每月一元
重慶	每月一元	西安	每月一元
西寧	每月一元	蘭州	每月一元
昆明	每月一元	貴陽	每月一元
海口	每月一元	香港	每月一元
澳門	每月一元	廣州	每月一元
汕頭	每月一元	天津	每月一元
北京	每月一元	濟南	每月一元
徐州	每月一元	無錫	每月一元
南通	每月一元	蕪湖	每月一元
九江	每月一元	重慶	每月一元
西安	每月一元	西寧	每月一元
蘭州	每月一元	昆明	每月一元
貴陽	每月一元	海口	每月一元
香港	每月一元	澳門	每月一元
廣州	每月一元	汕頭	每月一元
天津	每月一元	北京	每月一元
濟南	每月一元	徐州	每月一元
無錫	每月一元	南通	每月一元
蕪湖	每月一元	九江	每月一元
重慶	每月一元	西安	每月一元
西寧	每月一元	蘭州	每月一元
昆明	每月一元	貴陽	每月一元
海口	每月一元	香港	每月一元
澳門	每月一元	廣州	每月一元
汕頭	每月一元	天津	每月一元
北京	每月一元	濟南	每月一元
徐州	每月一元	無錫	每月一元
南通	每月一元	蕪湖	每月一元
九江	每月一元	重慶	每月一元
西安	每月一元	西寧	每月一元
蘭州	每月一元	昆明	每月一元
貴陽	每月一元	海口	每月一元
香港	每月一元	澳門	每月一元
廣州	每月一元	汕頭	每月一元
天津	每月一元	北京	每月一元
濟南	每月一元	徐州	每月一元
無錫	每月一元	南通	每月一元
蕪湖	每月一元	九江	每月一元
重慶	每月一元	西安	每月一元
西寧	每月一元	蘭州	每月一元
昆明	每月一元	貴陽	每月一元
海口	每月一元	香港	每月一元
澳門	每月一元	廣州	每月一元
汕頭	每月一元	天津	每月一元
北京	每月一元	濟南	每月一元
徐州	每月一元	無錫	每月一元
南通	每月一元	蕪湖	每月一元
九江	每月一元	重慶	每月一元
西安	每月一元	西寧	每月一元
蘭州	每月一元	昆明	每月一元
貴陽	每月一元	海口	每月一元
香港	每月一元	澳門	每月一元
廣州	每月一元	汕頭	每月一元
天津	每月一元	北京	每月一元
濟南	每月一元	徐州	每月一元
無錫	每月一元	南通	每月一元
蕪湖	每月一元	九江	每月一元
重慶	每月一元	西安	每月一元
西寧	每月一元	蘭州	每月一元
昆明	每月一元	貴陽	每月一元
海口	每月一元	香港	每月一元
澳門	每月一元	廣州	每月一元
汕頭	每月一元	天津	每月一元
北京	每月一元	濟南	每月一元
徐州	每月一元	無錫	每月一元
南通	每月一元	蕪湖	每月一元
九江	每月一元	重慶	每月一元
西安	每月一元	西寧	每月一元
蘭州	每月一元	昆明	每月一元
貴陽	每月一元	海口	每月一元
香港	每月一元	澳門	每月一元
廣州	每月一元	汕頭	每月一元
天津	每月一元	北京	每月一元
濟南	每月一元	徐州	每月一元
無錫	每月一元	南通	每月一元
蕪湖	每月一元	九江	每月一元
重慶	每月一元	西安	每月一元
西寧	每月一元	蘭州	每月一元
昆明	每月一元	貴陽	每月一元
海口	每月一元	香港	每月一元
澳門	每月一元	廣州	每月一元
汕頭	每月一元	天津	每月一元
北京	每月一元	濟南	每月一元
徐州	每月一元	無錫	每月一元
南通	每月一元	蕪湖	每月一元
九江	每月一元	重慶	每月一元
西安	每月一元	西寧	每月一元
蘭州	每月一元	昆明	每月一元
貴陽	每月一元	海口	每月一元
香港	每月一元	澳門	每月一元
廣州	每月一元	汕頭	每月一元
天津	每月一元	北京	每月一元
濟南	每月一元	徐州	每月一元
無錫	每月一元	南通	每月一元
蕪湖	每月一元	九江	每月一元
重慶	每月一元	西安	每月一元
西寧	每月一元	蘭州	每月一元
昆明	每月一元	貴陽	每月一元
海口	每月一元	香港	每月一元
澳門	每月一元	廣州	每月一元
汕頭	每月一元	天津	每月一元
北京	每月一元	濟南	每月一元
徐州	每月一元	無錫	每月一元
南通	每月一元	蕪湖	每月一元
九江	每月一元	重慶	每月一元
西安	每月一元	西寧	每月一元
蘭州	每月一元	昆明	每月一元
貴陽	每月一元	海口	每月一元
香港	每月一元	澳門	每月一元
廣州	每月一元	汕頭	每月一元
天津	每月一元	北京	每月一元
濟南	每月一元	徐州	每月一元
無錫	每月一元	南通	每月一元
蕪湖	每月一元	九江	每月一元
重慶	每月一元	西安	每月一元
西寧	每月一元	蘭州	每月一元
昆明	每月一元	貴陽	每月一元
海口	每月一元	香港	每月一元
澳門	每月一元	廣州	每月一元
汕頭	每月一元	天津	每月一元
北京	每月一元	濟南	每月一元
徐州	每月一元	無錫	每月一元
南通	每月一元	蕪湖	每月一元
九江	每月一元	重慶	每月一元
西安	每月一元	西寧	每月一元
蘭州	每月一元	昆明	每月一元
貴陽	每月一元	海口	每月一元
香港	每月一元	澳門	每月一元
廣州	每月一元	汕頭	每月一元
天津	每月一元	北京	每月一元
濟南	每月一元	徐州	每月一元
無錫	每月一元	南通	每月一元
蕪湖	每月一元	九江	每月一元
重慶	每月一元	西安	每月一元
西寧	每月一元	蘭州	每月一元
昆明	每月一元	貴陽	每月一元
海口	每月一元	香港	每月一元
澳門	每月一元	廣州	每月一元
汕頭	每月一元	天津	每月一元
北京	每月一元	濟南	每月一元
徐州	每月一元	無錫	每月一元
南通	每月一元	蕪湖	每月一元
九江	每月一元	重慶	每月一元
西安	每月一元	西寧	每月一元
蘭州	每月一元	昆明	每月一元
貴陽	每月一元	海口	每月一元
香港	每月一元	澳門	每月一元
廣州	每月一元	汕頭	每月一元
天津	每月一元	北京	每月一元
濟南	每月一元	徐州	每月一元
無錫	每月一元	南通	每月一元
蕪湖	每月一元	九江	每月一元
重慶	每月一元	西安	每月一元
西寧	每月一元	蘭州	每月一元
昆明	每月一元	貴陽	每月一元
海口	每月一元	香港	每月一元
澳門	每月一元	廣州	每月一元
汕頭	每月一元	天津	每月一元
北京	每月一元	濟南	每月一元
徐州	每月一元	無錫	每月一元
南通	每月一元	蕪湖	每月一元
九江	每月一元	重慶	每月一元
西安	每月一元	西寧	每月一元
蘭州	每月一元	昆明	每月一元
貴陽	每月一元	海口	每月一元
香港	每月一元	澳門	每月一元
廣州	每月一元	汕頭	每月一元
天津	每月一元	北京	每月一元
濟南	每月一元	徐州	每月一元
無錫	每月一元	南通	每月一元
蕪湖	每月一元	九江	每月一元
重慶	每月一元	西安	每月一元
西寧	每月一元	蘭州	每月一元
昆明	每月一元	貴陽	每月一元
海口	每月一元	香港	每月一元
澳門	每月一元	廣州	每月一元
汕頭	每月一元	天津	每月一元
北京	每月一元	濟南	每月一元
徐州	每月一元	無錫	每月一元
南通	每月一元	蕪湖	每月一元
九江	每月一元	重慶	每月一元
西安	每月一元	西寧	每月一元
蘭州	每月一元	昆明	每月一元
貴陽	每月一元	海口	每月一元
香港	每月一元	澳門	每月一元
廣州	每月一元	汕頭	每月一元
天津	每月一元	北京	每月一元
濟南	每月一元	徐州	每月一元
無錫	每月一元	南通	每月一元
蕪湖	每月一元	九江	每月一元
重慶	每月一元	西安	每月一元
西寧	每月一元	蘭州	每月一元
昆明	每月一元	貴陽	每月一元
海口	每月一元	香港	每月一元
澳門	每月一元	廣州	每月一元
汕頭	每月一元	天津	每月一元
北京	每月一元	濟南	每月一元
徐州	每月一元	無錫	每月一元
南通	每月一元	蕪湖	每月一元
九江	每月一元	重慶	每月一元
西安	每月一元	西寧	每月一元
蘭州	每月一元	昆明	每月一元
貴陽	每月一元	海口	每月一元
香港	每月一元	澳門	每月一元
廣州	每月一元	汕頭	每月一元
天津	每月一元	北京	每月一元
濟南	每月一元	徐州	每月一元
無錫	每月一元	南通	每月一元
蕪湖	每月一元	九江	每月一元
重慶	每月一元	西安	每月一元
西寧	每月一元	蘭州	每月一元
昆明	每月一元	貴陽	每月一元
海口	每月一元	香港	每月一元
澳門	每月一元	廣州	每月一元
汕頭	每月一元	天津	每月一元
北京	每月一元	濟南	每月一元
徐州	每月一元	無錫	每月一元
南通	每月一元	蕪湖	每月一元
九江	每月一元	重慶	每月一元
西安	每月一元	西寧	每月一元
蘭州	每月一元	昆明	每月一元
貴陽	每月一元	海口	每月一元
香港	每月一元	澳門	每月一元
廣州	每月一元	汕頭	每月一元
天津	每月一元	北京	每月一元
濟南	每月一元	徐州	每月一元
無錫	每月一元	南通	每月一元
蕪湖	每月一元	九江	每月一元
重慶	每月一元	西安	每月一元
西寧	每月一元	蘭州	每月一元
昆明	每月一元	貴陽	每月一元
海口	每月一元	香港	每月一元
澳門	每月一元	廣州	每月一元
汕頭	每月一元	天津	每月一元
北京	每月一元	濟南	每月一元
徐州	每月一元	無錫	每月一元
南通	每月一元	蕪湖	每月一元
九江	每月一元	重慶	每月一元
西安	每月一元	西寧	每月一元
蘭州	每月一元	昆明	每月一元
貴陽	每月一元	海口	每月一元
香港	每月一元	澳門	每月一元
廣州	每月一元	汕頭	每月一元
天津	每月一元	北京	每月一元
濟南	每月一元	徐州	每月一元
無錫	每月一元	南通	每月一元
蕪湖	每月一元	九江	每月一元
重慶	每月一元	西安	每月一元
西寧	每月一元	蘭州	每月一元
昆明	每月一元	貴陽	每月一元
海口	每月一元	香港	每月一元
澳門	每月一元	廣州	每月一元
汕頭	每月一元	天津	每月一元

國際週報

第六卷第十號

愛爾蘭的獨立問題... 楊祖詒... 吳卓生... 周琛

美國的救制問題... 司徒伊衡... 每份大洋五分...

時代教育

第一卷第九期

中國幼稚教育已到了十字街頭... 張雪門... 張英... 趙煥門

記中華平教會幼稚教育參觀團的討論... 張英... 趙煥門... 編輯者 北平市社會局教育科

交通雜誌

第二卷第一期

交通部與會計制度... 朱家驊... 張心激... 張瑞濤

電政會計之改革... 潘序倫... 張心激... 定價：六角全年連郵三元

日本評論

『昭和維新』與『日本自殺』... 楊玉清... 楊哲人... 張白文

一九三三年日本之經濟... 梁子青... 周伊武... 汪向宸... 定價：全年十二册 國幣三元

# 商務印書館復業後 初版新書之概況

本館於復業後，在上海先後成立製版、印刷、平版三廠，益以北平分廠及擴充後之香港分廠，生產能力逐漸恢復於重印原有書籍外，並努力於初版新書之印行。迄今新出之書不下二千冊，其概況可分三方面述之：

## (一) 一般讀物

自二十一年十一月一日起，每日出版新書一種，從未間斷。截至二十二年年底止，共出三百六十八種，四百零七冊，分類統計於次：

類別	(種數)	(冊數)
總類	7	10
哲學	22	23
宗教	5	5
社會科學	103	116
語文學	9	0
自然科學	37	37
應用技術	75	75
美術	19	21
文學	7	48
史地	54	62
	368	407

## (二) 鉅部書籍

萬有文庫於復業後，補印第四期被毀之書，續出第五期書，第一集全部至此告成。百衲本二十四史續出第三期書。小學生文庫亦已出前兩期書。合郵齋叢書志計凡一千二百三十七冊，分列於下：

- 萬有文庫……………第四期書 三百九十五冊
- ……………第五期書 四百十二冊
- 百衲本二十四史 第三期書 七十二冊
- 小學生文庫……………第一期書 二百冊
- ……………第二期書 一百五十冊
- 續古逸叢書 第三十五種 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 八冊

## (三) 教科書

遵照新課程標準編訂之復興教科書已出齊初小、高小、初中三套，高中一套亦開始出版，加以師範職業、書之續出者計凡九十一種，三百三十一冊，分列於次：

- 初小用書……………十八種 一百四十一冊
- 高小用書……………二十七種 一百零二冊
- 初中用書……………二十三種 六十三冊
- 高中及師範職業用書……………二十五種 二十五冊

自二十三年起，因生產能力續有增進，擬將初版之一般讀物儘量多出，每日多則兩三種，少亦一種。關於鉅部書籍，除百衲本二十四史及小學生文庫繼續出版外，四庫全書珍本及宛委別藏均已開始影印，即將分別發售預約，又籌備已久之四部叢刊續編亦即開始出版，預定每星期出版一種以上，分零售合售辦法，容另通告。至復興教科書高中一套，亦可於本年全部出齊。他如師範職業學校用書及大學叢書等，均依原定計劃繼續編印。此一併預告，即希公鑒。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二十三年一月一日

「不懂得日本的情形」！？

孟真

國際現勢的分析

蔣廷黻

建國問題平議

常燕生

閒談(三)(四)

汪敬熙

編輯後記

編者

# 獨立評論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東安市場	侯文齋(代定)	米良友
王	立	民智書局	志遠書局
公	新	華	志
司	月	新	志
新	中	華	志
和	書	新	志
中	社	華	志
社	年	新	志
增	嘉	華	志
社	陵	新	志
宣	光	華	志
內	華	新	志
增	光	華	志
社	華	新	志
宣	光	華	志
廠	華	新	志
旬	光	華	志
沙	華	新	志
永	光	華	志
水	華	新	志
成	光	華	志
府	華	新	志
天	光	華	志
津	華	新	志
大	光	華	志
學	華	新	志
局	光	華	志
書	華	新	志
現	光	華	志
代	華	新	志
處	光	華	志
定	華	新	志
華	光	華	志
新	華	新	志
中	光	華	志
山	華	新	志
鐘	光	華	志
書	華	新	志
局	光	華	志
大	華	新	志
中	光	華	志
書	華	新	志
局	光	華	志
代	華	新	志
定	光	華	志
華	華	新	志
南	光	華	志
京	華	新	志
新	光	華	志
蘇	華	新	志
州	光	華	志
廣	華	新	志
告	光	華	志
社	華	新	志

濟南	三友書局(代定)
濰縣	振華書局
煙台	明華書局
威海衛	明華書局
龍口	明華書局
周村	明華書局
博山	明華書局
濟寧	明華書局
臨沂	明華書局
德縣	明華書局
滄州	明華書局
保定	明華書局
石家莊	明華書局
開封	明華書局
鄭州	明華書局
徐州	明華書局
濟南	明華書局
濰縣	明華書局
煙台	明華書局
威海衛	明華書局
龍口	明華書局
周村	明華書局
博山	明華書局
濟寧	明華書局
臨沂	明華書局
德縣	明華書局
滄州	明華書局
保定	明華書局
石家莊	明華書局
開封	明華書局
鄭州	明華書局
徐州	明華書局
濟南	明華書局
濰縣	明華書局
煙台	明華書局
威海衛	明華書局
龍口	明華書局
周村	明華書局
博山	明華書局
濟寧	明華書局
臨沂	明華書局
德縣	明華書局
滄州	明華書局
保定	明華書局
石家莊	明華書局
開封	明華書局
鄭州	明華書局
徐州	明華書局

第八十八號

日四月二年三十二國民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一角以下爲限)代洋九五折。

## 「不懂得日本的情形」！？

孟 真

今天——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一月二十八日——是倭寇淞滬的第二個週歲，上海的蕭條依然，關北至吳淞的砲痕猶在，東北及熱河在日本手中更牢固，十九路軍已完全成個歷史的名詞了，想這兩個整年中，國民的人格立場到個什麼田地了，政府的對外態度到個什麼主義了，真是要掉淚也不知道是爲誰掉的！

東北有個「受命於天」的新帝國，華北有個「親善和平」的新政權，蒙古向外歸化，西域對內分崩，照道理說來，日本人應該最舒服了，然而何以日本人上下的那樣顧慮最近的將來，而歌頌太平者反而是我們貴國之有官守者有言責者呢？這不是日本人看到將來，中國人只圖鬼混現在？若是我們的政府明白的說，他的對外態度是鬼混，或更大胆的說，維持政府便是維持民族，我們這些「傻百姓也用不着獻疑了，不過衰衰諸公似乎也還有些「盡在不言中」的意思，淺來說是個不得已，深來說是別有見地。

若是不得已呢？則何以張學良之「不得已」而「暫不抵抗」是萬分的罪孽，而今之澈底的不得已是真不得已？

不知昔之恨張學良太不成樣子而今對溥儀僭號也不敢說一個字者，與張學良相見之下，是否「惟有慚德」呢？

若是別有見地呢？吾儕小民本也仰體高深不了許多，他們既不肯明說，我們自無從詳猜。不過展轉傳聞也頗有幾條妙義，我們的愚蠢不敢不佩服——究竟也還不免於懷疑的。這些妙義且分條談來。

其一曰，日本人長進，中國人不長進，且看日本這幾年來是做的甚麼，我們這老大國是做的什麼，在「努力」上比日本不過，又如何不服輸呢？我說：日本人在許多事上努力進步的可佩服，是不成問題，中國人之自暴自棄，是不可饒恕，這樣天長地久下去，中國人在地球上沒有位置，也是注定的運命。不過，這並不是向日本投降的充足理由。世界上民族的興亡，固然大體上是賽跑，然也並不是一個簡單的百碼比賽。兩者相爭，「後死者勝。」這個比賽還要昏以繼日，且以繼昏，上山下山，忽緊忽急。一氣貫奔本領下去者也許會遇到個對頭，而半路上曾經睡過幾覺者如還能醒來，也未必非要輸了。看看拿破崙時代

的法蘭西，比今日之日本何如，猛烈進取之不已，一敗塗地。又看大戰前之德意志，海軍以質論賽過英國，陸軍以質量論賽過法國，工業之進取精神賽過一切，國是之一定不疑賽過今日之日本，而今安在？世界之演進固然淘汰不進取者，同時也是淘汰進取得忘其所以者。我說這話不是說我們還要照常混沅下去，我只是說，這個鬥爭還不到太陽西落離服輸正遠着呢！譬如我們是個破落了的大戶人家，鄰近有個暴發戶，猛進而無賴，一經奪去我們的土田佃戶四分之一，我們便當把男兒送之爲奴女兒送之爲妾嗎？

其二曰，日本有巨大的陸海空軍，我們自救無力，呼救無靈，可又有甚麼法子？我說，日本人之有巨大的陸海空軍，不自今日始。若這話出自慣通日本者之口，猶可說，若出自初主張抵抗而今變了卦者，不是有點臉皮太厚了嗎？且我要問，日本人既有此巨大精能的陸海空軍，何不即來吞併中國？何以還有耐性走一條弧形的兼併之路？在日本人及親日的人，必有一批的假話。然而我們試看自九一八以來，或者更前，日本人對中國人那樣的野蠻獸性，若有可以做到的，還有什麼不肯做到的，還有什麼人類心腸，還有什麼原始文化？其所以走此曲線的吞併者，當然不是不忍不肯，還是有些不敢不能。若世界上只有中日兩

國，日本必然毫無猶疑的立刻派他的陸海空軍前來吞滅。若華北問題不比東北在國際上的意義更複雜，日本必然毫無猶疑的佔領。豈是如日本人語「南京政府改善其態度，」

「華北新政權表示親善，」便能使日本人避虛名，就實際，暫不在北平正陽門樓上掛太陽旗的。即東北之尚設一個傀儡孺子，沐猴稱帝，不立即名實一齊郡縣之者，也還不是因爲國際的關係？然則日寇雖有其陸海空軍，而究竟對中國如何使用法，在某一種情形之下用某一種力量之若干度，也並不是簡單的事情。其所以要如此者，仍是國際的關係，國際關係使日寇無直來吞併之可能，而日寇三年來的狂謬舉動，已引起國際上之大難關了。

其三曰，「這些亂嚷着對日本不退步者，不懂得日本的情形！」若一問其日本情形是什麼，則直接說者當吞吞吐吐的，間接說者每神乎其神的，告你些有真有假，少真多假，真的變假，一切等等日本人如何威風的話。有些固然很當知道，有些則直是日本人的宣傳而經過中國人口中，更說得談虎色變而已。知識者，無論在學術上或事務上，固患其無，有時更患其有而不真，真而忘了分寸，不辨輕重。無知識者，固永在昏天黑地中，然而有知識而不幸但偏于一隅者更容易誤事。王正廷以無日本的知識，（其歐

美的知識也真可笑的很）結果白白的錯過一個在日本濱口幣原當政的機會。現在的外交當局若自恃其日本的知識（其實他們的展轉從日本浪人與中國的「日本通」聽來的知識，價值何如，也大是問題。）更要交臂失去運用世界上四方八面蘊釀着大事件的機會，而儘自己的國家與民族的運命於萬劫不復之地位。難道辦外交必須閉上一個眼睛，昔者閉上東眼（濱口時代），今也閉上西眼，然後能有權威嗎？朱子有句話「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難道中國的外交當局必有醉人的八字然後合格嗎？奉告自負「懂得日本情形」的人，先要考慮一下，他所知道的日本情形，比例上有多少重，所不知道的日本情形還有幾多。更要自己問自己一下子，歐美的情形知道嗎？合一切的情形而權衡輕重，能看到一個將來在眼前嗎？

我也妄談幾件「情形」聊供「懂得日本情形」者之一哂！

第一件，華北之猶掛中國國旗，並不是日本的恩惠，而是日本的大便宜。用兵的上策是不戰而勝，外交的上策是取實棄名，侵略的高計是出最少的代價而得最大的利益，謀國之妙算是捉到一切的形式，而避去一切的困難。如果日寇佔領了華北，縱設一個傀儡政府，也要在國際的形

勢上比東北困難到無數倍。日本人何嘗不自知他沒有現在與世界作戰的本領，「焦土政策」還不是騙人的話？所以他纔一面在軍事上經濟上把華北握得牢牢的，一面却不即來玩直接的把戲，以避與他國之爭鬥。所以贍沽協定真是對於日本人再利益也沒有了，比日本人公然佔領了華北的利益大得多呢！遊騎及于北平城外，佔領及于唐山，割奪及于沽源，紊亂在平東灤河區域，在日本的立場上，真是最合理的步驟。看看前後的情景，真是預定的鐵步驟。然則飛機在北平城上邀翔，漫作一切長驅直入之姿態者，豈不是貓戲老鼠狗戲雞，所謂「加侮辱於打擊」也？然而「日本通」還說這是和緩派的象徵！

第二件，我們已經熬過半夜了，偏在這個時候投降嗎？若說不是投降而說外交方策未變（所謂未變者，也不知是從何時算起，）則如溥儀竊號，廣田演說一類的大事，也何以一言不發？這樣態度，只可以叫列國解釋做默認。當東北事件初起時，國聯的紙老虎未破，國聯希望以文明國待遇日本，而以文明的方法制裁或節制之，其結果是毫不中用，而國聯幾為此喪其存在，軍縮會議業已為此送入墓中。若只看到德國之繼續退出國聯，則日本之衣鉢相傳，真正威風矣。然而今日世界之大勢又何如？法國一向與



日接近，而今已經通盤逆轉。意大利是法西斯派的祖師，對東北事向不過於指斥日本，而莫索里尼最近有驚人的演說。俄英美三國內情各絕自不同，然無一個不是願安息者，而今竟整軍經武，以備國防。東西比利亞之準備既成，而俄國之口調一硬，大海軍派的主張在美國有不可思議的進展，英國又開他的帝國海軍會議于星加坡。世界之心驚固不全為東北問題，日貨傾銷也是同重要的原因，然而這兩件事作用上非合為一不可。佔領東北與日本財政是不可分的問題，日本財政與其對外貿易也是不可分的問題，將來之開發東北又與其對外貿易是不可分的問題。世界上都在積極準備「劍及屨及」的緊張態度中，究為何事呢？以為日本是能白白的吞併東北，白白的招來華北，真正是沒有的事，只是世界的反應不能不慢些罷了！然而現在業已轉緊起來了！記得我在國聯調查團到中國時，我每向朋友們談及日本恐不肯接受國聯的制裁，然而東北問題的出路正不妨和歐戰前的形勢比一下。歐戰之明顯的原因固然大部

分由于土耳其帝國之瓦解，分贓不均，與分贓後之禍患，（奧皇太子之被刺即此禍患之一）然直接刺激出大戰的原因當然是歐洲列國陸軍之比進，英德海軍之比進，比之不已，情不自禁，必出于一戰。吳稚暉先生好用的成語，「既有淫具必有淫心」者是也。今日中國之分崩的形勢，固如大戰前之土耳其，不過刺激出大戰的直接因素，必然是軍備的競賽。日本既佔據了我的東北，則不能不維持可以抗俄的陸軍，可以抗美的海軍，而俄美也不能不同樣感覺，而英，而法，而意均不能不同樣感覺，於是儼然成了上次大戰開幕前之形勢。「歷史是不重複出現的，而人類之愚偏重複歷史」。……當時說這話時，有的朋友以為過於作史論了，現在看來，這個史論也還作得有點意思。本來呢，料事于事之未現本難可靠，而看事于事之已露則容易明白。現在世界的局面已到緊急準備的經程中，我們的當局想也不至於把美之築艦，俄之自恃，英之海軍開會，都算做無意義的事，而把西向的線索一齊割斷吧？

## 國際現勢的分析

蔣廷黻

去年七月中，我在本報發表一篇時論，題目是「國際

的風雲和我們的準備」。我彼時說過：

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是國際關係史上的一個大分水界。這一年之內，國際的三大事業都失敗了：國聯處置中日問題失敗了，裁軍會議失敗了，倫敦世界經濟會議也要告失敗了。這三大事業的失敗就是歐戰以來國際主義的破產，和偏狹的，軍備競爭的，商戰的國家主義的勝利。人類的前途是不可樂觀的。（本刊第五十九期）

過了半年以後，這種趨勢更加顯明了。我們現在看的很清楚：一九三三年的前半是國際主義最後的努力，後半是國家主義火速的澎湃。我們若具體的研究現今的國際形勢，我們更能了解其嚴重性。

戰後的世界是以兩個條約為其根本憲章的：一個是維塞野條約，一個是華府會議的九國公約。根據前一個條約，列強分派了西洋的權利；根據後一個，列強分派了東洋的權利。這種分派的方法大致是維持訂約時候的實狀，而彼時的實狀利於戰勝的國家，或列強中先進的國家。所謂先進的國家，就是近五百年，在歐洲瓜分他洲的過程中，佔優勢的國家，那就是英，俄，法，美四大帝國。上次的大戰的根本原因可說是一個後起的帝國——德意志——圖謀強迫與這四個先進的帝國分肥。不幸，在上次的大戰中，這

個後起的帝國戰敗了，結果戰後權利的新分派更不利於德國。她的海外殖民地全被剝奪；在歐洲，土地喪失也不少，並且因為波蘭及捷克斯拉夫諸國的成立，德國在歐洲的外交及軍事地位遠不如戰前。換句話說，德國因謀一個世界的更優地位致其在歐洲的地位降低。於此我們尤應注意的是德國失敗的原由。這個原由，無疑的，是與英國作敵。英德未成仇讐之先，德國外交是時常優勝的。倘若在上次大戰中，英國不加入，德國無疑的可以戰勝法俄。英德的衝突並不在歐洲大陸，全在海外，所以這衝突的結晶成為海軍競爭。德國為維持在大陸的權利無須海軍；她在戰前竟與英國爭海權，那就是因為她企圖世界強權。在近代史上，所有海權的競爭就是世界強權的競爭；擴充海權的國家都是爭世界強權的國家。此外還有一點我們應該注意：先進的帝國雖彼此之間利害衝突甚多，倘若後起的帝國野心太大，致先進的帝國都受危害，那末先進的帝國必彼此妥協，合從以對付這後起者。戰前英法俄的聯絡就出於這種動機。所以上次的大戰根本是先進國與後起國的衝突。結果先進國勝了；於是她們戰前優勝的地位更加優勝。她們當然是心滿意足，組織一個國聯，來給現狀一種法律的，精神的，道德的保障。國聯盟約，洛迦羅條約，非戰

公約，及裁軍運動都在維持現狀的大前提之下產生的，都是這些先進而勝利的國家維持現狀最便宜，最經濟的方法。所謂戰後的國際主義就是這麼一回事。所謂國際主義的破產，就是這些方法的不適用。先進而勝利的國家又須把戰前的軍備競爭及外交縱橫那一套拿出來。

遠東的問題，表面上看起來，似乎特別，實際是與歐洲的問題大同小異的。九國公約也是一個維持現狀的條約；日本也是一個後起的帝國。所特異者，這個後起的帝國在上次的大戰中是與先進國為伍的。在歐戰期中及在戰後分贓之際，她算是占了光。赤道以北的德屬太平洋的島嶼，國聯委託了給她去統治；這是日本在太平洋海權的長進。日本在歐戰期中在中國所得的權利，山東除外，列強也未追究；這是日本在大陸上的長進。但是九國公約此外則加了嚴厲的限制；對中國，日本必須尊重主權的獨立，領土及行政的完整；對其他列強，日本必須尊重通商的和投資的均等機會。條約上雖分兩方面，實際除非中國有領土及行政的完整，列強是得不到均等機會。這個九國公約與華府的海軍條約是連成一片的。九國公約訂定了現狀的維持，於是各國縮減海軍以縮減維持現狀的費用。列強在戰後處置遠東問題的精神與處置歐洲問題的精神如出一轍。

在遠東，這些先進國也是圖謀一個最經濟的方法來維持有利於己的現狀。九一八以後，日本的行動也是使這方法不適用，迫着先進國利用戰前的舊方法，於是法俄的聯歡，美俄的恢復邦交，及美國的新海軍建設計劃。

自九一八以來，我們所看見的，所痛恨的是東北的喪失。在世界先進帝國眼裏，這個問題不是個東北問題，是個世界權利舊分派的推翻和新分派的成立問題。東北本身雖關重要，但至少英美法意四國在東北既無大宗商業和投資，並且就是日本沒有九一八的舉動，她們也是沒有經濟發展的希望的。她們所以關心的一則因為遠東的現狀不能維持，歐洲的現狀也是不能維持，因為維持現狀的條約，如國聯盟約及非戰公約，是雙方公用的，二則因為東北是日本向先進國進攻的一步，也是進攻第二步的好資料。中日問題的嚴重，全在乎這個世界性。

前途的發展全在日本是否要即時舉行第二步。換句話說，日本外交家此後是否將取守勢或攻勢是第二次大戰的主要關鍵。如果日本表明她是為東北本身而佔領東北，她現在既得了東北所以就心滿意足，那末，第二次大戰未必爆發。如果日本自己要給東北問題更大的世界性，那末，大戰是必會在短期內——一二年爆發的。日本的外交現在

究竟是取守勢呢，還是取攻勢呢？

廣田的真正政策，我們很難知道。我們如果設身處地，專憑理智來計日本的利害，我想他必採守勢的外交，正如畢士麥得了亞羅二州以後，始終只守不攻。因為他一採

守勢，其他國家就無可如何了。第一，美國政府現在對任何方面都不能行攻勢的外交。美國人民對東北本身沒有多大興趣。民間反戰的空氣一向是十分濃厚的。現在美國朝野正在那裏圖經濟復興，縱使政府要向日本進攻，美國的輿論和軍備均不容許。美國現在雖擴充海軍，但以條約爲限度，而這條約的海軍是守的海軍，不是攻的海軍。第二，蘇俄與日本的關係雖極緊張，但蘇俄目前所患者是日本的進攻，不是日本的保守已得權利。蘇俄至今仍願與日本訂互不侵犯條約；蘇俄最近又聲明仍願出售中東路。「滿洲國」的成立雖不利於蘇俄，但直到現在蘇俄毫無以武力推翻「滿洲國」的形勢。爲蘇俄計，國內工業化的長進是當前的急務。美俄復交當然是針對遠東問題的，但復交以外，美國政府不能有協助蘇俄任何秘密條約或了解。美俄兩國既不願進攻，他國更不必說了。在這種狀況之下，廣田若採守勢的外交，那是很自然的。他的言論之中，似乎表示他知道守勢的利便。所以近來蘇俄的態度雖轉強硬，東

京是很鎮靜的。中東路出售的交涉，他力圖進行。對英美是和緩，他簡直不遺餘力。他每次的正式表示都把日本皇帝退出國聯的詔書抬出來。那篇詔書的主旨在於日本雖退出國聯，日本爲維持世界的和平，仍願盡其責任。

但是日本近半年的外交是很矛盾的。第一，廣田這次在國會的演辭，不但聲明「滿洲國」必須維持，並明言華北的治安與日本有關，華北的局面若有變動，日本必出而干涉。對於中國共黨之發展，他也預留干涉的權利。無形之中，這個干涉權的保留豈不是日本的門羅主義的宣佈？這是攻勢的外交；這表示日本不是單爲東北本身而佔領東北，是要拿東北來控制全中國。這種野心之大超過戰前德國任何發展計劃。這是國際形勢所不許的。最可注意的不僅是這一篇演詞，還是日本的基本形勢。日本得了東北以後，國防問題，移民問題，原料問題算是解決了大部份，但是商場問題仍未解決。在現今世界經濟競爭的形勢之下，中國的商場是日本工業前途最可靠的商場。在未得到保障以前，日本的國策仍不能貫徹。所以對於關內的中國，日本是不能放手的。第二，倘若日本是採守勢的外交，溥儀不應在這時候稱帝。至於說溥儀稱帝是表示「滿洲國」實在的獨立，這只能騙小孩，不能騙明眼的外交家。高麗雖曾

有一個幾百年的王朝仍不免於亡國，何況這個日本一手造的「滿洲國」的王位？溥儀稱帝只能有一個作用，那就是吸收蒙古人的心。這又是攻勢的外交。第三，日本人似乎已把海軍平等作為日本的國策。這個海權問題更直接與世界強權相關。日本竟欲一躍而躋與英美平等的地位。東北問題，英美或可通融，因為牠還勉強可作為一個區域問題看。海軍平等問題絕無區域性質，絕不是英美所可通融的。日本人因佔領東北所引起的恐慌尚以為不足，反要在此以上，加海軍平等企圖更大的恐慌：這是先進國所能容忍的嗎？與這海權有關係的，有赤道以北的海島問題。到了一九三五年，日本與國聯完全脫離關係的時候，如日本一

## 建國問題平議

——讀獨立評論以後的意見——

中國怎樣才能建設一個現代的國家。這是胡適之先生所提出來的一個問題，也是全國有心國民所共同迫切要研究的問題——一部分自命世界主義者除外。建國必需要有相當程度的統一，這也是大家所都可贊同的。中國究竟要聯邦式的統一，還是中央集權式的統一，我以為這個問題關

面要求海軍平等，一面又要求保留太平洋的委任統治的海島，這問題就更加嚴重了。同時從日本立場看，這個海權競爭也是不能放棄的。沒有充分的海權，亞洲的門羅主義是不能成立的，日本在南洋及印度的商業也是無保障的。總而言之，日本現在所企圖的是世界權利的新分派。她這個企圖危害一切先進國的權利。戰爭因此是不能避免的。但是廣田若在目前採取守勢的外交，換句話說，把日本的企圖分為幾段落來實現，目前的戰爭是可避免的，因為目前這些先進國，除非不得已，皆不願戰。我們能得的安寧，不過是短期的苟安。但是我們如何利用這短期的苟安，那確與我民族的命運有莫大的關係。

常燕生

係還小，因為無論何種方式的統一，至少軍事和外交總應該是由中央政府主持的，而地方上也總不能不多少有點自治之權。現在所急切要問的是怎樣才能完成中國的統一？中國的民族，文化，語言，文字，乃至經濟生活，本來都早已是統一的，所以中國的問題就僅僅餘下了個政治統一的問題，怎樣才能使中國政治統一？這就是我們目前所迫

切要問的問題。

蔣廷黻先生告訴我們說，中國需要經過一個專制的時代，如同英國之有頓頭朝，法國之有布彭朝，俄國之有羅馬諾夫朝一樣，先讓專制的勢力把國家弄成一個民族的國家，然後再談革命和民治。這個主張的是否我們目前姑且不必討論，我們應該首先要問的是，蔣先生所理想的專制王朝怎樣才能產生出來。問到這裏，我們不能不慨歎地說，蔣先生的主張可惜提出的太晚了，假使在三十年以前，滿清政府尚未推倒的時候，蔣先生的話是或者可以實現的，因為那時中國尚有三百年歷史久遠的中心政治勢力，我們須知英法俄幾國的王朝都是由歷史上自然發生的，他們的專制權利是有歷史背景的，是為全國人所公認的，現在的中國有那一個人，那一種勢力配來講這種話？我們常推想中國現今內亂所以不能中止的緣故，沒有固有的中心勢力可以憑藉，也是一個極重要的原因。在西歐各國，由衰弱而強盛，由分裂而統一，大抵是因為國家的中心勢力並未失墜的緣故。英法西班牙等國的革命，大致都是首都革命，中樞組織根本沒有動搖，雖然是使用暴力，其實與和平禪讓無異，故法國能經四度革命而元氣不傷。俄國的革命也是首都革命，雖然在革命之初各地軍閥已經紛紛割據

起來，但因為列寧格勒和莫斯科兩個國家的中心已經落入布爾什維克黨人手中，所以其餘也就無法存在。德意志和意大利是兩個向來分裂的國家，其所以能統一是因為有普魯士和撒的尼亞兩個固有的國家做中心勢力。即在中國歷史上歷朝的遞嬗也大半是實力的遞嬗，平民起兵，赤手空拳可以成功的實在很少。蒙古滿洲等外族入主中國者不算，其餘的朝代更變大致可以分作四種方式。第一種是純粹憑藉中樞勢力篡奪成功的，如王莽之代漢，晉之代魏，南北朝之禪代，隋之代唐是。第二種是雖非中樞但也是憑藉固有勢力成功的，如唐之統一是因為李淵做太原留守，有晉陽的正式軍隊為憑藉。當時羣雄大半是起自草澤，惟有李淵和王世充是憑藉固有勢力，所以王世充能擊敗李密，而唐朝能統一中國。宋太祖的統一也是憑藉五代相傳的中心勢力而成功的。漢高祖雖起自草澤，但他和項羽所憑藉的都是楚國的固有勢力，楚是大國，受秦欺最甚，人民猶有故國之思，項氏又是楚舊將，故陳勝和項梁的起兵都必以楚為名，秦滅之後，項羽最強，也是因為憑藉楚國舊勢力的緣故。及漢高祖定三秦之後，秦的精兵都歸於漢，然後才能與楚相鬥。光武的實力是憑藉更始所給的名義造成的，沒有更始的名義，光武就不能安定河北，也就不能南

向以爭中原。南北朝的代嬪雖由篡奪，實際也是地方軍閥憑藉實力而代中央的，也可以歸入這一種裏面。第三種是雖無實力憑藉但名義上猶有憑藉可以號召的，如曹操的起兵是無憑藉的，但他憑藉的是議郎的官職，是世家大族，是尊王室討賊臣的名義，袁紹比他的憑藉更大，故袁紹更強。董卓有西涼精兵爲憑藉，故董卓最強。第四種是毫無憑藉，由流寇或平民起兵的，這一種人在中國史上雖然很多，但大半皆歸失敗，如張角，竇建德，黃巢，李自成等，其中成功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西漢末的更始，一個是明太祖，而這兩個都是有特殊原因的。更始的成功是因爲人心反莽向漢，明太祖的成功是因爲人心反對胡元。卽中華民國的成立也是因爲一方面有民族主義爲號召，一方面憑藉新軍的勢力，並不是完全平空起來的。以上的許多例，並不是說平民革命決不能成功，但只是指明無論是談統一，談革命，總是有憑藉的容易成功些。此所謂『雖有智慧，不如乘勢。』

中國現在有沒有中心勢力呢？我們也不能說絕對沒有，如民國十三年以前的北洋系，現在的國民黨，都勉強可以算做中心勢力，所以蔡松坡先生生時曾有志插入北洋軍隊訓練勁卒以改造中國（見與石醉六書）。不過平心說起來

，這種中心實力實在都薄弱得很。因爲像英法俄等國的王朝其所以能造成一種中心勢力，來源是很久的，一因有數百年的歷史背景，二因有全國心悅服從的倫理權威，三因當時國家本未分裂，軍政大權本未集中，這三點都不是中國現在的中心實力派所已具有的，要培養起來至少也還需要相當的時期。

如何才能培植一個中心勢力出來，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問題。據吳景超先生告我們，照中國亂史內上的成例推測起來，「統一是以武力的方式完成的」，所以現在的中國所希望的是產生一個「能幹的領袖」，這領袖「要有爲國爲民的聲望」，要有知人善用之明」，「要有開誠布公的胸懷」，此外再加上「現代的眼光」和「一個高明的外交政策」，如得其人，則中國立可統一，否則尙須延長內亂的年代。

吳先生這個武力統一的見解，是熟讀過三國演義後的中國人所共具的見解，不必一定要待用歷史的和社會科學的方法才能歸納出來。民國以來的實力派，自袁世凱，段祺瑞，吳佩孚，以至於當代英珪，都早已奉行過這個見解了，然而成績還是渺茫的。所以渺茫的緣故，就因爲現代的中國已經不是完全適用盤古以來的成例所能應付的。現

代的中國，有幾件新要素都是從前所沒有的。第一是科學——特別在軍事和交通方面；第二是國際的複雜關係——特別是租界；第三是民治思想。這三種要素都是以前中國所絕對沒有的，第一項是有利於武力統一的，因為較大實力派可以利用飛機重炮及交通器具摧毀地方的割據勢力，但第二，三兩項却是不利於武力統一的。舊時代中國武力統一所以能成功的緣故，因為失敗的人可以斬盡殺絕，無路可跑。一個領袖能够武力成功，其實不必遵照吳先生所提的三個條件，那三個條件都是好聽的門面話，與實際毫不相干，漢高帝不見得比項羽豁達大度，不過來得更狠辣些罷了。舊時領袖的成功，其要訣全在狠辣二字，在未成功以前，對於敵人要斬盡殺絕，在既成功之後，對於功臣也要斬盡殺絕，這就是領袖成功的得力原因。而這兩條祕訣在現代中國都是不容易實行的，其原因為有租界，有外國人。我們設想項羽在失敗之後有上海租界可跑，那麼漢高帝還能安心統治天下嗎？——縱使項羽負氣，不肯入租界，彭越英布之流也必入租界的。古代的逐鹿者在失敗以後，兵盡糧絕，縱不被擒也必須自殺，現在的逐鹿者在失敗以後，除出洋之外還可以借點外國款，辦一批軍械回來，再圖大舉。所以現代的領袖除非有力量能够戰勝外國人，否則

武力統一總是很難的，濟南慘案以後的事實不是顯然在我們眼前嗎？

其次民治思想的傳佈，也是武力統一的一個大障礙。我們誠然知道在中國今日談民治，是很幼稚，很可憐的，然而就這一點幼稚可憐的思想，也不可以完全忽視。三百年的滿清政府，是被這個思想所打倒的，袁世凱的中華帝國也是被這思想所打倒的。民治主義在今日中國，正所謂『成事不足，壞事有餘。』雖然自布爾什維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相繼創牌以來，民治思想似已相形落後，然而我們要知道那兩種主義之在中國也不過說說而已。人人之所以贊成法西斯主義，因為自己想當莫索里尼？假如到了知道自己決不能當莫索里尼而反要受另外一個莫索里尼鞭策驅使的時候，法西斯主義立刻就要坍台。中國傳統地是一個無治主義的國家，中國民族傳統地是一個無治主義的民族，服從領袖的心是有限的，崇拜英雄的心是有限的，遵守嚴格紀律的心是有限的。在俄國，斯達林可以開除託洛斯基，在中國，手創共產黨的陳獨秀不免落伍，這就是兩個民族根本的異點。特別是在現在輕薄成風的社會，以罵人為時髦，以挖苦人為幽默，以成人之美為有作用，學生可以隨便驅逐師長，軍隊可以隨便反對長官的時候，而希望任



何形式的專制可以成功，這是夢想。舊式中國武力統一之所以成功，因為尚有君臣大義可以維繫，一經委身事主，當然應該終身不二，所以忠臣是常軌，叛逆是例外。即使故主身亡，也還有嗣君可奉。在這樣的社會倫理之下，政治容易走入軌道。現在則人人可當領袖，人人想當領袖，倒戈叛主，視為常事。至於領袖死後，奉其子繼任的事，更絕無僅有。因此任何大的勢力，不幸領袖一死，立刻就變發生內爭，偉大的中心勢力不容易造成。在現在的中國，領袖與部屬的關係已完全成為勢利的關係，而別無道義的關係為之維繫，勢利的關係是暫時的，只要環境形勢一變就要發生變化的，以這樣的薄弱基礎，想來武力統一，豈不是南轅北轍嗎？

還有與武力統一政策相伴而來的困難，就是財政問題和民意問題。凡使用武力統一政策的人，勢必盡力擴充軍備，向外挑戰，這樣政策的結果，財政必陷於困難，財政困難之後，必須向人民身上盡量搜刮，結果民意對於這個實力派必發生怨憤，民意雖然無力，然實際向背可影響軍心，這是歷次內戰我們所熟知的。又因欲武力統一之故，對於謀臣猛將不得不加意聯絡，予以金錢美人及其他種種權利，結果政治上的種種罪惡就因此發生。如果既想使用

武力，又要標榜廉潔，則謀臣猛將必因失意而為敵所誘，自身也難免大敗。因此武力統一與政治罪惡又有因果的關係，而政治上的罪惡越多，民心也越去，統一的真正成功也就越遼遠。歷史上固然有逆取順守的，然絕對違背民心而能統一者確乎很少。現代的世界，打一次仗很不容易，戰爭所給予人民的負擔和痛苦遠過古代數千百倍，故古代用武力統一或可不失民心，而現代則勢有不能。同時因報紙及其他社會事業的關係，民衆容易表示他們的不滿，容易傳佈反抗的思想，容易結合起來消極抵抗，任何領袖都不能不向人民禱取而可以武力統一——除非做買國賊，有外國人供給款項——因此任何領袖也都不免於人民的怨恨而影響到他的成功。我們要記得，歐戰以後，革命的國家雖多，內戰的國家却少，純粹靠武力統一的國家更少。意、德、兩國法西斯的成功都沒有經過內戰，法西斯和共產黨的爭鬥只算鬥毆傷人，不是大規模的戰爭。土耳其基瑪爾的成功是對外戰爭，不是對內戰爭。捷克、波蘭等國的獨立也是國民戰爭，不是內戰。西班牙的革命雖有內戰，而時期不長，影響也不大。比較上只有俄國在革命後曾經過武力統一的時期。蘇俄政府之所以成功，一因俄國地勢僻遠，能免各國的積極干涉，二因正值歐戰後列強疲敝之餘，

無力大舉干涉，三因英法波蘭等國的幫助白黨，反激起俄民愛國的情緒，列寧政府爲俄國國民的國家主義所拯救。這三種特殊情形都不是中國今日所能援例的。中國今日人民心理怨恨內戰已到極點，任何主義，任何口號，想用武力來統一都難望成功，國際的環境和民衆的勢力都妨害武力統一的進行。在這種情勢之下，我不相信武力統一會能成功。

然則中國今日究將循何道以建設一個統一的國家呢？「以建設求統一」，這是一句好聽的口號，在現在羣雄割據，互相猜忌的形勢下，建設受財政的牽制，很難如意。仿照俾斯麥和基瑪爾的成例，從外戰中去求統一，這個形勢也許會到來，然而這種犧牲不是我們所忍言的，況且以中國國力之弱，敵人之強，外戰的結果也許完全和我們的期望相反，我們不必存這種微幸的心思。

切實說起來，中國今日國基之所以不安定，完全因爲沒有像普魯士，撒的尼亞那樣的有歷史背景的中心勢力可以憑藉，改良主義所以不能實現，也是這個原因。今日中國要談建國，要談統一，必須先從創造中心勢力入手。已往雖有兩次創造中心勢力的機會——北洋系和國民黨——但都將機會失去了。一個中心勢力的造成，不是全靠武力能濟

事的，所需要的是道義上的力量。一個中心勢力應該使人民仰之如慈母，奉之如嚴師，至少也要使大家覺得彼善於此，這一層若辦不到，根本難望樹立起中心來，而武力統一的政策却正和這個希望相反，斷難有成。

我根本贊同胡適之先生「無爲政治」的意見，中國今日已經民窮財盡，人民所惟一需要的是休息，不但武力統一或其他性質的內戰外戰完全與人民的希望相反，即所謂生產建設也是現時人民力量所擔負不起的。在幾千年官僚政治訓練之下的中國，妄想以國家的力量來興作一切，結果每辦一事即爲官僚造一搜刮人民的機會。中國的官僚政治是和中國的家族制度，中國的倫理觀念有不可分解的關係，一時急切不能打破，要打破官僚政治只有取省事主義，裁官減政，無爲而治，使官僚無法施其搜刮手段，自然消滅。我說這話並不是反對建設，但我以爲建設之前必須有一段預備工夫，古人中也頗有懂得這個道理的，故云「禮樂百年而後興」。我認爲中國今日欲談建設，必須先經過兩個預備時期，第一個是休養的時期，這時期的工作是裁兵，裁官，減政，減稅，澄清吏治，剷除盜匪，使人民的負擔逐漸減輕，能够自由吐口氣，在思想上也不妨取同樣的政策，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一切自由，大家自由說

說談談，把不平之氣放出一點，社會上自然減少許多亂子。這個時期經過之後，人民的能力逐漸恢復了，然後再可進入於第二個小規模培植的時期，這時期的工作是興教育、修路政，扶助人民自動建設小規模的實業，將大建設的人才和條件都預備好了，然後才能進入於第三個大規模建設的時期。如果不察民力的能否負擔，不察政治的能否澄清，以都市少數政治領袖的環境來視一般窮苦無告的人民，以爲連這一點點小小負擔，何至都擔負不起，這正如勸飢民食肉糜一樣，終是一種笑話。現在一般建設論者，都把中國窮困的原因歸在帝國主義者的經濟侵略身上，其實我們若從內地農村及小城市中親身閱歷一下，就可知中國人民現在的經濟破產大原因，還是在苛捐雜稅過多，以及官吏的侵吞壓榨。苛捐雜稅的過多，因爲要負擔過大的軍費。故不裁兵，不減政，決不能使人民休息，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還在其次。

我所理想的建國步驟是如此，這個意見的是否姑且不論，假如在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之下，要誠意實行這個政策是很容易的，但在現時則幾乎不可能，因爲政治不統一，各方實力派互相疑忌，不能不各擁一部分雄兵以圖自衛。裁兵之說在目前的局勢下很難能的。所以有人主張非先

貫徹武力統一政策不可。但武力統一也幾乎同樣的不可能，在前邊已經說過了。我們因此不能不於武力統一之外，另尋有效的辦法。

我以爲這事情並不是不可能的，我們現在確實需要一個領袖，但這個領袖不是好大喜功，神武英明式的領袖，而是心平氣和，開誠布公，使大家不至於畏忌他的。這領袖當然要有一部分實力，不然就是黎元洪第二了。但實力只以能維持他自己的勢力範圍爲限。這個領袖應該從政策和行動上明白表現他決沒有武力統一消滅異己的野心，應該坦白承認中國割據的現狀，應該正式給予地方實力派以完全自治的權利，這樣的辦法不但使老百姓安心，也可使地方實力派安心，如此才能在實力派中樹立起「互信」的關係來。這個關係是政治安定的要訣，在現在地方實力派慄慄畏懼各圖自守的時候，這個政策的實現並不困難。老實說，所謂中心實力派應該自己承認是一個封建時代的盟主，而不是天子，他的責任是保障列侯的勢力平衡，制止強凌弱衆暴寡的地方爭奪戰，討伐野心無道的暴徒，做一個公平的經紀人。在平時應該有一種類似國際聯盟會議的組織，以消弭各方的惡感，發抒各方的不平，在外侮到了的時候，應該學齊桓晉文去糾合諸侯，一匡天下。齊桓之所以

能爲霸主，因爲他不貪土地，不背盟信，所以爲列國所服。現在的盟主照這樣做去也並不爲難，只要有誠意，有毅力，日久自能獲得各方的信仰，發生一種道義上的力量。這力量不是打幾次勝仗，花幾百萬金錢所能獲得的，只有一個公忠體國，深明大體的領袖——或政治集團——才能得到這種報酬。這種道義的力量一樹立，才能獲止奠定國家的中心基礎，這就是李石曾先生所謂的「分治合作」，中國今日只有走這一條路。

我深信中國未來政治的演進，必然地要走這一條路，一切過去袁段吳張的武力統一政策的失敗，都證明那個政策早已此路不通，現在的局面也仍然是如此，適之先生在最近一篇文章裏——武力統一論——已經說得明白。人民政府的失敗，也只能證明福建的武力革命政策是失敗了，而不能證明南京的武力統一政策可以成功。這是很明顯的事實。假如有人不信，仍想試驗這種政策或鼓吹這種理論，也不過使中國的內亂更增加一些，並不能達到建國統一的理想，並且難免是「治絲而益棼」。

有人說，如果照我上面所提的辦法實現起來，豈不是使地方割據勢力越穩固，中國的統一越無望了嗎？這話至少在表面是如此的，但我們知道在這樣情勢之下中央政府

並不是沒有控制地方割據勢力的工具，這工具就是民意。

古代的霸主得力祕訣是「尊王室」，現在王室沒有了，但四萬萬國民就都是天子。天子是無實力的，但霸主偏要把他尊重起來，因爲這樣才可以制諸侯的跋扈。現在的國民實力並不比古之天子更弱，中心實力派應該抓住這個有力的工具。在最初，他應該與地方實力派相約，制定幾條保障民權的大法，這就是葵丘之會的盟約。盟約定後，中心實力派應該首先在自己的領土內切實實行，首先成立民意的機關，首先做出「尊民」的榜樣。然後昭告「天下」，敢有蹂躪民意，遏制民權的，與天下共擊之。如果中心實力派真能這樣做去，我相信各地人民不是全無血氣的，他們一定要團結起來，仗中央的聲威，靠法律的保障，和地方實力派算賬。在地方實力派與人民的權利衝突之中，中央政府可以乘機仗義執言，逐漸削減軍閥的權力，培植民權的基礎，國家的真正統一，只有在這樣民權伸張之後才能實現。武力統一和專制的結果，只有使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地方實力派反得挾持民意以與所謂中央者抵抗，國家是永遠無辦法的。

我對於中國建國問題的意見是如此，寫出來請大家指教。

# 閒談

汪敬熙

(三)

實驗法是一種技術，好似打獵一樣。熟於打獵的人到了野地裏，一看便知道那裏有兔子；有法將兔子趕出來；瞄鎗瞄的準，一打便可打着；打倒之後，很快的可以尋到死的兔子，又去打第二隻兔子了。不會的人非有兔子跑出來，是看不見有兔子；就是有人告訴他什麼地方有兔子藏着，他也沒法趕牠出來；打鎗也打不準；找第二個兔子又成了一個難題。有實驗訓練的人心中的問題是一個趕着一個來的；有一個問題便可有解決的方法；並且可以將這方法實行出來；解決了一個問題便又去做另一問題的工作了。沒有訓練的人，同不會打獵的人一樣，看不見問題；旁人給他個問題，他也想不到解決的方法；有了方法也實行不出來。實驗本領的大小，全看這個人看見問題快不快；想出的解決的方法多不多；實際做的時候，手術巧不巧。實驗的訓練，不是能由讀書來的。死書讀多，是可以把人的聰明磨掉了的。那一個書獃子是心靈手敏的？也不是能由在實驗室中按着講義去做「實驗」得來。道只是按

着前人的成法去練手術，不是用實驗法去求新智識。這只能使人手術純熟，不能使人體會實驗法的真意。更不能由按着教員指定的問題，想出來的方法，做成了的儀器，去做研究，得到實驗的訓練。這只是先生用學生的手去做實驗。問題不是學生自己看到的，解決的方法不是學生自己苦思而得的，儀器也不是學生自己創造的或選擇的。學生做此種研究也不過只得些手術的熟練而已。

跟着熟手出去打過幾次獵，經他們點撥一二，一個人就漸漸會打獵了；自己多去幾次，也可變成熟手了。學實驗法也是一樣。學科學的人都須經過一個學徒時期。這種學徒，是在一個熟手的手下，研究自己的問題。問題是自己的，方法是自己想得的，儀器也是自己選擇或製造的。熟手的功用，只是點撥一二。遇到自己解決不了的困難，熟手去指導指導。這正同學打獵一樣，打獵是須自己動手，熟手不過只任指導罷了。

同熟手打獵不但可以得到指導，並且可以看他如何打獵，耳濡目染，所獲多矣。同熟手作實驗，也有此種利益。

。這樣不知不覺得來的訓練，比由指導所得的更多。熟手見問題之快，方法之多，手術的巧妙，真是一種好榜樣，好興奮劑。尤其是在實驗的結果與預期的結果不同的時候，熟手的應付辦法，最足以發人深省。在這時候，如是因為手術不好，就求手術的改良；方法的不好，就求方法的進步；如手術方法均無錯誤，這實驗的結果就是新意見的出發點！

實驗方法既是一種技術，特別聰明的人，不必經熟手指導，自己也可弄會的。不過有熟手指導，進步一定快得多。在這裏，我們應該知道聰明的重要。一個笨蟲，經一千年的訓練，也學不好打獵。學實驗法也是如此。看見的問題之重要與否，想到的方法之適當與否，手術的巧妙與否，處處受天資的限制。所以天資低而努力的人只能得到中下的成就。

一個人做實驗的工作，「破題兒第一遭」，最感苦痛。美國的一個有機化學家 READ 說過，第一次自己去思想是非常的困難；這個困難打通之後，問題從四面八方都來了。我們可以增加幾句。不但問題來的多，而且解決的方法也多，手術也是愈來愈巧妙呀。但是我們要切記，沒有第一遭的苦痛，就沒有以後的快樂。

在獵場追逐野獸的時候，獵人多麼快樂！在實驗室想種種方法逼迫自然吐露一個問題的答案，也有同一的快樂。有無限的機會運用一個人的心機手腕。這種工作既可以訓練自己，又可以在人類智識的進步有所貢獻。我們中國人確是有做此種工作的材能。現在大學內做此種工作機會一天一天的多了。為什麼我們大學裏有些教員用許多離奇古怪自損人格的方法去求學生民衆的信仰呢？為什麼我們大學裏的學生，聰明的往往在學校內鉤心鬥角去鬧那於己有損於社會無利「茶壺內的風波」呢？在與自然的爭鬥中顯顯你們的身手罷！

(四)

自然科學的訓練都是如此。所以提倡自然科學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多設立些地方，使熟手得安心工作，並且可教些青年，繼續的不斷的工作。德國的科學的發達，和美國的科學近年的進步，其速度之快，都是仰仗着人力的提倡。德國是應歸功於十九世紀末普魯士教育部的一個官吏 ALTHOFF。美國是由於兩位大學校長：一位是 JOHNS HOPKINS 大學第一任校長 GILMAN；一位是兩任以前的哈佛大學校長 ELLIOT。他們的特長就是知人善任。他們能認識有能力的人，他們能給這些人以機會努力工作。

，並傳些徒弟。這種方法效驗非常之大。現在英國的皇家學會和美國的洛氏基金都是採用這種辦法。此法我們中國也應採取；採取之後必定有效。

至於集會宣傳，刊行雜誌，繙譯書籍，念「中國如要有科學，必須科學說中國話」的口號，熱鬧固然可以熱鬧一氣，使一般人對於科學名詞多知道一些。但是結果只是口耳眼口數寸之間的事情而已。在促進中國在人類智識上的貢獻是難有效的。即使有點效力，也是不過只能刺激一些青年學科學的興趣，至於他們怎樣及在何處可以得到訓練的機會仍然是一切任憑他們自己的命運。

使有能力有訓練的人得安心努力工作，使有希望的青年能得機會同這些人工作。這是中國提倡科學的根本問題

## 編輯後記

編者

△自從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搬往南方之後，獨立評論上就不看見傅孟真先生的文字了。去年秋天，他大病了一場，身體至今還不會復原。昨天一二八的兩週年紀念——他一面頭痛，一面勉力為我們寫了一篇很沉痛的文章。我們祝他早日恢復健康，並且盼望他多給獨立寫文字。

這個問題的解決須要中國有 ALTHOFF，GILMAN ELIOT 這樣子的人，或學術界有一種明白而有力的輿論。必有其一，方能希望科學的發達。

我國主持高等教育的人有幾個具知人之明的。「蓋有之矣，吾未之見也！」這種歎氣的話，是在教育界中的人常常說出來的。

至於輿論，在那兒裏？更談不到公正有力。除三四個學會之外，多數的學會是退化到一種交際會了。越龐大的學會越是如此，有幾個人肯說話呢？這是事關我國學術前途，我們豈能「默爾而息」嗎？

△常燕生先生的「建國問題平議」是他從山西太原寄來的。

△我們在上期已預告過了，本期出版之後，我們要告兩期的假。第八十九號在二月二十五日繼續出版。（我們每年只出五十期。）

# ◎獨立評論合訂本出售

本刊第一至二五期和第二六至五十期及第五一期至七十五期，現在補印齊全，分別裝訂成冊，極適於圖書館及私人收藏之用。每冊價目：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園」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 定價報目

本市 每月一元一角  
朝鮮 每月一元  
其租地 每月一元  
澳門 每月一元  
香港 每月一元  
元九角  
蒙古 每月一元  
南洋 每月一元  
歐美 每月一元  
四元一角

## 國際週報

第六卷十一號

蘇聯外交政策之基礎  
蘇聯外交之展望  
日人眼中之日美關係  
英屬南洋最近政治情形一瞥  
法西斯運動之意義

國際時事  
本報每份定價大洋五分半年連郵費一元一角全年二元國外加倍(郵票代銀九五折)  
社址：南京湖南路十八號

## 三民主義

第三卷

## 月刊

第一期

政治上的責任問題  
國際現勢的演變與太平洋爭霸戰的趨向(續)  
中國農村經濟的破壞原因及復興方策  
教育學與社會主義  
一個民族復興的先例  
一九三六年！  
中國政局之瞻望

專制與革命  
粵省改用大洋本位之我見  
英國地方政治制度  
奧學派經濟學總論(續)

錢實甫  
劉懋初  
滕柱  
郭體乾





## 再論無爲的政治

胡適

在去年五月初，我寫了一篇「從農村救濟談到無爲的政治」（獨立第四九期），我說：

我的意見是這樣。農村的救濟有兩條大路，一條是積極的救濟，一條是消極的救濟；前者是興利，後者是除弊除害。在現時的狀態之下，積極救濟決不如消極救濟的功效之大。興一利則受惠者有限，而除一弊則受惠者無窮。這是我要貢獻給政府的一個原則。

我舉出「消極救濟」的四項實例：（1）裁減官吏與機關，（2）停止一切所謂「建設」事業，（3）努力裁兵，（4）減輕捐稅。這都是消極無爲的救濟，在今日一定有人駭怪，所以我自己聲明：

讀者莫笑這種主張太消極了。有爲的建設必須有個有爲的時勢；無其時勢，無錢又無人而高倡建設，正如叫化子沒飯吃時夢想建造瓊樓玉宇，豈非絕倫的謬妄？今日大患正在不能估量自己的財力人力，而妄想從窮苦百姓的骨髓裏榨出油水來建設一個現

代式的大排場。骨髓有限而排場無窮，所以越走越近全國破產的死路了！

從這種觀察上着想，我曾提出一個大膽的建議，我說：此時中國所需要的一種提倡無爲的政治哲學。古代哲人提倡無爲，並非教人一事不做，只是要人睜開眼睛看看時勢，看看客觀的物質條件是不是可以有爲，所以他們說：「無爲者，不先物爲也。」又說：「不爲物先，不爲物後；與時推移，應物變化。」所謂「時」即是時勢；所謂「物」即是客觀的物質條件。第一個條件是經濟能力，第二個是人才。沒有經濟能力，就須用全力培養經濟能力；沒有人才，就須用全力培養人才。在這種條件未完備之先，決不能做出什麼有爲的政治。我看此時最好的培養方法是一種無爲的政治，「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換句話說，這就是要把政府的權力縮小到警察權；只要能維持人民的治安，別的建設事業可以暫時不管。人民有了治安，自然會用他們的餘力去發展積極的事業。

凡是留意我的著作或聽過我的哲學史工課的人，都知

道我平日是最反對無爲的政治哲學的。現在我公然提倡中國應該試行一種無爲的政治，這當然要引起不少的朋友們的驚異。所以「弘伯」先生（他是上過我的課的）老遠從

國外寄了一篇很嚴重的抗議，題爲「我們還需要提倡無爲的政治哲學嗎？」（獨立第六八至六九期）當時我在海外，不會作答。我回國時，恰好區少幹先生從廣州寄來了一篇「無爲與有爲」（獨立第七六期），那篇文字是替我答覆「弘伯」先生的。區先生還嫌我說的「把政府的權力縮小到警察權」一句話不切事實。他要改爲「把政府的權力擴張到警察權」，因爲「我們現在的政府還沒有做到警察權的境界」。他希望「政府先把警察做到了，然後才可以擴張到比警察權更大的權。換句話說，就是我們先做了『無爲之爲』，然後可以做『有爲之爲』。」

我很願意接受區先生的修正。我的本意也是說今日政府還沒有做到警察權的境界，所以我主張把別的建設事業都暫時停頓下來，努力做到維持人民治安的境界。我從減省其他事業說起，故說是「縮小」政府的權力。縮小了其他方面，用全力辦好警察權，這就是「擴張」了。

區先生特別指出，農村復興與非經過無爲政治的撫乳培養不可。他說：

現時復興各地農村，最要緊的是給他們一個翻蘇的機會；最低限度使他們能够繼續呼吸，才可以繼續工作。

這正是無爲政治的目的：與民休息。這個意思很淺顯，所以談政治與幹政治的人都不屑注意。最難叫現在的人們了解的，是「停止建設」一個提議。「弘伯」先生贊成裁官和裁兵，但他不能贊成「停止建設」一項。他說：

在全體比例中，建設費實微乎其微。即使全部取消了，於農民的負擔也輕不了多少。（六八期，頁一四）

關於全體費用的比例，弘伯先生的話似乎太看輕了建設費在內省農民負擔上的重量。本期的獨立有何會源先生「論田賦附加」一篇，痛論農民受田賦附加的痛苦。他指出田賦的附加稅往往「超過正糧一倍，二倍，以至十餘倍之多。江蘇各縣有的加到二十六倍！」最可注意的是他指出田賦附加稅都是跟着「新政」加起來的。他所謂「新政」，即是我們所謂「建設」。何先生說：

自民元以來，特別自十六年以來，這種附加稅隨着新政一天一天的加多。例如辦黨要錢，辦自治要錢，修路修衙門要錢，甚至復興農村也要錢，這些錢只好儘先向農民要。

他又說：

田賦附加與新政有不可分離的關係。差不多每一附加都有一項新政做背景。新政的名目很多，如教育，公安，自治，清丈，戶籍，倉儲，保甲，等等，真是應有盡有。……其實無所謂政，也無所謂新，只不過是田賦多一種附加，農民多一種負擔，同時無業遊民多一種飯碗。

何先生這兩段話，說的最沉痛。他又指出：

到了民國二十年，厘金裁撤了，有許多經費向來依靠厘金或厘金附加的，現在也要在田賦附加上面想法。於是從前一部分工商的負擔，現在也放在農民的肩上了。

所以何先生不知不覺的也走上了我們所謂無爲政策的路，也主張停辦那些擾民害民的「新政」，他很平和的提議：

地方新政，得減便減。不能減時，中央政府應與以補助。

各省政府應立即着手調查各縣新政，看看其中有無可以不辦的，可以緩辦的。

何先生只從田賦附加稅上着眼，他列舉的事實也自然叫他得到「停減新政」的結論。他這篇文章很可以答覆弘伯先

生「建設費實微乎其微」的駁論了。

弘伯先生還有一個議論：

況且名符其實的建設，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是生產的，不光是消費的；是救民救國所必需的，不光是做樣子出來好看的。……要得中國富強，必需現代化；要得現代化，必需努力建設。

所以他的結論是：

該建設，該認真建設，而不是應該停止建設。

關於這一種議論，我們必須認清今日所謂「建設」是不是「用之於民」的，是不是「救民救國所必需的」。平心說來，這幾年的建設事業的絕大部分都只是吳稚暉先生說的「鑿孔栽鬚」。有一口好鬚，豈不美觀？可是爲了要美觀而在光光的臉上鑿下無數栽鬚的孔，流出不少的血，受了不少的痛苦，結果還是栽不了鬚，這就未免太冤了！前幾年有過一陣拆城造馬路的狂熱，於是各地方紛紛把城牆拆了。這幾年匪亂多了，有些地方（如南昌）又趕着造起城牆來；造城還不够，還要加造起新式的要塞來。拆城還只限於城市，近年造公路的狂熱比拆城更普遍了。許多年前，早有些人說過：汽車路是最不經濟的，車容易損壞，路也要時常修治，又只能載人，不能多運貨。可是這幾年來

，各省都爭着造公路，誰也不計算人民的擔負，誰也不計算徵工徵料的苛擾，誰也不計算路成之後有無人用，有無資產可以輸出。四五年前，我們安徽的北部忽然奉令趕成了五條汽車路，限幾個月內完工。路是造成了；可是上個月有人去調查，從太湖到潛山的公路，連路帶兩旁的溝，足有四丈；四丈闊乘一百里長，要佔去多少民田！這一帶的人民，農民之外，出門最多的是補鍋補碗的，他們只能挑擔走路，那能坐汽車？汽車也多壞了，每天至多只能開一次車。路上滿長了草了，中間只剩兩尺多行人常走的路沒有草。這種建設不是「鑿孔栽鬚」嗎？「取之於民」則有之矣；「用之於民」又在那裏？

我所以贊成消極的救濟，是因為現在的人民實在太苦痛了，實在負擔太重了，而為政者不知道「除一弊勝于興一利」的政治原則，不明白除弊正是政府的首要責任；只知道羨慕建設的美名，巧立名目，廣設機關，結果是每興一利即是多生一弊，即是加多一重人民負擔。我希望大家明白無為的政治是大亂之後回復人民生活力的最有效方法，是有為政治的最有效的預備。常燕生先生在他的「建國問題平議」（獨立第八八期）裏，也贊成我這個主張，他說：

中國今日已經民窮財盡，人民所惟一需要的是休息。……在幾千年官僚政治訓練之下的中國，妄想以國

家的力量來興作一切，結果每辦一事即為官僚造一搜刮人民機會。……我認為中國今日欲談建設，必須先經過兩個預備時期。第一個是休養的時期，這時期的工作是裁兵，裁官，減政，減稅，澄清吏治，剷除盜匪，使人民的負擔逐漸減輕，能夠自由吐口氣；在思想上也不妨取同樣的政策，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一切自由，大家自由說談談，把不平之氣放出一點，社會上自然減少許多亂子。這個時期經過之後，人民的能力逐漸恢復了，然後可以進入於第二個小規模培植的時期。……然後才能進入於第三個大規模建設的時期。

最後，我們也可以說：這種種「消極」的政策也就是今日最需要的積極政策。裁官，裁兵，那一項不需要積極的去辦？我們所以諄諄提出這種消極的看法者，正因為今日為政者都不敢朝這些除弊除暴減輕人民苦痛的方面去想想。例如裁兵，豈不是全國人民所渴望？然而政府却只向加稅籌餉的方面去想，從不聞有人切切實實去想一個着手裁兵的辦法。現在中央的收入，用在軍費上的已超過百分之八十五了。這個局面能支持多久？假使五六個月之內，剿共的工作真能完成了，我們以為政府應該切實計畫裁兵

即逐漸實行，財政方有出路，國家方有辦法，人民方有生路。前幾天，政府領袖對全國宣言兩大政策，一是完成剿匪工作，一是「以建設求統一」。我們的私見是希望政府的領袖正式提出「裁兵」的計畫來，以裁兵求統一！我們也希望各地的軍事領袖大家明白國家統一的需要，明白武力的終久不可倚靠，明白人民負擔的太重太苦，大家把兵權交還國家，請中央實行編，分遣期裁減一切向來割據地方的軍隊。在今日中央軍力最盛的時候，在兩年多的國難所造成的一點新國家觀念之下，中央若以裁兵號召全國，全國

## 論田賦附加

何會源

留心農村問題的人，大概沒有不太息田賦病農的吧。但實在說來，真正病農的，不是田賦本身，而是牠的附加稅。現時各地田賦本身，即所謂正糧，比前清末葉相差不遠；而附加稅却超過正糧一倍二倍以至十餘倍（江蘇各縣有的加到二十六倍）之多。

爲什麼會到這種地步呢？因爲農民比較馴良，對於重稅不敢反抗；舊稅上附加，總比創設新稅輕而易舉；並且田賦是地方稅，牠的稅率比較的可以自由增加。所以自民

不應該沒有有力的響應。「以建設求統一」，話是積極的，其實等於空談。「以裁兵求統一」，看起來像是消極的，其實是積極的，是富有可能性的，因爲這是全國人民心裏所渴望的，因爲這是有全國人民的理智與情感作後盾的。我們說過，無爲是「不爲物先，不爲物後」。全國大裁兵的時勢到了，政治家有胆子放下那些建設的空談，來試試這種好像消極的大政策嗎？

二十三，二，十九。

元以來，特別自十六年以來，這種附稅隨着新政一天一天的加多。例如辦黨要錢，辦自治要錢，修路修衙門要錢，甚至復興農村也要錢，這些錢只好儘先向農民要。到了民國二十年，釐金稅裁撤了，有許多經費向來依靠釐金或釐金附加的，現在也要在田賦附加上面想法，於是從前一部分工商的負擔現在也放在農民的肩上。

在這種重稅壓迫之下，叫農民怎樣翻身？年成不好，他們雖傾家蕩產也不能籌出這批重稅；年成好了，穀不值

錢，他們也是籌不出款來。到於今，這個農業國家到處不免農村破產的朕兆，這豈不是很自然的結果麼？

中國近代史上有資格同田賦附加比較比較的，只有釐金一種。這兩種賦稅，大概說來，一是病農，一是妨害工商；他們對於中國經濟的影響是不相上下的。不過釐金容易令人注意，因為釐金有五六十年的歷史，而出賦附加之急激增加，則在十六七年北伐成功以後。又因為釐金既是由工商直接負擔，工商份子會聯絡知識階級，會運用報紙雜誌，會指揮職業團體，也會疏通政界要人，這種號召力量不是直接負擔田賦及其附加之農民所能得到的。還有更重要的原因，自一九〇五年以來，裁釐已變成我們國際義務之一，全國上下不得留心釐金問題。田賦則不然，牠的繳納，徵收，和使用，差不多都在窮鄉僻壤，自然不易得到社會上層的注意。釐金，在任何階級看來，是中國經濟上一個大問題。雖然如此，釐金之廢除，却也經全國人士奔走呼號，積二十年之努力，始得實現。田賦附加之裁撤，其困難更不待言。所以民國二十年以後，厘金沒有了，而田賦附加不但不裁，牠的數量反而增加不已。

此外，田賦附加還牽連許多『複雜問題。』

第一，田賦附加與新政有不可分離的關係。差不多每

一附加都有一項新政做背景。新政的名目很多，如教育，公安，自治，清丈，戶籍，倉儲，保甲，等等，真是應有盡有。不過這些新政，正如蔣廷黻教授所說的，多半是『新名詞舊事情。』極新名詞的畏葸，盡幹些陳腐的勾當。我國各地辦理新政的結局，無所謂政，也無所謂新，只不過是田賦多一種附加，農民多一種負擔，同時無業遊民多一種飯碗。在農民看來，新政就是剝削，新政只是剝削二字的另一寫法。這是大家公認的事實，勿庸諱言的。不過事情儘管舊，名詞仍然新，萬一真的將附加裁撤，這些新政豈不要停辦麼？這是田賦附加所特有的一種『複雜問題。』從前釐金固然有時與新政發生關係，但總不像田賦與新政之相依為命。一談到裁撤田賦附加，就要妨害新政。這在政府當局看來，是很嚴重的。田賦附加不能立即裁撤之主因即在此。

其次，田賦附加與一部分士人階級也是相依為命。裁撤釐金對於士農工商都有利益，而裁撤田賦附加則不然。自從新政一一舉辦之後，土豪劣紳榨取的方式也改了，以前他們直接向農民榨取，現在他們用附加的名義間接的向農民分一杯羹。萬一政府裁撤了一種附加，一方面停了一種新政，一方面立即破壞了士人的一種飯碗。所以田賦附

加問題內面，包含着士人農人的階級衝突或階級鬭爭問題。

此外，田賦附加與市民利害也有點關係。中國近三十年來，工商勢力不知增加了多少，政府雖然可以向工商要錢，但總覺有點麻煩，不如農民要錢那樣輕便。所以政府——至少地方政府——總是先向農民伸手，待到伸無可伸時，纔向市民伸手。假定政府的經費都是不能省的，那末，裁撤釐金無異於說增加市民負擔，如市地稅、遺產稅，所得稅，庶幾久之桑榆者纔可以收之東隅。所以田賦附加內面又包含國民負擔的互相推諉問題。

〔注〕現在我們可以談田賦附加的性質了。田賦附加是社會上某種階級向農民從事榨取的方式，或推諉負擔的方式。

我承認田賦附加包含這許多「複雜問題」，但沒有說田賦附加不能裁撤。正相反，我以為田賦附加是現政府下面一大弊政，是青白旗下的一大污點，裁撤田賦附加是中國農民解放的第一步。

田賦附加稅怎樣裁撤呢？我們目前所盼望的是：各省田賦附加是否超過正糧一倍，暫不管他，但以後無論如何，不再增加新的附稅。

這希望總算不高，萬一從今天起，田賦附加永不再增，也算一件喜事。萬一這一點辦不到，我們只好希望：

以後各省新增田賦附稅，事前必須請准中央政府，方得徵收。

此外爲求便利將來的努力起見，我們還希望：各省政府立即着手調查各縣財政情形，看看其中有無可以節省的，調查各縣新政，看看其中有無可以不辦的，可以緩辦的，以爲次年度地方預算更正的。預備。

目前希望大致如此。

以後怎麼辦呢？這自然要看政府與一般民衆決心如何而定。如果一定要完全裁撤的話，辦法也未嘗沒有。最直接了當的辦法（也是合理的可能的辦法）是：

- 一，地方新政得減使減，不能減時中央政府應與以補助。
- 二，如果中央政府無款可助，他應當裁汰冗兵，節省糜費。
- 三，如果冗兵裁無可裁，中央政府應當裁併驍枝機關，減低官吏俸給，以移出經費。
- 四，如果俸給移無可移，雖另創新稅亦所不惜。



這些辦法，從任何方面看來，不算激烈，不算空想。但在目前或最近的將來，能否有人如此大刀闊斧的幹去？尙成問題。

目前農民，除稅額太重外，對於納稅品類，也感覺困難。田地所生產的，是糧食，不是金錢；但田稅所交的則正相反，要金錢不要糧食。於是農民只好用糧換錢，其結果，或是有糧食換不到錢，或是拿許多的糧食換很少的錢，一出一入吃虧不小。從前農民生產的，是糧食；繳納的賦稅，是糧食；國家付與官吏的，是糧食；社會上其他物品也有以糧食爲交易之準繩的。那時糧食的地位，同現在的金錢差不多。農民的幸福，與年成的好壞成正比例。農民的幸福，與國家的幸福一致。如今世界大變了！金錢支配人的生活。農民所恃爲生者，不是糧食，而是糧食的價格。前者是田地產生的，而後者是市場產生的。農民的幸福，與年成的好壞不一定成正比例。農民的幸福，與社會上其他階級的，也不一致。以前工商將就農民；現在農民將就工商，受工商的操縱。司馬光曾這樣說過：

『力者民所生而有，穀帛民可耕桑而得，至於錢，

則縣官之所鑄，民不得私爲。自古農民不過出力役，稅不過穀帛。唐末兵興，始有稅錢者，故白居易詩云：「私家無錢爐，平地無銅山，」言責民以所無也。今有司立法，唯錢是求；民值豐歲，賤糶其穀以輸官；至凶年無穀可糶，吏責其錢不已，欲賣田則家家賣田，欲賣屋則家家賣屋，欲賣牛則家家賣牛；無田可售，則不免伐桑棗，撤屋材，賣其薪，或殺牛賣其肉，得錢以輸官。一年如此，明年將何以生乎？」

他的話，到現在看來，仍然是針針見血。所以要求田賦問題之澈底的解決，勢非恢復我國昔時允許農民用糧納稅的辦法不可。但是這種建議，近乎開倒車，應當取消。

這個問題究竟到那一天纔能解決？這是不能回答的。裁撤田附，本不容易；況且一面要同割據的軍閥敷衍，一面要同土劣貪污妥協？不過古人曾經說過「事在人爲。」世界上非常之人也能做出非常之大事來，這個問題關係太大了，我們對於賢明的當局怎能不有所期待？

二十三年二月十四日

☆

☆

☆

☆

## 痛癢相關之國是論

孟 森

吾國之事，何者爲是，既無定論，即無國是。論如何而定？以痛癢相關而定。近日獨立評論之評論，漸至痛癢相關之境矣。何謂痛？武力統一，國民之所隱痛也，自袁世凱以後，直至吳佩孚，皆以此爲國民所不信任。然謂彼所持之主義爲非，則試問統一之道，不恃武力而何恃？評論中蔣廷黻先生重揭發之，此所謂捫着痛處也。何謂癢？國民之所苦者騷動，所求者安靜。然而昔者閉關而治，欲安靜即安靜，欲不騷動即戒騷動。今則物質文明震吾前，現代化驅吾後，自古以來，與天下更始之第一義，過而不行，被騷動者爲學說所劫持，亦自以爲祇求安靜，乃吾儕小人不可告人之隱。既不可以告人，人亦莫爲之急。忽有胡適先生，出而持無爲政治之說。大多數不諳學理之國民，默默接受，而仍不敢轟然贊和，若以爲蠱蟲在身，不敢捫之而談，旁若無人也。胡先生明知議其後者大有人在，而公然以王景略自期，所謂搔着癢處也。

痛與癢皆爲我麻木不自覺之民國發露之矣。而痛者自痛，不欲忍痛者尙擬別尋止痛之方；癢者自癢，不自覺癢

者尙以爲痛且當忍，何有於癢，而必欲已之。是爲痛與癢各走一端，去相關之路尙遠。最後乃有常燕生先生之建國問題平議，乃籌武力統一必合無爲政治而一之，吾國始有挽救之望。武力必有所戴以爲壓人之具。君主之興，戴一君而後可以取勝於無君者。漢高起自亭長，與項氏猶俱戴義帝，至義帝被害，而爲義帝發喪以討項羽，於是拔山扛鼎之大豪，卒困於屢戰屢敗者之手。惟明祖則雖用韓林兒年號，不其得韓林兒之力，後人且以龍鳳紀元爲多此一舉。此似破武力必有所戴之公式。而常先生以爲明祖之所以勝，乃在種族之鬪爭，與民黨亡清之途徑相合，故可以無所戴而純用武力以得統一。最後乃言今已入雖統一而迄無安定之試驗期中。於是悟君主之世以戴君爲壓人之物，民主之世以戴民爲壓人之物。能壓人則武力統一完成矣。然欲戴民則必使民皆欣然稱此用武力之人乃真能諒我不可告人之隱而大慰之，則除於有爲之中留無爲之精意以施之政治，別無其他可以戴民之事。於是胡蔣之說合而爲一；於是痛癢乃有關係。然則以常先生之平議爲痛癢相關之論點

已有結穴可矣。復何畫蛇添足之爲？

顧吾以爲武力必有所戴而統一，此誠萬世不可逃之原則。至有戴民戴君之分，則又爲政體所眩，而以君主民主爲古今自有大限，真不可以強同。殊不知無論君主民主，不戴民而興者，皆不得爲撥亂反正長治久安之計。三章之約法，與爲義帝發喪，效力孰多？明祖之起也，兵事未畢，則以兵護農，兵之所到，地利盡興。其餉源取之於天地自然之生產。至大勢稍定，則以兵歸農，舉天下皆設屯衛，自言我之爲國，必使養兵而不煩吾民出顆粒之供億。屯之所入，兵餉之外，一切將帥之俸，器械之需，調發之費，皆於兵之本身取足。又使兵與生產相連，所衛乃衛兵之家，而兵以外之民，則爲利害共同，守望自不能不與相助而衛之，非強無身家之兵，衛有身家之民也。其爲民謀者如此。而擾民者必誅，至梟斬愛塔歐陽倫而不貸。貪官暴將，一誅戮輒累萬。明初以屢興大獄，爲史家所震懾，試問有戮及平民之事否。故君主者，以己身爲其下所戴而集事，然已則又戴民以集事。此常先生立論之發端，願爲加以揭明者一也。

至民主之必應戴民，今日以前早爲當世所覺悟。不但覺悟而已，且早以此爲標榜。國民軍之所向有功，豈不曰

此民衆之武力，爲民衆來打倒軍閥之武力乎。如使常先生

之平議以前，無民衆武力之標語，則不傳之妙一經道破，有武力者可以得所指導，從此得統一之真諦。無如言者苦心所籌，而當局以爲此本我之出發點，何勞他人借箸也。然則言論界幸而得一痛癢相關之結穴，實行家則痛癢無所關也。中山先生以阿斗喻民，以政府之當局喻諸葛亮，豈非即是戴民而興之宗旨？夫中山先生當未統一之前，指示此統一之所應戴，其識力已與常先生相合，而時期實早占其先。顧在統一已成之後，而久以阿斗視吾民，則非中山先生所及料也。夫阿斗之爲阿斗，今日視之爲武侯乳抱之稚弱，在武侯則視之猶昭烈也，故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與挾天子令諸侯之態度不同。武侯若以今人所見之阿斗待阿斗，則即曹操所曾戴之陳留王，曹丕所以不戴之山陽公矣。故君主之世，其戴民也，懷懷不敢不戴，其視民在一切尊貴之上。當時最尊而可受皇帝之誠敬者，惟天爲大，惟民配之。故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曰，「子得罪於父，可因諸姑伯叔解之。臣得罪於君，可因左右用事解之。桀紂得罪於百姓，至今未有能解之者也。」此皆君主戴民之已事也。

至民主之世而昌言吾民爲阿斗，則漢之阿斗，在有爲

之政治則爲羊，所謂羊毛出在羊身上也。今之憂國者，謂吾本以農立國，而國之最大漏卮已爲民食，使吾民果以缺食而待舶來之農品以自救，雖戴民而興者，亦豈能不爲？今之兵災匪擾烟禍以妨農，猶曰統一有名無實之故。近畿之地，政令所及，而又當無水旱之憂之虞，又曰穀賤傷農，則何也？糧價壓於舶來，而農本則糜於重稅，是益驅農以外之民仰舶來以爲食，而農則亦甘舍其不穀本之農，以遁於可以求生之路也。古者四民以農爲重，今必絕農之命，獨存三民，倘所謂三民主義之別一義耶？民之數究以農爲多；不能安農，必不能安民。不能安民，必不能自謂戴民。常先生謂明祖獨無所戴，以與國民政府之起同得力於種族問題。吾以爲明祖惟能戴民而後起，國民政府亦惟自標其爲民衆武力，而後一舉而遂底於統一也。統一之後，又反以不統一爲慮，然後計及武力之必有所戴，則苟曰吾惟爲民謀建設，乃始與羊謀毛，其又何以解之？此常先生立論之必有後命，願爲加以揭明者二也。

武力統一之必有所戴，戴君者二等豪傑，攀龍附鳳以成封拜之功名者也。其家天下者則必戴民，並不待民主之政體，而後民始挾以受其相戴。民挾政體以合當局之戴己，爲不統一之所由來。即所謂「革命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也。無爲政治以戴民爲起點。名曰政治，已非無爲。惟政治祇以因民所利爲限，則千辛萬苦之所爲，在民以爲未嘗有爲也。與羊謀皮之建設，尙在有爲無爲之間。欲得其皮而猶待相謀，則此曰羊毛出在羊身上，彼亦可曰羊毛留在羊身上也。君主之尊民也如天，民主之貌民也如阿斗，則宜其取毛而不與羊謀矣。不可以謀之民，而用現代化爲建設之標準，此政治之所以有爲也。要之皆用中山先生十年前之環境，所發十年前之言論，以爲忠實之信徒，則痛癢已相關者國是之有論，痛癢終不相關者主持國是之當局也。夫國是論則已盡於是矣。其他枝葉則本無盡期，獨立評論固不憂論盡而無可論也。

## 綏宣之失陷及其收復

賈問津

綏定和宣漢，是去年十月二十日爲徐向前率領的那一

股共匪佔據了的。宣漢收復在十二月十七日，綏定在十八

日。綏宣之失陷的罪過，應該由川陝邊防軍督辦劉存厚担起來；收復的功績，不得不讓二十一軍享有了。失陷與收復相隔的時間，雖然不過兩個月，但前前後後的事情，却是值得一述的。

講起地勢，這兩縣是很重要的。我們只須打開川省的地圖一看，便可明瞭它們是兩開（即開江開縣）的屏障。綏宣如果不保，兩開是無險可守，危殆萬分的；那末，萬縣夔府亦隨之動搖了。匪首徐向前若能得到夔萬，極容易與利川的賀龍打成一片，四川變成江西第二，是毫無問題的；但是它的嚴重性，就我個人看來，却比江西大哩。

可是綏宣爲甚末這樣容易被共匪佔據了呢，第一，因爲川陝邊防軍的軍隊不能作戰。有人這樣形容而且帶着挖苦的口吻說，『川陝邊防軍的太太多於軍官，軍官多於兵士，兵士多於槍械，槍械多於子彈！』并不算過火！甚至于火火也有太太，有時還加上小老婆。以這樣編制的隊伍，匪還沒有來到，軍官的太太，早溜到萬縣重慶去了，試問軍隊那有勇氣？試問如何能禦匪？兵士五六個月沒有發餉，有時發下的餉，上級軍官給吃了，那末兵士爲甚末打仗？爲甚末拚命？所以我在逃難時沿途遇着的退兵，槍都是槍口向下地背着，子彈一顆也沒有放！而且邊防軍素

有「老太爺隊伍」之稱，在綏宣坐享差不多十年的清福，從來的川戰，就沒有參加過，作戰的經驗是一點沒有的，無怪乎遇着共匪動輒退一二十里，還洋洋得意的對老百姓講，共匪是打不鑽的。天呀，壓根兒他們就沒有放過鎗！

第二因爲四川流行的「防區制」太嚴厲了。原來劉湘在成都就勦匪總司令職的時候，議定六路圍剿，但實在六路勦匪軍各自爲政，不相爲謀的。事先，共匪佔通江，南江，巴中，只田頌堯一部分的軍隊抵抗，其餘的川中將領都擁兵不動。於是湯森的防地，渠縣放棄了，營山蓬安也相繼失陷了；而那時的劉存厚還在綏定督辦署內逍遙自得的吟詩咧！等到議商會勦的時候，綏劉與匪區接壤的防線太長，恐不能持久抵禦，決定請他只守萬源城口，讓出綏宣給二十一軍防守，而川陝邊防軍抵死反對。因爲此議果成爲事實，自然劉存厚永不會有戲唱的。所以綏宣危急萬狀的時候，拍電求援雖數十餘次，而二十一軍只好抱定自己打掃門前雪主義，不管他人的瓦上霜了！據說當時連縣縣長吳連炬曾對劉存厚講過，川陝邊防軍自己既不能守，綏宣與其給共匪蹂躪破壞，不如讓交二十一軍，樂得一方面做了人情，他方又討得人民的歡心；但是素稱爲蜀中將領的老前輩，而且防地僅僅才四縣的劉存厚，那能失這

個面子？那能隨便一下將出產富庶的，督署所在的，而且又是下川東的名城的綏定讓人！然而這次綏定失陷最大的原因，就是這個防區制作祟。

通，南，巴爲共匪所陷，綏定早不是安全的地方。去年秋收之後，共匪定會向外發展，是不生問題的。共匪四面受包圍，當其擴張勢力的時候，實力薄弱的一面，先就得遭殃；劉存厚的防地之不保，我們也料到的。可是我們臨逃亡的前幾天，還是沒一點準備；許多的民衆，也和我們一樣，大家都把這火看得太老了。因爲劉存厚駐防綏定將近十年，對地方不能說一點責任沒有，一點情感沒有；擁兵十餘萬人，不可謂不多；并且綏定的兵工廠的子彈，足夠三四個月之用；所以當局聲言死守綏城，我們相信，是可能的。然而一日之內，一個傷兵沒有看見，使失掉兩個名城，所以全川震動！因爲事情發生太倉卒，人民逃難的，也就慘不可言了。

綏定的人民不外向大竹，開江逃走；漢宣的，向開縣走。但是須得渡過州河。河上原來搭有浮橋一座，只爲軍隊退時而設，有衛兵把守，人民是不許通行的。綏城失守的前兩天，首先搬家過河的，是軍官的太太小姐們。而且她們搬得太利害了，人民不能自持，也跟着搬，那上船時

擁擠不堪的情形，就够慘的：岸上散佈着兵提着槍，嚷着不許船靠岸划人民渡河，而船夫圖利，（最危急時一元大洋一個人！）也不管這一套；船將靠近河岸時，已有人不顧性命跳上船去的！有母親爭着上了船來不及帶上自己的兒子，而小兒子在岸上不休的哭着叫媽媽的！有的人想上船而船已載滿了人，一隻脚在船上一隻脚在水裏！……真慘極了！十月十九日夜裏，川陝邊防軍深怕共匪追擊，將沿河的船隻全給沉沒。而人民欲往淺灘處涉水逃命竟遭淹死的人，恐不在一二百以下吧！逃難的途中，充塞着各式各樣的人，但都是愁雲籠照了他們的血孔，死的恐怖充斥了他們的腦海。天下着纏綿不斷的雨，大家都光着頭，淋得透濕，沒一個人記得穿上膠反套鞋，帶上傘；個個像掉下水裏的雞！平日在家裏嬌養慣了的小姐少爺，出門時狠短的路都得坐上洋車的，這次也是自己揹着自己的妹妹，或弟弟，而且背着棉被蓋，默默地走着狼濕狼塌的道！農民呢，他們爲甚末怕？爲甚末也跟隨城市的人牽着他們的牛，羊，或豬逃跑？啊，還有那六七十歲的老年人，在滑溜而坎坷的蜀道上，一步一步地移動而狼狽的慘狀，真使我傷心了！我們青年人雖都是自背着自己極單簡的行李，可以走快些，但我們的脚尖舉起欲伸出時，已與前面的

人的脚跟相接觸了，只得蠕動而行！

鄉村的旅舍，民家，不論大小好壞貴賤，全住滿了難民。實在連座位也找不着的那許多人，站立在屋簷的下面，受着風霜寒氣的襲擊而顫抖着，已經够使人表同情的。但那禽獸一般的敗兵，（就是邊防軍）有時甚至將他們隨身攜帶的換洗衣物，及很少的逃亡費竟擄掠去了！

難民中家人離散四方，是普通極了的事。我家裏三十餘人，到開江時僅六七人，其餘的逃至甚末地方，也是無從知道的！我一位朋友家裏只六口人，但他各處打聽，六個人竟逃亡在六個地方！如果逃亡在外的，又未受共匪殺害，那真得禱告上帝，那是不幸中的大幸事喲！

我們走到二十一軍的防區，開江的時候，都認為是最安全的所在，再沒有往梁山萬縣前進的必要。因為我們深信二十軍是川軍中之最能作戰的，是川戰中的香濱隊，是其匪的勁敵；并且我們深信如果二十一軍失利，那嗎徐向前可以目中無人，橫行天下了。——再跑，是沒有用的！萬分不得已時，我們也準備赤化，不就完事！但我們到開江不幾日，開江的富紳也是逃走一空。家家戶戶關閉着門，像過舊歷年節一樣；城中找不到一位品行端正衣服禮貌些的人物！其實開江曾經危險兩次。第一次，共匪佔據

宣漢綏定之後，即以大股紅軍侵犯開江，直攻到普安場之寶塔壩，距縣城只六七里地；第二次，由宣開交界之涼風壩，竟攻至永興場，距縣城亦很近，但兩次共匪俱被擊敗，而且傷亡甚重；據說這是他們竄入四川以來，破題兒第一次的大失敗哩。從此之後，第五路勦匪軍二十一軍便節節勝利。近閱平中報載，現在將直搗其老巢通南巴了。

這次四川第五路勦匪軍其所以成績昭著勝利神速的情形，與江西中央軍歷數年之久而勦赤進展甚緩的，兩相比較，却大有原因在。二十一軍此次勦赤，具有極大的決心，認為共匪赤化了天府之國的四川，自己的地盤固然不保，與中國全局也有甚大的關係的。所以前線上完全用他的善戰的基本的慍悍隊伍參戰，（如王基陵師，在二十一軍中以善守稱，范紹增帥以能攻聞，且俱在鄂西勦過匪，而經驗狼豐富的。）沒有派過雜牌隊伍，士兵自然沒有聽說叛變過，此其一。第五路勦赤軍，未下總攻擊令之前，綏宣難民逃至二十一軍戍區的，扶老携幼，流離失所的那種悲劇，兵士皆親自目睹，受了極偉大的極深刻的感動和刺激，加之政治訓練部宣傳得力，知道此次作戰的意義，與歷來川戰迥然兩樣的。由前線負重傷而退下的兵士，笑容可鞠的對我們講，他們犧牲是有代價的，他們不是為某個

人爭地盤而打仗，而是爲老百姓打仗的。前次他們與二十四軍作戰，軍官有許多借故拉稀臨陣退下的，此次沒一位軍官犯此毛病；并且作戰又極英勇，如第二師第八旅第二十三團，自團長以下的軍官，非傷即陣亡，甚至以一中士士兵，代理營長哩！所以第五路勦匪軍士氣狼旺，此其二。第五路勦亦軍最大的成功，是能抓住民衆，并且得着民衆的極大的後援。他們對於難民盡量設置收容所，接濟糧食和款項，收復一個地方，即佈告勸慰回籍，免受流離之苦。對於未損大的各縣人民，則鼓勵勸勉奉公作事，賞罰分明，如團隊之能維持後方治安，鄉民之能任勞搬運軍米，子彈，傷兵以及兵站設施井井有條不亂，實在處處後面皆有極偉大的民衆的力量在活躍着。并且對於已收復的地方其未與共匪偕逃的人民，處置更爲謹慎小心，絲毫沒有江西那樣胡亂殺人民的怪現象，此其三。有此三點，二十一軍一戰而克綏宣，再戰而得巴河南岸全線及有天險可憑之馬渡關，并非一件奇異而難能的事。

綏宣收復之後五日，我曾親自到綏定視察一趟。我的目的，在看着赤區到底糜爛至甚末地步，善後問題是如何的困難情形。這佔據才兩個月的光景，單就綏城附近來講，各鄉場不提，遭共匪殘殺者達一千人以上，宣城據說達

六七百人以上！遇害者，——這最值得注意！——并非地主財主，并非土豪劣紳，因爲財主，土豪劣紳們早有準備，早逃之夭夭了。天知道，問起來遇害者多爲守分的農民，及第四階級中人，有一次幾個農民在西門外的大街上，低聲的講譚官軍的飛機擲下的炸彈一個共匪也沒有傷着，（這自然是一種怨聲咯）可憐他們的生命就因此喪大了！我的幾位親戚的家屬被殺，家裏的人從埋葬着許多人（所謂萬人坑）的土裏去找，去認屍身，那光景多悲傷，多帶悲劇性呀！還有幾位朋友的被殺的父親的屍首，現在尙無着落咧！城中共匪退却的時候，家家戶戶床上的稻草灑着煤油放火，結果被燒的大街，凡五條，煙火達數千餘戶！綏城的繁榮，十年後雖難望恢復元氣，但那些歸去的而又是無家可歸的人民，現在如何棲身！未燒的房屋，裏面甚末也沒有，四壁直立，一切動用器具，書籍古董，衣服財物，盡被掠走，給水洗了一般，甚至爐灶也是給毀壞了的！鄉間的田地，穀子是沒有的，田正在派分，一人五畝！我一位在南京金陵大學讀書的朋友，接到家信由宣漢寄來的說，家中穀子盡被連走，現在連吃稀飯都無辦法的。自然匪區的人民，十家有九家不能舉火！至于城中的學校，如綏定綏屬共立中學校，圖書館的書籍全燒毀了的，物



理儀器室的東西全搬走了的，化學藥品室是精光的，在校門上還貼着一幅對聯「勞工群衆請進來，土豪劣紳滾出去！」我真想不到像我們這樣的中學教員，就是土豪劣紳，該打倒！

最後，還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就是人民不分階級，經此事變以後思想全大轉變了。事前，大家受着川陝邊防軍十年來的壓迫與剝削，實在是達到苛政猛于虎的境地，

## 閒談

(五)

這幾日夜呢拿了 Claude Bernard 的 Introduction a l'étude de la Médecine expérimentale 同一九二七年出版的英譯本對着讀。我覺得 BERNARD 常發說的一句話最能代表他這書中所闡發的見解。他說：「幻想如同大衣一樣；到實驗室的時候，把他脫下；出實驗室的時候，把他穿上。」（見 Michael Fosters Claude Bernard, 1899.）

Bernard(1813—1878) 的先生是 Francois Magendie (1873—1855)。Magendie 是極反對空洞的談論的；他只注

不能爲生了，都希望共匪的光臨，以爲共匪可以解除他們的痛苦似的；然而現在都更失望，更覺得財產無保障，生命更比在軍閥統治之下像兒戲得多。誰也不承認共匪的行爲是一種辦法，因爲殺人放火并不是一種辦法；誰也不承認共匪是一種革命勢力的。他們不過借時髦的名字做幌子，實行土匪的劫掠生涯吧了。

二二三，二，一日清華園

汪敬熙

重由實驗得來的事實。他對於當日空談的風氣反對的如此利害，甚至於他自己從來沒有想把實驗得來的事實連貫起來。他一生做的實驗非常之多，但是他的最重要的發現只有一個。這就是關於脊髓的神經腹根和背根功用不同的發現。

他一生工作如此之勤，而結果不多，就是因爲他只搜求事實，而不去想事實間的相互關係。一生只描寫許多毫不相連屬的事實，就同一生只採集許多標本，一個一個定好了名字，放在架子上一樣，於人類關於生物的智識上，是不會貢獻甚多的。我們不但需要事實，更需要知道事實

間的相互關係！

BERNARD 清清楚楚看到了他先生的這點錯誤。他的實驗不只是搜求事實，而個個都是要求自然回答的問題。他不但心中有這問題，而且對於這問題自己也會細細的想過，得了清楚簡單的結論。他的實驗是盡一個極大的功用，就是求自然對於他這結論與以證明和反証。他以實驗管理思想。

但是在做實驗的時候，就不可為先入之見所影響了。人須要以客觀的態度去看，去記載實驗的結果；不應該且絕對不可以摻入一點一滴的自己的見解了。這是 MAGENDIE 所力行的，BERNARD 也是如此。所以 BERNARD 將幻想比作大衣。到了實驗室工作之時，自己的見解絕對不可存在。但是不動手工作的時候，卻不可不思想的。沒有思想，便只是盲目的去找事實。沒有實驗去管理思想，思想往往成了妄想。

BERNARD 在生理和藥物學上光榮的成績証明了他的方法的正當。並且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的進步，那一個不是他的見解的註腳呢！

☆ ☆ ☆ ☆

我們中國人也知道思想的重要，但是忽略了兩點。我

們往往忽略了思想的結論應該簡單清楚；我們更感覺不到拿實驗管理思想的重要。

只是有了簡單清楚的結論，方能去求實驗的證明和反証。結論當然是須經過一番小心謹慎的思想得來的。不過這結論對不對是沒有關係的。只要是簡明，實驗的結果必可給我們一個判斷。結果與結論所預期的相合，當然是証明了這結論是對的。與預期的不合，是發現了新事實，是引起我們新思想的出發點。

BERNARD 的經驗中就有許多例子，證明錯的結論可以引出重要的發現。例如他以爲交感神經是可以生熱的，所以割斷頸部的交感神經練之後，兔子耳朵的溫度應該低減。但是實驗的結果恰恰與此相反。割斷頸部交感神經練之後，兔子耳朵的溫度增加了。他的結論是錯了，但是因此他發現了交感神經對於血管的影響。

我們受了舊日文人的惡影響，思想是求博大精深。堆積許多無多大關係的學說事實，便是博；說出來的話令人莫名其妙，才是深。例如從前見過幾句文章：「人之有始，我自何來；人之有終，我自何往。倫始，倫終，我來，我往……」作此文的人是自命不凡的，但是這種文章有意義嗎？深在那兒？

還有一層，我們非常的怕有錯。有許多人專喜攻擊他人的錯誤。這也似乎來自舊日文人相輕的惡習。學術界却因此出了許多專說模稜兩可的話的「鄉愿」。

我們應切記：過錯是人人有的；並且清楚的思想，就是錯了，也可引我們尋到真理。胡亂堆砌的傳，莫名其妙的深，模稜兩可的滑，全是學術進步的障礙！

☆ ☆ ☆ ☆ ☆

用實驗來管理思想，是我國從來沒有的。這是我們應該到外國去學的。學實驗法，我們已經說過，須是在外國大學的實驗室中工作過。沒有在實驗室中作過工作的人是不能運用此種方法，而且也不能確實感到以實驗來管理思想的重要。十五六年以前，中國學生在外國大學的實驗室內長期工作過的人實在是甚少。近年來這種人漸多了，成績好的也多了。他們回國後繼續工作的機會也漸漸有了。他們自己工作的榜樣，給學生的訓練，是使學術界知道以實驗管理思想的重要之最有效的方法。

文字的鼓吹只能盡一點力去喚醒主持高等教育的人及一般輿論的注意，及給與青年些指導而已。

在中學讀書的小兄弟常常說，教員說他學校所用的衛生學教科書不好。我拿來翻翻，方知真是不好。

這部書是程瀚章先生著的，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國立編譯館審定的，復興初中教科書衛生學。共有三冊。第一冊二十二年六月初版；第二冊五月初版。第一冊到二十二年八月已印十五版；第二冊十版；第三冊三版。

這本書的文字有許多地方太費解。例如，「神經纖維細胞的突起，他末端有一定的終末，所以神經系統可分做中樞部，傳導部和末梢部三部。」即使不論這一段（是不對的）說的對否，只以文字而論，實難令人明白。

每本書末都附有漢英專名對照表。其中也有錯誤，如稱後腦為 POSTERIOR BRAIN (通用 HIND) BRAIN，破傷風為 Bacillus Tetani (這是被傷風桿狀菌) 等等。專名表指明的是漢英對照，但是裏面，許許多多拉丁文的名詞。拉丁文名詞是英文醫學中常用的，或者可以算作英文了。在這些表裏看到 LEBERSYPHILIS，LEBERABCESS，HYPERCHLOHYDRIE，SKORBUT，HAMOPHILIE，LEUKEMIE，KOLIK，PUERPERALFIBER，等德國名詞，真是有點奇怪。著者難道英文德文都分不清楚嗎？

(六)

書的內容就不是醫生的（如我自己）也可以看出錯誤來。黏液體（PITUITARY BODY）與腦垂體（HYPO-PHYSIS）是一個東西的兩個名字，書中竟然列為人體的兩個機關。脾（SPLEEN）不是一個內分泌腺，如何竟然說牠是內分泌腺，又說牠的分泌作用能促進消化力呢。書中說：「反射徑路：末梢部受刺激，就傳達於脊髓知覺神經，直由運動神經作用於這部。」這真是荒謬！交感神經不是一種獨立的神經系統。不說糖尿病與胰中島腺的關係。先述說 LEEUWENHOCK 再講 HARVEY 也於歷史先後不對。這都是極明顯的大錯。小錯更多。

希望國立編譯館毅然收回審定的成命，再請幾位醫師

## 編輯後記

編者

審查一過。也希望商務印書館能犧牲一些紅利暫不再賣此書，等改正或重著之後，再出版發行。因為這是遺誤青年的事。

越是給初學的人讀的書，越是難做。東扯一點，西拉一點，胡亂堆在一塊兒，絕對不能做成一部可讀的書。（這本書人體概論和生理學大意，在講神經系及內分泌腺的幾段頗不銜接，並且第二三冊中英德名詞雜拌在一塊，令人覺到是這書是堆成的。）以誤謬百出的書給中小學學生讀，弊害之大，是我們可以想像到的。我們的教育家是不除談論學制和課程標準外，也須注意一點中小學的課本呢？

△這一期的前三篇論文，差不多是互相呼應的。請讀者參照着看。

△何會源先生在清華大學做過研究生，在北平教過書，現在在上海。他提出的問題是值得我們嚴重考慮的。

△孟森先生（心史）是北京大學史學系的名譽教授，

現在專做整理檔案和明清實錄的研究工作。

△賈問津先生把他親身經歷的四川共亂的經驗和觀察，用很明快的文字寄出來送給我們發表，我們很感謝他的好意。

△汪敬熙先生的科學閒談的（一）至（四）段，登載在獨立的前兩期。

△我們休刊了兩個星期，這一期直接二月四日出版的第八十八期。

# ◎獨立評論合訂本出售

本刊第一至二五期和第二六至五十期及第五一期至七十五期，現在補印齊全，分別裝訂成冊，極適於圖書館及私人收藏之用。每冊價目：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陶孟和湯象龍主編

## 中國經濟史研究集刊

本期定價大洋捌角

### 第二卷第一期

要	咸豐朝的貨幣	湯象龍
目	清代雲南的鹽務	劉隽
	咸豐以後兩淮之票法	劉隽

洋期大本，直接訂閱，每卷八角。歡迎每卷定價。出版所：內門三號，天津街。調查所：北平。

##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圃」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 定價報目

本市	每月一元
朝鮮	每月一元
其租地	每月一元
香港	每月一元
澳門	每月一元
南洋	每月一元
歐美	每月一元

## 第五卷

## 山東民衆

## 教育月刊

## 第一期

### 要目

什麼是求生教育	何思源
民國二十三年民衆教育之展望	許公鑑
民衆教育的困難與問題	梁容若
民衆教育的哲學基礎	陳禮江
實施農民生計教育的新動向	林敬之
日本新興的全村學校	崔叔青

臨邑縣兩個民教實施計劃  
黃縣聖泉小學實施社教概況  
小學兼辦社教的研討

定價：每册一角五分，每年十册一元五角，郵費在內。  
發行：濟南山東省立民衆教育館發行處。

# 商務印書館影印發行

##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發揚東方文化 流通國學秘笈  
國學上兩鉅製 同時發售預約

### 預約辦法

**冊數** 初集共計二百三十一種，約十一萬一千葉，分裝約二千冊。

**版式** 六開版本，用江南縐製毛邊紙，金屬版影印，書根上加印書名冊次。

**預約期** 自二十三年一月十五日起，至同年四月底止。遠地（地域詳載預約簡章內）展至六月底止。

**預約價**

- (1) 自一月十五日起至二月底（遠地四月底）期內 大洋五百六十元
- (2) 自三月一日起至三月底（遠地五月底）期內 大洋五百八十元
- (3) 自四月一日起至四月底（遠地六月底）期內 大洋六百元

全集分四次出齊如下：（第一次）二十三年七月底（第二次）二十三年十一月底（第三次）二十四年三月底（第四次）二十四年七月底。

**出書期** 各行省及日本大洋三十元（蒙古新疆西藏及國外詳載預約簡章內）

**郵費及包裝費** 附載書目及預約簡章，索閱請附郵票一角。

## 四部叢刊續編

### 發售辦法

**冊數及出書期** 第一期書五百冊，自二十三年一月至十二月，每星期日出版一次，每次約出十冊，每冊平均以六十葉為度。

**版式** 依初編式，仍用六開版本，本國手工製連史紙，金屬版影印，書根上加印書名冊次。

**合售預約** 第一期書五百冊，合售預約價大洋一百五十元，預約期限於二十三年三月底截止。遠地（地域詳載發行簡章內）展至五月底止，每星期日出版之書，隨時可取。

**零售** 本書除合售預約外，其每星期日出版之書，隨時在上海各大日報本館初版新書廣告內刊佈，單行發售，每冊定價平均大洋五角，五百冊合計約大洋二百五十元，一次購滿大洋十元者，照定價九折。

**郵費及包裝費** 訂購第一期書預約者，寄往各行省及日本，另收郵費及包裝費大洋十四元（蒙古新疆西藏及國外詳載發行簡章內）

**書目** 附載發行簡章，索閱請附郵票五分。



## 國際流言中的一個夢想

胡適

答平津太晤士報二月廿四的社論

前幾天外國通訊社傳出了幾個謠言，忽而說德國要承認「滿洲國」了；忽而說美國政府要放棄菲律賓的海陸軍根據地了；忽而說羅斯福總統願意重行考慮「司汀生主義」（不承認用武力造成的領土變更）了。幾天之後，柏林也否認了，華盛頓也否認了，——原來都是有作用的人製造的空氣。

可是在流言盛行的那幾天，我們平時尊重的一家同業——平津太晤士報（The 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却借這個機會做了一場快意的夢，寫在二月廿四日的社論裏，題爲「新的一手」（A New Deal）。這篇文章是被上文說的那兩種華盛頓謠言引起的，其中有這樣一段：

我們現在困在各色各樣的許多文件（documents）的喧鬧聲裏，而明顯的事實告訴我們：我們若要跳出來站在青天白日裏，站在遠處望個分曉，我們總免不了要踏踐着幾種文件。在這個時代，世界是在

整個花樣翻新的時候，各國內政上許多先例遺風都踢翻了的時候，踏踐着幾件公牘也算不得什麼大不了的事。我們還是永遠在無能之下做俘虜，眼看着事變，讓他們管着我們，也許讓他們領我們走進像上回世界大戰一樣的浩劫裏去呢？還是鼓起勇氣來打上前去，決心要做命運的主人翁，而不做命運的奴隸呢？

我們試看我們的同業提議的「新的一手」是什麼。他說：必須有一個清楚的目標，而那個目標必須是頂遠大的。最後的目標是一個「統一的大國家」，略如當年中國文化獨霸時代的大一統；開始時先成一個遠東的國際聯盟，將來重行建築在一個經濟統一的基礎之上。

這是他的目標。要達到這個目標，他提議幾個步驟：

「滿洲國」是爭執的中心，我們必須從「滿洲國」做起。第一步，「滿洲國」應向中國提議一個聯盟，約如今日日本和「滿洲國」的聯盟。第二步，滿洲



境內的日本陸軍的職務須改變，凡南滿鐵路線外的治安皆改由「滿洲國」軍隊維持。以後關東軍實行減縮，逐漸撤到租借地內，以至完全撤退。……日的在於把一個假獨立做成真獨立。……

假定這最有密切關係的三方面協定是可能的，就可以進行稅商中東鐵路的出賣，關東軍退回原防，蘇俄也可以把一年內調到遠東的軍隊撤退一部分。……

……蘇俄近日在遠東建立了一個新經濟組織；若再進一步，自治權稍加大，可成一個變相的舊日遠東共和國。……這個自治邦也可以在遠東國聯裏有代表參加。……

如此做去，平津太晤士報的記者夢想一個遠東國際聯盟，包括日本，中國，朝鮮，蒙古，「滿洲國」，西藏，東西伯利亞，菲律賓，香港，安南。（他以爲中國應採聯邦制，西藏與蒙古都成爲中國的自治邦，也許新疆也成一個自治邦，略如不列顛帝國，以聯邦會議爲最高統治機關。）從這個遠東國聯，他還希望發展到一個「統一的大國家」。

以上略述我們這位天津同業的夢想。如今他所根據的

兩條美國謠言既然打破了，這個夢想本來也可以不必討論

了。可是我們知道，做這種如意夢的，不止平津太晤士報的記者一個人。有許多日本人現在到處做宣傳，印送匿名說帖。做的也是和這個大同小異的如意夢。所以我們不能不借這個機會指出這種夢想的幾個根本錯誤。

第一，「滿洲國」誠然是爭執的中心，然而即使華盛頓和倫敦巴黎柏林羅馬的政府都承認了「滿洲國」，中國的政府和人民也決不會承認牠的，更不用說中滿的同盟了。太晤士報的記者希望「滿洲國」做中日兩國之間的「連鎖」(a binding link)，而不能了解「滿洲國」的存在恰是割斷了中日兩國之間的一切連鎖，使這兩國成爲不解的仇讐！這是他的根本錯誤。現在偽國公然稱帝了，長春的傀儡戲唱的越熱鬧，長城這邊的怨毒種的越深沉。南京政府越緘默無聲，中國人民越感覺這深刻的怨毒。此中無有理智可說，因爲這完全是一團盲目的情感。如今高揚理智的口號來勸我們顧慮利害的人們，在二十年前，也曾昏迷了心竅，用機關槍坦克車拚命相屠殺。當時何嘗沒有人指出（如今日太晤士報向我們指出）「和平是值得努力的，值得慷慨的努力的，值得決心的努力的」？然而理智終於敵不住感情與怨毒，所以整個的文明的歐洲大踏步的走進「世界大戰的浩劫」裏去！我們決不鼓勵怨毒，也不拋棄理智；

我們只要指出怨毒是可怕的，而日本今日只是火上加油，在怨毒上堆起侮辱。中國的朋友們既沒有方法與力量解除這種怨毒，就不該妄想我們非基督的民族能够爬在重重怨毒與侮辱之下，認仇暫做同盟。

第二，即使我們退一步想，想尋求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除將來無窮慘禍的方法，我們也實在想不出一條路來，除非日本忽然真有一種決心悔禍的具體表示。這就是說：平津大晤士報的記者把步驟恰恰想顛倒了。如果他把他的第一步和第二步倒轉來看看，他就可以明白那就差不多接近了李頓報告書的解決方案的精神了。如果日本軍隊撤退了，如果「假獨立做成真獨立」了，那三千萬的中國人民自然會做到李頓報告書所建議的「在無背於中國主權及行政完整的範圍內」的自治權，——那麼，東北四省當然成了中華聯邦國的一個自治邦，這就是太晤士報社論所謂「保存李頓報告書裏的公道原則」的解決方案，也就是中國政府所曾在日內瓦聲明接受的方案了。如果這個第二步不能先做到，先就要中國不但承認「滿洲國」，還要和牠聯盟，這豈不是西洋俗話說的「在傷害之上加侮辱」嗎？

第三，我們也承認今日遠東局勢包孕着絕大的危險；我們也明白，如果遠東有大戰禍爆發，受害最先又最烈的

一定是中國。可是我們要問問我們的天津同業先生：這一場「像上回世界大戰一樣的浩劫」是中國能阻止的嗎？即使絕不可能的忽然變成可能的了，即使中國政府真能「為世界和平而慷慨的犧牲」，毅然承認了「滿洲國」，——難道國際的形勢就可以立時改變了嗎？難道世界的第二次大戰就可以安然避免了嗎？我們可以斷然回答：「不，不，不。」日本所以成爲孤立，世界所以猜疑日本，防備日本，這都是因爲日本這兩年多以來的行爲足以破壞人類在三十年來辛苦造成的一點點國際和平的希望，足以使人類回到十九世紀末葉的弱肉強食的野獸世界。美國與國聯的五十個同盟國所以違反一切國際法的先例，毅然決然的提出「決不承認一切用暴力造成的局面」的空前新原則，這豈是僅僅哀憐中國？這豈是僅僅「兔死狐悲」的一點同情之感？這豈不是因爲人類的文明已進到了一個較高的水準，百餘年的理想主義者的呼籲已因物質經濟的進步而到了實際收功之日；所以需要一個新的國際關係的原則來維持一個新的世界？今日世界各強國的積極備戰，豈是爲了要維持南京政府之不承認滿洲偽國嗎？豈不是因爲日內瓦的「紙老虎」一旦被日本的帶甲拳頭打破了，從此條約都成了廢紙，軍縮會議也成了笑柄，所以世界的文明國家無論大小強

弱都自然想到「道德的制裁」之不足恃，都想在那「全世界道德的貶議」的背後建築起一種有實力的制裁來？中國今日如果完全屈服了，如果立刻承認了長春的傀儡，那也只好增添那個日本帶甲拳頭的一點氣燄，使牠更無忌憚，使全世界人更感覺畏懼，使世界戰禍更不能避免而已！總之，今日世界的戰禍與和平，鎖鑰全在日本。日本若無根本悔禍之心，世界遲早終不能避免一場空前浩劫。中國的明白人決不妄想世界任何國家爲中國作戰，但也看不出

## 論專制與獨裁

歐洲各國於大戰之後，社會紊亂，經濟崩潰，殘局幾至不堪收拾；結果悔禍厭亂的人心，使會合堅強不撓的領袖，順時應天的產生了所謂獨裁政治，企圖以一時的高壓，求得百年的底定。俄羅斯與意大利行之於先，西班牙希臘奧斯利亞等國效之於後；前仆後繼，趨之若鶩；最近德國之西特勒更從而推波助瀾，大有使此二十世紀之法西斯帝式的寡頭政體席捲天下的氣概。最後，我們這政治腐化而思想沉悶的中國，也都受了這世界潮流的波及，亦思有以效顰；年來大聲疾呼以獨裁政治爲提倡者，朝野上下實

中國有何法子可以解救或阻止那一個浩劫。

最後，我們要正告我們平日尊重的天津同業朋友：一切維持國際安寧的「文件」都在這兩年內，踐踏撕碎完了。現在所賸的只有前年一月七日華盛頓提出的和前年三月十一日日內瓦五十個國家一致表決通過的那一個「文件」了。文明的人類應該愛惜那一個短短的文件，使他成爲這個新世界的有力護符，不可再想踐踏牠了！

一九三四，二，二十七夜

胡道維

煩有徒；近且變本加厲直以專制爲號召者，聲言內外亦頗不乏人。國人不察，不免作吠影吠聲的盲從；一念之差有如星火，燎原之禍不可嚮邇；楊殿的勸進，張康的復辟，都是思想簡單的文人與行爲鹵莽的軍閥鬧出來的把戲。因此，現在乘此兩派人尙未合作成功以先，我們只有不憚詞費的把這個茲事體大的問題，平心靜氣的提出來與國人一相商榷。

首先，什麼叫獨裁？什麼又叫專制？我們應先觀察牠們兩下比較的性質，然後進而討論牠們是否適合於時下的中國。我以爲獨裁與專制絕對不可混爲一談，因爲至少牠

們也有下列三種差別：

第一，獨裁是法治，專制是人治；獨裁是有法的專制，專制是無法的獨裁；換句話說，獨裁與專制之下，權威觀念固然是同樣的過於膨脹；獨裁者與專制者固然是一樣的大權獨攬；但是專制者乃是一味秉承「朕即國家」的精神而絲毫受法律限制的施行其個人意志的；而獨裁者却完全以法律為根據，其龐大的威權與職位是出於法律的容許，最後還是要遵循法律的常軌與限制的。所以我們可以說世界歷史上有立法的獨裁者，而無違法的專制帝王；因為前者有法故不應違法，而後者無法故無可立法；有不應違法之法——姑無論其法律性質如何特殊——定不失其為一種政治制度，無可違之法那便直是政治制度的缺乏了。遠如上古羅馬的各種獨裁都是引憲法以為基礎的，此節姑且不必備論（請參看 Mc Iver: *The modern State*, P. 347）。近代歷史上第一位偉大獨裁者，當推英國十七世紀的克郎威爾（Cromwell）；而克氏第一次專政在英國實行「共和」（Commonwealth）時代（自一六四九至一六六〇年）之初期，第二次專政在施行所謂「保護制度」（Protectorate）時代（自一六五三至一六五九年）；第一次係以一六四七年成立之所謂「人民協定」（Agreement of People）為根據，第二次又是以一六五三年制定之「政府組織法

」（Instrument of the Government）為基礎；而這兩種法典都是國家根本大法，大權在握的獨裁者對於這種國憲的限制也是只有奉命惟謹而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在最近歷史上轟動舉世觀聽的獨裁制，莫如歐戰後蘇俄所創立的一種無產階級的專政制度；其全國行政大權乃操於一個內閣——他們所謂「人民委員聯合會議」的手中，這個內閣乃為「聯合中央執行委員會」——這是一種最高立法機關的性質——所產生，這個立法機關又係由每年舉行一次的「蘇維埃聯合會議」所選出，而這個蘇維埃大會又是由各省各市各鄉村的蘇維埃——即丁會的意思——所選舉的代表而共同組織的；這種複雜綜錯而條理井然的制度，完全建造在一九一八年全俄蘇維埃大會所制定的憲法的基礎上。就是近年來勢力瀰漫全球的意大利怪傑墨索里尼指揮下的法西斯帝獨裁制，也絕對不是目無法紀的單純專制的機構。世人只驚羨墨氏身兼六職，操縱中樞，而不詳察墨氏的勢力乃基於法西斯帝黨的勢力，法西斯帝黨的勢力乃基於國會中絕對大多數的議席；按一九二三年意國會所通過的選舉法案，任何政黨在大選時如能于各種政黨中獲得比較多數的選票——只需要比較多數，并不需要大多數，更不需要絕大多數——便可以獲取國會中三分之二的議席。法西斯帝黨於一九

二四年大選中，獲得總投票的百分之四十，便取有議席三

罷了。

十六位；從此法西斯蒂勢力鞏固植於國會，廣遍播於社會，橫衝直撞，爲所欲爲；然而凡百運籌舉措，一遵法律常軌，實與絕對不受法定限制的專制大異其趣。日更有宜加注意者，一八四八年公佈之憲法，迄今尚巍然健存，一個政黨非僅存選舉時應循一九二三年法案所規定的軌道；即於當選得權後，亦須時虞隕越。處於這種制度之下，獨裁的墨索尼里如果倒行逆施，亦可失去法西斯蒂黨的信仰；專政的法西斯蒂黨如果倒行逆施，亦可失去社會的信仰；結果一九二三年選舉法所規定的特殊恩賜，或一日爲他黨所攫取，亦未可知；此種事實尋常情形下固然是很難發生，但亦有發生的可能，那是毫無疑問的。今日法西斯蒂黨以及法黨領袖墨氏在意大利的勢力地位，煊赫固然是煊赫，穩固固然是異常的穩固；但是比較英國美國或任何其他法治國家的當權的政黨與領袖，也不過是一種程度的差別——而不是種類的差別。綜此以論，專制的獨裁制度——無論其爲個人的，如克郎威爾的獨裁；或爲階級的，如蘇俄的無產階級獨裁；或爲政黨的，如意大利的法西斯蒂黨獨裁——莫不與法律共始終；根本性質與普通法治初無異致，至多也不過是一時非常局勢下所權宜施行的一種非常法治

第二，獨裁是達到目的的一種工具，專制則本身便是目的。從橫看，獨裁不在求獨裁者的利益，而在謀全國家的幸福；而專制除專制者本身以外，無須別圖增進其他任何人的福利。從直看，獨裁是暫時的，是適應一種最急事變的權宜之計。而專制是永久的，是安置於平常時期間的子孫萬世之業。獨裁是過程，是階段，因爲牠還要引到非獨裁。而專制是終局，是目標，因爲牠不要進到非專制。譬如意大利的墨索尼里便常以「大局收平，還政於民」爲言。此種論調聞之於墨氏執政之初年與一九二三年選舉法所掀起國會內外的評論，尤屬不一而足。如果蘇俄的當軸真是馬克斯的忠實信徒，自當以階級獨裁而進求各階級的平等，決不應以目前時局爲其使命的完成。就是我們中國的國民黨也何嘗不以「訓政」爲手段，而以「憲政」爲依歸呢？加拿大的學者馬基夫爾 Mc Liver 說：『另一非常體制，便是狄克推托制；而所謂狄克推托制，便是一種暫時權宜引用以迎合一種危急情勢的君主制。羅馬的狄克推托制，在學理上便是如此的。并且在近古時代，某某統治者——有如克郎威爾輩——亦嘗假「拯救」國家之名而實行統治』。足見獨裁制乃是亂世之「拯救」國家的一種手段，

而不是平日解決國事的長治久安之策。

第三，獨裁者只獨攬政治權，專制者則并獨攬財產權；獨裁者只獨攬主權，專制者則并獨攬經濟權。獨裁者只以人民領土爲其統治權的對象，專制者則直視人民領土爲其所有權的對象。故獨裁者的威權雖屬龐大，然只在一方面龐大；而專制者則盡兩方面所有威權而佔有之。獨裁制猶近於近代民主制，而專制制則直屬於中古封建制。國家的人民與領土，歸政府統治，而不歸政府所有；在美國如斯，在英國如斯，即在目前的意大利俄國德國亦莫不如斯。但是，昔日歐洲的君主神權論者，却以人民爲帝王的子女。舊年中國的傳統觀念，亦以帝王爲人民的父母；此皆爲專制主義者的現身說法。又如孟子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與所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宗廟饗之，子孫保之」一類言論，實爲異曲同工；且直認人民領土爲專制帝王之自由保有不動產權了。所以獨裁的流弊，只是政府過於強大，只是壓迫。專制的流弊，則可以生殺予奪而無所底止。

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便爲獨裁與專制是否適合於中國的問題。首先，獨裁制能實行於日下的中國嗎？獨裁制是以法治的體制與精神爲先決條件的；中國一向實行的是

人治。即至今日，這種法治的基本要素尙付闕如。一旦將龐大的威權搬移在某一個人的手中；則專權者國家既無法律足以限制其威權并監督其威權的行使。專權者又不甘自以法律限制其威權并監督其威權的行使。最壞的是社會上又沒有充分的法治習尙與精神足以濟政治體制之窮而限制專權者的威權并監督其威權的行使。結果，必不會造成一種暫時的，以全國幸福爲前提的，專門徜徉於單純的政治權的範圍以內而不逾越雷池一步的獨裁者；而一定反會造成一種永久的，專以謀私人利益爲目的的，視國家爲己有而僅於人民領土之上實行其財產權的專制者。在法治制度與精神尙未充分發達而立定深固基礎的今日中國或任何國家，欲實行獨裁制那是決然無疑的一件不可能的事。因爲在我們這種環境之中，獨裁甫經成立甚或未經成立就要變爲專制了。民國以來，從袁世凱以下，都是些專制的帝王，而不是專政的獨裁者。

那末，我們實行獨裁既不能，實行專制又可以嗎？而中國現在主張實行專制的人們（在中國主張獨裁的人，也就是主張專制的人；因爲中國的獨裁，是無法的獨裁；無法的獨裁，依上述原則，就是專制。），大概可別爲二派：一派人是主張而無理由的，他們惟一的出動點，就只有

他們一副傳統的專制腦袋；他們都可以說是些「生而專制」者，實在不值得我們一談。第二派人是因爲日擊「內戰綿延，歲無寧日，軍閥割據，國勢瓦解」，故從而提倡以「武力完成統一」，以「大專制消滅小專制」；他們的存心固屬可憫，然而他們的理由却又太欠講究了。「武力」「專制」既是無「軌道」「無「法紀」的，所以也就是無「保証」的——不但不能保証其必能禍國利民，亦且不能保証其必能統一（註：在此處我將武力與專制併爲一談，因爲專制是建造在武力之上的；牠們是一而二，二而一。至於專制不是建造在法律之上的事實，我在前部便已有所闡明了。

○最大的武力與最大的專制，最大的結果也只能勉強湊合一種統一的局面，而不能真實締造一種統一的邦國。中國歷史的演進，大都由于擾亂而躋於專制，由專制而復歸於擾亂——往往復歸於更大的擾亂。這種循環現象，雖不能證明專制必不能統一，至少也能證明專制不必能統一；雖不能證明專制必不能統一，至少也能證明專制必不能統一于久遠。民國三四年的袁世凱算是統一了，後來如何？民國十七八年的國民黨算是統一了，而今如何？遠的如司馬氏父子三代平蜀平吳算是統一了，且算是專制了；幾不旋踵而八王構兵五胡亂華，弄的中國分裂到三百年之久了

。隋楊氏篡周平陳算是統一了，且算是專制了；曾幾何時而群雄蜂起又陷天下于瓦解崩潰了。更遠的如秦始皇帝政并天下一統郡縣，伐匈奴收南越，算是統一了，且算是專制了；然而萬世天下僅至子嬰被殺而又發生楚漢戰爭了。專制統一的成績，窺諸史實，不過爾爾。

復次，武力是不合于中國民族的習尚，專制也是不合于中國歷史的背景的。就大致的情形而論，中國在辛亥以前只有過暴虐，很少有過專制；專制有如上述與蜀裁都一樣的是威權的龐大，不過獨裁還須走法律的軌道而專制便絲毫不受法律的限制罷了；但是暴虐却不是威權的龐大，而是威權——無論怎樣小——的濫用。舊式的中國政府，職權實薄弱到可憐的地步，通常行使的只有征收直接稅權與執行刑法權二種；并且連此些小的職權，不但不曾集中在一人，亦且不曾集中在中央，而是分別散置於各省及各地地方官吏的手中的；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的政治與社會體制，說不上是專制，只可以說是民治，過分一點直可以說是無政府主義制。張學良氏歐遊返國，述其感想，謂西方人擁護領袖的熱誠，遠非吾國人所可冀及。但是我們的人民爲什麼不知真誠的擁護我們現在的領袖呢？那就是因爲這般有長久經驗的無政府主義者，只知「日出而作，日入而

息」，抱着「帝力與我何有」「政府與我無關」的理想，不慣於受辛亥以後陡然從歐美搬來的強權政制的擺弄的原故。近二十餘年來政治的糾紛與擾攘，以其說是專制的背景上不能實行民治的明証，勿寧說是在民治的基礎上強制實行專制的流弊。在這種「一盤散沙」的局勢下，欲產生一種強力政府，尚且與民族精神扞格不入；若欲成立一種專制體制——無論其專制爲如何形式——那便更與人民心理水火不能相容了（注意：強力政府與專制絕不相同）。我們當前的任務，不在採行專制政府，或施用強制武力，以達到苟且統一勉強儉安的目的；而在戮力培植民族本身的黏貼性，用以促進國家內部的團結力，然後企圖逐漸增厚政府的力量與威權，以適應物質建設潮流中的需要；另一方面，仍須厲行民主制，以避免強力政府與民族精神必然的衝突。換句話說，今日的中國實處在一種進退維谷的困難環境中：不增加政府的權力不足以完成近代國家的使命，但若增加的太驟太重又足以掀起人民心理的反響而遭遇失敗。要於離心的潮流下求得向心的總結合，兩全其美的辦法只有採行民主制；因爲近代的民主制固然是別人的，而原有的民主精神的確是我們的；這是假借別人的制度，無悖於我們精神的滿足我們現在需要的辦法。然而這種偉大的

工作——一面培植團結力與黏貼性，一面厲行民治的工作——却有一個偉大的先決條件：就是普及良美的教育，藉以達到杜威所謂「改造東方人的心靈」的目的。這種心理建設是非數十年不爲功的，然而我們切不可見其功效緩滯而加以忽視。我們往近代的人類歷史上一望，在在都是我們的教訓與模範：德國的真實統一，不曾完成於卑斯麥的鐵與血，而完成於德國的教育與海格爾一派的哲學；意大利真實統一，不曾完成於加富爾的擺與佈，而完成於意國的教育與馬志尼一派的哲學；其實德意的統一又何嘗過於緩滯呢？我們要從戊戌政變以後即繼而從這一面戮力邁進，到今日也許已然大功告成了。我望我們社會上負有教育責任與領導民族思想的人們，對於這一點要多加注意。

最後，我們在今日還有一層很深重的顧慮：我們環顧四境，到處是軍閥當權，武人跋扈。在這種情形之下，而仍欲提倡專制，那便等于助紂爲虐。結果定不只是專制而是武人專制；專制在今日中國定必產生武人專制，亦猶獨裁在今日中國定必變爲專制。而在一切專制之中，武人專制斷然無疑的要算是最惡劣的專制了；因爲專制的武人不但不能受法律的限制，且不能受專制者個人理性的限制，更不能受公衆輿論的限制，亦不能受歷史批判的限制



：一日無惡不作，則人民真只有如詹姆斯一世所說的「向上帝禱告」了；這是多麼可怕的事？我們豈可以驅猛獸以食人呢？

所以，我們反對獨裁，是因為中國不能實行獨裁！我

## 做好做歹連拖帶打

我們鄉里有一家姓鄧的，開羊肉粉館，有六個金剛似的兒子，老大，老三，老二，老五，老七，老十，都是惹禍的魔王，動不動就與人打架，但他們從沒有全體出動過，總是老二與人打，老三來拖，老大與人打，老五老七帮忙，老二又來勸解，拖架的總在關節上抽大意給敵人幾個够受的「冷拳」；有時候老頭子還要出面來與人陪罪，大罵自己的兒子不好，總把後路留得寬寬的。他們在這樣的政策下，自來沒有吃過虧，而以拳把子名于鄉了。

我們試看看現在的國際情形怎樣，各國的對外政策怎樣，各外交人員的活動怎樣，再檢察我們自家的政策，尤其是外交家們又如何。

現常有個可笑的笑聲是，某某是親日的，某某是親法的，某某是親英的。而無奈尤可笑的是所謂親某國的某某

們反對專制，是因為中國不可實行專制！從而我們反對武力統一，是因為武力不能真正的統一，也是因為武力必產生獨裁，獨裁必轉變專制！

二十三，一，二十二，北平

壽生

那關顧某國的心又常勝于本國似的；各以供奉與外人的權利又多是所謂親某國的某某給他的親善國的。這又何怪人驚異，悲憤呢。

我們可以在歷史上找兩個人物來與現在的情形對看，這兩個人物，就是寫定秦以後中國歷史的項伯與張子房。項伯因親善不惜把自己的國家賣掉。子房因親善而利用之，以打倒敵人，固定了漢家的基業。同是親善，一是賣國而事仇。同是親善，一則破敵而封友。此二人價值之如何，無待言了吧。

慚愧得很，我們的外交家，實不能不說多是項伯的門生，張子房的手法却被外人行使了。也許這話說過火了點？但願是說過吧！然而，至少謝介石輩，我們無法否認是中國人。我們有時真這樣想，一旦法國由安南出動，把

西南三省搶了，不知又有許多親法分子要交好運，還忸忸的吐出，「我們是爲人民呢。」

從前日本田中組閣時，我們一般老百姓都恨定了他，似乎日本之侵略中國就是他一人的鬼，所以他的死信一出，我們皆欣欣然舉手而相告曰：「天下太平了。」九一八以來，又集恨于荒木了。加以日本外部間又傳出點與軍部不合的空氣來，更覺荒木之可惡了。榆關交涉，塘沽協定，外交上「辦好」了，日軍還要放幾槍過癮，于是日本外交家真成了我們的恩人。可是事情真如我們覺得的嗎？不

的，這是我們爲「本地風光」迷惑了。任何一像樣的國家，他對外一定有整個的政策，在骨子裏斷無所謂軍部要怎樣，外部要怎樣的，總如一條長蛇，首尾相顧，彼呼我應，做好做歹，各盡其對付敵人之最妙手段罷了。所以不管什麼荒木不荒木，他在職時哈一口氣，我們也要認定他是代表他整個政府的力量。他們外交家，不管怎樣甜言蜜語，我們也不要忘記由政府造成的炮火連天。寫至此，我想到了「虹霓關」的情節。那爲夫報仇的美人兒，那股媚勁，若用的是外交手腕，不是貪王伯當的風流，那她的敵人不用說是大上其當了。誰能不懷疑王伯當不是被她的雙槍所敗，乃是爲她的秋波所迷呢？這是懂得外交，明白

國際情形的人就知道的：外交家儘管耍軟，軍人儘管玩硬，但他們總是通氣的，步伍一致的，何進何止早有全盤計劃。所以，在日本人是只有中國通，無所謂中國親善者。要說親善也可以，那就是我們鄉里的一句俗話「你我好朋友，你的當我的，我的當你沒得的」勾當。這一層我們若不認識，我們的外交家若不悔悟，我們的外交將無翻身之日。

現在有兩種相反的態度；一是關着房門在屋子裏打勦斗，世界的情勢是不管的，大有「仲尼之徒恥道桓文之事」的樣子。一是自己本身什麼也不明白，也不要明白，只搬些洋貨來玩把戲。都弄得不逗關節。只怪荒木不好，也就是關着門猜度世界的態度的一點小表現。但亦還是用精細的觀察得來的，你看：上海打得那麼兇，日本甚至調在東北的軍隊去打，可是長城一帶的國軍就逍遙了。政府不要打，將軍硬要打。政府要「文幹」，宋部長要「武幹」。前部長說「借款一定用于建設」，現部長就不「一定」了。這些就算事大人多難一致吧！那末，在日內瓦幾個外交家，似乎應當在赴會前商量一下，今天怎樣應對，怎樣你拖我打的玩意吧？似乎外交家應考慮又考慮，在可能中以國家的利益爲目的，不應以自己出風頭爲事吧？在這樣

時真時假的你往東來我往西，你要吃鴨我吃雞的政府員司的表演下，又怎不叫人懷幣原而恨荒木呢。

從前王正廷先生有所謂直線的外交。現在黃郛先生又自說「我們是被動的。」這樣的外交政策，真叫人益想益心焦。直線外交，也許可行吧，但那豈是在許多鐵蹄下婉轉呻吟灣曲以求存在的弱國能行的？既言被動，還有什麼可說呢？割地，賠款也要有割法呀，也要有預備呀。其實什麼直線，被動，一而二，二而一的把戲而已。就是：「無辦法的，懶惰的外交。」蘇俄那種向外活動的精神是何等令人佩服！他從前不是被人認為不可親近，被人封鎖的嗎？但現在若何？這是值得我們的外交家想一想的。

我們再看看歐洲的外交史。當愛德華七世未訪問巴黎時，歐洲的國際情形怎樣？英王以妙腕將英法的仇恨一變而為親善，進而聯俄，意，盟日本，把德國弄得孤伶伶的；致世界大戰一發動而德國倒台，英得緊握了世界霸權。中國現在固不能與那時的英國比，但是利用國際情勢，取捨自己的友仇，看清必需走的路子，在一定的目標下大活動，這是任何政府，任何外交家宜注意力行的。一隻船不問好壞，在大海裏若無舵師照一定方向指揮前進，由風

飄蕩，那危險是不用說的。日法商戰緊迫了；英法商戰緊迫了；日美商戰緊迫了；日俄情勢惡化了；……；左勾右撻，你拉我扯，現在的國際形勢之交結，真是大大可觀。我們的政府，外交家，將如何適應利用呢？這問題是很宜考慮，很急迫的，懶惰不行呀。什麼「直線」「被動」的想頭，還不放下，還不將軍事外交結成一氣，真不知要演成什麼一個慘景呢！當美國脫離英國時，軍事上的勝利固不用說，但美人利用那時的英法情勢，實給英政府一很大的打擊。總之，謀國是不是一件容易事，無識而又懶惰是不行的。

總上吾人所希望于政府者是：要有個通盤的計劃。放去安于被動的謬見。努力打開一個新局面。少說硬話，多做點硬事。外交家師張良，而不要師項伯。若能與鄧老板認識則更善了。我們要記着，不特日本，任何國對我們的一切，我們不要以為是個人或少數人的行動，而要認他為他整個政府的行動。我們靠自己振作幹我們的，不要只歡喜「某某東北禍首死了。」我們若還是這樣不成話的混下去，那只有日本人死完，歐美人全變成豬獠，我們才得救。日本人會死完嗎？還是自己學好吧！

其實我是說錯了，真的我們不知道如何做好歹連拖帶打

嗎？不過是只用來對付老百姓和私敵罷了。如某部長之退休的把戲，有識者誰不明白。梁惠王曰「寡人好色。」我們也效孟子希求曰「王請無好小色。」「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吧。

## 閒談

汪敬熙

(七)

在今年二月一日出版的第一卷第十三期科學畫報上，有唐學黃先生的一篇文章，「促進科學的人」。唐先生說，「科學界中還可以分出兩種不同的人：一種可以叫做有成績的人，一種可以叫做雖沒有成績而有貢獻的人。……：……有不少所謂毫無成績的教授，因其知識豐富，想像活潑，批評力尖銳，一般所認為技術精新的學者却是受他的陶鑄而成就的。假如沒有這些科學界的無名英雄，那末，科學就很難進步……：……」這話，我以為應當補充一點。

科學界中，可以分出兩大類的人來：一種是做科學工作的人；一種是自己不做科學工作而在提倡科學研究上邊

若問我們說：「你印道現在四分五裂，難得全盤計劃，步伍統一嗎？」那我們在此文裏只能回答「是嗎」？

二十三年，二月十三日十四日。

力的人。

對於科學有興趣，深知科學的重要，自己不做研究工作，但却在物質上，或在文字鼓吹上，提倡科學的，都是這第二類的人。這一種人在科學的進步確有貢獻的。

例如，現在英國的 NATURE 週刊的主筆 SIR RICHARD GREGORY，就是在文字上鼓吹上盡力的。他的週刊在促進科學研究確是有力；因此之故，被選為英國皇家學會的會員。又如英國的 J. W. N. SULLIVAN 自己雖不做科學工作，但是用流利的文章，做了許多好的普遍及批評科學的文章。這知的人，如果從未做過科學工作，就不能稱為科學家。美國的 ROCKFELLER，英國的 YA，KROW，BEIT 等人，都是曾以巨大的款子供給科學研究的，固然是無人稱他們為科學家。就是 SULLIVAN

也沒有英國人稱他爲物理學家。GREGORY 之選入英國皇家學會是因爲他爲科學盡力。這種人在科學的進步上確實有貢獻，是大家公認的；但是科學的進步大部份在於做研究工作的人之努力。

科學家——實際做研究工作的人——又可分爲兩類：一種就是唐先生所說的有成績的人；一種就是唐先生說的雖沒有成績而有貢獻的人。

不過這第二種人并不一定是無名的英雄。例如十九

世紀中，德國的 JOHANNES MULLER 和 CARL LUDWIG，英國的 WILLIAM SHARPEY 和 MICHAEL

FOSTER。他們自己的成績雖不多，但是他們養成了許多好徒弟。德國的生理學之發達，英國的生理學之發達，都是他們的貢獻。他們的影響甚至及于美國。他們活着的時候，并非不受人景仰，死了以後，也不是沒有名譽。心理學中的 WILHELM WUNDT 也是這種人。

我們應該切記所謂科學家必是實際工作的人。

中國現在科學界一個根本不健全的現象，就是把做科學工作的人，同自己不做科學工作而在提倡科學上盡力的人，分不清楚。只有在中國，一個從未做過研究，但只繙

譯幾部書，或做過幾篇通俗文章的人，便可成爲科學名家。只有在中國，才有人請這種人在大學任教席，和主持研究工作。英國人決不會請 GREGORY 或 SULLIVAN 做實驗室的主任。更不必說那繙譯很多書的二位 EDEN AND CEDAR PAUL 了。這些事非請實際工作的人辦不了的。近些年來，費許多款項買儀器，購圖書，造實驗室，來提倡科學教育，促進科學研究，但是錢是往往白費了。其大原因就是社會上往往把自己不做研究工作而在提倡科學上盡力的人，認爲科學家——實際工作的人——了。

我們并不是不承認這二十年來以文字鼓吹科學的人努力所得的結果是有價值的。一般人對於科學的信仰，和現在種種研究科學的機會，多半是由于這些人的努力而來的。我們只要指出鼓吹科學和科學工作是兩種不同的事情；鼓吹科學是有些科學智識，善辯論，能文章的人便可做的；科學工作就須請科學家——受過訓練而能實際工作的人——來做了。

(八)

ANATOLE FRANCE 說：

我曾認得同小孩一般的隨便，一般的不裝模倣樣的學者，但是我們時時遇到毫無知識的人自以為是世界的中心。唉！我們個個都是以宇宙樞紐自居啊。這是人類普遍的妄念。就是十字街頭掃地人也不免如此。他的眼睛告訴他是這樣；當他周圍看看的時候，他看見天穹四邊籠罩着他，正正使他做成天地的中心。思想深的人，或者可以把他心中這種妄念打動些。謙虛，在有學問的人已經是少有的了，在無知識的人更是少有。（見其所著

THE GARDEN OF EPICURUS)

中國學術的落後，最足以長人的驕傲。在許多門學問，有成績的人不過二三個。這幾個人，周圍看看，正同絕早在十字街頭掃地的人一樣，他一個人真成了天地的中心。但他最容易忘了，他旁邊是沒有旁人呵。我們常說「羊群裏的駱駝」。這種人往往只是草地裏孤零零一隻羊罷了。就是他真是「羊群裏的駱駝」，同他國的同行比比，他成了甚麼呢？有幾個不變成「駱駝群」的！我素來不喜稱人爲「中國第一」，也怕聽人說，某人在某種學問上是「中國第一」。

(九)

第三卷第十二號國風有秉志先生用英文著作，林文先生繙譯的一篇文章，「國內生物科學近來之進展」。秉君在文章內所列舉的著作，只以分類學著作爲限；而且只以中國人或中國人與外國人合著的文章爲限。林君在附錄內所列舉的也是用同一的辦法。文的標題是「國內生物科學近來之進展」，而列舉的著作亦限於分類工作，似乎不妥。只限于中國人的著作，不錄他國學者在中國做的用中國的材料的工作，似乎也嫌過於狹隘。

古生物學的工作，多半是與分類學性質相近，不過所描寫的是生物化石，不是採集的生物標本而已。這種學問在中國近年有很大的進步。爲什麼把生物科學這一支的工作不著錄呢？

「北京人」的發現，是中國近年在生物科學上一大貢獻。這件工作，也是屬於描寫的科學(DESRIPTIVE SCIENCE)的。并且這件工作也是他國與中國學者合力完成的。我們實不解爲何緣故，屏而不錄？

形體學的研究，在細胞學上，胚胎學上，中國也有一

些工作。這也只是描寫的工作，不知爲了甚麼緣故，也不見著錄？

在生理學一方面，中國生理學會所刊行的中國生理學雜誌，已經有七年的歷史了。我素來最恨「台裏喝采」，也不喜「互相標榜」。我是生理學會的會員之一，而不願意說些有涉吹噓嫌疑的話。如想知道裏面發表的

## 福州通訊

小招

閱獨立評論，適之先生問我住址，不自覺又寫成一文，聊寫近時情況和感慨，一并寄去，沒有題目，故名爲福州通訊。

小招註

「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如今倒了，大家都想不到這樣的快，中央政府當然欣喜得無以復加，就是福建的人民也很歡慶的。

回想當時，中央飛機每天午後定時的飛來，福州城內幾乎變成一座空城，大街的店舖都鎖起門來，鎖在門的外面，街上肅靜得比十幾年前的舊歷新年元旦還利害。一聽見飛機的響聲，家家的婦人小兒就打抖擻。大家只得在日

工作之內容和價值，請讀者去看這雜誌罷。生理學也是生物科學的一個重要部份，爲何把這雜誌完全一字不提呢？

我們要更進一步問：這是不是因爲只現有的生物的分類方是根本，方是生物科學世界的樞紐呢？

間出城，南台倉前山滿堆了人。

有一天，我還不會跑出家去，飛機轟轟的飛來，只聽四面炮聲不斷的向上打，飛機聲音越飛越近，轟然的一聲，地面震動得我的腳根發痛，房子柱上掛的小鈴也震動連響幾聲。幾個躲在房角的人只是相顧默然，不知炸彈是不是落在我們家的別一院子裏。

飛機飛去以後，我們出門打聽，過幾家的院裏被炸彈毀了，塌下四五間的房屋，幾個滿身滿臉是土的孩子在哭着，還有三個人埋在土堆裏，第二天的下午纔拿出口首。這三位只算是閩變中沒人注意的一點點的犧牲。

後來，我每天也跑出城去，常有在郊外的路上，飛機

在頭上轟轟然的飛，我夾在路人裏跑，心裏只是想四個字「不知死所！」

飛機不斷飛來的那幾天，前方上也炸毀得利害，十九路軍準備撤退，各機關先就早散。十九路軍的軍紀的確不壞。撤退的時候，秋毫無犯，一隊隊，有械的無械的，大家順次的，從西門外經過城內，一直到南台過峽兜渡江而去。城內的秩序意外的好，誠如那天街上貼的標語一樣「十九路軍軍紀今古無雙！」

現在一切都平復了，做官的又做了官，街上多許多的標語，許多的司令和許多的兵。

前幾天我坐洋車出西門外，走有好幾里路，全路上都是開進城的軍隊，我在車上注視他們每一個的臉都是平正順從的樣子，身體高大強偉沒有一個不是我羨慕的體格。我心裏發愁，不知中國有多少這樣的青年，做的是放槍殺人的職業。各方面都用同樣的精力，彼此準備；爲的是什麼？我看到這一大隊的兵不斷的開進城，我想到各地方的軍隊，想到十九路軍，想到各省大大小小的軍閥。我嘆息這些偉大的民族力量的耗費！我又想到前幾天我遊玩過的一個地方——

那是在閩江的旁邊，風景異常的清幽，一條淤塞的小

河口，小魚都游泳到岸旁。這河乾得沒有一點的水，河底幾乎同岸上一樣的高，那裏有一家水利機關，用洋油點動的機器在春夏季裏抽上江水，灌入這條河裏，供給沿河一千五百畝田地的灌溉。每年很容易的從農民收到一二千元的進入。因爲，假如沒有這個水利機關，那一千五百畝地將要毫無收成的。

這裏水利機關的一個辦事人和我一同沿河步行。他說：如果有人來把這河每年掘深五尺，四年以後，這河長年有水，不必去江裏抽水了。農家種田種菜四季都有水，多麼方便！潄深以後，附近一帶絕對不能發生水災。福州春季大雨，河道淤塞，幾乎每年發生水災，農民習以爲常，以無災爲例外，無法補救。所以把河道掘深，利益真大，魚蝦生產，樹林收益，水料供給，火患防止，目前泥土掘上來就是好肥料，農民極其愛要的。但是沒有人去幹。我聽這話，極其高興而且感動，心想如果我能够得到航空獎券的頭獎（雖然我還沒買過一條票）必定來舉辦這個事業的。

那天看到這多軍隊，我又想到這個地方。假如那些多多少少的軍隊來潄深河道，不必愁沒處拿餉，不必去冒險殺人。但是中國的軍隊不幹，他們要把自己分做許多部



分，彼此堅築起深厚的壁壘，然後自己破壞牠；彼此購買許多武器，然後拿來毀棄；彼此招集強盛的丁壯，然後拿來屠殺。「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自古以來是這樣不變的，現在如此，將來恐怕也是如此，是多麼痛心的事呢？

中國軍隊耗費國家的精力，損失民族的元氣，誰也算不出來，够如何的重大！要叫他們築萬里長城，那萬里長城繞過全地球，開運河可以造成一百個巴拿馬運河！建設國家絕對可以建成最強盛的最近代的最統一的國家！但是他們不，他們要彼此準備着，準備世界最新式的軍械和戰術，預備佔領或奪取地盤，榨取民間金錢。他們開火了，把地方毀傷得不得了，元氣更加損失，然而爲把持地方起

## 編輯後記

△本期投稿「論專制與獨裁」的作者胡道維先生曾在北平幾個大學裏擔任過政治學的課程，他現在專力翻譯政治思想的名著，已譯成了 Coker「政治思想史料選讀」，Merriam的「美國政治思想史」。他在此文中所引的 Mc Ivor 的「近代國家論」也是他新翻譯完的一部書。

獨立評論 第九十號 編輯後記

見不得不再榨取，再準備！勝利者之後還有勝利者，儘是如此依樣糊塗的下去，將要得到如何的結局呢？

結果只有兩個的最終歸途，不是歸共產黨就是歸日本。日本很有把握，很有準備，東四省去了，華北岌岌可危，福建也是他囊中之物，等到我們或我們的兒孫做了亡國奴的時候，那就晚了，太晚了。

對於大大小小的軍閥，我不知要怎樣的勸告他們，趁着我們的筆還能寫我們要寫的文字，我們的口還可以說我們良心上的話，大家都要加緊努力，雖然聽的人要說我們的話是廢話。

二十三，二，八燈下，福州

適之

△胡道維先生是獨立投稿最勤的一位作者，他曾在本刊發表過三篇「權利是什麼」，分論英國人，美國人，歐洲人對權利的見解和保障權利的制度。（第四二，四三，四五號）他又有一篇「憲與憲法」，登在第五十號。

△「做好做歹連拖帶打」的作者「壽生」先生是一位北平

一九

投稿者，住在近人所謂「中國的拉丁區」。他在本刊第八十六期發表過一篇「試談專制問題」。

△「小招」先生曾在本刊發表過兩篇文章，一篇是「參加福州人民代表大會記」（第八四號），一篇是「福州經濟的崩潰」（第八五號）。

△獨立的讀者在這十天以來，一定和我們一樣，都很關切翁文灝先生的狀況。翁先生於三月十六日在京杭國道上因汽車誤撞橋柱，受了重傷，因流血過多，曾昏暈至一日以上。當時各地朋友讀了初次傳出的惡消息，都十分焦慮。幸得京杭滬三處朋友協力醫護，經牛惠霖沈克非諸先生診治，翁先生現已出險。他的腦部雖受震動，並未損傷；面部諸傷，據說都不甚厲害。大概他經過較長期休養之後。可以復原，當消息最壞的第一天，他的一位北平朋友寫信給人說：「如此天才，如此修養，豈但是一國之壞寶

，真是人世所希有！」還有一位朋友對人說：「翁詠寬是五十萬條性命換不來的！」我們天天祝他早日恢復健康。

△上月二十七夜，獨立評論社聚餐，主人家中恰有體重計，我們都試磅自己的重量，翁先生連衣服皮鞋只有九十磅。他笑說：「我又掉了兩磅了！」我們都勸他休息，他說，「我明天到陝西去旅行，就是要去休息。只有旅行可以給我休息。」他從西安回來就到南京，從南京坐汽車往杭州，路上竟遇此大險，我們盼望他能利用這個強迫休息的時期，絕對安心靜養，——就是周口店再發現一個完整的「北京猿人」的腦殼出來，他也不必過問！

△八十九期汪敬熙先生的「閒談」（六）評論的一部衛生學，是教育部審定的，文中誤記為國立編譯館審定的。汪先生囑我們替他更正。

# 社會科學雜誌

陶孟和 主 撰  
曹炳鈞

社會調查所出版

## 第四卷第四期

### 要 目

- 大戰前日本棉紡織業在華貿易之發展……王鎮中
- 世界經濟會議之回顧……陳君慧
- 日煤與中國煤的供給……蔡謙
- 中國的牙稅……曲直生
- 中國對日蛋類貿易之後顧與前瞻……嚴仁廣
- 書評……黃善梵

本刊價目：本刊年出一卷每卷四期，於三、六、九、十二各月出版，每卷定價洋六角，直接向本所預定全年四冊者，實洋二元，郵費在內。郵票代洋按九五折合，以一角以下者為限。

社會調查所發行  
北平西安門內文津街三號



## 溥逆竊號與外部態度

傅斯年

三月一日，醜逆溥儀照傀儡戲的預定步驟登了他的所謂極。這事之關於溥儀及其從黨者，本不值得一論，因為溥儀小子無論稱號是「執政」，是「皇帝」，是「可汗」，是「溥王」（準朝鮮亡後稱李王之例），他和他的從黨總是「給奴才做奴才的奴才」，他做的事自有他的主人負責任。這事之關於倭寇者，也與以往的行徑無分別，反正他們撕碎一切公約，破壞一切文明的原則，而求逞其暴力，這一段醜劇也不過是這大行動中之一步。所最可怪者，是我們的政府對此事竟如此膽怯，發一個無益而有損的談話便算完事！

這個談話，據平津三月一日各報所登載，真是一篇膽怯含糊，責任推到歐美國家身上的大作品，這樣宣言的效果，真正要損害我們國家的立場，因為這樣宣言，在實質，態度，及法律的觀點上，不免被國人及外國人認做我們政府業已趨向於默忍乃至於默認東北現狀也。

這篇文字整個不成樣子，而其內容之尤謬者有兩點。第一點，「日本」兩個字簡直不敢提明，彷彿這兩個字犯

了祖宗的廟諱一個樣子。須知沒有被告的狀，法庭是不受理的，沒有主犯的名字，空論是不發生法律效力的。若拿這樣的文字給外國政府，真把我們政府「齷齪」的儀容表顯充分了。在這個心理支配之下，談話的字句中很有些極不妥處，詳見下文。第二點，若干該說的並不去說，反而去責列國以「國家之人格」。夫責人者必先自責，試問現在北方的若干事實是否已有默認「滿洲國」的嫌疑？且喧傳一時之進一步的解決華北外交懸案如果實現，是否已是實際的默認滿洲國？如此，則試問我們政府的設施已把我們國家之人格維護到如何安全的地步了？日本的名字不敢明說，別國的人格却大是我們所關心者！

我以為在這一段時機中，我們的文告必須是一件正式外交公文，通知國聯盟約，九國公約，非戰公約，各簽字國，並正式的通知國聯秘書處。這樣子才有「備案」的法律效力，否則一件外交部長的談話，算不得什麼，即使偷偷的告給列國政府，也不够「備案」的價值。國聯方面我們當然要有正式通告。日本雖然退出國聯，我們却不曾。國聯

已因我們的不爭氣——熱河戰之不力及塘沽協定——被人穿破了偶像權威，而我們今日還是依賴着國聯的決議案，才能維持關於東北之法律的地位。對國聯的態度我們斷無佔在日本一面的道理。至於通告的內容，必直斥日本爲東北事件自始以來之罪犯，而提明一切日本所撕破之國際和平公約及國聯歷次的決議案，以資繼續肯定我們國家向來的立場。總而言之，公式必須鄭重，語言必須明瞭，責任必須指明是誰：重的事件必須不輕說。我們之所以必當有此一着者，無非繼續肯定我們在國聯中所昭示的立場，當此時機須再向列國備案。若辦此事的手續和態度不足以完備備案的意義，反而明顯的暴露害怕的了不得的樣子，那算怎麼一回事？使列國覺得我們對東北問題已經怕到不敢說犯人是誰了，則自然引得別人趨於默認東北「已成事實」的道路上。自己先做了一個含糊糊糊的榜樣，如何還能責求別人不渾渾沌沌？這樣吞吐的舉動，在作者縱不自覺慚愧，其有斲喪「國家的人格」（用原文語）之嫌疑否耶？

責求歐美各國之「國家人格」！全國國民所憤激者，實在在日本不在溥儀，因爲憤激值不得對傀儡而發，而談話上說，「對於此種叛國行爲，不勝憤激，」重言溥儀之叛國，即輕言日本之耍猴子戲，把國人的憤激所向，自日本人身上改在溥儀身上，這豈不是提高溥儀之重要？提高溥儀之重要豈不即是減輕日本之犯罪成分？下文又說，「惟自吾人觀察」云云，這種觀察是五十餘國在國聯中一致的決議案，也是美國蘇俄歷次所表示，何不提明，而縮小到「吾人」？明明是一個天下之公言而曰「吾人觀察」，這算什麼話？下文又說，「歐美各國之不承認偽組織，亦已成爲國際道德之鐵律。」這真小說了！美國有不承認的宣言若干次，始于司汀生，而民主黨政府未上台時，及一上台後宣言繼續不變，國聯五十餘國更有決議案的約束，在國際法上，更無法承認滿洲國。然則此事不僅是國際道德乃是法律！談話的文章中這樣改實爲虛，自墮我國的法律憑藉，是何用心呢？豈不是因爲提到這個法律的根據便牽到國聯，牽到國聯使觸怒日本呢？以上等等誤謬，若是推尋致此之由，總不外乎害怕，因爲害怕到微妙的境界，於是日本二字與廟諱同避，而一切可以觸犯日本忌諱的字句，例如不承認之法律案等，都是去之惟恐不盡的！受如此心理支配

而成之文字，能不十足暴露如此心理嗎？談話到這步田地，還說我們對東北事件的態度沒有大軟而特軟下去，可不可以信喻國人及別人呢？

英國因爲有一個對僞國郵政的困難，請求國聯宣示如何方可免於事實承認滿洲國之嫌疑。在他們關係遼遠者，措置尙求如此謹慎，立場尙求如此嚴明，難道我們反而遇事含糊混下去？

## 無爲還是有爲？

(一)

胡適之先生近來倡無爲的政治，他在獨立評論八十九期上說道：

凡是留意我的著作或聽過我的哲學史下課的人，都知道我平日是反對無爲的政治哲學的。現在我公然提倡中國應該試行一種無爲的政治，這當然要引起不少的朋友們的驚異。

他一個反對無爲的政治哲學的人反來提倡無爲的政治，這果然是一件可驚異的事情。但是，如果把問題弄明白了，這一點也沒有可以驚異的地方。爲什麼呢？要知道改革政

據日本報紙所載，吉林的義勇軍以擴大的舉動紀念日僞的這一幕醜劇，（這事是中國報不敢登的，想必有命令之者）而我們外交當局的態度如此！到底中國的希望當在民衆的身上求之！

不過談話既然談到「國家的人格」了，還不免使我們寄一線的希望，便請他時時想到自己國家的人格！

陶希聖

治的組織與那在政治現狀之下求一種較好的辦法，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事情。即如胡先生，他是主張民治的政治組織的。但是現在官僚政治已經沒得改革的方法了，他使在官僚政治之下求一較好的辦法。反無爲哲學的人儘可以提倡無爲政治了。

我爲什麼把胡先生所沒有提出來的官僚政治這個意思提出來呢？無爲政治本是官僚政治之下的最高理想政治，如果官僚政治組織已經確定了，最好的政治便是無爲的政治。如果我們要改革官僚政治，那我們可以有種種的高深主張。如果我們在官僚政治下面，要人民少受一星兒的苦

，那末，無爲政治哲學便出來了。

## (二)

無論國家是服務的，或是探奪的，或是人類最高的理想，在國家組織之下，人民總有財政上的負擔。國家對於人民這種財政上的負擔，和是由官吏來徵收的。國家要人民出多少賦稅？官吏對人民怎樣徵收法？在民治國家沒成立以前，人民是沒法過問的。民治國家的最原始的政制，——議會召集，便是由於人民要來過問稅法。那時候，人民的口號是「不出代表便不納稅。」

在人民無權過問稅法的國家，人民只希望官兒們少定一點，並且少收一點。至於官兒們那一方面呢，也有聰明一些的法子，也有愚蠢一些兒的法子。假如人民是向天生一個金蛋的稅，聰明的辦法就是好好兒的喂這隻肥，好去天天有金蛋可收。愚蠢的辦法就是一刀把肥肚子剖開，那末一來，今天可以收到一個半金蛋，可是明天就沒得收的了。換個比喻來說，要明年收取蜂蜜，今年必得留一份蜜兒讓蜂子們過冬。養蜂政策乃是國家所以能夠維持長久的政策。殺鵝政策便是「子與汝偕亡」的政策。再換個比喻來

說，孟森先生在獨立評論八十九期會提到「羊毛出在羊身上」的話。我在這裏却拿來這樣的說：剪羊毛比剝羊皮到底較爲聰明一些。所以羊毛雖一樣出在羊身上，還得看這毛是帶皮底的不是呵！

西漢初年的無爲政治哲學便是養蜂的原理。在蓋公的「寧靜而民自定」的主張，同時還有「省刑罰，薄賦斂」的法子。幾十年間，「家給人足」的民情，「爲史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的政策，是後世任何朝代所做不到的。

## (三)

任何朝代都有人想到西漢初年那樣的安定，任何朝代都不易做到。這是爲什麼呢？任何政府都未始不聰明，任何政府都必終於愚蠢，這是爲什麼呢？

官吏軍隊的數目老是一年多一年。這是一個原因。翻開歷史一看，怨官兵漸增的話兒，那一朝都有過。西漢到武帝時代，官兵使已濫加了。唐到中宗時代，官使加多了。宋一開國便覺官多，而地方官的加多，到真宗時已有人在怨訴了。清末回想乾嘉，民初回想清末，現在回想民初，官吏兵卒的加多到怎樣的程度呢？

貪污的事情老是一代多一代。這又是一個原因。西漢初年，皇帝坐輛馬車，馬還不够四匹的格局。將相坐坐牛車也就好了。開國君臣可以這樣。他們的兒孫能這樣嗎？宋武帝的兒子看見他的土坑木梳，罵他是鄉下老，這樣的事情太平常了。於今寧夏的廳長坐轎車，算是不够格的事情。大都會的洋式生活，誰也要從老農身上多取一滴血來過一過癮的。

心裏也許知道重稅是殺鵝的政策，口裏也許會替農村破產呼冤，但是官兵加多，貪求加重，決不是幾個人心上口頭的快談所能解除的。

農村的破產自有原因。無爲政治並不能根治農村破產，有時無爲政治還把農民給弄窮了。卽如文景之際，土地兼併的事情把農民弄得賣妻鬻子，便是無爲政治的恩賜。因爲輕稅斂，只是地主的負擔輕減些；省刑罰，只是豪強漏網；所以無爲政治並不能止住賈誼痛哭長太息的現象。不過，如單就官兵加多及貪污加重來說，這與農村破產也有因果關係——並且是互爲因果的。官兵加多，貪污加重，農民加一層破產。農民破產，鄉下的收入不够用了，那鄉下高貴些的士人們便難於恬退了。大家到都門或地方的權門去求官。到底俸祿的收入比耕田的收入豐富些，於

是官便加了又加了。那鄉下勞苦些的農民破產，沒地奔逃，他們也大家去當兵去了。有些朝代竟然用刺爲兵卒的辦法來救濟饑民，例如宋；又有些朝代却因爲當兵的材料太多，肉戰打個不休，例如民國以來。這是說，農村破產的現象，可以引起官兵加多的結果。官和兵太多，稅捐便加重，農村更破壞了。

所以一個政府，聰明起首，愚蠢結局；養鵝起首，殺鵝結局；剪羊毛起首，剝羊皮結局；看來也不是偶然的。

(四)

如上所說，農村破產，有一部分由於官兒們；還有一部分不由於官兒們。由前之說，無爲政治可以使官兒們少要兩文。這是官兒們做得到的，是人民應當責備他們做的，也是他們應當覺悟到的。他們難道連殺鵝取金蛋是愚蠢的事情都想不過來嗎？

但是由後之說——農村破產有不由官吏的原因——使有人想用政府的權力去下手解決社會問題，實行有爲的政治。例如董仲舒師丹的限田，王莽的王田，范仲淹朱熹王安石的均賦。本來，社會的問題，如土地兼併，田賦不均



，是要解決的。政府去辦罷。殊不知官吏們這一辦，人民的負擔更多，騷擾更甚。「吏緣爲奸」這句話在漢書王莽傳裏見過一次，在宋史裏便見過兩百次也不止。

這有爲的政治毛病既然太多，無爲政治哲學使勝利了。例如兩宋道學黨所崇奉的范仲淹，本也想改革的；但是王安石這一改改壞了，道學這一黨便回到無爲政治去了。

因之，歷代的有見解有經驗的政治家或思想家，許多都傾向於「寡欲省事」的教條。他們對官吏們的勸誡可以歸成這樣的一句話「你們少改制，多防禦」。

## 對於兒童教育的一個意見

衡 哲

我對於兒童教育的意見，不是從書本或是課室中得來的，乃是完全由經驗中得來的。這些經驗的來源有兩種，其一是自己做兒童時的種種經驗，其二是現在教育自己的兒童時所得到的種種經驗。現在在提出我的意見之前，似乎應該先把這兩種經驗簡述一下。

我自己做兒童及少年時所受的教育，說起來真是一幕悲劇。但此處既是公衆的地方，不便滴淚抹眼的來訴說私人的苦惱，故也就不願多說。不過即在那個時候，在我

前幾天，有一位傳令兵騎車過天橋朝北走。他的車與電車相撞。他受傷的身軀恰好夾到電車前輪和後輪的中間。這時候，除了用起重機把電車起去之外，只有一個方法，「電車你別動呵！」同樣的，官吏的教條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無爲政治雖不能治這位傳令兵的傷，有爲政治却可以送他苟延殘喘的命。

在這樣的意思上，我贊成胡先生的無爲政治的主張。

二三，三，四，北平

的幼稚的思想中，也會發生過這樣的幾個疑問與決心。那疑問之一是，「爲什麼父親要用那打與罵的嚴酷方法來強迫我讀那些古怪字句（爾雅），與那些自漢以來的帝王年號？爲什麼不讓我像姊姊妹妹一樣，跟着母親去背誦那些音調鏗鏘的詩經與唐詩，那些我心中渴望一讀的「容易書」？爲什麼父親偏要讓我去臨那些呆板與古怪的碑帖，叫做什麼『龍門二十品』的，致使我直到如今，見到了毛筆還討厭？（現在我很明白，我父親所以教我這樣的讀書與寫

字，確是想把我教成一個與姊妹們不同的人才，可惜他的方法完全錯了。）我的又一個疑問，是對於一個不學無術之人所辦的學校而發的，『爲什麼自己智識那麼低，却偏偏要來辦什麼學校，來哄騙這一羣十四五歲的小孩子，損害了她們身體的康健，摧殘了她們求智的自然欲望？』我的決心之一是，『假使有一天，我也有威權去教人，我一定不教他讀一句他所不願讀的書，我一定不迫他寫一個他所不願寫的字。』

至于我對於小學教育的不滿意，則真是一言難盡，却也言之可憐。六七年來，每到春秋季始業的時候，我總是手牽着我的孩子們，東校去碰門，西校去商量，希望能把她或他們安放到一個我認爲可以于他們無損的地方去——無損而已，有益當然更是談何容易——我自己也可以因此得到一點清閒，好去做一點自己要做的工。但結果是怎樣？我會把他們先後的送進了兩個北平比較有名望的小學去。但是，在人格方面，我所見到的，是校中許多孩子們的買零食，偷小品，和打架吵嘴等的種種惡習慣。我曾和學校當局們開誠佈公的討論過這些問題，這自然也不盡是爲我自己一人的孩子們着想。但結果却總是一番敷衍，一頓官話，作了收場！在讀書方面，則又是那樣的生吞活剝，那

樣鴿籠式的分門別類的授課。比如說吧，我的大孩子的數學做得不對，但她的教師却只在她的簿子上加了一條紅槓，一點也不給她解釋錯誤。這樣的累積了幾個月，居然把那孩子對於數學的胃口消滅到無影無踪。到此，我自然也就不能再叫她去上那樣的糊塗功課了。退學之後，她在家裏『玩』了兩三年。在這兩三年之中，她在我的指導之下，看了五六種小說，學寫了百十封信，學作了百十篇知文，除了許多常識及人格方面的教育不計外。可是對於數學一項，我不但不令她學習，并且曾極力把那些已往裝在她腦中的糊塗假設法的取了出來。去年夏天，看看她已往快滿十二歲了，我方請了一位教員，給她補起數學來。可喜的是，從前所習的數學，此時在她的腦筋中已經是空過天青，空無所有。故補過一、兩次之後，不但她使很容易的考上了中學，并且半年以來，不曾見她對上數學再遇到過什麼困難。我的述說這個故事，并不是想誇獎自己的女兒——一個十二歲有餘的孩子，按部就班的讀習一點中學的功課，即使樣樣都得到了甲等，也算不得什麼天才——乃是要指出生吞活剝的害處。用這種方法去教兒童，結果是只有把兒童們對於智識的胃口毀敗淨盡，使他們一輩子不願再去和這一種學問見面。這結果不單是等于零，他實是一個

負數。教育兒童的效果竟至于成爲一個負數，我們還能說他不是一個很嚴重的情形嗎？

鴿籠式的功課分配，乃是現在全國小學的狀況，當然不能單獨責備那上面所說的兩個小學，但這個問題豈不因此更顯出他的嚴重性？試拿任何一個小學生的功課表來看一看，我們便差不多要疑心他是一張佈滿經緯線的地圖。我們對於那功課表上的國語，認爲基本的教材，對於那些圖畫手工之類的科目，也認爲適合于兒童的心理，以爲應該保留——雖然對於圖畫手工之類，似乎也可以不必那樣的分門別類，只『遊戲』一項便可以包括一切兒童們所喜愛的工作。但我們實在不能明白，爲什麼還要加上什麼三民主義哩，數學哩，社會哩，常識哩，自然哩，這豈不是把一個發育剛始的嬌嫩小腦，切成了一個大八塊！在一個入世不過五六年的兒童生命上，事事物物都是教育的材料，國語與遊戲不够包括一切的教材嗎？常識不够包括一切上天下地的新智識嗎？

以上所舉的，不過是一兩個最顯明的例子，我對於現在小學教育不滿意的地方，還多着哩。但我這篇文字的目的，既重在建議，所以對於這一層，正也不必多說。當然，這種種令人不滿意的現象，也不盡是小學教員或辦學

者之罪，家庭及社會也不能不分負一大部份的責任。不過這又是另一個問題，此處也可以不必細說。此處要說的是，以我們這一羣自承爲教育界的人士，反忤到自己的兒女無校可進，反須自己犧牲了學業與光陰，在家中作一個小學教師，或是另外去請一個人來代替自己，這豈不正應了古詩上所說的，『餅之馨矣，維蠱之耻』的兩句話嗎？

一半是爲了這一點的慚愧與自責心，一半也是因爲深刻的感到現在小學教育的離理想太遠太遠，故我現在謹以上述的兩種經驗爲根據，提出下面的一個意見，希望國內關心兒童教育的教師們與母親們，給我以指教。

說起我的意見來，却也平凡得很。牠並沒有什麼驚人的計劃，或是什麼新奇的學說。牠所有的，不過是一點常識，和對於兒童的同情與了解。這意見的第一層，是救救孩子。我們應該先把他們從那些『鴿子籠』中救出來，從那個生吞活腦髓的魔鬼，叫做什麼『糊裏糊塗』的口中救出來。這是一個消極的起碼工作。第二層是，我們應有一個遠大的眼光，把整個民族的前途，作爲兒童教育的前題。在這個前題之下，所有一切功名富貴的企求，家庭戚族的扶持，以及與此相類的各種觀念，都應該把他們驅除淨盡。我們應把每一個兒童，看爲一個整個的與獨立的生命，使

他們能得到一個身心上平均的與充分的發展。

欲求這個第二層意見的實現，我們却須先有一個具體的事物，來作爲達到這個理想的憑藉。這個事物，我現在姑把牠叫做一個學園。牠應不分年級，但分程度，凡在三歲以上，十三四歲以下的兒童，在相當條件之下，都可以進內接受身心上的種種訓練。

這個學園與一般小學不同之處，第一是注重兒童身體的強健。中華民族的生活力，現在似乎已到了日落西山的時候了，即使沒有鴉片嗎啡之類的毒品，在那裏吸取這個衰弱民族的稀血。在這樣情形之下，智識的增廣與提高，似乎已成爲一個次要的條件。我們不必說什麼康健的腦子寓在康健的身中一類的話，我們即使承認一個多病或是殘廢的人，有時也能成爲一個詩人或學者，或是一件事業的領袖，那也不過是一個偶然的現象，他是不足爲例的。我們試把我國社會上的所謂領袖與歐美日本的領袖相比，則將見人家的白髮老翁，仍是生龍活虎般的生活着；而我國的中年人士，却已是十之七八成爲病魔壓下的降卒。我們看了這個情形，還不憬然覺悟到，身體的康健，乃是兒童教育的根基嗎？欲求養成兒童身體的康健，一方面自然須注意他們的飲食與起居，使他們有需要的滋養品，以

及合乎衛生的環境。一方面又應該給他們以練習勞苦與運動——不是錦標式的運動——的充分機會。至于如何方能達到這類的目標，則因他是屬下一個子目的問題，只好待到將來再說了。

這個學園與普通小學不同的第二點，是在以整個的人生作爲教育的目標。故不但鴿籠式的課程分類，及生吞活剝式的智識注入，在所不取；即專以智識爲限的教室功課，也在需要改良之列。而身體上的康健發展雖是一個基礎，牠也不能單獨存在，牠是必須與人格的熏陶及常識的浸潤，相輔相成，同時並進的。欲求這個多方面教育功效的實現，環境是比教訓爲有價值，而父母師長們的人格與習慣的潛移默化，也比教室中的口講指畫爲能對於兒童發生影響。即以我個人的經驗來說，爲了孩子的緣故，我不知道發見了自己多少的短處，我的孩子們不但學到了一點我們自以爲良好的習慣，如以讀書，寫字，畫圖等，爲遊戲的中心之類；并且我的懶于運動及躺着看書之類的許多壞習慣，不幸在不知不覺之中，也都傳染到那幾個應該生龍活虎般的孩子身上去了。我一方面努力矯正自己的惡習慣，一方面也用別的積極的方法——如鼓勵他們的戶外生活之類——去消滅那些我所影響于他們的不良習慣。而我也因此

明白，凡是抽象的人格教育，如守秩序，愛清潔，不懶惰，注意力的養成，合作，不自私，及其他類似的的基本德性，都不應該單用言語來教授，而應該造出一個優良的環境與榜樣，使兒童們在不知不覺之中，能得到一個高尚優美，而又能腳踏實地的人格的重陶。

上面所說的兩點，都是對於教育一切兒童的共同地方。因為身體，人格和常識的培養，及運用腦力的訓練，——一個科學化的腦筋的訓練——都是做人的基本條件。牠是可以不分天資的優劣，而一律施以『困而學之』的工作，以求達到目的的。現在要說第三點，却是所謂量材施教的一個目標。牠與上述兩點不同的地方，乃在對於兒童個性的注意。學園對於所有兒童既經施以相當的基本訓練之後，即須再作進一步的工作。牠須不斷的觀察與研究，以期對於每一個兒童的個性與天才能得到一個深切的認識。我們雖然不想把一個平凡兒童變成天才，但我們也決不能讓一塊天生美玉輕輕的錯過了牠的磨琢的機會。我們的工作，是在這些美玉的發見與雕琢上的。我們須使每一塊玉的特點，能在他成器之後，充分的顯出他的優美與用處。我們固然不能把一個未來的學者，教成一個銀行家的預備人，或是把一個『大醫星』，教成一個『七步成章』的未來

詩人。但同時，我們對於每一位未來的銀行家，詩人，學者，醫士，以及各種各類的不同人才，却須施以充分的而又不同的預備教育，使每一個人將來都能成爲他自己天才所召命的一個有用人物。

總而言之，我們對於這個學園的希望，不在牠的製造許多領袖與學者，而在牠的訓練無數無數的健全國民。我們希望靠了一個廣大明美的學園，根據着上面所提出的三個原則，能達到我們對於兒童教育的最低目標。使一個中國的未來的主人翁，都能有一副冰凍不凍，飢餓不傷的健全身體。有一份身心調勻，常識充足的做人工具；有一個『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堅貞人格；再有一番科學頭腦的訓練，俾出園之後，可以進一步的去求一點專門的智識，和那謀生的技能。這樣，我們對於兒童的教育，也可以算是盡了一點責任了；對於我們的民族，也可以算是爲他們下過一點好種子了。

#### 附言數則

(一) 不滿人意的教育現狀，當然不以小學爲限，但爲求討論上的方便起見，我們却不能沒有一個固定的範圍，并且從教育問題的全體看來，從整個民族的前

途看來，從每一個人的生命上看來，我們也不能不把兒童的教育，視為一個最基本的教育問題。

(二) 假使我的這個意見，和歐美的教育家所發明的什麼制，有相合的地方，那却是完全出于偶然。我對於許多教育界的先進名家的學說與制度，當然有相當的欽佩與成同。但我也常常想，是人為教育而生的呢，還是教育為人而設的？假使是後者——我相信是後者——那麼，我們討論教育的時候，似乎應該從人的頭開始，而不當從書本學說的一頭開始。這樣，不但能使人做了教育的主體，并且似乎還可以免去多掉書袋的麻煩，許多入主出奴的門戶之見；雖然我們也不至于那樣的淺陋與愚笨，想把許多教育學上有價值的試驗與制度，屏在我們參考的範圍之外。

(三) 有人說，『你以民族為前題，這個調子唱得固然是很高的了，但請你不要忘了，一個人還要吃什麼？』我的簡單回答是：受過這個學園的訓練的兒童，再加上數年職業上的訓練，吃飯是應該不成問題的了。假如因為少了一張文憑，即使有真才實用，也吃不着飯，或者不能升學，那麼，這個現象的本身，便是社會上的一個大問題。我們正應趁此把這個社會問題

，設法解決，不應該反去犧牲了良好的國民，以求敷衍一個病態的社會現狀的。

(四) 我在上面曾別特提出『在相當條件之下，兒童們都可以到這個學園來』的一個情形。這個所謂相當條件是指家長——尤其是母親——對於學園的合作。但因限于篇幅，這裏只能把這一層指出，不能再為申說了。

(五) 這一篇小小的意見，其實也不是我腦中的空想，他實是我自己教育孩子時，所得到的一點經驗與結論。假如此處還有篇幅的話，我可以把我這一方面許多經驗寫出來，以供大家的參考。但這一層暫時既做不到，我且簡說一句話來作結吧：我用這個方法來教育自己的孩子，比了讓他們到小學校去的成績，是滿意得多了。

末了，我還要請求讀者們，把他們所讀的那些浩如烟海的教育書本，暫時忘却；專心看他們的常識與經驗，來和我們討論這個兒童教育的大問題。我的這一篇意見，一方面是粗枝大葉，遺漏甚多；一方面也是管窺蠡測，聞見有限。故更希望能靠着這一塊磚石，引來更多的美玉，俾這個小小的建議，能有實行的一日

# 國府主席林森先生

胡適

本年的四中全會選舉林森先生連任國民政府主席，全國輿論對這件事似乎很一致地表示滿意。在這個只有攻擊而很少贊揚的民族裏，這樣一致的贊同豈不是很可驚異的事嗎？

我們考察各方輿論對林主席的贊許，總不外「恬退」兩個字。「恬退」的褒語只可以表示國人看慣了爭權攘利的風氣，所以驚歎一個最高官吏的澹泊謙退，認為「模範」的行爲。但這種估量，我們認為不夠，——不夠表示林森先生在中國現代政治制度史上的重大貢獻。

林森先生的絕大功勞在於把「國府主席」的地位實行做到一個「虛位」，而讓行政院院長的地位抬高到實際行政首領的地位。今日的國府主席，最像法國的大總統；今日的行政院院長，頗像法國的國務總理與英國的首相。兩年多以來的政治制度的大變遷，就是從兩年前的主席制變成兩年來的行政院長制。其重要性頗等於從一種總統制改成內閣制。改制的根據固然由於民國廿一年十二月三中全會之改制案，然而使這個新制度成爲可能的事實，這不能

不歸功於林森先生之善於做主席。

三中全會改定政府組織，把行政院抬高，作爲行政最高機關。這確是政治制度上的一大進步。但如果國府主席是一個不明大體而個性特別堅強的人，如果他不甘心做一個僅僅畫諾的主席，那麼，十幾年前北京唱過的「府院之爭」一幕戲還是不容易避免的。

林森主席是一個知大體的人，他明白廿一年底改制的意義是要一個法國總統式的國府主席，所以他從不肯和行政院長爭政權。舊制下國民政府的文官處，主計處，參軍處，都至今依然存在，但兩年來的行政大權都移歸行政院了。

去年我過南京時，一位部長告訴我一個很有趣味的故事。在新組織法之下，第一個政府是孫科的政府，不久就倒了。第二個政府，汪精衛的政府，成立之時正當淞滬南京都最受日本壓迫時期。汪政府成立了一個多月，忽然有一天，一位部長說：「我們就職了一個多月，還沒有去正式參謁林主席哩！」這一句話提醒了全體「官員」，於是汪院長派人去通知林主席，說明天上午汪院長要率領全體官員去

聽見主席。到了第二天，全體開員到了林主席的公館。到處

尋不見林主席。主席不知往那兒去了！他們都感覺詫異，只好留下名片，惘然而返。到了下午，林主席去回拜，他們才知道林主席因爲「不敢常參謁的大禮」，出門迴避了！

這個故事至今在南京傳爲美談。我們關心政治制度的人，也都會認得這個故事是一樁有意義的美談。我們試回想那兩年前黨政軍合爲一體的國府主席的地位，就可以明白林主席的謙退無爲是有重大的歷史意義的了。

兩年前的國民政府組織法是最不合理的。那時一個部長的地位是很低的：各部之上有行政院，行政院是與其他四院平等的，五院的正副院長加上其他國府委員組成國民政府。二十一年底的改制，改行政院各部爲政府，而國府主席成爲虛君制，於是三級政府合爲一級，而其他四院與行政院分開對立，爲行政部之外監督協助行政的機關。這個改革與孫中山先生的五權憲法的原意似乎接近多了。而其中用無爲的精神，在不知不覺之中使這個內閣制成爲事實，使這個虛君主席制成爲典型，乃是林森先生兩年來的

最大成績。

我今年再到南京，又聽見人說林主席的一件故事。兩年前，他被選爲國府主席之後，他自己去請他的同鄉魏懷先生担任文官長的職務。林主席對他說：「我只要你做到兩個條件：第一，你不要薦人。第二，你最好是不見客。」這個故事也應該成爲南京政治的美談。這是有意的無爲。若沒有這種有意的無爲，單有一個恬退的主席，也難保他的屬吏不與風作浪攪權干政，造成一個府院鬥爭的局面。

有個朋友從廬山回來，說起牯嶺的路上有林主席捐造的石磴子，每條石磴上刻着「有姨太太的不許坐」八個字。這個故事頗使許多人感覺好笑。有人說：「我若有姨太太，偏要坐坐看，有誰能站在旁邊禁止我坐？」其實這也是林森先生的聰明過人處。你有姨太太，你儘管去坐，決沒有警察干涉你。不過你坐下去了，心裏總有點不舒服。林先生刻石的意思，也不過要你感覺到這一點不舒服罷了。他若大吹大擂的發起一個「不納妾」的新生活運動，那就够不上做一個無爲主義的政治家了。二十三，三，三夜。

## 閒談

汪敬熙



如果我們有一塊紫檀木，想做成一件器具；我們必定去找一個高手來做。我們知道，請的木匠手藝不高明，只是空費時間，白花許多工錢，而且把這塊好木頭也糟塌了。只是手巧而沒有經驗的人我們一定不請；雖有經驗而手藝不精，我們也不要。至于那手藝不精，天資不高，而只是努力的木匠，我們也決不會因為他的勤力而請他來做這件檀木器具。我們知道這器具，不是只由勤力而可以做好的。我們更是一定不找那執讀「考工記」，能做討論木工的文章，而從來沒有學過一天手藝的人。器具做成了，請他做篇讚美的文章是可以的；要這種人做木器那真是「緣木求魚」了。這些都是極簡單淺近的道理。

奇怪得很，我國主持高等教育的人往往好像簡直是不懂這些淺顯的道理。在科學教育一方面，尤可以見出他們不注意或不諳這些淺顯的道理。但是我們近些年來花了許多有用的金錢，寶貴的光陰，去購圖書，買儀器，造實驗室，而所得的結果不多，就是因為我們只顧了買木料，置下具，蓋工廠，而忘了應該找高明的木匠。木料要上好的，下具也要上好的，工廠也要美觀的。至于匠人呢？隨便

請幾個老資格有名氣的，就得了。有這樣上等的木料，這樣精巧的工具，這樣漂亮的工廠，那有做不出精緻的木器的道理呀！

可歎的很，天公不作美，沒有高手的木匠，總是不能有好木器造出來的！

☆ ☆ ☆ ☆ ☆

高明的木匠買工具的時候會抉擇；買來之後會用；用壞了的時候會修理。手藝太低的木匠就不能如此。

科學家也是同木匠一樣。手藝不高，不但不能造成木器，而且不會買，不會用，不會修理下具。

我曾經見過人們在一個沒有煤氣的城市裏買了四個燒煤氣的消毒器。我也曾見過人們在只有二百廿或三百八十八伏特交流電的城市裏買了一些用一百一十伏特交流或直流電的儀器。我不明白，為什麼緣故，中國許多心理學家都喜歡到那價錢貴，材料劣，工作壞的 SPOLLING 公司（在美國芝加哥）去買儀器。

我曾見過儀器買來之後，從來沒有裝置起來，等到幾年之後，零件散在各架之上，並且有遺失掉的，有時候就是有人來裝也裝不起來了。在廣州，我曾見過一個很大的很靈敏的儲錢的 CONSTANT TEMPERATURE WATER

BATH 塵封兩年之後，才有人把牠裝起來用。我也曾聽人說過，有的科學家買來儲電池之後，不加一滴硫酸水，就要用電；用不到電，就鬧着說，儲電池買壞了。

國立省立大學有幾個是有鐵工廠的。儀器壞了之後，是自己能修理的。我在國內一個省立大學，兩個國立大學教過書，其中只有一個國立大學的物理學系有一個鐵工廠。

我個人的所見所聞，或者是不足代表普通的情形。但是我相信，上面三段內所講的話，是足以證明，沒有好木匠，工具是不會買，買來之後是不會用，壞了之後是不會修理。

這是不是花錢而不得結果的事呢？

☆ ☆ ☆ ☆

沒有手藝的工匠未必會把他工作的地方收拾的井井有條，件件器具都放在適宜的處所。沒有受過訓練的科學家也多半是不會安排實驗室。

在河南的時候，我曾見過一位化學專家把蒸溜水放在磁罈子內，用個北方常用的鐵做的「洋油提」一提一提的往上提出來用。後來他改用虹吸管；他把那磁罈子的口緊緊的蓋住，蓋子的中心只安了一條玻璃管，彎成了虹吸管

用！用了幾次水後，水不向外流了，他還以為奇怪呢！

這固然是個「出類拔萃」的例子。但是我們看看國立省立的大學中，有幾個是對於全校各實驗室所須要的冷的和熱的自來水，煤氣，和電，是有計劃來佈置的。各學系各自為政的安置起來是不是太費呢？

☆ ☆ ☆ ☆ ☆

我不明白，為什麼我國各大學的理學院從來沒有一個一定的預算？為什麼有了預算之後，永遠是不照着預算去做？為什麼預算之內，不把創辦費及經常費分開；有新教授來的時候給他一筆創辦費去佈置他自己研究所須要的東西；經常費包括實驗室一年內的普通費用？為什麼一年開一次有名無實的「分贓會議」？為什麼叫這分的款項為儀器費？難道實驗室是只安放些架子，為裝漂亮的儀器用的嗎？

我更不明白，為什麼實驗室零用的東西，非經由「庶務處」去買不可？「庶務處」買東西，都是慢的非常，貴的可觀，而且是不合用的！

這是不是因為木匠鋪的老板是個外行的人呢？

☆ ☆ ☆ ☆ ☆

看看許多大學的課程表，往往令人生低手的木匠不知

道怎樣教徒弟之感。

在廣州的時候，我曾經聽到一位化學老名家說：他這化學系的功課，比任何國的大學的化學系，都完全。不錯，自分析化學，到香料製造，「十八般武器件件俱全」。但是學生學的也是「十八般武器件件稀鬆」！

課程瑣碎；基本的訓練不夠；課程的編製不注意學生畢業後的工作：——都是我國大學的重要缺點！

這幾點討論起來太長，而且各系的功課非本系的專家

## 東京通訊

### 六十五次議會之展望

日本第六十五次議會于去年十二月底舉行開幕禮，本月二十三日正式開會，今日為議會再開之第八日。

在未入本題之前，我們覺得有一看六十五次議會的前景——國內的與國際的情勢之必要。先說國際方面：日本

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奪取東北，一九三二年三月退出國聯，接任的是偽國成立，一九三三年五月間奪取熱河，本年本月偽國宣佈稱帝，而夾在中間的有一九三二年一月的上海事變，在這一串的大事變之下，在國內：議會政治瀕于危

討論不透澈。我們現在不再往下談了。我們只要指明，為徒弟找老師，必須找有手藝的木匠。

有手藝的匠人之重要，我們似乎已經說明白了。我們相信，我們國家這將傾的大廈，是須要各種的有手藝的匠人的努力方能重整起來。我們已經花費了許多冤枉錢去培養匠人。我們應該醒了。我們希望以後主持高等教育的人不只是買好木料，購新工具，蓋漂亮工廠，而真正是努力的去搜尋有手藝的木匠。Amen—

刑天

殆，軍事的法西斯的政治逐漸抬頭；在國際，放棄外交的詞令，積極的準備以兵戎相見。國際的地位愈險惡，國內的議會政治愈破產，軍人愈得勢，這差不多是很正確的成反比例而進行。但是一九三一年司汀生的宣言無效，一九三二年國聯調查團的報告書又無效，日本在國際上的地位雖陷于孤立，但是奪取了東北，倒反覺得國際方面一時尚無危機。于是乘這個機會國內的外交自重論又抬頭，而政黨政治又得苟延殘喘。前者的表現是所謂廣田外交，而後者的表現就是去年年末的五大臣會議中的荒木的對俄政策

之不行。而自廣田登台以後，在國際上又玩種種把戲，什麼親美使節，什麼日俄親善，中日親善。這些政策在究極的意義上，作用是很小，但是委蛇國內主戰論者，一時却是很有作用的。

在這個情況之下，美俄復交是有非常的意義的。我們可以說美俄復交是暫時壓低主戰論者的一種革命。而蘇俄的外交表面是極粗，但是其用意則極深極細。在美俄復交已經成爲事實的時候，莫斯科發表怪文書，美俄復交以後，十二月底共產黨第十七回大會上，莫洛托夫稱揚蘇俄紅軍之強，東方威脅之不足懼，而今年正月間，史大林又說我們仍舊希望與日本回復親善關係，一方面在遠東不斷的增兵，而另一方面則仍于議會正閉之前，使東京俄大使再提出賣中東路，使議會政治不致爲軍人利用日俄緊張的口實一腳踢倒。正是威撫兼施，無所往而不收其利。

荒木的失敗，不是荒木的無能，而是國際上太沒有材料讓他在國內做文章。

本來日俄關係上日本完全立于主動的地位，所以軍部在西伯利亞一有了題目，他們就拿來在東京做文章，在東京煽動「亦俄亦德」的傳單，標語，集會，是時常可以見到的。但是美俄復交了，軍閥對於蘇俄的舉動是不得不審

慎了。起碼在目前利用全世界列強的名義討伐赤俄的口號是走不通了。

在國內，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金再禁以來，國內輸出工業，直至現在仍在繁榮中；而另一方面，因軍事預算之膨脹，軍需工業呈一時景氣，工人失業數目已比一九三〇年大減。雖則去年十一月美國實行金買進政策之後，對美國輸出的大宗，生絲，已一落不振，農村失業頓增；而另一方面去年十月以來纖維工業輸出微增頹勢；出口漸減，入口激增（一月二十一日止入超達二千萬，同往年期入超只四五百萬。）但是一般的說，日本國內經濟情況仍就在好況之中。

一九三〇年是日本經濟恐慌最深刻的一年，於是不得不找出路，那出路就是一九三一年九月的奪取滿洲市場與十二月的金再禁。本來每一個國家社會內部的不安，當是他向外發展的動機。但是在目前，日本還沒有渴飲第二次屠殺的血的必要。這在政治上表現出來的是目前的國內日重論者。

以上對外相對的平衡，內部相當的繁榮，是這次議會的前提環境。但是這兩種環境也只能保持軍部原有的地位與議會殘破的局面而已。其他積極的作用是沒有的。

大家都知道齋藤內閣將是日本最後的內閣，齋藤倒後，日本是不是還能有內閣或類似內閣的東西，誰都不敢担保。因此很早我們就可以推測這次議會平安渡過，毫無問題。這次議會所能做的事情只有承認事實而已。

但是就是這一點，齋藤已經是戰戰兢兢的了。本來對現內閣的關係，政友會較遠，民政黨較親。現內閣得助於民政黨者多，得助於政友會者少。政友會所標榜的是農村問題為主，而民政黨則以預算均衡為說。十五日齋藤見政友會總裁鈴木，請求諒解，說明政友會所提政綱，全部贊同，但不能見諸預算者實因財政困難。十七日見若槻民政黨總裁，表示同樣請求。若槻事後語人：政府所行政策，原則與民政黨主張相同，因此從此原則出發之具體政策，諒亦無大異；預算案實遍處此，別無他法。其他政黨還有國民國盟，但是在議會中，是沒有勢力的，因此齋藤內閣得此兩大政黨之贊助，六十五次議會大概是沒有問題的。

滿洲問題，外交問題，國防問題，政民兩黨是與現內閣一致的。剩下的問題是一九三四年的預算案通過問題。預算案中成問題的是軍費膨脹與農村匡救費的縮小。但是既然國防問題的意見與現內閣一致，那麼此現內閣國防政

策的經濟表現——軍事費膨脹，他們當然是要承認的。承認了軍費膨脹而另一方面又不欲多發赤字公債與增稅，那麼剩下來下的結論，只有削減農村的救濟費——讓農村破產。因此一方面承認現內閣的國防政策，而另一方面又要借農村問題來攻擊現內閣，實在不是攻擊現內閣，而是政黨的自己打自己嘴巴，頭腦糊塗。

事實上，政友會民政黨對此中消息，他們是知道的。他們知道了自己的要求是虛幻，而仍要來這一套，不過是表現他們仍舊是會為民衆說空話的政黨而已。

二十三日會議再開，貴族院由二荒伯質問綱紀問題，涉及目下流行的挑發戰事的出版物，結論以為日本國民應取法於日本古代的武士道，陸相答辯，表示贊同。但是二荒伯却忘掉了沒有戰爭是沒有武士道呀！二十四日衆議院政友會議自安藤質問去年十二月間軍部發表的關於軍民離間的聲明書，當場與林陸相及大角海相頗有一陣衝突，齋藤見事不妙，乃於二十五日赴政友會總部訪島田總務勸以後勿作過分刺激軍部言論。——這就是日本的議會政治。

在法律上，議會產生現內閣，現內閣產生軍部；但是事實正好相反，政黨偷生於現內閣，現內閣偷生于軍部。

一九三四，一月三十一日，東京。

# 編輯後記

適之

△陶希聖先生是北京大學政治系教授。他曾在獨立評論上發表過好幾篇文章。(第二十，二四，三三，七二，七五，八一等號。)他說我的無為政治論是要「在官僚政治之下求一較好的辦法」，這句話，我可以相當的承認。可是他又說：「無為政治本是官僚政治之下的最高理想的政治。」這句話似乎未必能成立。德國與日本的官僚政治，何嘗不可以大有為？我所以主張無為政治，不過是因為這時候實在不是可以有為的時候。

△陳衡哲女士根據她的經驗，提出一個關於兒童教育

的意見。我們希望她的「學園」可以早日有個出現的機會。  
△關於林森先生的一篇短文，是我在一個月前為獨立第八八號寫的。那一期有許多好文章，我就把這篇抽出了。今天沒有工夫寫文字，恰好尋得這篇舊稿，改作了幾段，登在這裏充篇幅。

△「刑天」君是一個清華大學畢業生，現在在日本讀書。他的字跡好難認！他的署名好像是「刑王」，我想起陶淵明「刑天舞干戚」的詩句，暫定他為「刑天」。倘若我認錯了，請他來信抗議。

## 本刊前二期 的要目

再論無為的政治	胡適	第九十期目錄	國際流言之一個夢想	胡適
論田賦附加	何會源	答平津太晤士報二月二十四日的社論	胡道維	壽生
痛癢相關之國是論	孟森	論專制與獨裁	汪敬熙	汪敬熙
綏官之失陷及其收復	賈問津	做好做歹連拖帶打	汪敬熙	汪敬熙
閒談(五)(六)	汪敬熙	福州通信	汪敬熙	汪敬熙
編輯後記	汪敬熙	編輯後記	汪敬熙	汪敬熙

## ◎獨立評論合訂本出售

本刊第一至二五期和第二六至五十期及第五一期至七十五期，現在補印齊全，分別裝訂成冊，極適於圖書館及私人收藏之用。每冊價目：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圃」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	
本市	每月一元
朝鮮	每月一元
其租地	每月一元
香港	每月一元
澳門	每月一元
元九角	每月一元
蒙古	每月一元
南洋	每月一元
歐美	每月一元
四元	每月一元

## 第四卷 學風月刊 第一期 要目

- L.C.分類法之鳥瞰..... 舒紀維
- 中國上古時代刑罰史..... 孫傳瑗
- 淮南京者舊小傳初編..... 張樹侯
- 宣城著述人物考略..... 將元卿
- 讀書求是錄..... 孫傳瑗
- 詩譚三則..... 黃漢

金氏花近樓書目解題(十一)..... 金濤  
城南草堂曝書記(三)..... 王立中  
編印及發行：安徽省立圖書館  
定價：每册一角半年六角全年一元

## 第七卷 國際週報 第三期 要目

- 日本政黨聯合運動與政黨改造派之抗爭..... 陳次溥
- 德國與軍縮之危機..... 王伯祥
- 最近蘇俄政局之檢討..... 周琛
- 四國角逐中之西藏..... 司徒尹衡

國際是否為達到和平之路？..... 葉祥法  
本報每份定價大洋五分半年連郵費一元一角  
全年二元國外加倍(郵票代銀九五折)社址南京湖南路十八號

## 外交 評論 第三卷 第二期 要目

- 國際聯盟改組問題..... 袁道豐
- 德波互不侵犯條約論..... 徐公肅
- 日本外交之歷史觀..... 王芸生
- 美國對中日事件之政策及與國際合作之經過(下)..... 譚紹華
- 薩爾問題..... 蔣用莊
- 薩滿鐵道會社之現狀及其改遠方案..... 老拙
- 美國政府及輿論界現狀一瞥..... 吾行健
- 斯特萊斯曼的一生..... 周子亞
- 美國最近之貨幣論戰(美國通信)..... 潘楚基

蘇聯對外政策之基礎..... 李琴  
廣田弘毅論日本外交之基礎..... 沈鐘靈  
德意志與軍縮之危機..... 馬兆奎  
英意會談與國聯前途..... 陶奎  
麥唐納倫敦海軍會議演說辭全文..... 編者  
定價：每册零售四角半年(連郵)國內及日本二元二角歐美各國三元八角全年(連郵)國內及日本四元歐美各國七元  
社址：南京七街口壽康里

# 中華書局重印聚珍做宋版四部備要

## 發售預約

全書 一萬二千三百零五卷 分訂二千五百冊 預約祇售六百元 每冊只合二角四分

### 十大優點

- 選書 經國學專家再四討論專選切實有用之書校勘精詳之本
- 校對 特聘宿儒二十餘人每書輒校至十餘次期無魯魚亥豕之訛
- 工作 常川有百餘人工作至十四年之久集宋版精華故精字無倫
- 費用 俾製成之書所費已逾五十萬元與照相影印者迥不相同
- 分量 全書一百五十一種都一萬一千二百零五卷約十八萬葉分訂二千五百冊厚木板書約五千冊實為鳴清傳世
- 印刷 活字用新法及又用頂上油墨而工精印故翠色滿字字一楚儼如最精之初印本
- 版本 五開大木長八吋四分之一門五吋四分之二大地放寬書品閱人全書既便收藏又便檢閱
- 書根 每書行冊均用做字號字加印書根所有書名一律印明不獨整齊一律且便檢查
- 價廉 分十二種預約每冊僅合一角四分而分單倍於數倍購者購版購價須昂四五倍數十倍
- 易購 如一時無款可分十期繳購了拜每約二十一元七角洵輕而易舉也

(子種) 四部備要全書

全書三百五十一種部一萬一千三百零五卷分訂二千五百冊  
定價一千二百元預約一次繳六百元  
分十次繳者六百八十元第一次繳九十五元廿三年七月起每二個月繳一次每次繳六十五元

(丑種) 四部備要全書除廿四史

全書二百二十七種部八千零六十五卷分訂二千冊  
定價九百二十九元預約一次繳四百六十元  
分十次繳者三百三十元第一次繳八十元廿三年七月起每個月繳一次每次繳五十五元

(寅種) 四部備要選一百五十種

全書一百五十一種部四千六百二十三卷分訂一千二百五十九冊  
定價五百七十元預約一次繳二百八十五元  
分十次繳者三百三十元第一次繳六十元廿三年七月起每三個月繳一次每次繳三十元

(卯種) 四部備要選七十種

全書七十種部二千四百六十四卷分訂六百六十五冊  
定價二百八十八元預約一次繳一百四十四元  
分五次繳者一百七十四元第一次繳五十四元廿三年七月起每六個月繳一次每次繳三十元

(辰種) 十二經注疏

全書十三種部四百十六卷分訂一百一十一冊  
定價四十六元預約一次繳二十三元

(巳種) 青十三經注疏

全書十三種部四百六十二卷分訂一百二十九冊  
定價六十元預約一次繳三十元

(午種) 二十四史

全書二十四種部三千二百四十四卷分訂五百冊  
定價二百八十元預約一次繳一百四十元  
分五次繳者一百七十元第一次繳五十五元廿三年七月起每六個月繳一次每次繳三十元

(未種) 正續資治通鑑附通鑑目錄及明紀

全書四種部六百零四卷分訂一百九十四冊  
定價八十元預約一次繳四十元

(申種) 子書四十種附子略

全書四十一種部四百十卷分訂九十五冊  
定價三十六元預約一次繳十八元

(酉種) 理學書十四種

全書十四種部四百九十二卷分訂一百六十九冊  
定價七十二元預約一次繳三十六元

(戌種) 別集一百零八種

全書一百零八種部二千六百四十八卷分訂五百七十冊  
定價二百七十二元預約一次繳一百三十六元  
分五次繳者一百六十六元第一次繳四十六元廿三年七月起每六個月繳一次每次繳三十元

(亥種) 總集及詩文評三十三種

全書三十三種部一千零三十六卷分訂二百零八冊  
定價一百零四元預約一次繳五十二元

詳見本樣

普通單行本附本樣實售洋一角

片索當即寄贈





## 銀價問題與中國

何廉

自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美總統羅斯福氏批准倫敦白銀協定，宣布白銀計劃，收買銀塊，鼓鑄銀幣，於是美國一般代表銀利益之國會議員及政客，競亟亟於高唱提高銀價，甚至有主張建立一對十二之金銀比率自由鼓鑄銀幣者。我國對此其響應上之美銀政策，羣相驚駭。數月以來，臨渴掘井之計，呼救告苦之聲，時有所聞。日前報載實業部特延專家組織銀價問題研究委員會，探討利弊。而上海銀行公會復於二月二十日，致電羅總統，謂我國為銀本位國家，生產落後，對外貿易入超，提高銀價，必使中國現銀自動流出，將發生源涸流竭之恐慌，請其注意中國現情，加以考慮。同時又電致政府作有力之陳述，請其從緩批准倫敦白銀協定，一若白銀協定，必致銀價上騰也者。

普通所謂之「銀價」有二：一為白銀對重要金本位國家貨幣之市價；二為白銀對黃金之比價。自英日美等國先後採用貨幣膨脹政策以來，白銀對貨幣之市價，確已隨一般物價而飛騰。至白銀對黃金之比價，則其趨勢依舊跌落；不過其跌落率較二年前稍緩和耳。中國為世界唯一重

要銀本位幣制國家，銀價（指金銀比價）下跌和緩之初，即世界經濟不景氣侵入中國之開始。二年來國內工商衰落之情形日甚一日，現已至經濟恐慌最深刻化之地步。其主要原因，當然不在世界銀價之變動失常，而在我國幣制之不健全，蓋自身無健全之幣制，則易受國際間經濟政策之支配，一漲一落，均急惶而不知所措。年來國人對此，徒託空言，未見有實際之補救方法，今病已深，忽又重遭外感，尚不知自定根本辦法，徒呼救告苦；果於事何補也。茲從銀價變動對中國之影響及吾人今後應有之對付方法一略論之。

### （一）過去銀價變動及今後之趨勢

一八七一年以前，世界金銀比價，至為平穩，常在一比十五以下。自一八七二以後起始下降，迨至一八九〇年下降之速率更加。自此以後，金銀比價，漲落無定，歐戰以前，銀價最低之年為一九〇九年，金銀比價為一比三九·七四。歐戰期內銀價逐步騰漲，至一九二〇年金銀比價

竟回至一與十五·三一之比，尚不及一八七一年金銀比價之高（是年爲一比十五·五七）。但此種情形，僅爲極短時期之現象。自一九二一年起銀價即趨下跌，至一九二九年金銀比價跌至一與三八之比。一九二九至翌年，銀價復由一三八跌至五四，一九三一年更跌至一比七一。此時之銀價，已僅及一九二八年之一半，尚不及一八七一年以前或一九二〇年市價四分之一，實爲銀價有史以來未有之慘跌。

一九三一年算國停止金本位後，以英磅計算之倫敦白銀市價暫趨上升。一九三二年之平均爲一比五二·八六，一九三三年爲一比五一·九六。此種升漲，實爲英國貨幣膨脹英磅購買力下跌之幻影，蓋因倫敦金銀比價之平均，一九三二年爲一比七三·三三，一九三三年爲一比七七·一八，較之一九三一年之平均實則尚高也。美國自一九三三年三月實行貨幣膨脹政策以來，銀價亦隨一般物價而上升。美元對白銀之紐約市價，自一比七四·五三（去年三月之平均），一變而爲一比四七·一三（十二月之平均）。同時美國提高銀價之議，日高一日，於是一般人皆認白銀對英金之實價，確已猛漲。實則紐約金銀比價，去年十一月之平均爲一比七七·〇二，十二月之平均爲一比七七·

，五八，較之三月之平均亦尚高也。

一八七二年以後，各國相繼採用金本位，白銀需要減少而銀產逐步增加，此爲銀價跌落之重要原因。歐戰期內，銀價之升漲，爲一暫時的現象，自一九二一年起，即復下降。一九二九年後，則更呈暴跌之象，此半由於金價之上升；半由於銀價之下降。金價之升，係由於各國經濟衰落，金本位國物價下降所致；銀價之跌，則仍爲銀產增加與其需要減少之共同原因所造成。一九二三年以來，世界銀產額極爲固定，但與一九一四至一九二二年之時期相較，則增加甚多。而就需要方面言，印度向爲需銀最多之國，一九二〇年以後，停止鑄造銀幣；一九二五年復決定採用金本位制；出售政府存銀；一九三〇年三月，更征收銀貨之進口稅。世界銀產增加，而銀貨原有之最重要銷場，既出售大量存銀，又復施以封鎖。此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內，銀價暴落之原因也。銀之價格既跌，銀鑛無利可圖，因而停業或減少產量者日多。一九三〇年以後，每年銀產均有減少。同時因銀價之降落過甚，印度售銀無利，亦暫停其出售之計劃。又加以世界主要國家，次第實行貨幣膨脹政策，近復高唱提高銀價，間接上影響金銀比價，此一九三二年後，白銀對黃金市價之下跌所以日趨緩和。

也。

此後白銀對黃金市價之趨勢，仍不外視需要與供給為轉移。倘美國政府實行收買大量白銀作為通貨準備，或竟採行金銀并用之幣制，甚至他國尤而效之，同時假定銀產不變，則白銀對黃金之市價，必將逐步上升無疑。不過白銀需要增加，產銀者或因有利可圖，而擴充產量，市場白銀供給，將隨而增加，則銀價前途，殊不易預測也。

## (二) 一九二九年以來銀價變動與中國

### 國之重要經濟影響

先就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之銀價猛跌時期言之，一九二九年以來，世界經濟衰落，物價下跌，工商蕭條，貿易減少，至今尚未能恢復其固有之繁榮。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時期內，工商情形比較良好而不大受世界經濟衰落之影響者，僅蘇俄與中國兩國。蘇俄有計畫經濟之保護，採用國營貿易之政策，低價出售商品於國外，從全國收入觀點，雖有其相當之損失，然人民得因此而免去經濟衰落之痛苦。中國則因世界銀價之猛跌，遂得暫時免受世界經濟不景氣之波及。此蓋因世界銀價下跌之程度，遠超於金本位國一般物價之降落，（一九二五年紐約銀價較一九二

八年下跌百分之十弱，美國一般物價則下跌百分之二強；一九三〇年銀價較一九二九年下跌百分之二八，一般物價則下跌百分之十；一九三一年之銀價較一九三〇年下跌百分之二四；一般物價則下跌百分之十六。）中國為銀本位國，市場物價均以銀為量度之標準；世界銀價之跌既遠甚於金值之升，則銀幣對一般物品之購買力趨於低落，而以銀幣為量度之物價超於上漲，自為常然之結果。加以世界銀價之下跌，吾國往往後於外國（因國外多為銀供給之地，中國則為銀需要之地。），外國銀價先跌，因之國外銀價購買力恆較中國之銀購買力為低。故自一九二一年銀價日趨下跌以來，中國白銀進口年有增加。世界銀價跌落之最烈時期，中國銀貨進口亦達最高點。（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中國銀貨進口平均每年約值一四三，〇〇〇，〇〇〇元，較一九二八年以前十年之每年平均銀貨進口計多百分之八十以上。）此項大量之進口銀貨，在採用銀本位之吾國，多半作為通貨之準備。故一九二九年起，上海各中國銀行之庫存銀年有增加，而其增加之數殊甚巨。計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之平均每年庫存銀計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之多，較一九二八年之數，均高一倍有餘，若與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八年之十年平均數相較，則高

三分之二以上。因此銀根愈鬆，而貨幣之膨脹愈烈矣。

銀價下跌，中國貨幣膨脹，物價遂因之昂貴。上海批

發物價指數，自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每年平均均較上年上漲百分之十，華北批發物價指數在同一時期內，亦顯呈上漲之趨勢。夫物價低足以引起工商之衰落，及一般經濟之蕭條；物價漲則每能鼓勵工商之畸形發展，造成一種虛偽的經濟繁榮。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世界金本位國（除蘇俄外），均有經濟恐慌。中國雖內政不安，外禍頻加，而一般經濟均顯是一種非常的蓬勃氣象，如小工業之興起

（按一九三〇年小工業之營業總值計有一億四千四百萬元，較一九二九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一九三一年之小工業營業總值，更增至一億八千四百萬元，較一九三〇年增加百分之二八），市面資金之豐裕（一九二九年拆銀之平均率最高為二錢五分六厘，最低為五分六厘，一九三〇年則最高為一錢七分九厘，最低為一分七厘；一九三一年九月以前最高為二錢，最低則為無利拆借。至銀行存款利率，一九三〇及一九三一年之上海天津香港各大銀行，均相率減低一厘至二厘之譜），債市交易之繁盛（一九三〇年政府發行新公債四種，額面共達一億七千四百萬元，從中扣除舊債到期本息償還部分約計增發五千六百萬元，各銀行及

個人團體購儲中國政府所發行之金公債者共三千萬元之譜

。公司債及股票等之發行數額合計亦約在三千萬兩左右。一九三一年政府公債增發三億八千萬兩。全年公債成交總額共三十七億五千七百萬元，與其現交易之比例為八與一之比），地產營業之熱狂（一九三〇年上海地產價值總額之增加，共有十萬萬兩之鉅。其每月之成交數目，多則千萬，少亦數百萬兩。一九三一年地價繼續增高，全年成交數目共達一萬三千萬兩）；而最足表示工商活動之發達，一般交易之增多者，則為工商界之清算數值。此項數值，可於上海錢業公單收解數觀之。在中國物價上漲之時期內，上海錢業公單收解數額，自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增加百分之二七；自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增加百分之二五。以上種種，足証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世界羣受經濟恐慌之痛苦時期，而中國因銀價猛跌之屏障，遂致工商得臻於虛偽之繁榮。

從國外貿易論，似與經濟理論有不符之處，蓋貨幣膨脹，外匯隨物價上升，其上升之率恆較物價上升之率為多。（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中國一般物價上之率平均每年為百分之十。至外匯上升之率，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為百分之四五，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為百分之三二。

在此情形之下，中國市場買貨優於賣貨，就常態言，出口貿易量應有增加，入口貿易量應行減少。但按之中國進口貿易量指數，一九二九年爲一〇七·二（一九二六年等於一〇〇），一九三〇僅較上年減少百分之六；一九三一年僅較上年減少百分之一，至出口貿易量指數，一九二九年爲一〇五·五（一九二六年等於一〇〇），一九三〇年則反較上年低百分之十二。一九三一年雖較上年高百分之四，然較一九二九年尚低百分之八。推其原因：一則因世界經濟衰落，中國出口貨物大半爲生熟農產原料品，其在國外之需要，俱有減少之趨勢，而年來國內因水旱兵禍，生產實亦衰減，故其輸出量自難因外匯之上升而增加。同時中國在貨幣膨脹幻影之中，工商發展，消費擴充，舶來貨物三分之二爲棉米糖麵粉煤油等之日用品，及菸葉紙類木材鋼鐵等之生熟原料。其輸入量亦自難因外匯上升而減少也。

再就一九三三年至現在之銀價跌落緩和時期言之，一九三三年以來，金銀比價之下跌日趨緩和，其下跌率恒較一般物價下跌之率爲低。（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金銀比價下跌百分之二，而美國一般物價則跌百分之十）中國爲銀本位國，故以銀計算之物價，因而跌落，一九三一至一

九三二年之上海批發物價指數下跌百分之十二；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更跌百分之七。華北一般物價在此時期中亦趨下降。且自英日美金本位國實行貨幣膨脹政策，中國外匯跌落，而其跌落率遠超物價跌落率以上（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年上海外匯指數，平均每年下跌百分之二二左右）。因此中國市場買貨優於賣貨。同時因提高銀價之聲浪興起，投機者從中作祟，致國外（特別是美國）以金計算的銀價，乃在中國國內以上，遂造成一個國外金賤銀貴，中國金貴銀賤的現象。結果以金償付中國的入超，尙不如銀償付之有利。故一九三二及一九三三年中國銀貨出超（淨出口）共達三千萬元之鉅。一九三二年，世界銀價下跌不及一般物價下跌之甚，遂致吾國物價隨國外物價而俱落。加以銀貨外流，市面銀根更形緊縮，物價遂趨下落矣。

貨幣緊縮，物價下落，工商業之不景氣，沿之而起，例如歷年三月份上海之棉紗交易每日達三四千包之賣出，而去年三月則每日僅一百包至三百包之數。此外如上海錢業公單收解額，自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減少百分之三二；自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減少百分之二四。進口貿易量指數，自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減少百分之二一；自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更減少百分之十三。出口貿易量，自一

九三一至一九三二減少百分之二七；一九三三年較一九三二雖略有增加（百分之十八），然較一九三一年則尚低百分之十四。蕭條之情，於此可見。又查中國紗廠至去年年底完全停工者，其錠數約在六十萬枚以上，計佔華廠總錠數三分之一左右。江浙兩省絲廠共二百七十八家，去年年底尚勉強開工者十四家。上海絲廠六十五家，去年年底勉強開工者僅兩家。其他如麵粉業茶業等，莫不具同一衰落之象。倘此後銀價因美國白銀計劃之實現，而果使之高於一般物價，則吾國之貨幣收縮將益加厲，其結果必致物價下跌，生產停頓，金融呆滯，失業遞加，入超增多，銀貨外流，更遠甚於今日。且目前『白銀計劃』尚未實現，已因提高銀價之運動，促使美國銀貨投機者，積極買進，例如紐約五金交易所每日銀市成交總額少則五六百萬盎斯，多則一千七八百萬盎斯。僅憑此投機作用，銀價即有提高之可能，固不必待『白銀計劃』實現，需要增加，而後始趨上漲也。

### （二）銀價問題之對付方法

銀價變動，影響吾國經濟之劇烈，實由於吾國幣制之不健全所致，此吾人所應特別注意者。明乎此，則應付方

法之採取，自易知所遵循。蓋我國為銀本位國，銀價變動，足以影響我國貨幣對一般貨物之購買力，故問題中心，即在如何使中國銀本位貨幣對一般貨物之購買力求其安定，而不致易受銀價變動之影響。夫銀為世界產物，有世界為市場，價之高低，非任何一國所能操縱；亦非國際協定所能維持而永久不變，其理至明而易見。苟貨幣主權操之在我，具有完善自主之幣制，則外波之來，自有以禦之。吾則吐會經濟，國際匯兌，皆受他國經濟政策之支配，弊害之起自無已時。今日銀價變動之易影響於吾國經濟者，其故在此。

自銀價問題發生以來，國人所建議之應付方法，不外乎徵收生銀出口稅，或禁銀出口兩途。此種治標方法，其目的在保存中國現在必需之白銀數量。在目前政治經濟情形之下，此種方法，亦允宜採而行之，以為補牢之計；但其困難則有不能不慮及者。（一）自美提高銀價政策實行後，中美銀價已見差額，現相差百分之五。倘禁銀出口，其差額必更大。因我國貿易人超甚鉅，平時華商購買美匯，如美匯匯價甚貴，可運現銀出口以資抵償，則美匯不至貴。若禁銀出口，則美匯匯價必趨於漲。美銀匯價漲，即我銀幣匯價跌；亦即我銀價更跌。結果中美銀價之差額愈

大，而私運現銀出口者之利亦愈大，利之所在，將恐禁不勝禁。(二)即不直接禁銀出口而僅徵收相當之生銀出口稅以示限制，亦有困難。蓋徵收之額，當與中外銀價之差額相當。在平時固可收限制出口之效。而現在銀價有繼續之趨勢，顯然可見。如今日差額為百分之五，下月或可漲至百分之十五。當我徵稅之初，假定中美銀價差額為百分之五，徵收百分之五之出口稅。外商銀行縱須遵章繳納，彼等亦可儘量運出，暫時儲存香港等處，以俟漲至百分之十五時，始再運美。結果除去所付之出口稅，仍可逐百分之十之餘利矣。(三)外商銀行，即不自中國運出生銀，但可將庫存現銀賣與美政府，封存庫中，視之為美政府封存金，俟將來有相當機會，再行運出。即不運出，美政府之目的亦可達到。因其目的不在使用，而在封存，以期使銀價提高。至我政府則因治外法權尚未收回，無權可以利用此項存銀。故名義上現銀雖尙在中國，而實際作用上則與運出無異。

治本之法，當然須從幣制着手。我國談改革幣制者，多主張統一銀本位或採行金本位。以中國現在經濟力之薄弱，如即欲採行金本位制，無論不可能。即曰能之，亦不敢担保其對一般貨物購買力之永久穩定。英美前例，可資

證印。至統一銀本位，則對當前問題，不能大有裨益。爲今之計，惟有採行管理銀幣制之一法。管理貨幣制之目的，在藉貨幣之管理，以維持物價之平衡。查中國之銀本位，當二年前未爲世界投機者所注意之時，對發展中國產業，亦曾著有相當之功效。因銀價隨世界物價而起落，其調劑我國物價之作用，頗有類於管理貨幣制。所可惜者，銀之本身價值，逐漸下落，數十年來趨勢未變。用以爲貨幣，既不能爲「價值之標準」，亦不能爲「價值之保存者」。近二年來，各國貨幣跌落，益以投機者在國際行大規模之抬銀運動，銀值漸高，我國物價隨之下降。凡此種種，皆足以證明銀本身價值之不定，甚有害於我國經濟。國內有識之士，遂疊倡用金之議。然金之本身價值，苟不加以管理，則其害較銀尤烈。與其以暴易暴，何若仍銀本位之舊貫，而加以管理。採用此法，使國幣本身自有其價值，對外既不受世界投機者之操縱，對內復得物價相當之安定，於計殊得。第管理銀幣制之採行，亦不能無困難，第一，管理幣制，爲整個政治經濟問題，政治組織不健全，經濟政策不樹立，則管理亦不易言。第二，政府財政困難瀕於極點，預算不敷，月有短虧，使得操管理幣制之權，則無法支應之時，行將出於發鈔票，流弊亦不可勝言。雖然



，兩法相較從其長，兩害相權取其輕，管理銀幣制，固爲可行之法，取其長而去其弊，是所望於當局者。

## 讀憲法初稿

陳受康

至釐訂管理貨幣制之方案，須專家詳實研究，始能爲之，非短文中所能討論也，故不及。（完）

本月一日，立法院公布新訂的憲法初稿全文，並指定在這一箇月的期間內，請國人批評。所以連日各報都載有批評和討論的文章，對於人權保障，國民參政，政府組織，國民經濟等問題，都有詳細的討論。這次公布的憲法草案可算能喚起言論界的注意，和專家及學者的興趣了。我將憲法初稿讀過之後，也有私見幾點，簡略地寫了出來請大家指教。

### （一）對於國民大會的意見

我對於國民大會的意見，有好幾點，現在只提出我以爲重要的略說一說。

大會代表的選舉，憲法初稿第五章第四十七條規定，西藏人民和海外華僑的代表名額，另以法律規定。那些名額怎樣分配，現在尙未可知。但是國內人民應選出的代表名額，却完全以區域——縣市或與縣市同等的區域——爲根據。照我個人的私見看來，我國的縣市，面積的大小，

既有不同；人口的分配，也有衆寡的差異；倘若照現有的縣市區域而爲編劃選舉區的唯一根據，每區選派代表一名未免太漠視人口的數目了。我們若想保持每個縣市區最少也有代表一人出席國民大會，那麼憲法裏面，應該規定一個代表的數率，使人口衆多的縣市，凡超過數率幾分之幾的可以添派代表一名，如此人口的比例和區域之劃分，都可避免偏重的弊病。去年吳經熊先生發表的憲法稿，也曾注意到這一個問題，他將選區分別爲兩種，一爲縣選區，「縣選舉，每縣及其同等區域，選出代表一人。但人口超過百萬者，均增選一人。」一爲市選區，「市選舉，市人口每三十萬人選出代表一人。」這樣辦法，能將區域與人口相輔而行，略爲較妥。但吳稿市區代表的名額，強于縣區的三倍有奇，似未免過于推重城市而忽視農村了。

對於國民大會的職權，我們應該注意牠的職權的歸宿或是付託的問題。大會幾種重要職權，如創制，複決，修

憲等等，當大會閉會後便無所寄託了。國民委員會當大會閉會後接理的，不過是大會秘書處和籌備下屆大會召集的職務，其他憲法賦予之權，將如何行使，憲法草案中絕未有提及。我將憲法草案細覽一遍，不覺起了一個大疑問：國民大會究竟是那一種的機關，——為立法機關，為裁判機關，抑為諮詢機關？——憲法草案裏，沒有將牠說明。最可詫異的是罷免權，創議權，複決權當閉會後如何行使。如需要召集臨時大會，而憲法上大會却沒有自動要求臨時集會的賦予權。那麼國民的主權，在憲法草案裏，僅極輕微。罷免權還有監察院，國民委員會及立法院代人民行使，創議權也可以候到三年一次的大會開會時才創議。但複決權呢？立法院雖然不是天天立新法，通過新議決案，也是常常有新法和議決案，關係到國家人民的權利幸福的。那一種法律，那一種議決案，是應該要交人民代表公決的？是否立法院的議決案，要等到總統提交複議而立法院以三分二以上的票數再通過，然後由大總統交國民代表複決呢？憲法對於這類的問題，似乎應該有更明確的規定。

(二)我對於國民政府職權的意見

憲法初稿聲明國民政府是總統及五院組織成的。這是一個具體的機關，還是一個抽象的名詞呢？若果說他是個

委員制的機關，憲法初稿中又沒有說明國民政府會議之組織。但照憲法上賦與牠的職權，牠又不像是一個抽象的名詞。為什麼我要提出這問題呢？因國民政府與總統的「否決」權有很大的關係。大總統可以將立法院的議決案發還複議的，這種憲法權，就是否決權，是責任總統制的總統職權之一。美國的總統便可以自由行使這種職權，但因為全國的行政事務全由總統個人負責，而總統「內閣」的「閣員」又都是他有權罷免和委任的，所以行政內部沒有僵局發生的弊病。我們的憲法初稿以大總統公布法律，法令，都要每個主管院院長副署的，似乎是責任內閣制的原則；但是頒布法律，又以國民政府名義出之。若果國民政府不是一個抽象的名詞，便是一個委員制的機關，每當立法院將決議送交國民政府之後，在十五日內，國民政府便要召集會議一次；當會議中，萬一有四院院長（立法院院長許不會在內）反對該議決案，但是總統却表示贊成的時候，四院院長不能強迫大總統行使「否決」權。若果大總統與立法院的意見分歧，那麼大總統個人便可將立法院議決案否決；無論五院院長的態度如何，也不能停止大總統行使他的憲法賦予權。所以國民政府的大總統，若果應處于「虛君」的地位的，憲法便不應賦予他以否決權；若果是一個

委員制的組織，否決權便常在委員會——國民政府——而不該授予總統個人；既授予總統個人，便不該要國民政府的法律，法令，經大總統署名之後，還要主管院院長副署，方可公布。憲法初稿規定，立法院呈交國民政府公布的議決案，于達到後十五日便公布。如果大總統因拒絕院長要求行使否決權而堅持立法院的原議的時候，主管院長，不肯副署，而大總統又沒有單獨行使罷免該院長的憲法權，那不是發生了行政內部的僵局，法律便無從有生效的公布方法嗎？

還有一點意見，我不敢將他輕輕放過的，就是立法院對於行政院的不信任案。爲伸述我個人私見的利便起見，首先我要將行政院的地位說明。憲法草案裏聲明，行政院爲國民政府的最高行政機關；行政院長的產生是由總統提經國民委員會認可任免的。從政治關係上，行政院與總統及國民委員會的政見，應該都很融洽，否則行政院院長不能獲得總統和國民委員會的信賴。即使行政院長就任之後與總統及國民委員會發生政見的差異而不受指揮時，總統和國民委員會可以將行政院長罷免。所以行政院長是向總統及國民委員會負責的。同時立法院爲立法最高機關，可以向行政院表示不信任案；但法院的不信任案，要經過國民委員會的處理，才能發生效力的。這一點，從表面上

看去。似乎可以保護行政官員不受立法機關的過分裁制和約束。但行政與立法間發生的衝突，就由這一點而發生。普通內閣制政府的原則，內閣政府是由議會而產生的，所以他的去留都靠議會的信任與否而定。內閣不能得國會信任時，可以請求元首或相當的機關，行使憲法賦予權，將議會解散。現據憲法初稿，立法院沒有解散的可能性，那麼一到了立法院向行政院提出不信任案時，政府便有衝突的危機。從政治關係的線索而揣測，國民委員會與行政院關係較深，與立法院的關係較淺，因爲立法院和國民委員會是兩個獨立的機關，而行政院與國民委員會既有上述的連帶關係，立法院的不信任案，若因尋常政策和行動問題而起的，恐怕國民委員不容易將他接受。到時立法和行政兩機關，便處于相峙的地位。若果行政院得國民委員會和總統的同情，便難有向立法院讓步的趨勢。那麼兩方堅持，便成僵局。我們更曉得行政院和立法院間的關係至切，所有政府的預算案和尋常的行政間應興應革的法律案，都要向立法案提出，一到僵局不可解救的當兒，全國都受他們的影響了。說到解決這個僵局的問題，照我的揣測，只有一個可能的出路，就是國民委員會可以四分之三多數通過召集臨時國民代表大會，將行政與立法間的僵局亦

諸國民代表，聽由他們解決。如果國民委員會是與行政院表同情的，知道最後的勝利還是在行政院的，也許肯召集大會。但如果勝利難分的話，國民委員會使不容易召集國民代表大會了。

就當行政院和立法院沒有僵局問題發生的時候，行政院的地位，可以受總統的牽掣，立法院的干涉，和監察院

## 變動中的家庭

自從工業革命之後，家庭的性質，已經逐漸變動了，而且這種變動，到現在還未停止。將來的家庭，到底會變成什麼樣子，現在固然很難預測，不過在過去一二百年，家庭變動的成績，我們無妨攷察一下，也許從這種攷察，我們可以料到一點未來的趨勢。

研究一種社會制度的變遷，最好從他的職務下手，因為制度的變動，可以從他的職務的變動，看得最為分明。家庭是一個複雜的制度，他的職務是很多的。第一，他有傳種的職務，社會生命的能否維持，就看家庭對於這一點能盡職與否。以前的家庭，很少是不生育的。據許多人口專家的估計，在工業革命之前，不育的家庭，只佔全體白

的彈劾，好像「四面楚歌」的樣子，辦事也就夠困難了。行政院分頭負責太多，受別個機關的裁制過深，行政上極欠靈活，這也是值得考慮的一點。

我對於憲法草案裏的，副總統，國民委員會，和地方制度，尚有幾點意見，現為時間及篇幅的限制，待再有機會時，再寫出來討論。

吳景超

分之二以至百分之四。這些人大約都是因為身體有毛病，所以不能生育，并非能够生育而故意不生。但是近代的家庭，不育者的百分數，比以前加增許多。在工業化的國家中，每每高到百分之十。這種國家中的上流階級，不育者的百分數，常達百分之十六以至百分之二十以上。這些人并不是完全不能生育，大多數乃是利用生育制裁的結果。有了這種智識的人，假如不要兒子，兒子自己是不會來的。我們再看那些有子女的家庭，就可知道現代的家庭，平均所生的子女，也比以前的家庭為少。在西北歐的國家中，據人口專家如顧靜斯基等的計算，現在一百個母親，只能生九十三個將來的母親。難怪這些國家中，有人在那

兒獎勵生育，有人提倡凡生第二個小孩的，由國家給與補助金，又有人提倡凡作母親的，由國家給與薪資。這些事實，都表示現在的家庭，對於傳種一事，已經不能盡職，須由國家出來監督與扶助了。

家庭的第二種職務，便是生產與消費。以前在農業社會中，家庭是生產的單位，男耕女織，一家人的生活，大部份皆可以自給。在工業的社會中，生產的單位，已經由家庭移到工廠，家庭中幾無生產事業可言。只有少數的農民（在英國農民還不到全人口的百分之十，美國也只有四分之一）還以家庭為生產的單位，不過他們生產的目標，也起了大的變動，不是為自給而生產，乃是為市場而生產了。現在這種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農業，將來還要變動，假如有一天合作農場可以代替家庭農場，那麼便是在農業中，家庭也不能成為生產的單位了。再從消費方面來看，雖然家庭還是佔一個重要的位置，但是在消費的過程中，有許多工作，原來是由家庭負擔的，現在也逐漸移到社會的手中了，關於這點，美國的統計最詳，我們可以舉出幾件來說。自從一九〇〇年以後，美國的人口，只增加了三分之一有奇，但飯館中的招待，却加了一倍以上，開飯館的人，加了百分之一百五十八，這是表示吃飯一件事，

有移到家庭外面去的趨勢了。男子的衣服，早就不在家裏做，便是女子的衣服，女子自己動手的也漸少了，這是從家庭縫紉機器銷路的減少可以看得出來的。此外如做麪包，保藏食物，洗衣服等家常工作，也都有一部份由家庭移到社會中去。結果是已經結婚的女子，有好些因為家庭中沒有很多事可做，都加入社會去活動。在一八九〇年，美國七十二個做工的女子，有十個是已經結婚的，到了一九二〇年，四十二個做工的女子中，便有十個是已經結婚的。還有一件有趣的事，便是三十年前，二十二個結婚的女子中，只有一個在外面工作，在一九二〇年，十一個結婚的女子中，便有一個在外面工作了。這些事實，如合起來看，可以表示在消費方面，家庭已沒有以前那樣重要了。

家庭的第三種職務，便是教養子女。在以前那種士之子常為士，農之子常為農，工之子常為工，商之子常為商的時代，父親就是教師。雖然在家庭之外，也有受訓練的地方，但家庭的教育職務，無論如何，是很重要的。現在便大不然了，在教育很發達的國家中，教育的機關，有幼稚園，有小學，有中學，有大學，有各種的專門學校。一個人在幼稚的時代，便從家庭之外去受教育，他的學問，他的技能，可以說大部份是從家庭以外得來的。他從家庭

中受到的影響，如與從社會中受到的影響相比，可以說前者是很薄弱的。在蘇俄等國家中，現在還有託兒所的設備。在這種制度之下，兒童受社會教育的影響，又提早了兩三年。這是從教的一方面說。再從養的一方面說，家庭現在還負一大部份的職務。雖然歐美的小學中，也有供給午餐的例，但這是比較少見的。因為家庭還負責養子女的職務，所以國家雖然實行義務教育，有許多貧窮家庭中的子女，便不能充分利用這種機會。他們到了適當的年齡，雖然還有志深造，雖然國家也不收他們的學費，但他們為飢寒所迫，只好捨求學而謀職業了。為矯正這種缺點起見，有許多學者，提倡國家應當代替家庭，去盡「養」的職務。凡是求學的青年，國家在不收學費之外，還應給以補助金，假如這一步可以做到，那麼一切青年，不問貧富，便都有同樣受國家教育的機會了。

家庭的第四種職務，便是互助以抵禦外侮及危險。在中國的內地，現在還有族門的事發生，因為這種地方，政府的力量達不到，一個人如受別人欺侮了，自有族人來替他抱不平，替他來主持公道。假如他受人殺害了，他家庭中的，會挺身出來替他報仇。假如有什麼內亂發生，或土匪來搶劫，家庭中的人，總是通力合作，來謀一家人

的平安。這一切職務，在歐美等國家中，都不必由家庭來操心，自有政府負責了。除却這些外侮之外，我們在生活過程中，還有許多危險，如生病，如失業，如殘廢，如衰老。在以前的社會裏，一個人如遇到這危險，他的生活，自有他的家庭來替他安排。但在近代，這一切職務，也逐漸轉移到社會的手中去了。譬如在英國，一個失業的工人，國家會給他失業保險金，以維持他的生活。其餘的危險，社會都給他有相當的保障。大約國家的職務越擴大，社會的組織越嚴密，一個人遇到急難，社會自有解決的方法，不一定要家庭來幫助了。

家庭的第五種職務，便是供給娛樂。在農業社會中，一家人之工作完畢，大家聚在一起，或閒談，或唱歌，或遊戲，便把閒暇的工夫，輕輕度過了。但在工業的社會中，娛樂也社會化了。男子女子，各有他們的會社，各有他們的俱樂部。此外還有許多商業化的娛樂，引誘人從家庭中出來，消費他們的閒暇。在一九一〇年，美國只有九千多個電影院，到了一九二八年，便加到二萬餘。這二萬多個電影院的全年收入，在五萬萬元以上。此外還有體育場，跳球場，球場，戲院，都是吸收人們外出的機關。還有一八九五年發明的汽車，每逢星期日或假期，總在那兒催

促人家到外面去玩。只有無線電的發明，到可使一些人安心留在家中。不過無線電所供給的娛樂，也是從社會中來的，而非家庭中自創的。所以時至今日，家庭對於娛樂的職務，可以說是把大部份讓渡給社會了。

家庭的第六種職務，便是財產的傳授。在社會主義的國家中，這種職務，已無足輕重。便是資本主義的國家中，財產的傳授，現在也要受國家的干涉了。遺產稅便是國家干涉這種職務的工具。在英美等國家中，凡直系親屬接受遺產的，稅額最低；旁系親屬接受遺產的，稅額較高；無血統關係的人，接受遺產，稅額最高。另外還有一種普遍的原則，便是遺產稅每是遞進的，遺產愈大，所納的稅也越高。這是在資本主義的國家中，一種均貧富的最好方法。美國的省政府，在一九二七年，從遺產稅中的收入，總數在一萬萬元以上。有些省政府，遺產稅的收入，要佔全收入百分之十五左右。有有些學者，以為遺產稅的稅則，還嫌太低。譬如美國最高的遺產，只征收百分之四十。直系親屬接收遺產時，最高稅則只是百分之十四。假如能由百分之四十，加至百分之八十或九十，那麼一個人的財產，在死亡時，便大部份由政府收去了。政府以這種收入，來推廣社會事業，社會上一般人的福利，便可增加許

多。現在的潮流，似乎正向這一方面前進，將來一個人的財產，到了臨終的時候，大約不會由他個人分派，而由政府來代行職責了。

家庭的第七種職務，便是供給感情上的食糧。一個人在生活中，需要感情上的安慰，而這種安慰，在以前和現在，一大部份全靠家庭供給。除却家庭之外，友朋及事業，也是我們感情寄託的所在。現在的家庭，對於這點，是否較以前的家庭為能盡職，很難用客觀的事實來證明。我們先拿父子的關係來說，以前的家庭大，現在的家庭小，所以每一個子女，從他的父母手中所得到的慈愛，也許較以前為多。但是社會的變遷很快，兩代的人，在不同的思想環境，不同的教育制度長成，彼此互相了解的程度，也許不如以前那樣的深刻。這種情形，是可以使家庭中兩代間的人，加增隔膜的。至如夫妻間的關係，如專從離婚的數目字上看眼，無疑地可以證明現在破裂的家庭，數目較以前為大。不過如從夫妻間的感情上看想，現在還沒有材料，證明過去夫妻間的感情，比現在的夫妻濃密。以前的夫妻，儘每天爭吵的，但因風俗習慣及經濟的關係，他們不一定離婚。這種家庭，雖然沒有破裂，但并無幸福可言。現在的家庭，因為有離婚的方便，所以那些沒有破裂的

，到是快樂的佔大多數。美國會有一個研究，問一千個已經結婚的女子，看他們的婚姻生活，是否滿意。這些女子，大多數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在他們的答案之中，有八七二人，認他們的婚姻生活爲快樂的；只有一一六人，自己承認不快樂。還有一個研究，包括七千四百十二個家庭。研究者設法去問與這些家庭認識的人，看由他們的觀察，這些家庭中的夫妻，是否快樂。結果有百分之七二的家庭，被認爲是快樂的；只有百分之九，被認爲不快樂或感情極惡劣的。由此以觀，近代的夫妻關係，大多數還是滿意的。可惜我們沒有前代的材料，拿來與此相比。

家庭的職務，也許還不只以上七點。但從上面片段的

討論，我們已可看出，家庭的職務，已比以前減少，而且餘留下來的職務，除一二點外，有逐漸社會化的可能。這種社會化的結果，對於大多數人的福利，我們認爲是有益無損的。家庭在以前的社會中，佔有很重要的位置，他在各種社會制度中，可以說是最重要的，對於人類的福利，可以說是最有密切的關係。在時代推移的過程中，家庭逐漸喪失他的重要性，他在社會中的最要地位，已爲經濟制度及政治制度所取而代之了。工業革命所發生的影響，我們認這是最要的一點。

二三，三月，十日。

## 爲什麼我們的政府不能做出像樣的事業？

閔

從前我覺得很奇怪：爲什麼中國現代幹政治的人，在台下儘管說得很漂亮，到台上却又做不出什麼？在台下不但攻擊別人的地方狠有理，並且自己的主張也很堂皇。其漂亮的程度，幾乎是天花亂墜，幾乎使我們老百姓目眩心迷，全抱着滿腔的熱望，以爲一旦他們上台，不堪回首的中華就會好了，就會煥然一新，不像從前那樣的『擦濫污

』了。——然而事實纔不是如此。到了他們奪得政權以後，髣髴依然是吳下阿蒙，不僅成績不斐然，不僅不像土耳其，不僅不像德意志，不僅不像意大利，也不像不像蘇俄，甚至連空袍也漸漸地由大一變，至於小；小一變，至於○了。空袍不放以後，便匿迹銷聲，蕭規曹隨，結果拿錢，吃飯，睡覺，坐車，找人，開會，吹牛，拍馬，上衙門



，畫例行，遊名勝，跑上海，住租界，完事。

掉過頭來看看西方的政治舞台，似乎不是這樣。他們在野所吹的，不是空頭支票，上台去真要兌現。不兌現，便要大受別人的攻擊，尤其是同黨的攻擊。受了攻擊，自己便不好意思戀棧，也便會爽爽快快地下台，讓別人來幹。決不會拖泥帶水，或如王八喇着了什麼寶貝，將頭一縮，死也不放。我常常想：這是爲什麼？隱伏於這種差異後面的原因在那裏？很想找得一點相當的解釋。

頭一個跑上心來的觀念是：西方幹政治的（至少是主要的角色）是政治家（Homme d'état），我們的是政客（Politicien）。政治家不是隨便什麼人都可以冒充的。他一定得有學識，有人格，有信條，有誠意。他的信條是由平時自己的研究得來，不是吹影吠聲，抄襲摸擬，作瞞心昧己的勾當。惟其有誠，所以纔能堅持；惟其堅持，所以纔有人格；亦惟其有人格，所以纔能得民衆熱烈誠摯的愛護，久而彌篤。政客不是如此。他常常心口相違，時時觀望風色。主張沒有一定，夕是可以晨非。嘴裏只管以民族國家爲前提，實際則私心大於一切。他狠缺乏誠意，他尤其缺乏學識。學識與誠意，這兩事是互相關聯的。見不明則信不真，信不真則易游移。變來變去，結果許多金字招

牌，徒爲他騙入市官固位的工具。民衆既一再受騙，結果恨烏及屋，連那塊被污的金字招牌也一齊討厭了。這當然是狠可慨歎的事體，但也是狠自然的現象。

中國現代的政治社會，是一個撲朔迷離的政治社會，令人莫辨雌雄。原因是：政客太多，政治家太少。孫中山是配稱做政治家者。但四十年如一日的，就沒有幾個。孫中山臨終別無長物，只有若干卷帙以遺夫人；他的日常生活有規律，據說九點以前一定要看書報，這是他偉大人格的來源。又因爲他能拋開自己，能以公衆的福利爲前提，所以能維繫人心，號召忠義：這是他能造成時勢的所自。中庸說：『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撫今追昔，不禁感慨係之！

如果孫中山沒有研究沒有心得，沒有理想，沒有信條，沒有誠意，我相信：他的大欲恐也如今之頑貴，不外乎飲食男女，車馬衣服……。事實告訴我們：內重者外輕，內輕者外重。沒有修養，沒有精神生活的人，當然要受物質的堅牢束縛，一則不能自拔於流俗，再則只逐逐於貨利聲色，與恒河沙數同腐朽。但修養這個東西，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得來，必須經歷長久的歲月，刻苦用功，纔可以有相當的結果。試問今之治人階級，有幾位注意你這

一套？又有幾位願幹你這一套？幹這一套的多麼苦！多麼傻！多麼慢！但個人不苦不傻不慢的效果，却弄得國事一場糊塗，江河日下。覆巢之下，沒有完卵，嗚呼哀哉！

第二個應有的解釋是：西方民衆程度高，我們的教育尙未普及。因爲他們的民衆程度高，所以社會真有公是非，真有輿論，而且輿論也真能制裁。惟其真能制裁，所以當道者有所顧忌而不敢。換言之，即不如中國的肆行無憚。中國民衆，直到現在，還是大多數目不識丁，怎能說得上具有現代公民應備的常識？更何能教他們行使民國主人翁的主權，監督政府？老實說，民國招牌雖然已經勉強

掛起二十二年了，但一查內容，試問是不是和專制時代差不多？沿江沿海的幾個大城市，雖然有些更變，但內地的狀況，試問有些處所，是不是也許連曩日都不如？從前山高皇帝遠，作官的人便可以相肆淫威，欺負無識無知的老百姓。現代『綱紀陵夷』，自然不在話下（要證據嗎？請看四川的羣魔！）。我相信：西方有如中國這樣的官吏，他是走不了路的。但在中國則可以安富尊榮！我也相信

：西方的兵士，教他們去作內戰是不成的。然而在中國則自己殺自己格外勇敢（要例證嗎？請看四川去年及今年二劉的那些惡鬥）！這知事細數起來，真可謂『花日繁多

，不勝枚舉』。因爲我們的民衆程度太低了，所以幾乎絲毫沒有制裁的刀威，而當局得以爲所欲爲。不幸這爲所欲爲幾乎又盡是壞事，盡是不像樣的事，盡是高鼻子報告出來令僑民羞慚無地的事！（這的國外報紙雜誌且不說，請就近看看上海法人所辦的『中國國民集誌』La Revue Nationale Chinoise，特別是各省的通訊一欄）。因爲西方民衆程度高，所以他們當局，時常小心翼翼，只能爲公衆謀福利，不敢自私，不敢亂來，更絕對不敢勒種鴉片。這是消極方面的效果。

在積極上，因爲他們一般公民的程度高，好領袖容易被入認識，被人擁戴，像樣的事業也容易進行。我們呢，因爲一般公民的程度太低，就有好領袖，一則不容易爲大眾認識，再則難於得大眾真誠愛護，三則他的大政計畫，也難於按步就班地展布出來。爲什麼呢？小之一個政治團體，大之一個國家的組織，和人體有些髣髴。領袖譬如腦筋，助之者好似五官百骸。腦筋誠然要好，但五官百骸也不要太壞，纔行。假如光是一個腦筋好，結果勢必有心無力：想得到，做不到。猶之乎一位癱瘓的人，腦筋要教脚走，脚不走；腦筋要教手動，手不動。腦筋處受他們的拖累，牽掣，就是有點力氣，也全消耗在內部，不能表現

於外了，怎能說得上按部就班地作事？不幸中國的政治社會，有時就像如此。中國一般人知識道德的水準太低，他們不認識真正的領袖，也不願服從真正的領袖。許多受過不良教育的人，是『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許多自私自利的人，是只認識金錢，不認識道義。在西方可以找得出犧牲一切的信徒，生死以之的信徒，有如吾國古代隨從墨子者可以赴湯蹈火的信徒。在西方真正有力的民族，與其說是由於他們的大砲多，由於他們的飛機軍艦坦克厲害，毋寧說是由於他們的組織好，紀律好，訓練好，一致對外的習慣好。在中國現世，不幸則只見炎涼，只見勢利，只見嫉妬，只見叛變，只見一盤散沙；罕有同情，罕有了解，罕有合作，更罕有重羣輕己，見義勇為。很奇怪，中山生時，許多罵他是大砲，不聽他，甚至於要毀滅他。不但異社如此，就是同黨亦然。解釋掙扎，他消費在此中的時力，不知凡幾，試查民二失敗後，陳其美致黃克強書，和中山自己致黃克強書，再查後來番禺事變的因果，便可知吾言之非謬。中山死於肝癌，據說是積憤所致。假使拂逆不若彼其多，或亦不至壽終如是其早，中國也或者不至如是其糟。這是一般公民程度太低，在積極方面連累好領袖的一個例證。

第三，說到政府本身。依個人的觀察比較，狠感到西方是對事的政府，中國是對人的政府。這話怎麼講呢？西方一個領袖上台，他所能更動的人員非常有限。不但事務官各有專司，不用調換；就是政務官也不是非全體滾蛋不成。他對於飯碗的問題——在中國認為是天大的問題——不費多少心思時間去支配。一上去便振起全副精神出來作事體。其屬員因有法規保障，也用不着懸心吊胆，逢迎上司，見好同僚，而只夜以繼日地想法子來處理事體。這事體是他們公共的事體，他們的立場是國家民族的立場；不是某人的私事，也不是某君的私意。結果其事體辦好，洵屬理所當然。我們的呢？常常某部長登台，上自次長，下至門房，有時全體都得改易。最奇妙的是部長為某省人，則該部便成某省人的地盤。只消一聽部中人說話的口音，便可知曉。試問宦海以這麼一個方式升沈，怎能不『人人找事，而事却又找人』？據說某新貴初到部時，所接薦信便有四百封之多。一一看？不可能。只好面子大的拆開，小的仍舊；有的設法安插；有的婉詞謝絕。粥少僧多，苦心熬費。這個難關初度以後，回頭還有應付這個防範那派的無盡問題，更複雜更嚴重的問題。這問題時常佔據作者心靈的全部。本來中國社會的人是得罪不得的，得罪了

便要莫明其妙地出鬼。因爲怕出鬼，所以必需時常費不少的時力來提防，來破除，然後纔可以保短期的太平無事。

試問：西方是二十四小時一天，東方並不加倍；高鼻子是二目雙耳，黃帝子孫並不是六臂三頭；以同樣的時力去作正事，猶恐不逮，何況用法大相逕庭？久而久之，成績相去懸殊，自然無待龜卜。有位曾在政界作官的人告訴我道：『在中國社會服務，當以七分來對人，三分來對事』。這真是一句狠有經驗的格言，枕中的鴻秘。吾人從這話裏，可以看出一般肉食者鬼混無聊的情形。他們一天到晚，你敷衍我，我又來敷衍你；你欺騙我，我又來欺騙你。說話力求圓滑，手段競賽高明。表是表，裏是裏。其複雜糾紛曲折巧妙的程度，可以教比較簡單老實的碧眼兒瞪目結舌，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他們於頭痛之餘，無以爲名，只好新創一詞，叫做『理不清懂不倒的怪把戲』（Chinoiserie）。國人本還有點小聰明，但可惜這點小聰明，差不多盡在這方面用去了；照例的『等因奉此』，『等由准此』，也就只好如是地對付完了。假如全世界的人都在那裏像我們的敷衍對付，也許我們還可以長苟延殘喘。無如別人認真地幹，極有效率地幹，而我們只是紙老虎一杆，只是銀樣蠟槍頭一杆，你說，到實際接觸，怎麼不棄甲曳兵，醜態

畢呈？中華民族的老臉，百年來真已够丟盡了，豈惟今日？蘇老泉說得好『事有必至，理所固然』。這本是可以預測的事體，無須乎一定要到戰場上纔曉得。

回顧既往，所得的教訓，已够多了。如再不覺悟，再不掉轉頭來認真對事，將來必還要更不堪問哩！這對人的壞習，本來和整個的社會組織，和一般的風俗有關。不過要改總須從位高而望重者做起，不能推諉因循。中國歷來是人治的國家，至今尙未過渡到法治的軌道上去，所以多人俱惟當權者之馬首是瞻。他們的一言一動，觀聽所繫，影響非常大，也非常快。好事如此，壞事亦然。論理他們當如何自愛，如何小心，如何努力，纔對得起民族，纔對得起職位，也纔對得起他們自己。然而逸樂性成，羊公之鶴不舞，令人急煞。往事已矣，將來假如老不改，非惟自不長進而已，結果是自誤誤人，將整個民族拖入阿鼻地獄，將斷送四萬萬無辜老百姓的前途！中國現在的局勢，已經够危險了。臨巖勒馬，也許還可有救。倘再不止步，恐將至於潰爛不可收拾，那時勢必悔之已晚。東隣有位生物學家說得很對：

凡是一種東西的滅亡，總有兩種原因：一個是在外面的，由外面動作的原因；一個是內裏生的，由裏

面動作的原因。就看日本國的歷史，平家滅亡，源氏代興，決不是小家繼續健全的發達，保持着優勢，源氏却比他更發達，更優勝，兩家競爭的結果，平家倒了。平家內裏要沒有可亡的原因，那地位很不利的源氏，那有推倒他的希望呢？那羈縱的平家不久就滅亡，是由於平家內裏可亡的原因，已經在那裏動作，早就很危殆的。源氏從外面一推，好像內部朽了的枯木，遇着風一吹就倒，所以輕輕的就覆滅了。生存競爭非常劇烈的世間，無論怎樣佔優勢的動物，內裏生了可亡的原因，到了「大命乃傾」的時候，被那處於劣等地位的忽然傾覆了，這是當然的。中生代裏自命惟我獨尊，橫行闊步的「尹克奇阿梳爾斯」和「布理西阿梳爾斯」的一代而滅；第三期裏可怕的猛獸，可驚的巨象，忽然滅絕，不留下子孫，和平家的滅亡，都是由於一個道理。（丘淺治郎，進化與人生，劉文典譯，頁三五六）

我們引用這話，並非危言聳聽，心中實有無限的隱憂。來日大難，望哀哀當局細思之！

本來對人不對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吾國現代社

會的通病。因為在官場中更顯著，其關係也更重大，所以本文特別拿治人階級來講，希望有點轉機。當然，在這轉機中，除開人的問題以外，制度還須改善。例如行政機關的組織要合理化，辦事的效率要提高，以及陶內（Tawney）所建議於吾人的二事：（甲）應聘請外國官吏會有特殊行政經驗者來幫助組織各種行政事業；（乙）中國應派這些經嚴格選擇的官吏到外國行政機關去作長期的實習，我是贊同的。那些話，因有人說過了，所以不用再講而特別注意人的問題。在改造過渡的時代，我有種偏見，以為人的問題是樞紐問題，核心問題，不容忽視。忽視了就是好制度搬過來也不成。不信，再瞻能！

總起來說，個人以為我們的政府，要得將來能於做出點像樣的事業，頭一件必須有像樣的人，即幹政治的必須具有政治家的修養，不要老是學這些政客；第二，公民程度要提高，民衆教育要普及，以便是非能分，黑白能判，消極制裁壞蛋，積極扶助賢能；第三政府本身須掉轉方針，以七分的時力來對事，勿仍以七分的時力來對人。再進一步，以十分之九的時力來治事，只以十分之一的時力來治人。火速建設，認真改良。如是學學西方，則庶幾乎可以挽救危亡，庶幾乎可以提高國際地位，也庶幾乎可以維

持住民族生存的命脈。現在的政府，只能勉強說做有政，不能叫做有治；只能勉強說做對人，不能叫做對事。空言空文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處於現在的環境，無論往內看

也好，向外瞧也罷，都需要老實作事。不但要老實作事，還要趕緊作像樣的事。機會無多，不可再三再四地錯過。

二二，十二，十七，里昂。

## 編輯後記

適之

△白銀問題是今日的絕大問題，我們早就想請專家學者替獨立評論撰文討論。現在何廉先生寄了一篇七千字的長文來，我們非常感謝。何廉先生是南開大學經濟學院的主任，是「經濟統計季刊」的主編者，著有「中國六十年進出口物量指數物價指數及交易指數之說明」等書。

號開談內提到程瀚章先生的初中衛生學，誤記為國立編譯館審定的；我們在第九十期曾替他更正，說是教育部審查的。其實教育部也不會審定。我們收到國立編譯館劉英十先生來信說：

△憲法初稿公布以來，我們也想參加討論。本期先發表陳受康先生的討論。陳先生是北京大學政治學系的教授；他很謙遜的告訴我們說這是他第一次用白話作文章。

△「閔仁」先生現在法國里昂大學研究院。

程瀚章著復興初中衛生學，未經國立編譯館審定，即由商務印書館擅自發行。國立編譯館對這本書已審查兩次。第一次的總評是：「本書內容錯誤及欠妥之處甚多，應令修正後，准予審定。」第二次的總評是：「本書雖經修正，但錯誤之處尚屬不少，應再行修正後，准予審定。」

## ◎獨立評論合訂本出售

本刊第一至二五期和第二六至五十期及第五一期至七十五期，現在補印齊全，分別裝訂成冊，極適於圖書館及私人收藏之用。每冊價目：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 中古式之中國經濟

何 廉

今日之世界經濟制度與現象，息息相關，變幻莫測；中美雖遙隔重洋，而牽彼一髮，可動此一身，如近來美國提高銀價之聲浪興起，而中國之一般物價遂受其影響，此即所謂世界經濟時代之象徵也。雖然，世界經濟關係之如此，實非一朝一夕之故，而為有史以來所逐漸演進而成。人類經濟生活之演化，約歷四階段，第一為家庭經濟時代，次之為城市經濟時代，次之為國家經濟時代，又次為世界經濟時代。家庭經濟時代為上古，城市經濟時代為中古，國家經濟時代進及世界經濟時代為現世。惟此種劃分，殊非絕對，蓋在一時代之中，其他時代之經濟生活，常紛然雜陳。即如吾人謂今日為世界經濟時代，證之世界經濟關係之密切，亦誠不訛，然同時經濟國家主義之高潮，方有席捲一切之趨勢；而在經濟發展較為落後之國家，城市經濟甚至家庭經濟之生活，尚多存在。即此可知各時代之區別，祇能視某一時代之特徵而定，凡一時代之經濟現象，呈某種特徵者，吾人即名其為某某經濟時代。如家庭經濟之特徵為自給，主要謀一身一家之自足。城市經濟之特色為地方化，舉凡農工業之生產，商賈之懋遷，資本勞工、貨幣信用之供給，工商業之制度，莫不限制於地域隨俗而異。就農業言，則規模狹小，資本微薄，技術拙劣，生產短少；而農奴制度之盛行，條田制畝田制之耕作，尤為特徵。就工業言，則資本技術生產，亦與農業相若，而手藝制度之普遍，行會勢力之雄厚，商業範圍之不廣，為其特徵。至國家經濟，則以謀一國之自足為前提，對本國產業，率予保護；而資本勞工信用之供給較廣，貨幣之應用，貿易之範圍亦加大。世界經濟之特色，在世界經濟關係之密切，息息相通，無間彼此，至生產範圍之擴大，交通便利之擴充，資本勞工信用供給之膨脹，貿易範圍之世界化等，尤為顯著之現象。按諸上述，以衡今日中國之經濟生活，自多屬中古式，本文目的，即在就此點論之。

先就中國經濟之地方化總括言之。吾國生產消費，多具地方化之徵，一隅豐收，穀賤傷農，而另一隅則飢民遍野；西北皮毛之價格，與津滬相差懸殊；「江津之柑橘，滿坑滿谷，入望皆是，至代食橘肉而剝橘皮與橘絡者，反



可得工資』。(胡先驥獨遊雜感見獨立評論七十一期)此外如浙江紹興之花雕，金華之火腿，江西景德鎮之瓷器，閩粵之果物，其產銷亦多限於一地。尤可注意者，為各地方度量衡之參差不一。夫度量衡制度，貴能劃一，方能昭公平信實，吾國初無統一之制度，各地習用器具花樣之多，差異之鉅，駭人聽聞。濟南一市，所用衡器，除磅秤外，尙有三斤四兩，三斤五兩，三斤六兩，三斤八兩等四種秤量。其量度單位，一官畝原等於六千方尺(營造尺)，但在濟南及他處，一畝亦可等於八千尺至一萬七千五百尺，幾三倍官畝之面積。又如南京之布尺等於一·二八英尺，在濟南則等於一·一六尺。南京之木尺等於一·〇九，濟南則等於一·〇四。漢口一埠，尺有六種，自十一英寸至十五英寸不等。斗有五種，大小亦各不同。北平一地所用之尺，長短不同者共有七十餘種之多，最長者較標準尺長百分之三十，最知者較標準尺知百分之十六。尤有趣之例，如上海一担重百五十斤，而雲南一担重千二百斤，黑龍江米一担重三百斤，麥一擔則重六百斤。其他類似情形，不可勝舉，一國之經濟，非地方化至於極度，曷克致此？

再就中國之農業狀況言之，中國為農業國家，其農業經濟狀況，宜足以代表全國之經濟程度。中國今日農民佔

全人口之百分之七十五，與英國一七九二年前，德國一八七一年前之情形相類。較之美國今日之農民僅佔全人口之百分之二六，法國百分之四二，德國百分之三一，英國百分之七，俱高出數倍；即較日本之百分之五五，印度之百分之七二，亦有過之。而已耕之農地，據劉季陶先生最高之估計，不過為二八一，〇〇〇，〇〇〇英畝，平均每一農人之耕殖面積，不過為〇·八三英畝。又據金陵大學皖直豫陝浙閩蘇七省之調查，平均每家之耕種面積為五英畝零一，若以每家五口計之，每人所耕，亦不過一英畝左右。而據作者在山東所調查之結果，農家之耕種面積，少至一英畝或一英畝以下者，至佔調查家數(三千餘家)百分之五五。即以金陵大學之調查為準，我國農家之耕種面積，小於美國者，約十二倍有餘；小於丹麥者，亦六倍以上。故中國之農業，以人工言，為極端集約 (Intensive) 之農作。惟就資本額言之，則據金陵大學之調查平均每家之資本計一七六九元，其中百分之九十二為不動產，如土地房屋樹林之類，百分之四為牲口，百分之二為農具，百分之二為種子及糧食，實際上之情形，自耕農與佃農之資本，猶相差極鉅。據作者調查山東佃農之資本在五十元以下者，約佔調查佃農全數(五百餘家)五分之一

。資本如是之微，而牲畜農具所佔部分又如其小，故中國農田耕種之動力，大都爲人力，即畜力亦不多用。據中央研究院一九三二年在徐州之調查，至有三戶共用一牲畜，租用牲畜耕田一畝，須一人工作三日以償之情形，牲畜之少，可以想見。結果所至，每六英畝耕地，需動力一馬力，而每一農家所有之動力，尙不足此數也。尤足痛者爲耕地之散碎，東南邳陵之區，固然如斯，即大河南北之沃野千里者，亦溝塍密布。據中央研究院之調查，無錫三十家，每家所有耕地咸在十五畝以上，然此十五畝之地，平均分爲十二塊，每塊面積平均爲一·二畝，最小者至於僅有〇·三五畝。據李景漢先生河北定縣一村內二百家一五五二塊田之調查，平均每田面積爲四·二畝，百分之六十九在五畝以下。是直肖歐洲中古食邑時代之條田制矣。至中國佃農之佃田完租方法，亦各地異制，田租高低，迥不相同。據江蘇農民協會之調查，崇明吳江縣有所謂「永佃權」，佃戶每畝納租金若干元，即有永遠承佃之權，田主不另換佃戶，佃戶亦不得退田，此種制度頗與歐洲之農奴制度相類似。

再就工業言之。中國工業，自通商巨埠觀之，似已達相當現代化之程度，蓋因日常所用，耳目所接，大都爲工

廠工業之產物。殊不知手藝工業之生產，實佔全國工業生產之十分之九，手藝工業工人之數目，亦遠過工廠工人。即就棉紡織業之情形而論，民國十九年全國共銷棉紗九六一兆磅，其中力織機之消費量僅二〇七兆磅，而手織機之消費量竟達七五四兆磅，爲一與四之比，即此可見手藝工業在今日中國之重要。歐洲之行會，濫觴於十四世紀，其在中國則十二世紀即已發生，降至今日，依然爲工商界之支配勢力，一九二七年上海一隅即有工業行會五八個，商幫一一七個，同鄉會館一五一所；廣州一處，由行會與商幫改組成之職工會有四三〇個。此種行會，不特能規定價格，控制市場，且能訂定度量衡制度，與調節一般之經濟生活。即此又可見行會勢力之依然仍大。即現代之新式工業，其組織亦多爲合夥組織，恒由親誼關係互相結合，非按公司法設立，故一九三一年之全國註冊公司不過三〇五個，一九三二年不過二〇四個。且股東極少，資本有限，普通一新式工廠之資本額，平均不過爲三五十萬元，營業行事多衡諸情誼，而不講求法效。其僱用之勞工，多季節性，例如上海各工廠每當秋穫之後，僱用工人人數特多，因農隙之時，鄉民赴城覓工，僱用甚易。他如包頭張家口之茶磚廠毛織廠之工人僱傭情形亦類此。勞工與地域之關

係，尙甚密切，亦足徵未脫中古時代之習慣。此類工人，毫無經驗訓練，不能遵守工廠規則；益以目不識丁，知識淺陋，故工作效率極爲低落，殊未能語於西洋之勞工標準也。

再就國際貿易言之。中國國際貿易額，每人平均不過金洋二·九一元，較諸美國之七四·七二元，日本之三〇·四九元，固屬望塵莫及，即較朝鮮之一八·一九元，安南之一一·七三元，蘇俄之五·一九元，亦不可等量齊觀。而即此少量之國際貿易，猶大部份操諸外國洋行與貿易公司之手，國人鮮有自行經營進出口貿易者。國外貿易額如其小之原因，固爲國民生活程度之低落，生產能力之薄弱，然亦由於國內地方貿易額之膨大，此蓋因國民經濟尙停滯於地方自足之局故也。

此外交通之不發達，與此中古式之經濟，殆互爲因果。中國面積大於美國者三分之一，而所有鐵路不過美國之四十分之一，以全國人口四八五兆之衆，僅有鐵路一五·三〇〇公里，平均每百萬人僅三一八公里，而美國則一九二〇年每百萬人平均五，八六一公里，相差一八六倍。況所有鐵路分配極不均匀，全國有鐵路者不過十九省，其中占路五千公里以上者，又不過五省，而以遼寧吉林兩省爲

最多。其他近代航業，多在外人掌握，本國船隻噸數，不過美國百分之二，公路建築，近雖有進展，然亦多供軍用官用耳。內地運輸交通工具，在北方多利用畜力人力，南方則尙有賴於帆舟與肩輿，極肖歐洲工業革命前之狀況，而道路之不修，水利之不興亦似之。

至若金融事業與財政狀況，亦初無二致。新式銀行之興起，雖已有三十年之歷史，顧實際勢力，仍甚微弱，至於最近，始稍振作。實際上各重要商埠中執金融事業之牛耳，非爲銀行而爲舊式之錢莊，國內工商界固多與錢莊往來，即外國洋行與銀行，對錢莊之信用，亦恆在銀行之上。而中國錢莊承山西票號之緒餘，究爲舊式金融組織，實未足以應現代經濟之需要，錢莊勢力之存在，正足以表現金融市場之中古色彩耳。幣制紊亂，亦如度量衡制。廢兩改元以前，兩元通用，各銀行在各埠所發紙幣，別埠不能流通；各種銀元重兩成色，每有互差。而各地輔幣之雜亂，紙幣之滯存，更無庸論。又如政府財政，除直隸中央各省外，餘則多各自爲政，不相統屬，稅收既無定額，徵收復多積弊。軍事供應，一任誅求，每有急需，隨意攤派。中央地方，無適應時代之租稅制度，各級政府，無名實相符之預算。倉庫制度，未能厲行，行政官吏，因緣中飽。

前者釐金未廢，直等歐州中古時代之通過稅，今雖裁撤，而各省之由厘金改頭換目者，尙多貌去神存也。

吾國之經濟情形，已拉雜舉例言之。綜上所述，中國今日之一般經濟，實未能脫離中古時代之特點，即通商各埠之新式事業，亦僅虛有其表。探其根本癥結，即在對此中古式之環境，未能加以改變，徒羨他人之現代化制度而強用之，不惟「逾淮爲枳」，且根本上即難生長。試舉例言之，近年政府頒布之立法，大率本諸西洋最新之原則，然而國情不同，多成具文。譬如營業稅法，自中央頒布之後，各省即遵照製定營業稅徵收章程，試一展閱，似甚完善，而實際各省所徵，其舊有者仍一沿數年前之成例，結果稅法與事實，截然成爲兩事，名易而實不變，於事何補？再就私人事業言，工廠公司之經營，固爲現代之新式組織，當其組織之初，即多未能厲行其必須之條件，集股非由公開招收股，東多限於少數人，而身任經理者，又復綜攬一切，公私不分，結果資本數額甚少，而少數人之責任過重，以致企業不易擴充；一遇風波，即往往發生根本動搖

。商業銀行，宜從事於正當之投資，以扶助工商業之發展，始爲正辦。而吾國各商業銀行，因環境上之困難，不易放款，轉而致力於公債之買賣，及地產之經營等投機事業，以期倖獲過度之贏利。諸如此類，足證整個之環境，未能更變，現代化之制度，決不能推行順利；即偶支節用之，亦祇名異而實同。然則改變環境之計將安出？近年政府修電台，修馬路，築公路，辦電汽事業，種種建設，似亦改變環境之方，實則非根本之要圖。處今日而言改革整個環境，不僅在外表之組織與工具，尙須有內心及精神方面之轉變。自政府方面言，宜力求各種制度之現代化與統一，庶能促進國家經濟之實現；宜推廣民衆教育事業，庶能使其思想革新；宜急修各主要之幹路，以爲運輸現代文化之工具。而尤宜減輕農民之過重負擔，使其生機漸蘇，得有接收現代文化之可能。不此之務，則中國經濟之現代化，永難實現。不急之建設，虛浮之改革，無補於事，徒足以滋病民耳。

(完)

## 提高銀價對策之商榷

張茲闓

自從美國擬設法提高銀價的消息傳到中國以來，朝野爲之震動。大家都認爲這是對中國有害無利的。羣衆的心理，與數年前銀價下落所引起恐慌的時候，是整個相反，雖然他們恐慌的程度，是相同的。但是現時討論提高銀價對策的空氣十分緊張，究竟美國已經採取了什麼步驟？是狠值得注意的。按自羅斯福就職以來，最初所採與白銀有關係的方案，便是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二日批准的農業救濟律 (Farm Relief Act)。其中包含有兩段與白銀有關的規定。(一)爲授予大總統有核定銀圓與金圓成分之比率及按此比率無限制鼓鑄金銀圓之全權，(二)爲於本案通過後六個月內，大總統得接受其他各國對於美國政府負債本息，以銀清償之，其價不得超過每盎斯合美幣五角，其數量不得超過美金式萬萬元。財政部即可如額發行銀幣券，并將所收之銀，鑄成銀幣，以資隨時應付此項銀幣券之兌現。這就是所謂『湯姆士修正案』內容之一部份 (Thomas Amendment)。關於第二項在去年六月裏，美國所收英國戰債一部分，就是這樣交付。但是與現時提高銀價無直接影響。關於第一項，羅斯福并未立時採取實施的步驟，一直到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批准白銀協定的命令內，才宣佈自該日起，在四年內所有美國造幣廠得接受人民

交來之新出礦的白銀，扣除百分之五十，作爲鑄幣費用，所餘下百分之五十，則鑄成銀幣，交與原主。所可注意的，就是原來銀幣的成分，不會改變。所以除掉所扣百分之五十的鑄費，折合生銀的價格，每盎斯約合美幣六角四分五，高出當時市價二角以上。其次若照這樣的規定，事實上等於銀幣可以無限制的鼓鑄。但是只限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以後出鑄的生銀，并不是將現存的生銀，由政府來收買用以鼓鑄銀幣。據我個人所觀察，直至最近，美國方面已經生效的方案，只限於此。但不能十分有效的提加銀價。所以這種方案，對於引起我國銀貨外流的趨向，并無直接的影響。至於最近纔有照市價提高百分之二十五收購運至美國償付出口農產價值之白銀，及許政府照市價陸續收買白銀十三萬萬盎斯兩議案，現雖已通過衆議院，但都不會成爲法律。然而銀價因此高漲不少。如果以上兩種新議案，可以通過，又經羅斯福批准，成爲法律，那時銀價狠有大漲的可能。但如不成爲事實，照現狀繼續下去，其影響決不會狠嚴重。

在原則上，銀在中國是貨幣，銀價上漲，則中國銀元的外匯價值上漲。於是中國貨在世界市價的成本高，而外國貨來中國推銷時成本低，出口於是有減低的趨向，而入

口便有增加的可能。現時大家對於提高銀價，所認為不利於中國的影響，不外乎兩點：（一）外國貨跑到中國，侵佔了國貨的市場，國貨的銷路銳減，則工廠倒閉，工人失業，由此引起金融恐慌，農村更形衰敝。（二）因美國提高銀價，銀貨有外流的趨向，以致國內籌碼不足，於是貨幣緊縮（Deflation）的影響，物價因之低落，工商業更形不景氣，引起各種恐慌。這種推論，自然確切不移。凡外匯價值過高的貨幣，如果旁的生產成分不動，一定使生產的負扣增高而處於不利的地位。反之外匯價值過低的貨幣，自然是生產的一層保障，假如在國內的購買力，可以穩定。這種議論，無人能設否認的。但是經濟學的律條，只定相對的可信，而不是絕對可信，因為經濟的動力是時刻變動的。假如我們要想確定上述原則的可信程度，必須要將整個問題的成因，分析清楚，纔能設得着可靠的結論。許多經濟言論界的先進，都不曾指示給我們，這個問題推演起來，要經過那種階段。這樣去求相當的對策，似乎很不容易，因此引起我以下的各種疑問。

按照國際貿易的原理，從前時代稍遠的經濟學者理論，一國的對外貿易，如果因比較成本高，以致貿易差額頗呈逆勢，其補救方法，首先要由內部整理，將成本減輕。

一面從製造技術及管理上力求效率之增進，一面將工資設法低減。同時并開闢新工業，使勞工及資本均可轉移至較為有利的用途。但是現時勞工及資本，因分工及日趨專門的緣故，其流動性已較前差得多了。再加上勞動組織的阻力，不能使工資減低，所以經濟組合變成固定的。因此許多學者，不主張由勞力一方面來想對策，而由貨幣政策來設法。不過前一說，并不是可以完全推倒的。有些時候，仍然可以適用。現時國內工資很低，無法再減。但是我們國內的工業，在製造上的效率來論，人人都知道是落後。是不是我們的工業家，仍可由這方面去做工夫？這是狠值得注意的問題。假如尚可從這方面努力，是不是較在貨幣問題設法，更是根本的對策呢？我們參閱上海字林西報二月二十八日所載倫敦金融對於我國銀行界致羅斯福電報的批評，使覺得我這種的懷疑，并不是全無理由。

一國的貨幣外匯價值增高，可以使外國貨來本國推銷時，成本較本國貨低，因而入超增加，國內工業因而不振。但是這種現象，也不是無限制的。仍然要看本國在國際貿易的地位，其人口出口的商品，是什麼性質。換言之，必須看本國國際貿易的伸縮性。本國出口商品的市價，是否受國際物價的支配？入口商品是否有替代物？本國人對

於入口商品的需要，到什麼程度？都是很重要的問題。以前兩年銀價下落的時候，入口應該減少的，然而并未減少。但是歐戰後的幾年，銀價大漲，入口確曾大增。這個問題，的確很難解答。

現在我們狠費心思去想提高銀價的對策，自然是針對美國方面而言。但是美國自從在復興程序內，定了許多業規。工作時間是減少了，工資是不減的，工人要多用了。這樣一來，成本的增加，是不能免的。因之價格的增高，也是無法避免。前幾天一個經售美國製造打字機計算機的商人告訴我，他已接到廠家的通知，不久恐怕要將價格提高。這也是意料得到的事實。因此美國貨物因美匯下落，可以增加遠東市場銷路的希望，自然要減少一部份。

其實在國際貿易上，入口出口互爲因果。一國之對外購買力，并不以所存金與銀的數額爲標準，而仍以出口的數額爲比例。出口額增加時，入口往往亦增。入口額增加時，出口亦有增加之可能。至出入口差額不能抵補時（由於本國出品之不良或成本太高，不能得海外市場；或債權國不願接受此種物品之交付），金與銀（用銀國）乃不得不隨之流轉。美國一般人主張提高銀價，以獲得遠東市場之誤解，亦因爲不明此種原理之故。所以據我個人觀察，

提高銀價的結果，如果銀貨驟然的巨量外流，決不是因入超驟增的緣故，因爲決不見得入口商立刻運銀子到美國去買貨。所以因有形入超的增加，而使銀貨外流，這種情勢是不曾立時發生。但是中國多年入超的結果，公私外債累增，而洋商銀行在市面的勢力很大，他們要隨時運現，是大有可能的。所以要使入口洋貨不致驟然增加來奪國內銷場，決不是阻止銀貨外流，可以得着有效的制裁，并且從貨幣政策着手，所得效力亦是甚微的。就事實上的可能來着想，仍以增加關稅爲較有效。

所以目前最要顧慮的，便是美國提高銀價，洋商銀行便要運銀赴美。因此存銀日見減少，發生嚴重的貨幣緊縮的影響，物價愈形暴落。所有世界不景氣的負擔，轉移到中國來。我想多以經濟論者，都着重這一點。這的確是嚴重的問題，而且難得相當的對策。

在我的意見，以爲中國貨幣政策上困難，實因商業上習慣，一切交易，多要用通貨來做交付的手段。因此必須保存大量的通貨。在從前全係銀兩或銀元，現在雖用鈔票，但鈔票的發行；仍需巨量的銀貨做準備。同時我國人窖藏銀子的習慣，至今未除，因之又需要巨量的銀貨，來滿足這種的慾望。而且銀子又是國際上流轉的物品，要受世

界銀價的支配。處這樣情形之下，中國貨幣的管理，必然感覺許多困難，而担負調劑全國金融的銀行界，也要左支右絀了。

事實上現時貨幣論者，決不是專從通貨上著論。最要緊的還是信用制度。在信用制度發達的國家，許多商業行為，都不必用通貨來做交付的手段。如以鈔票的發行，所有手過手的通貨，也不必貴金屬了。在中國現時鈔票的發行既不集中，各行要保存準備數額，較統一發行制總要大些。同時內地又要相當數額的硬幣，來做手過手的通貨。

還有窖藏的銀子。所以銀子在中國貨幣上的需要，未免太大了。假如我們可以減少銀子在這方面的需要，便可以騰出多餘的銀子，來應付這種局面，同時不致發生緊縮的惡影響。原來貴金屬在貨幣上的特能，除却一般貨幣學教科書所列舉能耐久及可以分合等性質外，還有最重要的一項；就是使貨幣的發行，有一個限制，然後他的貨值，可以保持。假如我們能設用旁的方法，來保證這種數額的限制，貨幣的價值，仍可存在的。美國的貨幣制度，就是一個明證。

要達到這個目的，除了要政治上的安穩，不致發生戰爭及革命等意外事故，使經濟的秩序可以保持等條件外，

最重要的便是要改善銀行制度。鈔票的發行應該及時統一。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銀行。即使我國因商業上用票據的習慣，一時提倡不起來，因而信用制度，不能充分發達。然而紙幣的發行，一經統一，使中央銀行有權發行巨量的保證發行額 (Fiduciary Issue)，一方既標明限制，一方慎重發行，務與商業的需要相呼應，不使他變成政府填虧空的手段。於是銀子的需要，自然減少了。所騰得出的銀子，便可用來應付國外的壓力，而不發生緊縮的影響。若照現時情形，有發行權的銀行，平日各自為政，一旦遇有銀貨外流時危機；又各自為戰，自然更難應付了。

最近有人認為中國銀元，一經銀貨外流，被迫而禁銀出口，便成了管理的貨幣。尚有人認為要應付現時的危機，非用管理的貨幣不可，但對管理的貨幣，又不說明，所以更使人難以明瞭。其實管理的貨幣，本來很難下一定義。如果大家認為應照凱恩斯 (J. M. Keynes)，所說的辦法，在中國這種散漫的銀行制度，不知從那裏下手？短期資金的市場（如同倫敦的承兌市場，及紐約的證券抵押借款的市場）既不成立。中央銀行的貼現率，亦并無之，何況論到貼現率的有效無效呢？所以大家假如要採取管理的貨幣，亦非從銀行制度上設法不可。

自然我們要管理貨幣，尚可從其他方面着想。顧季高



先生所主張，出賣我們的存銀，來買外匯，是狠有道理的。在英美現時所設立的平準基金，都是國庫的負擔。我們政府暫時沒有這種力量，他提議由發行銀行來經營，尤見匠心。但是我認為仍要改善銀行制度之後着手，尤易生效。因集中發行之後，騰得出存銀來經營，使可不影響發行的準備。購入外匯并不一定賺錢，或者是賠錢的。如果由中央銀行來經營，便不致因此影響商業銀行的本身地位。至於改金本位一層，因金銀比率一變為金賤銀貴，理論上金子流人是有可能性的。但我認為這種掛號，也應該在購集金子到相當地位，才談得到。斷不能在現在金子還未到

## 答擁護無為政治的主張者

弘伯

手，便談到改金本位。尤其是現時美國雖議提高銀價，却未明顯的採取復本位，對於用金兌現，更毫無這種可能的表現（參閱一月三十日的金準備法案）。大家對於金貨仍不放手，我們也得不着金貨。要改金本位，恐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至於銀出口稅及禁銀出口，都是一種臨時應付緊急事機的手段，并不是永久的辦法。如果此時國內銀行制度依然散漫，銀貨外流太驟，措手不及，也只好採取這種手段了。但是試觀美國的幣史，每逢一次恐慌，即想法將制度改善一次，斷斷不是把臨時策略想出來，便不再去理他的。

僑居異域，去年七月方得讀五月初適之先生那篇『從

農村救濟談到無為的政治』一文。當時寫了一點東西，叫做『我們還需要提倡無為的政治哲學嗎？』寄回發表，已

經是九月的中下旬了。緣於道遠課忙，初念本是不想寫的。嗣以返觀吾國過去的史實與夫現代的環境，覺得不能默爾而息。我是從適之先生弄過幾年哲學的人，也許還能約略了解他思想的來歷。對於他的憤慨，我表深厚的同情（

證據見前文）；對於他這個主張的影響，却有點擔憂。本

於『吾愛吾師，吾却愛真理』之旨，所以大加針對那文的主腦——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是提倡一種無為的政治哲學——

發言，証明這種哲學用不着再提倡。理由是：歷史所昭示的效果不良，且為當今的國際形勢所不許。中國的文化，表面上雖是儒家居於首席，實際上却中道家的流毒很深。我們與西洋相較，已經够無爲了，並且還正在受祖傳無爲

政治哲學的罪。所以不宜覆轍復蹈，不宜消極後退，只宜積極努力向前——認真建設。

遲至昨夜，在新到的一包評論內，終發現區少幹先生的『無為與有為』一篇駁議（七十六號）。這是遙遠的一個回響，也可說是空谷的足音，令人高興。他說：『我是擁護適之先生無為政治的人』。又說：『尤其是農村的復興，非經過無為政治的撫乳培養不可』。就從這兩句話中（其他還有；尤其是立場），也足見適之先生的那文，在思想上已生影響了；也足證我認爲無為政治哲學的勢力早已深入人心的那個看法，大致不差。昔人有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一社會，一民族，如是我聞，似乎真具有他的成訓與『共通意識』啊！要改變，頗不容易（這是德法許多社會學家的說法）。但無論易與難，無論所言是否有當，爲關心黃人的前途起見，我那篇東西，現已證明確有寫的的必要。老實說，憂時的衷懷，個人是有的；至於見解究竟對不對，願國人共同商討。總期求得一個客觀的，正確的，比較妥善的結論，纔好。因爲這問題不但關係國家的存亡，且影響將來整個民族的存滅。『思想爲事實之母』；『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願國人幸勿忽視這問題的重大性。

區先生的文章，和適之先生的那篇一樣，似乎最大的一個缺憾是：看時勢只看了國內的人才與經濟，只說了國內環境如何如何不足以有爲，但對於關係更重大的國際環境，却一字不提。很奇怪！難道中國還可以閉關自守，儼成世外桃源嗎？難道中國現在的四周，還和明代以前，甚至和漢代以前一樣嗎？小環境是逃不了大環境影響的。難道中國的國內政治，可不受國際政治的鞭策麼？縱然我們情願深溝高壘，關起大門來講無爲而治，不慌不忙地再等他幾十年，以來經歷這一段撫乳培養的歷程，然後從事建設，但事實上請問辦得到嗎？天演公例告訴我們：弱肉則強食。請看當今是什麼世界！你要無爲，別人偏要來和你有爲了；你要閉戶，別人偏要登龍求見了。這登龍在起初還是斯斯文文地『重譯來朝』，在後便毫不客氣地動腳動手了。歷史的教訓如此，將來則更嚴重。一九三六年的危機，目下國際間的形勢，不知區先生也曾注意過麼？『放開眼睛看過我們自身週遭的環境』固然很對，但是還須得再看遠一點呀！不然；恐有夜半深池之憂。萬一嘩啦一聲，那時便悔之晚矣！

區先生以爲我遠在異邦，只看慣了西歐的瓊樓玉宇而絕對忽略了我們『自身週遭的環境』，對此首先有點聲辯。

個人是抵歐不久的，去國前曾深入內地去看過農村實在痛苦的情形。我的家就在鄉間，且世以耕讀爲業。到內地旅行的時間不算很短，綜算起來，有半年多。在鄉下住的日子也不少，整整有兩個月。我是極不滿意於現狀者，我是極痛心於軍閥官僚的治績者，我也是極表同情於平民者，因爲我本身，就是平民。平民的痛苦絕對當解救，不成問題。成問題的是如何解救的方法。

在未提方法以前，我們須先認明一宗事實。譬如醫，要投方劑，必須先診清病源。否則必誤下歧黃；事與願違，不惟效驗不生，甚至斷送他人的老命。

我們第一要問：現在的民不聊生，是否真是且全是由於建設？是否一切的建設停止了，人民就可以昭蘇？區先生舉出廣東停止築路的事例，據說原因是：「馬路兩傍的人民，即使勉強有錢交給路費，却再不能勉強弄錢建築自己的舖屋。結果是：當中一條好好的馬路，襯着兩傍拆得七零八落破敗不堪的爛屋」。是的，爲修路而拆爛民房，誠爲病擾。但我們要問：這爛屋的不能復葺，真是且全是由於路捐一項之過嗎？倘然是，則停止開築的明令已下了，好了沒有？昭蘇的機會已得，試問豁然沒有？如答案是肯定的，自不用說；若猶未也，則或另有更重大的原因在

墨子云：「辨也者，有不見也」。不知區先生曾經注意沒有，原文中我有下列幾句：

內部的人力與財力，適之先生認爲遠不足以有爲，所以頂好不要高談建護。假如不度德不量力，便是叫化子沒飯吃而妄想建造瓊樓玉宇，便是絕倫的謬妄。不過事實告訴我們：中國的收入，大部份是用於軍費，其次是政費，用於建設者寥寥。就在寥寥的建設費中，真正用來作實事者，尤屬寥寥。這可見財力問題的癥結並不是一文不名的赤貧，乃是尙有幾文而用不得其當。害人的不是建設本身，乃是不善辨理建設的官僚和攘奪建費的丘八。依我們的意見，消極救濟農村的辦法，只是裁兵與裁官，不是停止建設。因爲在全體比例上，建費實微乎其微。即使全部取消了，於農民的負擔也輕不了多少。況且名符其實的建設，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是生產的，不光是消費的；是救民救國所必需的，不是光做樣子出來好看的。所以，如果有朝有日，附庸能蔚爲大國——建費與軍政費易地而居——則中華民國之在世界，也或者就有抬頭的希望了。（獨

第六十八號

評這裏應當覆按的是吾國財政收支的統計，因為牠是討論本題的基礎。在前我曾經查過一下，民八預算歲入實際總數爲四億餘（歲入經常臨時共計，本爲六四七，六九一，七八七元。內除國內公債，銀行借款，及無確實增加收數之警察收入三款外，故實際僅四億餘）。在支出方面，單是軍費一項，便占二億五千餘萬，居全收入百分之六十五以上（據第一回中國年鑑，第四一三頁，商務本。這是此間所能得的材料）。原書續云：『民八以後，國事日紛，財政益紊，正式預算，無從稽考』。故以後若下年均付闕如，是誠憾事。但吾國軍額，不惟未減，且與年俱增，這是共曉的事實。吾國常備兵額，冠於全球，這也是共曉的事實。因此，我乃據常識判斷：『中國的收入，大部份用於軍費，……用於建設者寥寥』。我相信：這個判斷是不會大錯的。區先生是近水樓臺，比我易於搜查這方面的資料。爲明瞭真象起見，極盼能找得確切新鮮的數目字，證明無論是中央，是地方，支出方面，不是大部份用於軍費，也不是其次是政費，乃是我所希望的建設費。並且再請附帶調查，證明在建設方面，確已涓滴歸公，眞作實事，未飽私囊（據個人前在川的調查，狼慚愧。也許外間好點）

。如果區先生將來的答案是『正』，則我決即撤銷前論，欣慰無似。否則我似乎不能不相信：『害人的不是建設本身，乃是不善辦理建設的官僚和攘奪建費的丘八』。

認清這事實以後，我們可以提解救的方法了。這方法比較上可分兩種：一種是消極的，一種是積極的。消極的是適之先生的主張，具體的辦法如裁兵裁官省事（停止一切建設）。積極的是個人的意見，具體的辦法如改良農產，改進農業技術，便利運輸，濬河造林，興辦實業，屯墾邊殖，一言以蔽之曰：認真建設。用吾國的老話來講，前者近於節流，後者屬於開源。節流雖可暫時鬆口氣，但問題仍然存在。不信嗎？請查海關華洋貿易總冊（最近見大公报載：『據國際貿易局呈報實業部，二十二年對外貿易，入超達九萬萬左右。這個驚人的數字，代表洪水猛獸似的國外商品流入中國來。這是中國半殖民地化的一大動力』。查去年十二月十五日第四版）與三千年來一治一亂的背景，便可了然。近於節流的政策雖非完全不妥，但只有裁官裁兵不够，以停止一切建設爲省事則不可。爲什麼不可呢？處在這科學昌明的時代，我們要解決問題，應該相信人類由努力得來的智慧，應該設法控制社會與自然，應該該勇猛奮鬥向前，應該不怕困難與失敗，應該學學西方

。換言之，即不要因循，不要苟安，不許再照抄有弊的老哲學。

我們無爲的老哲學，和西方有爲的新思想，大體是對立的。真正儒家的意見，和基本的道家哲學，大體也是對立的。（例證見前文）區先生說：『無爲與有爲，只是一個先後的程序問題，並不是兩個對立的體系』。對此我們要問：真的麼？果然是這樣的單簡麼？茲分兩方面來說：

（一）抽象地講，有爲與無爲，是絕對的對立，毫無疑義；

（二）具體地說，則主張有爲與無爲者，是相對的對立，也不成問題。

前者在字面上可以答覆區先生，後者在內容上可以使我們『深切清認』。爲什麼呢？因爲儒家把『有爲』放在前，道家擱在後；反之，道家把『無爲』放在前，儒家擱在後。分野清楚，立場各異。這足見兩派的思想，是相對的對立了，是兩個對立的體系了，并不只是一個程序的問題而非兩個對峙的體系了。我最不贊成的是那個『只』字。如今拿現實的材料來講，比起翻開老眼，或更親切有味：

我們展讀兩文，明明看見；無論適之先生也好，是區

先生也能，都把無爲放在前，有爲擱在後。他們以爲要達富強的境地，必須經過一段無爲的歷程，必須先『做了無爲之爲，然後可以做有爲之爲。』請問：這還是先有爲然後無爲嗎？這還是必先有禮樂刑政，然後可以垂拱而治嗎？禮樂刑政這些怪麻煩的事物，喜歡省事的道家是厭惡的，鄙視的，不要的；在儒家却認爲必不可少。如果區先生說這禮樂刑政等等，就是他的所謂『無爲之爲』，恐怕真正的道家要擺腦袋吧？如果區先生說這個『有爲』就是他的所謂『無爲之爲』，那麼，則他的話是說：『我們先做了『有爲』，然後可以做『有爲之爲』了，這不是有點滑稽麼？不過這還是理論上的研討，不甚緊要。現在我們須看看目前的局勢，請問事實上停止一切建設，是否真該？是否可能？再查歷史上文景的富庶，也是否真是無爲在前？我不想再饒舌了，只引第三者吳秀峯君的幾句話來看：

胡先生謂曹參主張無爲而治，漢室繼隆。不知參乃蕭何政治之實行家，而蕭何乃有爲之國相。參亦承認其與高帝『定天下，法令既明。』是參實非真正無爲的宰相，因當時漢室治國已有規模，故遵而行之，可使國家富強。我國今日，則百端待舉，事

事落後。若不急圖建設，恐時不我與，瞬息日本將代我行之，而國亡矣！……（十一月四日）

大概這也是犯了『忽略有為政治成功所必需經過的一個階級』？大概他是『誤解了無為兩字哲學上的意義』了。適之先生關於無為二字的解釋（區先生稱爲定義，不妥），個人並未嘗忽略。我曾經說：『現在受環境的鞭策，須本於無爲的精義，「與時推移，因物變化」，不可膠柱鼓瑟，一味模仿從前』。韓非是受老子的影響者（參考適之先生哲史三七三，三七九頁，又史遷老韓列傳末），他頗能認識無爲哲學精義。因此我又曾引韓非的話道：『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後人誤解老子，個人還特別聲明，說不是適之先生。這幾點請說我沒有認清無爲的定義（？）的區先生留意。

道家的第二位祖師莊子道：『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老子自己說：『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再查小國寡民全章），適之先生更具體更摩登的說法是：『要把政府的權力縮小到警察權』。換言之，即讓他維持治安使罷。這可見無爲哲學的政治，方向是傾於消極的；適之先生也曾請別人不要笑他的主張太消極。現在區先生狠妙，把我替被裁的兵官想出路，如

興辦實業，屯墾殖邊之類，也一概歸於無爲政治範圍之內。請問：這興辦，這屯殖，還是只當警察，什麼事也不管，一切聽人民自己去辦嗎？這還是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可再損嗎？還有，區先生說適之先生在論文附記承認亦區土地的分配，也是無爲政策之一。誠然，但這是『不爲物先』，是『曳而後往』，而不是像西方人的自動，實驗，發明，創造，冒險，硬要做個樣子出來與人看看啊！注意！這積極與消極是兩條方向不同的路，請國人自加選擇。由西方的那條，事實告訴我們：是民安物阜，是健康愉快。用我們自己的老法子，經驗告訴我們：是災荒貧病，是禍亂愁。國人，請看一看，想一想，比較一比較！

四川自流井的馬路，區先生舉出來以作病民擾民的例證。這個極小的例算注意了，其他更凶十倍百倍的火餉，附加，預徵，指名勒索，窩捐懶捐客燈照……得毋與薪未見？昔有人打趣適之先生的五鬼禍國道：『捉住了五個小鬼，放掉了一個大妖精。』如今區先生所放掉的大妖精，似乎還不只一個兩個哩！聲明，我決不是說馬路永遠該那麼修，我是說兩害相權取其輕，此善於彼。你以爲路捐可以真免嗎？很難。所說的那『翻新花樣，另起名目，以來生財之道』，這是事實問題，並非捏造。區先生引我的話，

止於『瓣形的建設，可以作爲改良進步基礎的建設，連這上點也沒有了。』下文更重要的——『我倒不是滿意於他們現在的成績，我是說：出馬路捐比出救國捐。至少還好一絲一釐，害人最凶的是別有用途的預徵，是火餉，是……不是建設費。』——不幸略而未錄。倘讀者未覽原文，恐不免於越意稍有誤會。假如建設本身真是害人，則東省近兩年，當已民無睢類矣（蘇俄更該江河日下）！如果修馬路便要命，則齊魯當早已蕩無炊煙矣！（據北平社會調查所編的『中國之經濟地位統計圖』交通組第六幅，山東於一九三〇便已有汽車公路九千四百里左右，居第一位；廣東次之，只七千三百里左右）。然而事實呢？這問題請區先生自己去調查，解答。（此下刪去兩長段。——編者）

以上差不多把區先生的談話答完了，再總結幾句。無爲的政治，若實施於停止一切建設，依個人的意見，以爲有危險，且無濟。區先生急於想替人民鬆口氣的心情可佩，但方法則須另商。我決不是不贊成『貧兒薄節儲蓄』我是要大家找得真可以救民救國的有效方法。有衣食然後有

禮義，這話對平民是不錯的。但我們的問題是要如何纔有衣食？是要查出此前沒有衣食的主因。要有衣食；尤其是要有如西方的豐衣足食，依我看，決非消極停止一切建設的省事所能生效。必須積極運用科學，認真建設。建設認真了，則。弊去而利來。例如交通便了，則農產品不至有的地方太多，不值錢；有的地太少，價太貴。至於所見深淺的問題，除待第三者評判外，我現在只想說一件故事以湊趣。昔日崔東壁以衛道尊經之故，曾批評宥坐篇的首段道：

此喻取意良新，警世亦切。然玩其詞意，正與周廟金人之銘相類，皆似黃老家言，以語於聖人之道則淺矣！

據後人詳加考證，發現東壁微嫌主觀（查張昌圻洙泗考信錄評誤第一七至二二頁商務本）。區先生，你是不是因愛護胡先生而步『二千年來一個了不得疑古大家』的後塵呢？這是一點餘興。

二十三，一，二十八，里昂。

## 擁護建設

薛典曾

適之先生：這次在獨立評論第八十九期，看見先生發表「再論無為的政治」的言論，我斗胆的以素昧平生的人，同先生討論一下子。

關於第一段，先生表示農村的救濟有兩條大路，一條是積極的救濟，一條是消極的救濟；前者是興利，後者是除弊除害，而以為興一利則受惠者有限，而除一弊則受惠者無窮，這是先生貢獻政府的一個原則。這個原則，我敢說先生未曾把許多的事實，收集起來，而僅就理想中造出的。我並無意為中國政治贊美，中國的政治弊和害，實在很多，但是將這種弊和害，我們能够一掃而空嗎？教育家如先生，不難悉其中緣由，而不得不承認此種弊和害，決非一時所能去除的。但是因為我們現在要提倡除弊和害，把積極的救濟，難道就停止嗎？我請把積極的救濟的實例，報告先生，可以做參攷。從前中國大量輸出品，以絲茶為最要，農人的生活，倚賴此的，不知多少。後來為什麼輸出量慘跌呢？就是商人在那裏作偽，把信用失去，所以如此。這件事情，可不是政府作的孽。我們不能把什麼事，多推在政府身上，就同先生素來的主張，不把一切中國的受害者，推在洋鬼子身上一樣。現在有商品檢驗局，在那裏檢查出品，當然我不知道那局裏用多少錢；這錢是否從

農人身上直接和間接徵收來的，我不知道；至於這項費用，對農民發生了什麼嚴重的害處，我也無從確定。但是我可以知道的，是像茶及其他出品，質地上確已有了標準，信用上確已提高，對於農民的利益，的確不能說少。雖然現在的貿易，因為受他國的競爭，和全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無從恢復以前的輸出量，但是我們也許會想到，如其這種檢驗局早些設立，中國商品的信用，不致墮落，也可以減少他人分肥的念頭。還有一個實例，就是江北一帶，窮苦異常，張季直先生，他從前的主張，要使得數十萬人有豐衣足食的機會，非導准不可。但是當地的農民，聽說要把他們的地開成河，他們竟暴動起來，結果導准沒有成功，那數十萬人仍就窮不可言。而且前三年的大水災，如其淮河導成，也許不致把無數的房屋沖去。從這一點看起來，我們未必可以說「興一利則受惠者有限。」至於從前他在南通興辦市政的時候，他要築馬路，築江鏡，築江堤，開壩等等，有許多次農民捧着香跪在地上求。畢竟他是本地的狀元，狀元是天上星宿下凡，他的意旨，農民可以求救，但是不能違背，結果他要做的事，逐漸實行起來，所以號稱釜底的南通，那次大水災，竟沒受害。這又是一個佐證，我們未必可以說「興一利則受惠者有限。」



我敢說先生所定的原則，並不正確。至於「除一弊則受惠者無窮」的話，我請把先生所舉的四項實例討論一下，第一項裁減官吏與機關。有很多的官吏和機關，是應該裁減，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要說「受惠者無窮」的話，多少要有數字才能證明（無窮兩字可惜基本上就不能認為數字）。第一我們必需知道每年行政費，約為若干，借政治力量而另取於民的約計若干，現在官吏和機關，約可減去若干，每年可省若干，每農民可減少負擔若干，那麼就民受惠的程度，多少可以確定。我這項意見，不過要指出「無窮」兩字，未免誇張，至於應該裁減官吏和機關，無論對於人民（不能專講農民）利益多少，總應該實行的。

第二項先生主張停止一切所謂「建設」事業，這實在是荒謬的。在現在大家提倡建設的時候，而先生忽然主張停止，這足以使人「駭怪」是無可疑的。我以為先生沒有把實事詳細研究，而為「立異」的心理所影響。先生在第四頁中，引何君的話，說是「田賦附加與新政有不可分離的關係。差不多每一附加都有一項新政做背景。新政的名目很多，如教育，公安，自治，清丈……等」。先生把建設叫做新政，而以新政的舉例為教育等，這是萬分牽強的話。現在一般人心目中的「建設」兩字，是辦電廠，築馬

路，造橋樑等的事，至於教育，公安，自治等，一般人是不認為建設的，簡單的舉例，如其教育上發生學潮問題，地方上發生盜匪的事，或是每縣要辦一種自治的機關，總不會有人去到建設委員會去說話的。如其先生真確的主張農民的負擔，應當多多的減少，或竟是免除，以先生贊同何君的話，以為教育是新政，新政即是無政，無政即係增加農民負擔，那麼先生願否鮮明的主張取消教育，或是取消一部分？我也不敢說公安局，總是能盡職守，但是如其把所有的公安局裁撤，鎗械一齊收回，先生以為地方上的治安，能不受影響嗎？

我並不是說現在的地方行政，是完善的，是無可裁撤的。但是把一切的事業，都目之為「新政」，而更奇怪的又稱曰「建設」，那不得不視為謬見。按先生所引何君的辦法，說是「地方新政，得減使減。不能減時，中央應與以補助。」更按何君所著的「論田賦附加」（在獨立評論八十九號）又說：「如果中央政府無款可助，他應當裁汰冗兵，節省糜費。如果冗兵裁無可裁，中央政府應當裁併聯枝機關，減低官吏俸給，以移出經費。如果俸給移無可移，雖另創新稅亦所不惜。」我們很可惜何君未曾把新稅的辦法說出來，如其何君能創一種新稅，既不害農，又不

害工商，又不是遺產稅及所得稅等，因為何君以為這是增加市民負擔的。我想任何世界財政家，都恐怕無此本領，惟有夏得海其人，請他做財政部長，到水晶宮去和海龍王敖廣去商量，才有辦法。

先生又指出拆城造馬路，是建設狂熱，因為現在如南昌地方，又趕着造起城來，以禦匪亂。這一點我們應該怪推背圖說得沒有明瞭，他們拆城的時候，原是圖交通的利便，未曾想到共產爺爺，會這樣的厲害。如其先生以為公路不應造，那也許過了幾年，有什麼碧眼睛高鼻子的人，發明了土遁，（我們那時再可誇口我們早就有土行孫可以如此如此的，）我們豈不省去力量建築公路，又未曾害農分寸。或者因為在地下來來去去，做了蚯蚓的工作，有益於農，也未可知。先生以為南昌拆城造城，就斷然說建設應當廢止，殊不知有狼多城拆去之後，已經築好馬路，交通較前便利。實在的情形，是狼多的城，範圍狹小，市民大多數還在城外。假設城是有用的，也不過保護了少數的市民。至於我們的農民，又當如何呢？我並不是說農民不能保護，連市民也無須保護的意思。如其我們多築公路，如鄉鎮有匪，即可派兵往勦，豈不較為合理？現在江西等地勦匪勝利，可以不歸功於公路嗎？至於先生又舉出安徽

北部的汽車路，如何侵佔民田，如何不能通行，這是狼狽的事。但是先生應曉得並非所有公路，皆係如此。先生對於貴省的公路，既不同意，如何僅望望然去之，何不研究此項公路，是否確有用？如屬有用，能否設法修理？這不是較為合理的事嗎？

我記得先生有一次在美國，和一位美國教授同乘汽車，而極力稱頌開汽車如何的有意思。那時我聽見這消息，就很懷疑，中國不是也有馬路嗎？中國不是也有汽車嗚嗚的開來開去嗎？先生的教授朋友當中，想不乏有能開汽車的，先生也許同乘過，而先生獨在美國時，大獻頌辭，本就費解。當然先生能够游歷美國，領略彼邦坐汽車的風味，但是倒轆的一般中國人，如連倒轆的公路也沒有，倒轆的汽車也沒有，豈不是先生所領略的風味，絕對的不能得其一二了嗎？我並不是說中國造公路，就是因為要坐汽車去玩，先生在馬路上，可以留心去看，除去了紅紅綠綠的汽車，其內坐的是少爺小姐們，去參觀作樂外，也有貨車，也有運農產物的車子。

至如我們認為是建設的事，不妨略舉一二，和先生談談。第一是長江的大車輪渡，下次先生從北平到上海來演說的時候，先生也許可以感覺到免去向來候渡的麻煩。又

譬如現在在上海附近真茹的地方，新建了無線電台，能够同倫敦直接通電，先生將來有什麼要事，和倫敦的朋友接洽，那時先生也許可以感覺到迅速的可喜。又譬如先生的大作，在杭州發表，從前的時候，需要數日後，徽州的朋友，才可以看到，現在先生所痛恨的公路造成，僅需一日，先生的宏論，就可滿佈全城，那時先生也許引以為快。

第三項先生主張努力裁兵這同第四項減輕捐稅是有相連關係的。先生以為政府應該切實計畫裁兵的逐漸實行，財政方有出路，國家方有辦法。又批評政府領袖對全國宣言兩大政策，一是完成剿匪工作，一是以建設求統一，視為等於空談。這可說是先生有哲學的思想，而缺乏政治的常識。裁兵當然是要務，政府未必不曉得。如其先生不健忘的時候，也許可以記得政府曾經召集裁兵會議，然而長官不聽話，一場希望，仍歸泡影。先生以為「中央若以裁兵號召全國，全國不應該沒有有力的響應。」誠然響應是有的，然而響應力量足以制服軍閥，先生有把握嗎？如其現在政府由先生組織，先生有辦法嗎？進一步說，我敢告訴先生，現政府並不是和先生同一的沒辦法，現政府也未

必就把裁兵大計，完全忘却。在現在還有割據的局面之下，我們能够裁兵嗎；這是絕對不能的。裁兵必然在統一之後，統一必然借重建設，要建設必需先把匪患蕩平。匪患是有把握可以蕩平的，建設是可以着手的，而且在此憂患之時，已經有相當的成績，建設工作如能逐漸完成，統一自有希望，統一之後，政令屬中央，則裁兵自可實現，而財政自有辦法，而國家自有辦法，這種理論，豈不較先生強健多嗎？先生「以為政府應該切實計畫裁兵的逐漸的實行」。汪先生或蔣先生在真電上不是已經表明裁兵的切實計劃嗎？實際的政治家，他無疑的把他第一步的工作，昭告國人，而求得國人的贊助，他決不會把第二步工作，先說出來，也許可以得到國人的贊助，但這種贊助，無濟於事，並不是政治家所要的。

我以為先生這次言論，是忿激之辭，我個人是贊成建設的，認為現在的建設或為「物後」，却非「物先」，希望先生可以給我的言論，一種考慮的榮幸。

辭典會上

三月十四日

☆

☆

☆

☆

☆

☆

## 擁護無爲

瘦吟

適之先生：

在獨立評論上先后讀到您關於論無爲的政治兩篇文章，暨其他討論此問題的文字，真是感慨無既！我們工務人員提起筆來真是沒有自由，所以七八年來，起因於所謂建設，使老百姓累得喘不過氣，耳聞目見的事實，以及統計上的材料（如各種附捐名額）雖俯拾即是，却也懶得去做成一篇有系統的文字。對於先生其他論政的文字恕我無禮，有時憤慨之極，不免會說：「政論一類的文字胡適之最好不做！」然而關於論這「好像消極的大政策」——無爲政治，却非常表同情。誠如區少幹君所說：「現時復興各地農村，最要緊的是給他們一個翻蘇的機會；最低限度使他們能够繼續呼吸，才可以繼續工作。」憑我們的良心，及仔細觀察之結果，可以大胆說一句：這個原則，雖有聖者與，無以易也。

寫這信的本意，是想供給先生關於此問題一點有價

值的材料。

事情是這樣：去年冬間江西省民政廳長朱懷冰先生，曾出巡贛江沿岸各縣，十二月八日以巡視所得三事，電呈南昌行營蔣委員長鑒察。茲照錄其原電第三項全文如後：

（二）匪患連年，民物凋敝至極；各種建設繁興，派捐征夫材料急如星火；人民之負擔奇重，痛苦萬狀，職所到之處，民衆輒攔途請願豁免，而一衡其事項，又爲功令所應辦者。若言其負擔，實心不忍！應請置不急之務，即急要者亦分期舉辦，以恤民艱，而紓民困！

我們看了這段短短的文字，又想想老百姓們攔途請願的神色，或則在目前時勢之下，無爲政治實有提倡之必要。

瘦吟 三月三日

☆

☆

☆

☆

☆

☆

# 編輯後記

編者

△這一期差不多成了「討論無為政治」的專號了。何

廉先生本來要為獨立寫一篇「浙江建設的成績與胡適先生的無為主義」，但他臨時收到全國經濟委員會的信，知道

浙江建設的調查報告不日即可印出，所以他換了一個題目

，寄了一篇「中方式之中國經濟」來。他在篇末也談到現代

化的建設的問題。他這篇文字也是討論建設與無為的一篇

基本資料。

△「弘伯」即是前幾次投稿署名「閔仁」的。他現在里昂

大學。

△薛典會先生從南京寄信來反對無為之說，擁護一切

新建設。而「瘦吟」先生從南昌寄信來反對建設，擁護無為

政治。

△「提高銀價對策之商榷」的作者張茲蘭先生是南開大

學畢業的，曾在美國專研究金融與國際投資，現在中華教

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的會計部服務。（關於銀價問題，讀者

請參看獨立九二期何廉先生的長文。）

△本期因有時間性的稿件過多，汪敬熙先生的科學開

票再停一期。

## ◎獨立評論合訂本出售

本刊第一至二五期和第二六至五十期及第五一期至七十五期，現在補印齊全，分別裝訂成冊，極適於圖書館及私人收藏之用。每冊價目：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圃」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 定價

本市	每月一元	國內	每月一元
朝鮮	每月一元	日本	每月一元
租地	每月一元	香港	每月一元
澳門	每月一元	上海	每月一元
倫敦	每月一元	新加坡	每月一元
南洋	每月一元	海峽殖民地	每月一元
歐美	每月一元	威爾斯	每月一元
四角			

# 商務印書館影印

##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敝館借印四庫全書之議，倡於十數年前。民國十三年十四年兩次訂約，正待點裝起運，卒皆因事中止。二十二年教育部復有選印四庫珍本及委託敝館影印之議，經行政院議決通過。六月十七日教育部委託中央圖書館籌備處與敝館簽訂「影印四庫全書未刊珍本合同」。規定將文淵閣四庫未刊珍本，縮成小六開本，限期完成。旋經教育部聘請專家組織委員會，編訂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目錄，選書二百三十一種，約十一萬一千葉，分裝約二千冊。敝館籌備進行，亦已數月。自二十三年一月十五日起，開始發售預約，十餘年來中外學者互相欣告，敝館堅苦經營，再躡再起者，至此得以實現。全書版式與四部叢刊及百衲本二十四史相同，披覽度藏，並皆便利，另印樣本備索。

### 發售預約辦法

冊數	初集共計二百三十一種，約十一萬一千葉，分裝約二千冊。
版式	六開版本，用江南製毛邊紙，金屬版影印，書模上加印書名冊次。
預約期	自二十三年一月十五日起，至同年四月底止。遠地（地域詳載預約簡章內）展至六月底止。
預約價	<p>(1) 自一月十五日起至二月底（遠地四月底）期內 大洋五百六十元</p> <p>(2) 自三月一日起至三月底（遠地五月底）期內 大洋五百八十元</p> <p>(3) 自四月一日起至四月底（遠地六月底）期內 大洋六百元</p>
出書期	全集分四次出齊，第一次二十三年七月底，第二次二十三年十一月底，第三次二十四年三月底，第四次二十四年七月底。

書目及預約簡章載入樣本  
承索請附郵票一角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登記証：警字六六二號，中字八二一號

建設與無爲

胡適

求有爲無爲之界說

孟森

閒談 (十一)

汪敬熙

憲法草案初稿商兌

徐道鄰

家庭職務與婦女解放

吳景超

好妻子 (新書介紹)

衡哲

編輯後記

編者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平 | 東安市場 佩文齋(代定) | 景華書社 侯記書社    | 王府井 民智書局 良友 | 公司 立達書局 西單   | 中和書社 志遠書社 | 中書社 青年書社 誠華 | 增華書社 鴻記書社  | 社 神州國光社 佩文齋 | 宣內 現代書局 星雲堂 | 廠甸 北大 一院 德信 | 沙灘 現代書局 德信 | 永泉山書社 燕大書局 | 清華 進分社 燕大書局 | 成府 競進分社 文元書 | 天津 大學 生書局 文元書 | 局 業房子書社 博古 | 上海       | 現代書局 (總代售及代 | 定處) 亞東圖書館 光 | 華書局 新中國書店 | 南京       | 鐘山書局 正中書局 花 | 樓書局 大中書局 花 | 鎮江 代定)天一書店 | 徐州 廣益社     | 南通 三友書店(代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漢口 | 明華書局 現代書局    | 時代書局 真美書店 金城 | 圖書公司 生活書店   | 新生命書局(代定) 胡正 | 與派書局 新光書局 | 南昌          | 神州國光社 現代書局 | 廣州          | 大東書局 新民書店   | 汕頭          | 新時代書局 新派報社 | 瓊州         | 海南書局 永昌公司   | 青島          | 中華書社 春記報社     | 濟南         | 東方書局(代定) | 威海          | 吉昇書局 春記報社   | 臨沂        | 文德書局 代辦部 | 安慶          | 世界書局 中興書局  | 蕪湖         | 小一學社 統一派報所 | 蕪湖          | 覺民書報社 | 太化 | 新安書報社 | 開封 | 甘肅書報社 | 西安 | 現代文化社 | 成都 | 文友書局 | 萬縣 | 新川書局 | 重慶 | 東方書社 文化書店 | 雲南 | 新友書社 | 貴州 | 現代書局 | 福州 | 萬國圖書公司 | 廈門 | 開明書店 衡州派報社 |

# 獨立評論

第九十四號

民國三十三年四月一號

每册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一角以下爲限)代洋九五折。

## 建設與無爲

二

胡適

上期我們登出了兩篇擁護建設反對無爲的文章，同時也登出了一篇贊成無爲反對建設的通信。還有一些投稿，兩方面的主張多有，我們因爲篇幅關係，不發表了。我看許多批評我的無爲政治的議論，不能再寫一篇文字，申明我的立場，同時解釋一些誤會。

我是最贊成建設的人；我曾歌頌科學，歌頌工業，歌頌有爲的政治，歌頌工業的文明。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現在我忽然提出無爲政治之論，並非自己向自己挑戰，也不是像某君說的「沒有把事實詳細研究，而爲『立異』的心理所影響」。我的無爲論是研究實事的結果。我至今還是有爲的歌頌者；但我要指出一個極平常的原則：有爲的建設必須有個可以有爲的時勢，必須先看看客觀的物質條件是否許我們有爲。在這種條件未完備之先，盲目的建設是有害而無利的，至少是害多而利少的，是應該及早停止的。我不反對有爲，但我反對盲目的有爲；我贊成建設，但我反對盲目的建設。盲目盲目的建設不如無爲的休息。

蔣廷黻先生在三月十一日大公報的星期論文裏，很嚴

厲的責備那些「過端的批評」建設的人們；他恐怕「建設的前途大有堵塞的可能」，所以他的論文標題是「建設的前途不可堵塞了！」他替今日的建設提出兩種辯護：第一是對內不可不建設，第二是對外不可不建設。在對內方面，他說，「現在我們得着科學和機械，我們初次能有積極的解決生活問題，一方面能改良農業，一方面又能發展工業，把單軌的（農業）經濟變爲雙軌的（工商業）經濟。……對於這個機會，我們還不想充分利用，還是懷疑躊躇，豈不是自暴自棄嗎？」在對外方面，他說，「在最近幾年之內，我們外交活動的能力及我們的國際地位，大半要靠我們建設的成績。」

這些話，我們豈不覺得？我們所以「由篤信建設以至於懷疑，反對」，只是因爲今日的建設，沒有一項夠得上叫做「改良農業」，也沒有一項夠得上「發展工業」。徵地，徵料，徵工來築的公路，不是發展工業。清丈土地不是發展農業。強佔民家田地爲路基，強徵人民力役爲路工，佔了民田還要人民完田賦，不是發展農業。浙江省辦理



「清丈」，只辦了杭州市和杭縣的一部分，已花費了一百二十萬元了；據專家的估計，浙江全省的清丈，必須有二千四百萬元，才能完事。即使浙江省能籌二千四百萬元的清丈費，完成之後，距離「改良農業」還有二千四百萬里之遠！又如廣西一省，公路最發達了，於貴州鴉片過境是方便了，於軍事也許便利了，但這與「發展工業」有何關係？

所以蔣先生的辯護是錯認了題目的。他所辯護的是改良農業與發展工業的建設；但今日的建設只是為軍事用的公路，為學時髦的公路，為準備增加田賦收入的清丈，就使他的辯護文不對題了。

我們所反對的是盲目的與害民的建設。蔣先生的辯護文裏，却替我們舉了不少的好例子。先說「病民」，可舉他引的浙江省建設三弊為例：

第一，浙省自民國十六年以前，田賦幾全無附加；自十六年到現在，各縣附加少者等於原額的二倍，多者至五倍。……

第二，因汽車運費過高，鄉民的貨運仍靠人力。

第三，經費大部分用在公路上，河流就無法維持和改良。

次說「盲目」，也用蔣先生論浙江建設的話：

(一)「汽車營業不發達，尤其是貨運的缺乏，証明公路的建築不一定就是我們當前的急務。」富庶的浙江如此，廣西可知了，他省可知了。這是盲目。

(二)「江浙民間向靠水利和水運。我們現正為建設民間所不能利用的新交通工具，竟致廢棄了民間所能利用的，最便宜的水運。難怪我們愈建設，鄉村經濟就愈不景氣。」(參看本期孟森先生的論文末段論江浙水利一節。)這是不是「盲目」？

(三)蔣先生又泛論築路：「全國對於建設實無經驗……因為沒有經驗，我們只好模倣。外國大修汽車路，於是我們也大修汽車路。這種死板的抄襲不是我國工程司獨有的缺點。」這是不是盲目？

盲目與害民，二者之中，盲目是因，害民是果。所以我們大聲疾呼的反對這一切盲目的建設。然而我們的蔣廷黻先生還要替盲目建設家辯護！他說：

這種死板的抄襲不是我國工程司獨有的缺點。……我們要知道，抄襲是學習的初步，不能避免的。

他又說：

以前，凡談建設的人，誰不以爲建築鐵路及汽車是當前的第一急務？我們拿事後的眼光來批評當局事前的設計，未免太不想了。

這一句話，我真不明白了。事前的盲目設計，在事後既然證明是錯的，我們正應該拿事後的聰明來批評事前的懵懂。難道此外還有別的更好的批評方法嗎？難道我們都應該好錯就錯嗎？

我們所以要批評今日之建設，正因爲這種盲目的建設並不是「我國工程師」的過失，乃是一班領袖羣倫的人物之普通過失。工程師是執行命令的；而一切盲目的建設乃是政治領袖所提倡，學者與政客所附和，與工程師無大關係。政治領袖爲的是好大喜功，政客爲的是可以吃建設飯，學者爲的是迷信建設總不會錯的。我們也曾「篤信建設」，但我們不護前，不護短；我們現在很誠懇的奉勸我們的政治領袖：建設是一件需要專門技術的事業，不當用作政治的途徑，更不可用作裝點門面的排場。翁文灝先生（獨立第五號：「建設與計畫」）會很沉痛的追述前清許多建設事業所以失敗，都由於糊塗與冒昧。他說：

建設真不是容易事。建設必先有計畫，計畫又必有實在根據，不能憑空設想，也不能全抄外國成法。

……應該由富有學識的頭腦來做計畫，再叫各部份的工作者各就所專去調查研究，徵集應備的材料，或解決局部的問題。而這種計畫大部份純是專門問題，必須先搜集已有的材料，考察實際的情形，然後方能下手，決不是普通行政機關四壁蕭然毫無存放設備的辦公室內所能憑空杜撰的。

現今的人所以輕易談建設，都是因爲他們不了解建設的專門性質。而這幾年各省的建設所以只限於築路拆城一類的事業者，其原因不在於僅僅盲目的模倣，其真實原因是因爲此種工程都不需要專門的學術。政客與商人粗工都幹得了，都包得下，都可以吃飯邀功，升官發財；今日建設所以成爲風氣，都由於此。人民的痛苦，國家的利益，百年的大計，在他們的腦子裏都沒有地位。要挽救此種風氣，必須先要政治領袖們澈底覺悟建設是專門學術的事，不是他們可以隨便發一個電報命令十來個省分限幾個月完成的。他們必須澈底明白他們自己不配談建設，更必須明白他們今日辦的建設只是政客工頭的飯碗，而不是真正的永久的建設。他們明白了自己不配建設，然後能安分無爲，做一點與民休息的仁政；等到民困稍蘇國力稍復的時候，等到專門人才調查研究有結果的時候，方才可以有爲。

蔣廷黻先生問我們：

倘若蘇俄第一五年計畫失敗了，你看她的國際地位能有如今日嗎？

我們要請他想想翁文灝先生兩年前說的話：

古人說七年之病必求三年之艾。現在可以說，五年建設必須先有五年的測量，調查，研究。所以俄國五年建設計畫比較可能，因為他們預備工夫究竟比

## 求有爲無爲之界說

孟 森

胡適先生倡無爲政治一說，辨難至今未已。就當前之舉

實言，以無爲足慰人望。以進化之理論言，則無爲終啟人疑。陶希聖先生以官僚與民主定其界說，而胡先生又不甚謂然。然則他國明明帝國，必以有爲而興；吾國明明民國，將以無爲而始有濟。求其故又不可得。豈非今日論政之一微妙而神秘之端乎。吾終欲強求其故，以質之諸先生。

吾國以道家爲言無爲之宗主，猶之佛家之言果報。人

以爲彼自成一家言，縱不非之，而亦不能捐所有事實以徇之也。求無爲之說，當在道家以外，而後不域於主觀。是故欲問道家以外無爲二字之來歷。孔子曰，「無爲而治者

我們開始得早了許久。他們的第二個五年建設計畫

成功必定更大，因爲已有了第一個五年工作做了基礎。（獨立五，頁十二）

沒有一個國家能靠盲目的建設得着國際的地位的。也沒有一個政治領袖能靠害民的建設得着人心的擁戴的。

大家歇歇罷！必須肯無爲，然後可以大有爲。

廿三，三，廿六。

，其舜也歟」。然則無爲之標準乃舜也。舜勤衆事而野死，何謂無爲？誅四凶，舉十六族，平水土，播百穀，敷五教，五刑有服，使垂共工，使益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使伯典禮，使製典樂，使龍作納言，二十二人時亮天功。自古有爲之政治綱領，皆定於舜，何謂無爲？若謂舜之恭己正南面，惟在任人，能任人故稱無爲，則何以五十載陟方乃死，並非任人而自逸也？

其次若禹，孟子言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是謂大有爲矣。乃又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無事即無爲也。

孔孟皆言無爲，而孔子之所謂無爲，乃野死勤事之舜。孟子之所謂無事，乃過門不入之禹。然則無爲與不爲大異。舜之治人，善與人同，是謂無爲。禹之行水，順水之性，是爲無事。民自利其所利，而後爲政者因其所利以利之。帝國之有爲，根本在於自治。民國之有爲，根本在於訓政。以訓政之權與公僕，爲主人者不受訓則其罪當居何等？是故訓令種煙則種之，煙多而糧食仰外國矣。訓令當兵則當之，兵多而戕賊有力，生產無力矣。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巳矣。故者以利爲本。是說也，論政治者不常盡以最初之原理爲根據也。名教誠緣於後起，而既成爲教之後，未易一日而還毀。今吾國於訓政之中，有一使全國大亂之道，而國民偏不受訓，亦尙不至於亂。此名教之力。若必謂合於天賦之原理，則殊不然也。大亂之道謂何？假使全國之民，有子女有資產者無一家不以骨肉相見於訟庭，其爲亂國，有甚於盜賊滿山俄學載道矣。何也？非法者可以法裁之，天災亦可以人事挽之也；今之國民，無尊重血統之素習，而沿宗法以來之男統。國家制定法律，可爲訓政之著爲定令者矣。繼承之法，出嫁之女，又爲夫家生女，此女可以得外祖之外祖之家財。胞姪於胞伯叔則無分也。法律既定，民不遵行，則訓政之效

力安在？乃自定法以來，民間冢家祠修宗譜者輒盛，是其維持男統，即破壞法統也。子女爭產之案，除一二著名涼薄蘊利生孽之家外，若告以析產之法，今異於昔，不惟以後施行，且已溯及既往，成例具在，民輒笑謝之曰，吾先高曾祖考莫之行，吾先高曾祖姑亦莫之行也。若此則訓政之效力又安在？或者曰，放棄權利，法所不禁。故雖履行訓政，亦不欲以法律強迫成訟。然所謂放棄者乃女權之片面，彼以男統繼承者，則成違法之侵佔，何故又容許之？無亦謂全國以骨肉相見於訟庭乃大亂之道而可巳則巳乎？思想落後，至少爲不革命。況已有法律而聽其不遵守，甚且名之曰道德，若名以道德，即可超法律之外者然。其實則在提倡女權之日，而又以壓抑女權爲道德，以此爲訓，使人何所適從？則無乃仍以亂之說爲較合理。夫制法以訓民，幸民之不受訓而暫免於亂。此政治之有爲，而民尙幸其無爲乃始儉一日之安也。

爲修鍋釘盤者造必不使用之汽車公路，胡先生就其鄉之所見，惜其有爲之徒奪人田，徒勞人力，徒耗人財。吾亦欲就鄉之所見，問有爲者何故又置而不爲？夫江浙爲全國財賦之區，以其農產之富也。江浙之宜於農產，以太湖爲之司旱潦也。太湖之能司旱潦，以上下游之水閘能節其

殿閉也。運河自京口而下，節節設閘，前人之有爲，而民不病，以其因民之利而利之也。今無一閘不廢，太湖流域旱潦皆患，而田賦則居天下之最重。論建設之績，僅僅修復思想落後不知現代化之人之故跡，當未必即爲有爲。然今日之當爲，莫急於是。太湖流域數千萬畝之農田，畝益

## 閒談

(十一)

現在大學學生畢業的一年多過一年。但是學生畢業後找事做的困難卻是一年大過一年。學生的出路——怎樣安插這些畢業的學生——就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

這個問題有兩方面：一方面是社會上用這些畢業生的機會的多少；一方面是畢業生的能力的有無。

我國各種事業都感覺到人材太少，機會似乎是不嫌太少。並且大學畢業的高材生都可以找到機會去做事。

大學畢業生之中，最沒有辦法的，就是成績中等和中等以下的人。這些學生真真是「文不像騰錄生，武不像救火兵」，「高不成，低不就」，在社會的生存競爭中，實是站立不住。學生的出路窄，似乎大半是因爲能力不夠的

一石，所得幾何？即畝益一斗，所得當幾何？此不現代化之事業，當在未能有爲之列。未能有爲，即無爲政治也。故吾欲定無爲有爲之界說，願舉不合現代化之訓條爲準；以欲從人，則無爲也。以人從欲，則有爲也。

汪敬熙

緣故。

解決這個問題，根本的辦法，似乎不在多造機會，而在改良大學訓練學生的方法。機會造多了，而大學畢業生能力不夠，也不能利用這些機會。機會也是白造了。



可惜我們的教育專家，只注意到了學制，學校的組織，課程的編製，學校的設備；然而不注意到怎樣訓練大學學生。

我們現在就吃了不注意這個問題的虧。我的見聞太窄，只能以教育界的現狀，來作證明。

現在設立年歲稍久的大學，那一個不感受一筆教員俸的苦痛？那一個沒有一批老資格的教員，既不能教書，

更不能做研究工作，然而學校須出他們的養老金的？

中學的教員是不是程度漸漸降低？中學學生程度不好，是現在大家所公認的。政治不安定，教育經費不固定，政客利用學生，固是使中等學校退化的原因。但是這些原因抵不上師資缺乏的重要。師資為何缺乏呢？

我們素來不注意訓練大學學生的方法，所以在大學及中等學校，都留下了一堆不中用的教員，使學校退步，並且阻礙教育的改革！

我們如果真是想給學生一種好的訓練，先得要將現在大學內的一種壞空氣澈底換過。不知道為什麼緣故，我們的大學之內，教員，職員，和學生，成了三個對立的團體，而學校成了這三個團體運用手腕的政治舞台；校長真變成 President 或 Chancellor 了。教員要「應付」職員和學生；職員要「應付」教員和學生；學生也要「應付」教員和職員。畢業的時候，學生「應付」的本領有了，政治手腕用熟了，但是有沒有專門學問的訓練呢？

這種專以個人利害為本位，「爾虞我詐」的惡習，非完全去盡不可。

大學在社會中的職務是：（一）求得新知識；（二）

保存已得的知識；和（三）訓練各種專門的人材。

要想大學盡這些職務；教員必須是能知道他所教的學問的現狀和趨勢，並且是能努力作研究工作，去增加這門學問的新知識。這是大學教員所應必具的條件。至於「結黨營私」，「鼓動風潮」，實是下流；不但有損自己人格，並且未必於己有利，更是害了學生，對不住社會。如果教員自知不能盡職，何苦不「另尋高就」呢？

職員必須能幫助教務的進行。學校不是衙署，官僚的惡習是不能在學校內存在的。「敷衍」，「搪塞」，「規避」，「躲懶」，這些把戲是不應該玩的。

學生必須知道在大學內的第一要義，是把自己造成一有用的材料。教員職員不是政敵，手腕大不可用。手腕的練習只能使人學到幾套騙人一時的鬼把戲。真正做事的能力是必須從努力求專門的知識，受專門的訓練，方能得到的。

總而言之，大學應該是一個教員領導學生，努力求知的一個地方。教員須能努力前進。學生須能在教員指導之下；獲得專門的知識，專門的訓練。大學既不應是文憑發賣所，更不該是未來政客製造所。

我們還須要改大學教學生的方法，我們現在可以說  
是沒有方法。看現在大學的功課表，我們現在教大學學  
生好似「填鴨」一樣。這種「填鴨」的方法，是只將各  
種學問往學生嘴裏塞下去，不問他能消化與否，更不待他  
以後能自己尋學問的食物否。但是仔細看看，方才知道  
「填鴨」也不是這樣的填法。「填鴨」填的食物是富於  
滋養料的，是可以使鴨子肥的。我們大學的課程是高梁  
，油，麵，竹頭，木屑，亂填一氣。

譬如拿心理學系說，普通心理學，初級及高級實驗心  
理學，生理心理學，變態心理學，兒童心理學，動物心理  
學，教育心理學，應用心理學，社會心理學，情緒的心理  
學，思想的心理學，Gestalt 心理學，測驗，心理學史，  
——甚至 Messer 的心理學——「五花八門」，「樣樣俱全  
」。心理學各門的功課是完備了。但是學生能夠得些  
基本的知識同訓練嗎？

我國有心理學系的各大學，那個是有醫學院的。那個是  
能給學生學解剖學，神經學，生理學的機會的？那個心理  
學系是除了要學生學統計學之外，並且要學生學的算學程  
度可以了解統計的算理？那個心理學系是要學生有相當的  
物理知識和工廠的經驗，自己可以製自己用的儀器？那個

心理學系是真能給學生以做實驗研究的訓練？

不使學生求算學，物理學，解剖學，生理學的基本知  
識，而且不給學生以真正能得實驗訓練的機會；只是使學  
生聽些「五花八門」，「雞零狗碎」的心理學的知識；有  
什麼用處呢？學生畢業後有什麼能力？就是教心理學  
，教的下去嗎？教書之外，又能做什麼事呢？為什麼  
各學校的心理學系學生不少呢！

不求教法的根本改良，有些學校大開方便之門，許從  
來沒有學算學，物理學，和生物學興趣的文學院的學生入  
心理學系，能夠吸收來學生嗎？吸收來的學生能夠是好  
的嗎？

我們的大學是應該注重基本的知識，基本的訓練，少  
設立一些零碎的課程。

大學教學生也是應顧及學生畢業後的職業。

大學畢業生中最少數的是做專門研究的；再多一點的  
是做中學的教員；或者更多的到政界，工場，商界，等  
等去服務。

大學教學生似乎不該不無目的；也不應該去把個個  
學生造成專門學者。

全無目的固然是造就不出好學生來。只以造成專門學者爲目的，往往使天資中等以下的學生，在學校內的時候趕不上功課，出學校之後有「高不成，低不就，」「眼高手低」的苦痛。

大學第一二年的功課似乎宜於注重基本的知識；第三四年似乎應該按照學生的興趣和能力，給以不同的訓練。有研究的興趣和能力的人當然應該極力幫助他前進。興趣和能力都不在研究方面的人，似乎應該給他一種訓練，使

他畢業之後如有機會便可實際應用他所學的東西；如此！他既可免受「眼高手低」之苦，社會也不是白白造就一個無用的人。

這是一個淺近的道理。但是如果我們早按着這淺近的道理做，我們大學理工農學院的畢業生，就不至於大多數都是謹遵孔子「學而優則仕」的訓條，走入政界之內，結果變成高等無業游民了。

## 憲法草案初稿商兌

徐道鄰

### (一) 批評憲草之先決問題

吾人今日欲討論憲法問題，應先認清三點：一，制定憲法，乃實際政治問題，而非學術理論問題；此謂吾人目前最重要目的；在如何可得一發生效力之憲法，不在如何可得一最完美最高妙之憲法。蓋憲法雖「好」而不「生效」，與廢紙無異；憲法雖有缺點而能生效，勝於無憲。二，我國目前外憂內患嚴重之時，欲求度此難關，首在得一強有力之政府，欲求政府之強有力，必先求其政權統一，而欲求政權之統一，必先求其地位鞏固，近年山東廣西之

漸獲小康，可以爲證。故吾人今日當願有一地位鞏固強有力之專制政府，不願得一表面上順從民意實則朝不保夕之柔弱政府。三，一國憂難時間，地方政治重於中央政治，庚子之亂，東南半壁可以保境自安，不受摧殘，可以爲證。論者謂百姓幸福，不在一國憲法之好惡，而在地方行政之良否，宜三思也。以下對憲法草案初稿之批評，皆根據以上三點。

### (二) 憲草中制度上可議之點

一，行政院長之地位太不鞏固



憲法草案初稿之政府組織：全國政治中心，在行政院長而不任總統，任命行政院長之權，在總統而不任國民大會。是即責任內閣制也，所不同者：（一），責任內閣之所顧慮者，伴一國會之信任案已耳，行政院長之所顧慮者則有四：A 國民大會或國民委員會之不同意；B 立法院之不信任；C，監察院之彈劾；D，國民委員會之接受彈劾或不信任案，是行政院長之阻力過多也。（二），責任內閣與國會不協時，元首為擁護其內閣，有解散國會之權而從新召集之。憲草中之總統，欲擁護其行政院長，則除遇

立法院提出不信任案時，可提交複議一次而已，此外絲毫無能為力，即使總統極端信任行政院長，而全國人民極端愛戴總統，然苟有十餘國民委員及二十餘監察委員或百餘立法委員不與同情，則盡全國人民之權利力能，亦絕無法為之後援，是行政院長之基礎特薄也。處中國目前憂患正多百廢待興之時，使一阻力甚多而後盾毫無之長官，作一國政治組織之中心，負推動全國行政之責任，而可能乎？憲草中缺憾甚多，此點最宜注意。且就其組織觀之，總統不自負行政責任，而有提任行政院長之權，然又無權擁護之，是全國中祇有負行政之責任者，而無具行政之實權者也。例如總統提出一人作行政院長，而國民委員會反對之

；或才得任命，監察院彈劾之，而國民委員會接受之，此後歷任皆然，而監察院既不彈劾總統，國民委員會亦不召集國民大會，是三年中將無行政院長，試問此三年中主持行政者何人乎？且政府行政機關（總統—行政院長）及監督機關（國民委員會立法院監察院），既同為民選，而監督機關隨時可互相聯合或召集大會，以排去行政長官，行政長官則無法召集大會以抵抗監督機關，則法理上亦失分權互制之效也。

## 二，立法院權限太寬——不信任案之失當

憲草初稿以國民委員會代表國民大會，以之作為民意機關，而以立法權付諸立法院，是斷然決然，不以立法與民意，混為一譚也。此誠合乎近代歐美各國憲法學之趨勢，而為挽回議會制度末日之初試，良可贊美。所可疑者，憲草既視立法權為政府治權，而不以為人民政權，視立法為技術之事，而不為民意之事，然則又何故以議會制度組織立法院乎？其說如下：（一），立法委員之職，既在運用立法技術，而不代表民意，然則何以立法委員必經國民大會選舉？（二），立法委員既為專門法律人材，則對於財政（預算）軍事（戒嚴宣戰媾和）外交（條約）及國際事項，豈能皆有特殊之研究，而可負責為各事最後之決斷

？(三)，立法院之所事，既首重立法，則對於國家行政之細情，自難深悉，然則何以對行政院有提出不信任案之權？信若行政院政治之設施，或法律案之執行，有所不當，則監察院將無彈劾之職權乎？彈劾之，是全國之中獨行，則監察院將無彈劾之職權乎？例如行政院政治之設施，果有不當，立法院不提出質詢，亦不提出不信任案，則監察院彈劾行政院之外，亦必將彈劾立法院乎？

### 三，縣長無厲行庶政之機能

依憲草初稿，縣長雖受省長之指揮以執行中央行政，而其罷免之權，則全在縣議員與縣民之手。然則遇中央政策與地方利益有衝突時，縣長為執行中央政策而受地方人民之反對與攻擊，中央何以擁護之乎？目前我國地方人民，尙多缺乏政治訓練，故雖有惠民之政，而在其設施之項，率皆不得百姓諒解，殆為常例。乃欲於此時使地方人民有罷免其行政長官之權，是無異盡削其行政機能，非所以處為濟亂也。

### 四，行政訴訟仍應獨立

憲草初稿司法院無行法院之組織(一〇七)，其旨未詳，若欲以行政訴訟歸之普通法院，特設行政訴訟庭

而使之有復審上訴之可能，則未嘗不可，若欲以之減去行政訴訟，或以之併諸普通民刑訴訟，則是與一般法治趨勢逆流而趨，甚不可也。

### (三) 憲草中條文上可議之點

#### 一，十五條之宗教自由

憲草十五條：人民信仰宗教之自由，可受法律限制，與約法十一條之絕對自由不同。何前寬而後嚴耶？

#### 二，廿六條之礦產及天然力

廿六條定礦產及天然力屬於國家所有，不受人民土地所有權之影響。然不知人民於國家取用礦產或天然力時，其土地所有權，因之遭受損失，國家將與以相當賠償乎？

### (四) 憲草中應決而未決之問題

#### 一，省縣間中間階級問題

地方行政之應改二級制為三級制，全國上下，幾眾口一辭，憲草似尙未顧及此點。

#### 二，憲法法庭問題

憲法之如何保障，憲草中殊未顧及。將來違憲之法律，由何處判其失效，違憲之行政，由何處為之糾正，皆難決之事也。

# 家庭職務與婦女解放

吳景超

過去一百餘年的婦女運動，目的只有一個，便是求婦女的解放。我們現在如來估量一下這種運動的成績，便可知道有些方面是成功的，而有些方面，雖成功還很遙遠。當然，無論在那一方面，各國婦女運動成功的程度，是不一致的。但是我們如撇開那些落後的國家不算，而只注意那些先進的國家，我想大家一定可以看出，在教育方面，在政治方面，女子解放的成功，是最顯著的。但在經濟方面，在心理方面，女子的解放，還未澈底。女子雖然可以與男子受同樣的教育，可以與男子同樣的參加政治活動，但在經濟方面，大部份的女子，還是依靠男子的。他們大多數沒有獨立的職業，沒有獨立的進款，因

而只好過那寄人籬下的生活。在這種生活之下，女子只能養成一種倚賴的心理，自卑的心理，遷就男子的心理，脅肩諂笑的心理，決不會產生一種獨立自尊的心理的。所以現在婦女解放的焦點，還是婦女的職業問題。假如成年的婦女，也與成年的男子一樣，都有獨立的職業，婦女的心理，一定要隨着起一重大的改革，男子對於女子，自然會另眼相看，那時，婦女才算真的解放了。

講到婦女的職業問題，我們可以先看一些統計。今以英美兩國為例，看看十歲以上的男女，有職業者的百分數，是否有點分別。

國名	年 月	十歲以上人口有職業者的百分數	
		男 子	女 子
英	一八八一	八三、三	三三、九
	一八九一	八三、二	三四、四
國	一九〇一	八三、七	三一、八



業生業生活，但大部份都變成管家的主婦，不能再在社會上活動了。

我想受過教育的青年女子，誰都放慮過這個難題。

家庭的生活，是他們所要求的，職業的生活，也是他們所要求的。這兩種生活，顯然的是有衝突，有什麼法子可以解決呢？

在討論各種解決方法之先，有一點我們應當先決的，就是我們所提出的方法，一定要兩全其美，不可捨彼取此。所謂兩全其美的方法，便是使婦女有家庭生活同時還可以有職業生活的方法，因為只有在這種辦法之下，女子的人格，可以得到充分的發展。假如採取孟子所謂捨魚而取熊掌的方法，不管魚是家庭還是職業，婦女與社會的全體，都要感到一種不良的影響。因為婦女如捨家庭而取職業，社會上的生產力，自然是增加了，但社會本身，將因無人傳種而消滅，所以那些為職業而獨身的女子，是不足為訓的。假如婦女捨職業而取家庭，社會上的生產力，自然要因婦女退隱而減低，而且婦女本身的解放，也永遠不能達到目的，所以這種辦法，雖然是已經行了數千年，終不是一個最好的辦法。

最好的辦法，只有使家庭的職務社會化，使一切成年

的女子，不論已婚未婚，都不致因家庭的職務，而影響到他們的職業。家庭的職務中，最足妨礙婦女職業的，便是教養子女。在現在的社會中，一個已婚的女子，在生育期的前後，便是有職業也要放棄的。但在蘇俄，因為教養子女的職務，其社會化的程度，較任何國家為深，所以女子在生育期的前後，可以暫時離開他的職業，不必放棄他的職業。蘇俄的法律，凡作工的婦女，在生育期的前後，可以休息各八星期，依舊拿到工資。就是在公事房中當書記的婦女，在生育期前後，也可以休息各六星期。所以生育子女，並不影響到婦女經濟的獨立。婦女在生育之後，休息八星期，體力已經復原了，便可回到原來的職業中去。在英美等國，婦女在生育後兩三月便工作的，并非沒有，但是因為小孩缺乏照顧，所以這種家庭中的嬰兒死亡率，特別的高。蘇俄有見于此，便在工廠或工司附近，設立一些託兒所。有職業的婦女，每天可以抱小孩去上工，到了工廠或工司，便將小孩交給託兒所，裡面自有專家照顧，做母親的，隔若干點鐘，可以去哺乳一次，到了下工的時候，可從託兒所中，將自己的小孩領回。在這種情形之下，小孩因為有專家照料，不致發生不幸，而且自幼便過羈縻的生活，長大成人，也許可以做一個

更好的國民。至于做母親的，因為無小孩的牽掛，自然不必放棄他的職業了。在莫斯科的都市中，一九一八年，只有四個託兒所；一九二八年，便加至一〇四個；一九三一年，又加到一百二十個。這個數目，自然還不能滿足全市人的需要。但這種託兒所，是年年增加的，將來總有一天，供給與要求，可以相合。我們還要注意的，就是託兒所的制度，并非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專利品，歐美各國中，也有類似託兒所的組織，不過不十分普遍就是了。然而這種制度與婦女解放的關係，我想是極明顯的，凡同情于婦女解放運動的，應當提倡託兒所的制度。

除了教養子女以外，家庭中還有許多雜務，特別是關於經濟一方面的，也要消磨主婦很多的時間。譬如三餐的烹飪，這是從古以來，便是放在女子身上的，一天至少要花三點鐘。其實這種雜務，也可以使他社會化的，而且社會化之後，只有加增人們的福利，壞處是一點也沒有的。德儒爾勒在一九二二年著家庭一書，對於這一點說得很透切。他以為現在這種以家庭為單位的烹飪方法，是最不經濟的方法。譬如有一百個家庭，現在便要造一百個爐灶，社會化之後，只須造一個爐灶，一個廚房，便可解決這一百個家庭的吃飯問題了。現在每做一餐飯，便

有一百個主婦在那兒忙碌，他們所買的菜，既不便宜又不一定合乎衛生，他們做出來的菜，也不一定是適口的，弄得許多人都生胃病，對於生活減少許多興趣。但是社會化之後，情形便大不同了。以前需要一百個主婦才能做出來的飯，現在只要兩三個廚子，便可做出來了。從廚房中解放出來那九十幾個人的時間，便可去做點別的生產事業。在廚房中的兩三位廚子，我們假定他們是受過訓練的，買菜的時候知道那種最富於滋養，做菜的時候，放出他們的本領來，一定可以使大家都覺得適口。而且他們是大量的進貨，大量的生產，一定比現在這種小規模的烹飪，要經濟得多。現在已有國家，採取這種合作廚房的辦法了。這自然是最合於理性的。烹飪既然可以社會化，洗衣自然也可以社會化，其餘的一切雜務，都可以社會化。餘下來假如還有一些工作，那麼在上工之前，下工之後，夫妻可以合作，共同來盡這種家庭的職務。以上一切，假如一一都辦到了，試問還有什麼阻礙，使女子不能加入社會去活動？

我們對於女子經濟獨立的運動，是十二分同情的，同時我們願意指出他的困難，以及征服此種困難的方法。所謂困難，便是婦女的家庭職務。所謂征服困難的方法，

便是家庭職務的社會化。家庭職務社會化之後，婦女便可一樣的與男子同謀獨立的職業，同為社會服務，同為社會生產。婦女加入社會生產的結果，至少有一點對於男子是有利的。那便是男子工作時間的減少，以及閒暇的

## 好妻子 (新書介紹)

書名 好妻子 (Good wives)

作者 Louisa M. Alcott 譯者 鄭曉滄

譯本出版者 開明書店

「好妻子」是兒爾珂德女士繼續「小婦人」而作的一本帶有自傳性質的小說。正有些版本上，牠的章目還是接着那「小婦人」的章目數下去的；而牠的正主人，也便是那幾位小婦人，雖然她們都長大而出嫁了，除去那一位最溫柔的佩絲，永遠不會有機會成爲一個「好妻子」，因爲她早早的便死了。美麗的梅格，是嫁了一位模範的，雖然不免窮一點的丈夫，叫做柏魯客的。在此書結局的時候，梅格是有了一男一女。她是已經改良了她的那個喜愛奢華及裝飾的脾氣，成爲一個克勤克儉的賢母良妻。不羈的羅，雖然拒絕了勞笠的求婚，自信是一位守獨身主義者；而

加增。因爲現任的生產事業，如只讓男子去作，每人每天須作八點鐘的工，到了女子一齊加入之後，不是每天只做四五點鐘的工作就夠了麼？

一三，三，二四。

## 衡 哲

結果却仍是嫁了那位吃醋的勞笠把他叫做「鬼一般的老頭子」，實際上則又如蜀所說的「良好而溫和」的德國教授——一位在雨傘之下，一手挾着一個大包，一手挾着他的愛人，在泥濘的馬路上，向她求婚而得到成功的中年學者！當我們的書收場的時候，這一對書獃子夫婦正在努力于他們爲貧苦孩子們所創立的一個學校。同時，他們自己也有了兩個男孩，遂使那一匹沒籠頭的野馬，居然變爲一隻看家的老母雞。而以藝術家自命的艾美，則終於嫁了那位來在四朵鮮花中的隣舍青年，勞笠——在他失戀于鄧的後一年，在本書結束的時候，她也有了一個嬰兒了，所以那位自己已有四個姑娘的中年馬夫人，一轉眼間，便忽然成爲五個淘氣孩子的外祖母。并且這些孩子每年還要加添呢！馬夫人喜歡得要流眼淚了，雖然着者不會讓她這樣做。

我們對於梅格與艾美的結局，並不覺得詫異。雖然其美常常以藝術家自期，但我們開始就知道，那也不過是一點作用，並沒有什麼源遠流長的活水，在這她成爲一個天才。但我們對於蜀，却不能沒有一點惋惜，在「小婦人中」，蜀是那樣的聰明，那樣的活潑與獨立，那樣的閃爍着天才的光亮，而終局却是把她所視爲重於一切的著作野心，完全拋棄。我們知道，這不是本書著者自己的真實生涯。她之所以使書中的蜀，得到一個與真正的不同的結局者，大概還有一點不能忘情於那個少年時代所錯過的機會吧！這個對於自己生命的不滿意，她曾使蜀這樣的發洩過：

「一個老處女，這便是我將來的成就了。一個文學的獨身女子，一枝筆當了丈夫，一個個的故事當了孩子。二十年以後，或者一點兒小小的聲名。在那時，像可憐的約翰生，我年已老，不能享受，彭隻形單，有誰與共？薄有金錢，羞耻自立，然而也何所用之？」

這是凡有天才的女子的一个共同悲劇：她若不爲了野心犧牲愛情，如著者的自身；便須爲了愛情犧牲她的最高的野心，像書中的蜀一樣。

但著者似乎要我們相信後的一个解决方法，是赶快

樂的。她並不願意和我們來討論這一个「二者不可得兼」的大問題。所以我讀這個古事的時候，覺得猶如走到了一個松柏環繞，流水潺潺的古廟中；境地雖然十分的清幽，十分的可愛，無奈她總不免離開現實的生活與問題太遠了一點。比如說吧，誰不願意有一个賢母，一个良妻，而反願有一个愚魯粗俗的母妻呢？誰不知道對於一个天生的家庭女子，一个快樂的家庭乃是她的樂園呢？但是，假如說像蜀那樣一个天才橫溢的女子，却仍須跟着她那平凡的大姊與小妹的脚跟，以四座高牆和一個平凡的社會，作爲她生命的唯一世界，那就未免有點可惜了。不錯，書中明明告訴我們，蜀是正在辦着學堂，教着貧苦的孩子哪。這自然是一件神聖的工作，但蜀却絕不是做這件事的人。牠的存在，猶之那位德國教授的存在一樣，都不過是一種解嘲，都是很不自然的。在全書的寫實風格中，這兩處更不免有點顯出白璧微瑕。故我們仍舊要說，書中的蜀，的確是犧牲了她的野心的。

這是對於本書的內容而言。對於譯者的努力與成功，則我的感想，正如我讀「小婦人」時的感想一樣，覺得他的譯筆不但忠誠，而且流利優美，可謂克勝了那譯書的兩個大困難——神情的傳達和意義的保存。而在運用白話的一





今日可做的建設事業

胡適

如何提高中國行政效率

趙錫麟

從定縣回來

章元善

閒談(十二)(十三)(十四)

汪敬熙

無吃無教(通信)

熊十力

爲新生活運動進一解

胡適

編輯後記

編者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西單商場—大學出版社 業所 君中書社 嘉陵書社 增華書社 平和書店 聚南書社 聚華書社 東安市場—佩文齋(代定) 吳華書社 福華書社 侯記書社 王府井—民智書局 宣內—佩文齋 廠甸—現代書局 星雲堂 沙灘—北大—院 景山書社 海運倉—朝野書店 朝大消費社	天津	清華消費社 政府發進分社 天津書局(代定) 南開大學 大生書局 文元書局 紫房子書報部 博古書局 現代書局 (總代售及代定處) 亞東圖書館 光華書局 新中國書店	上海	新中華書店 鐘山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局 大中書局 花牌樓書店(代定) 天一書店	南京	鎮江書局 徐州廣告社 徐州書店(代定) 三友書店(代定) 振華書局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 新	漢口		武昌	時代書店 真美善書店 金城圖書公司 生活書店 新生命書局(代定) 胡正興派報處 新光書局	南昌	南昌書局 南昌書局	廣州	現代書局 圖書消費社	汕頭	大東書局	興寧	興寧書店 新民書店	梅縣	新時代書局 黃勝和堂派報社	瓊州	海南書局	桂林	永昌公司	濟南	東方書社(代定)	青島	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	威海	吉昇昌書局	臨清	荷澤書報代辦部	文衛書局	世界書局	安慶	匯海書局	蕪湖	廿一學社 中華書局	綏遠	小小書報社	宣化	覺民書報社	太原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開封	西安派報社	西安	甘肅書報社	蘭州	現代文化社	成都	文寶書局	萬縣	新川書局	合川	朋友書店	重慶	朋友書店 文化書店	雲南	東方書店	貴陽	新友書店	杭州	現代書店	福州	萬有圖書公司	廈門	開明書店	衡州	開明書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獨立評論

第九十五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八日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一角以下爲限)代洋九五折。

電話：東一局〇五六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牙胡同二號

## 今日可做的建設事業

胡適

關於建設與無爲的討論，我在上期曾有一篇短文——論

「建設與無爲」——申明我的立場：「我不反對有爲，但我

反對盲目的有爲；我贊成建設，但我反對害民的建設。」

我申明我所以提出「無爲政治」那個使人駭怪的口號來，

只是因爲我希望今日的政治領袖們澈底覺悟建設是專門學

術的事，不是他們可以隨便發一道電報命令十來個省分限

幾個月完成的。那樣的建設必然是政客商人的飯碗，必然

不是根據於專家研究，富國利民的建設事業。我也明白，

在這個時代高談無爲的政治，真有點像朱熹對宋孝宗高談

正心誠意一樣的迂闊。但是，如果這種討論可以減少一點

點盲目的有爲，或者減輕一點點人民的苦痛，我是不避迂

腐的譏笑的。

有人問我：「你既然不是根本的反對建設，那麼，你

看現在有什麼不盲目的建設可以舉辦嗎？換句話說，你贊

成那樣子的建設事業呢？」

我很歡迎這位朋友的質問，因爲他給了我一個機會，

使我可以補充上期論文沒有說完的一點意見。

我曾說過：有爲的建設必須先有可以建設的客觀的條

件：第一是經濟能力，第二是人才。兩件之中，專門人才

更重要，因爲有價值的建設事業都是需要專門技術的事業

。有了專門學術人才，沒有錢，還可以量米下鍋，從小計

劃做起，慢慢的發展。若沒有人才，即使有很多的錢，也

只會做到張之洞的建設事業，賠了錢還替國家增添一個大

禍害。所以我們可以提出這樣的建設標準：

第一，有了專家計劃，又有了實行的技術人才，這  
樣的建設可以舉辦。

第二，凡沒有專門學術人才可以計劃執行的事業，  
都應該先用全力培養人才。

第三，在創辦新事業之先，應該充分利用專門技術  
人才，改革已有的建設事業，使他們技術化，  
使他們增加效率。

我們試舉幾個例子來說明這幾個標準。公共衛生是最  
明顯的需要專門學術的事業。近幾年來，中央與幾個大城  
市的公共衛生所以比較有成績，都是因爲這件事業太專門

了，官僚與商人插腳不進去，只好讓幾個專門技術人才去計劃執行。薛篤弼先生從前也會想用擁錘掃地的本領來辦公共衛生，但因爲國內有個第一流的醫學學校，又有一些留學國外的醫學人才，所以薛篤弼先生改做律師之後，南京上海北平等處的公共衛生事業仍舊繼續增高，有顯明的進步。這樣的建設是不會有人反對的。

再舉農業改良爲例。公共衛生辦在大都會，事業集中，所以中國現有的少數技術人才在眼前還勉強可以够用。農業改良的範圍太大了，專門人才實在不够分配，而歷來政府當局又不完全明白農業科學的專門性質，至今還不會有個培養農學人才的決心，所以至今全國只有一兩個像樣的農科大學，而偌大的北方竟沒有一個。在人才這樣缺乏的狀態之下，一切「農業改良」「農村復興」的呼聲都不過是熱空氣而已。「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正是指這一類的事業。爲今之計，政府必須下最大的決心，集中財力，完成一兩個第一流的農科大學，多聘國外的第一流專家，務要在十年二十年之內訓練出一些農學領袖人才出來。這種工作收效最遲緩，而經營必須及早；向來人都說工科大學最費錢，但近人都知道工科教育還不如農科教育費錢之多。費錢最多而收效最緩，所以必須用政府的財力，必

須下很大的決心，必須存一種不妄想收速效的大決心。這雖不是普通人心目中想像的農業建設，但這是農業建設絕對必需的預備。在這種預備工作收效之先，一切空頭的「改進中國農業計劃」，都可以暫時擱在高閣上。

最後一個例子是交通。今日已有的交通機關的腐敗，最可以表示政府對於建設沒有誠意，又沒有理解。汪精衛先生最近在中央黨部紀念週上教訓我們批評造路的人道：「如今已到了空中飛行的時候了，我們却連在地上走的路也不想造，那麼，豈不是等着被人和雞犬一般的宰割麼？」政府如果有建設交通事業的誠意與決心，應該把交通和鐵道兩部劃出政治之外，合併作一個純粹專門技術的管理機關，不受政局的影響；然後把國有各鐵道和招商局等都改爲專門技術機關，使他們集中全國技術人才，努力增進效率，減輕負債，添加車輛船隻，減低水陸運費，便利各地農產貨物的輸送。這樣的建設才可算是爲建設運動「樹之風聲」。這樣做法，既不須徵地徵工，又不須增加田賦附征，而可以做出一點刮刮叫的建設成績來昭示全國與全世界，——政府又何嫌何疑而不肯大有爲一番呢？國家請來了無數外國建設專家顧問，都把鐵道交通兩部所屬的交通事業看作「禁樹」而不敢過問，却偏要成羣結隊的陪着大官

上西北去尋訪建設事業做，這豈不是世界的大奇事嗎？

時也借此說明我可以贊成什麼樣子的建設。

以上舉了三個例子，說明我提出的三個建設標準，同

廿三，四，二

## 如何提高中國行政效率

趙錫麟

我好久沒有看見「獨立評論」了。前幾天晚上，我走進成賢街一個書店，買了幾本舊的「獨立評論」，拿回家來看，就先看見叔水先生的「技術合作應從何處作起？」一文。看完後，我不禁發生如何提高我們的行政效率之感。現在寫出來與關心國事者討論。

叔永先生在他的文裏，勸我們不要疑慮國聯技術合作，中國現需國聯行政專家來把我們的整個行政機關變成現代化。他的精警之語如下：「我們的主張，不但計劃新事業，改良舊組織，要歡迎國際專家的合作，於必要時，並且可以請他們來監督這些計劃的實行。因為我們那些濫用私人和爲人設事的壞習慣，要我們自己改除則甚難，叫他來替我們改除則較易。」

這種虛心下氣求教於人的態度，我是很贊成的。但若一味迷信洋人，不自振作，以爲事事非「洋顧問」不可，未免太富于「下等複雜」了！假如沒有「洋顧問」，我們

便永遠不能提高我們的行政效率嗎？難道洋人的政府，其行政效率都高嗎？有一次我的一個清華學校老同學，現在當炮兵營長，他對我講：「他用法國操法來訓練他的砲兵。德國顧問便批評他不好，因爲他不按照德國操法。」我便回答他道：「以前諸葛亮和司馬懿打仗，難道亦非有德國顧問不可嗎？」我的朋友便笑起來了！上星期日，另有一位清華同學到我家來，他亦是一個軍官，他對我說：「他訓練軍隊，並不限于那一國的操法，凡是好的都採取」。他又說某軍校專靠德國顧問是缺乏自動能力 (initiative)。呵！這樣看來，我們自己也可以自己想點法子，何必迷信洋人？

碰巧我現在是叔永先生所屬望的全國經濟委員會的專員。對於國聯技術合作的實況，當然知道一點。可惜限于職責，不能暢所欲言。須知中國官場有一個怪習氣，事事都要守秘密。我的行政長官訓令我的第一句話，就是要守

秘密。我在此只好說一句輕描淡寫不着邊際的話，請叔永先生們，對於洋人不要太奢望了！最好是我們自己想法子去幹罷。中國人雖然倒霉到這步田地，仍然有腦筋，何嘗不能重整旗鼓再演我們歷史上所已經做到的成績啦！

例如一回我參觀南京中央大學農學院，由一位獸醫教授引導。他先引我到他的實驗室與手術房。那房屋是前清造的，年久失修，破陋不堪。棹椅傢具，都是將就。可是木架上的藥品非常之多，而且一切獸醫工作，都是進行不懈。他又引我到農業化學部，見一位研究酒類教授。他所搜集的標本非常之多，工作亦非常之勤勞，並且工具非常之經濟。凡能用國貨地方，都用國貨。參觀完後，我們走出來，這位引導教授便向我說：「中國人何嘗不能作事，祇要有錢，祇要有機會。」我深以為然。假如請洋顧問來幹，不知要增加多少經費，蓋多少房子，買多少洋貨，僱多少翻譯，才能做到那些事。

叔永先生叫我們看看前清晚年赫德辦稅務的成績。誠然不錯，果有其事。但若我們中國人在同一情形之下，不受政潮影響，埋頭做那海關收稅的簡單行政，一做便做幾十年，報酬非常豐富，未見不能與赫德並駕齊馳。請叔永先生注意海關行政費是非常之大的，現在約為二千萬元。

那做過財政總長的梁任公先生曾經說過其中不免有弊。鹽務亦在洋大人之手，其行政費更多。辦理鹽務多年的立法委員陳長蘊先生曾對我說，他辦鹽務時候，領月薪四百元，現在交給洋大人辦，薪水大大增加，嫌南京房子不好，搬到上海，花園房子，都開公費。請問叔永先生，這是行政效率麼？

閒話少說，言歸正傳。我並不欲與叔永先生打筆墨官司，我不過借他的說話來引起我討論如何提高我們的行政效率罷了。

○政治上軌道 我的開宗明義第一句話是若要中國政府好，除非中國好。正如俗話所說「水漲船高」。斷無在中國鬧得天翻地覆時候能希望中國政府有行政效率的道理。無論那一個沒有良心的中國人，做了中國官，不想提高行政效率的。但政治上不軌道，外患頻臨，內亂迭起，風雨飄搖，朝不保夕，苟能維持政府門面，已屬差強人意，安能談到提高行政效率。而政治之上軌道，須視全國人民之努力如何，不能專責公務員。

○發展實業 中國現在黨政軍教四界，都有人滿之患。因為中國實業太不發達，稍受教育的人，不去辦黨、做官、當軍人、教書，向那裏去？所以有愈受教育愈無出

路之說。在此情形之下，當然行政機關人浮于事。一切經費，用來發薪水，尙患不足，更談不上行政效率了！欲救此弊，自當釜底抽薪，開發實業，把官才（非人才）向農工商方面送去。如是行政方有效率提高之機會。

③ 組織簡單 我總覺得我們中國的社會尙屬簡單，政務並不頂繁，用不着這樣多的院、部、會、廳、處、司、科。關於中央五院制，我已在投登大公報之「黨化憲法」一文中，詳細論列。我希望不久能刊佈問世。現在只說一句政府組織須求簡單以專責成而免浪費罷了！否則只見推諉牽制延誤而不見效率。

④ 限定人數 中國立法人才，並不都是糊塗，但他們在起草各政府機關組織法時，常不知不覺的爲行政長官留一位置冗員地步。例如顧問、專員、僱員、技術人員等，均無人數限定。于是乎我們中國的巧于迴避善于曲解的官僚便大開方便之門，援引其親戚故舊弟子黨員。新近我又發見一個嶄新官職，名曰「會外工作」人員。按之實際，領乾薪耳！若恐限制此項人數，足以妨礙應付非常事變，不妨限制稍寬，或在時間上加以限制。總之，有限制勝於漫無限制。

⑤ 禁止兼差 中央行政之怪現象，莫如兼差。一

人兼了三五個差事，奔走于中山馬路與京滬道中。官愈紅，差愈多。不必舉例，舉例便要得罪千百要人。只看立法院所草憲法初稿，特別規定國民委員會委員立法委員監察委員之不得兼差，可想而知。如一人可兼二差，則此二差可併爲一職。既然分開，當另派一人負責。否則不是兼差之人太忙，政躬易于違和；便是溺職，做官不做事，只知道拿薪水更領辦公費，這亦是一種貪污。上行下效，病等傳染。不能兼差者遂生不平之氣，對於公務，當然敷衍了事。許多時候，簡直沒有行政，那裏談得上效率。國聯教育專家報告書，嚴厲批評中國大學教授之兼任數校教職，與我的意思相同。

⑥ 用人得當 行政一項，在西洋已成一種科學，並與商務營業爭效率之高低。在我國大都仍然用老辦法，爲人謀事多于爲事謀人。並且動輒就要講私人關係如何。用人不當，實在可嘆。現財政部長倡「人才主義」。考試院厲行考試銓叙。我們希望他們成功。

⑦ 文官保障 「五日京兆」是中國官吏的口頭禪，亦是他們的說不出的苦。事務官隨政務官而變動。政局不定，政潮起伏，政務官之變動既多，事務官之變動隨之而多。如是文官缺乏保障，不能忠于職務；縱忠于職務，

而非熟手，如何能有行政效率啦？

① 按時發薪 「做官發財」四字，在中國是時常聯用的。其實中國之做官發財者，固然很多；但同時災官亦復不少。在特別情形之下，欠薪扣餉，當然使從公者灰心。即在平時，不按時發薪，拖欠一月半月，對於公務員任事熱心，亦發生不良之影響。如果國庫空虛，不妨均等減成，但須按時發薪，使官吏有所倚靠，方能忠于職務，增加行政效率。

② 按時辦公 中央政府辦公時間，名為自星期一至星期六每日午前九時至十二時，午后二時至六時。實則一般事務官員，午前九時方到，十二時回去吃午飯，午后三時方到，六時自然下班。至於政務官，則來去自由，太無限制矣。為增進道德與體恤官吏計，不妨直切了當，縮短辦公時間，由八小時改為六小時。午前九時至十二時，午後二時至五時。既免畫到造假，又可除掉在公事房吃燒

## 從定縣回來

我與平民教育運動，雖然確有相當的淵源與認識，但是到定縣去參觀，新近方纔實現。以前我對於平教運動，終覺得牠範圍廣大而不澈底。整個的農村問題，如何可以

餅油條之惡習，並可使公務員在午后五時後操練身體。如有要事，不妨由主管長官臨時延長時間。至于星期六下午，最好放假，使官吏往鄉村去換一換空氣。政務官應當稍為守時，庶不致妨礙公務之進行。這是仿照美國中央政府辦法。定能提高行政效率。

以上九點，可謂「老生常談」，並不新奇，但都是經驗之言。若不能把這九點做到，休想其他。至于叔永先生所講請教洋顧問一層，我亦贊成。但須先有用處，然後才去找人。並且須由我們指名請那一個，不要讓人隨便派些二三人物來。請來後，我們應當打定主意去做什麼事。于有所不知有所不曉時，找這些顧問供給我們的材料或方法。萬不可喧賓奪主，由他們支配。因為他們不懂中國情形，那能一到上海就成中國通啦？請顧問不是好玩的事，一定花一筆大款，我們也應當問一問究竟值得值不得呵！

### 章元善

用千字課來解決？以及即使平教會憑藉外界的財力人力把定縣改造成一個世外桃源，其他各縣如何可以趕得上定縣？學得起定縣？……等等問題，終難釋然于懷。平教會



雖是辦得有聲有色，但是他的整個計劃，到底是什麼，實在看不清楚。恐怕不但我一個人如此，一般觀察平教運動的人，評論平教運動的人，都有這樣的心理。

好了，這股子悶勁兒，現在有了打破的希望了！平教運動在這一年以內，得到了他的生命基礎，新近平教計劃已漸漸的趨入於經濟一途。他們的生計教育部，研究農事之外，兼辦合作事業。現時規模雖還不大，基礎雖還不固，而且他們指導的合作社，似乎偏重于「購買」——其實是消費——的一種，農村合作運動從消費入手是否最為相宜，乃另一問題，姑且按下不談。但這一步演化是很值得注意的。單純的識字運動，不把他放大來則已。勸人識幾個字，本是一個極有價值的運動。如果要拿他來解決整個的農村問題，那非走入經濟途徑不可的。合作運動今日在平教會整個計劃之中，雖然還佔一個不甚重要的地位，可是平教運動的生命綫似乎就在這一點。他們從前要以各村裏平校同學會為推動村子裏種種新事業的原動力，因此發生了合作社。但是依我看來，等到合作社辦有成效，「村政」的重心是要從同學會移轉到合作社的。從辦平教而辦合作，將來以經濟的組織——合作社——為中心發展村治。這種力量，是不可忽視的。

還有一點，亦是關於平教運動存亡關係的。就是平教會得到人民的信仰，村子裏原有的財力，平教會漸有參與支配的機會，做村民美意的干涉者。這事目下範圍還不大，可是的確是平教運動的生命綫，可以答復「別縣如何學得起定縣」一類的問題。平教會自上年十一月起，就東建陽村原有的教育經費，辦了兩個實驗小學。在我不懂教育的人看來，的確不錯。同是這幾個錢，學生多了好幾倍，不必說。教出來的學生，都是生氣勃勃，所學的切合實用，教育的効力，在學生還沒有離開學校以前，就在那兒不斷的發生，影響到家庭的改良；生計的發展；村風的改善。無怪馬烈克看了之後，要與「吾道不孤」之嘆。目下不過代辦學校，但是日子久了，成績一天比一天明顯了，人民對平教會的信仰一天比一天的深刻了，村子內的種種問題，都會如此用本地的力量與辦本地的事的。單就這一點說，——就地取財與辦教育——平教運動的進展是有了出路了。否則專恃外來的捐款，即使平教會在定縣辦到十全十美，是與其他各地無關的；平教運動永遠走不出定縣，他的持久性是受捐款限制的。

至于平教會在這平教運動剛剛找着出路的時候，白白添上一個重負，把縣政也接過來辦，以致有陷平教會於失

却牠獨立性的危險，是一個狠不智的舉動。平教運動，照目下的計劃做去，自有得到政治力量的一日，有如當年修築金字塔的工人，一層一層的把石頭累上去，自有造成之一日。現在塔基尚未累齊，就要安裝一個塔頂，那實在是件大大勉强的事。行政技術的試驗，既不在平教運動原定計劃之列，何必要拿來分散他的力量，阻碍本身工作的進展呢？中國政治的不良，決不能用不自然的方法局部去改善的。吾們辦社會事業的人們，只要專心注力于「下層工作」，假之以時日，政治的昌明是不必發愁的。

當我們在定縣的時候，定縣人有三種隱憂；一是壯丁出關。據說有人新從東三省發了財回來，到家就買田置房，引得一般正在經濟壓迫下呻吟的農人們，都想出關去。同時他們聽說，東三省鐵路上招工。去的人可到天津去應募。我們在路上確看見年富力壯者，一羣一羣的背着鋪蓋捲往東走去。村人告訴吾們，已有五分之一的壯年離鄉東去了！

老百姓沒有鹽吃也是一個嚴重現象。他們拿地上的硝鹽來替代。據說現在鹽價，一元錢只買八斤。在這農產品賣不出錢，人們購買力非常薄弱的時候，只得買。但是地上硝鹽，只要去掃集起來，用水化煉，就有鹽味。于是大大小小，男男女女，成羣結隊的大刮起地皮來，頓成了一方的風氣。奉公守法的緝私官兵，認為有關職守，不得不加以制止。聽說已經鬧出事端了。不過緝私事小，人民沒有鹽吃，民間的苦楚又增重一層了！

當我們離開定縣的時候，兵車絡繹於途，開到了許多軍隊。西關一帶，兵馬滿街，家家門口，已畫上軍隊符號的粉筆字。不知這實驗區的定縣，將要蒙受多大的好處？像東建陽這個村子，經濟雖不景氣，人民還能安居，充滿新氣象。這一點小小成績——代表平教會多年的經營——是經不起大兵們一天的光臨的呢！

二三，三，二七，北平

# 國際 報

第七卷第七號  
要目

歐洲政局之鳥瞰……  
美總統之經濟政策對日本之影響……  
世界將來之展望……  
法國當前之三大問題……  
美國參議院之領袖人物……

陳次博  
吳卓生  
楊祖詒  
葉祥法  
王伯祥

每份大洋五分半年連郵費一元一角全年  
二元國外加倍（郵票代銀九五折）社址  
南京湖南路十八號

## 閒談

汪敬熙

### 十二

從朋友處借來一本L. KOENIGSBERGER作的HERMAN VON HELMHOLTZ傳讀。HELMHOLTZ青年的時候，德國NATURPHILOSOPHIE(自然哲學)派的風氣尙未消滅，重看空談，輕視實驗。並且他在 KOENIGSBERG 做生理學教授的時候，尙有人勸他應該專講生理學中思想豐富的部份，至於實驗大可讓助教們去管罷。同時，他也聽到過，有個生理學家說實驗於生理學無用，不去看同他辯論的物理學家的實驗(這個故事使人想到 GALILEO GALILEI 的天文鏡與當時的哲學家的事。)這都是將近百年以前的事。那時，實驗法在德國生物學界中尙不爲人所重視。現在實驗法成了多麼重要呢！

我又想到前些日子偶然看到北美醫學名家 WILLIAM OSLER 的幾句話。他這幾句話的大意是：醫學的發達經過三個時期，——用耳，用眼，用手的三個時期。最初只相信古人的話，就等于只是用耳朵聽。 VESALIUS

(1514—1567) 以後，便是用眼的時期，人們不願只靜聽古人的教訓，而要自己去睜眼了。等到不滿意只是旁觀，而要去想，想了再去實驗，便入了腦子和兩隻手聯盟去研究醫學的時期了。

其實從科學史上看來，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那一個沒有經過這三個時期。實驗法一定也是要爲中國學術界所信認的！

在這裏，我又想起，數日之前，一位朋友告訴我：一位分類學家頗不以我批評生物學界重分類輕實驗爲然，并且預言將來我一定後悔！我當時答他，科學的進步是循上述的路線，我「何悔之有」！

這位朋友笑着說：「後悔這幾個字的意義頗曖昧呢？」我也笑着答：「你還不知道我是什麼樣子的人嗎？」

### 十三

我們談談科學家的人格。

許多人以為科學家孜孜努力研究學問，不求富貴，不慕榮華，人格真是高尚。有些科學家以為有此高尚人格便可以低視一切，而且可以小節不拘。學問好一點兒的尤其是氣焰萬丈長！

這些都是錯的！科學家在社會中的職務就是研究學問。孜孜努力研究學問只是盡他的職務而已，並不是稀奇高貴的事。既以研究學問為一生的事業，當然不能去追逐着「財神」「祿神」，求「陞官發財」。這都是研究科學的人自然做到的事。怎樣能因為做到這個地步便能不拘小節呢？難道孔夫子便可隨便在街上小便嗎？就是研究的結果真是「光焰萬丈長」，也不應該是氣焰萬丈長呀！

MICHAEL FARADAY (1791—1867) 一生在研究學問上如何努力並且收穫如何的多。他本是鐵匠的兒子，書店學徒出身，到了一八三一年，他為工商界做研究的收入到了一千多鎊。如果他肯繼續做，他成一個富翁是很容易的事。這種工作影響到他研究學問的時間，他便決意不做了。老年的時候，英國皇家學會的理事請他做學會會長，他也辭了。這真是「富貴不能淫」的學者。

但是他以此自誇嗎？長自己的氣焰嗎？

凡是自稱真正學者的人，或者稱自己的團體為真正學者的人，只是表示識見淺陋，眼光窄小而已！

在學問上起爭論的時候，才真是科學家人格的試金石呢！

現在印刷容易，交通方便的時代，科學家如果有錯，真是「過也，人皆見之」。能做到「更也，人皆仰之」，方纔見出科學家之所求是真理而不是自身的利害！

譬如，二十年前到十年前 WALTER B. CANNON 同 G. N. STEWART 關於腎上腺內髓 (ADRENAL MEDULLA) 與情緒關係的爭論。他們的辦法，既不私下或公然互相謾罵，更不是搬些本國或各國聖人的話來辯論。他們只是各人自己去搜求實驗的證據。等到 CANNON 做出無可非議的無隙可尋的實驗，證明怒忿或恐懼時腎上腺內髓的分泌的確增加；STEWART 請他去講演，聽他說他的證據。自此之後，STEWART 自己知道錯了，便再不強辯了。

我國的科學家有這種精神，這種雅量嗎？

十四

有人說：形體學，生理學，胚胎學都是從分類學流出來的。

在生物學史上看來這話不對。

ARISTOTLE (384—322 B.C.) 雖是會將動物分類，但是CARL VON LINNE (1707—1778) 才把分類抬得重要；自他以後才有今日所謂分類學。

在 ARISTOTLE 以前並非沒有形體的研究。AND-RHAS VESALIUS (1514—1564) 研究人體構造的時候；

## 無吃無教 (通信)

熊十力

適之先生：

昨秋因病請假回南。十餘年不歸故鄉，此次乃徑回鄉里。頃始來平銷假，又將以兩點鐘混飯吃也。此番鄉居，真有萬感交集。感觸太多太苦，遂至疲困而歸於無感。偶一清醒，因思吾鄉此等情形，大可以類推吾國社會。吾國社會已完全破產，而羣衆絕無自覺心。古語所謂麻木不仁者，差可形容此種病態。蓋清末初感於內政之腐敗，外侮之交迫，而羣衆稍能自覺，故革命熱誠，徧發於閭閻婦孺。辛亥以來，經武人之種種摧殘於內，而外人遂益加以種

SANTORIUS SANTORIUS (1561—1636) 研究人的新陳代謝作用，WILLIAM HARVEY (1578—1657) 研究血液循環的時候；WILLIAM HARVEY 研究鷄卵孵化，MARCELO MALPIGHI (1628—1694) 研究同一問題的時候；VON LINNE 還不知道是在他的幾代祖父母的生殖細胞內藏着呢！

分類學自有存在的價值，何必硬把牠抬做其他生物科學的祖宗呢？

種蹂躪。則其感觸太多太苦，人皆疲困而歸於無感，此所以亡國滅種之禍迫眉睫，而士大夫皆漠然無念。南京閹官且窮奢極欲，熙熙如遊春台也。吾鄉居所感，真所謂一部廿四史從何處說起。矧復以長途勞頓之病軀，又有說不得之苦耶？然絕對不說一字，則又有所不快，故略說幾句，請付之獨立評論，冀以引起社會之注意。

吾所欲略說者，可蔽以四字，曰『無吃無教』而已。

先說無吃。人必曰，四海困窮，固也。然農民尚有薄田可耕，穀價又賤，何至絕然無吃耶？不知今日農村大半

淪於匪共。其幸而免於匪共者，又皆被剝削，以至無血無髓，不獨無皮無骨。吾固黃岡縣之細民也。吾回鄉，見糧券上所載附加捐稅名目重重疊疊，而各地方政府（如鄉區等）之捐項尙不在內。胥吏徵收之餘扣，暨地方士劣之藉公家名義苛派以肥己者更不在內。又時有官兵通過與駐紮者，派夫派米，種種說不盡之逼索凶訛。又有最流行之建設，所謂各縣公道。公道須修造，人人知之。而各省建廳對於此等公道建設，則一律不肯分別道區內沿線人民生活力之等差，路線所至，將其地一律強迫歸公，不稍給價。赤貧之民恃立錐之地而活命者，遇此等劫數，只有登時就斃。而闊官佔地太多者，反有改易路線，以奪貧窮無告者之產。又其修築道路，亦皆強迫人民爲之，赴工稍緩，多有爲監工之士兵立予擊斃者。其他尙有種種爲筆墨所不能形容之情節，非作專項調查不可。今日在鄉所見之建設新政，亦只有道路一事。自餘種種新猷，則皆載在政府公牘，與各都市報紙，及流行於闊官偉人之口頭而已。然道路新政之行於鄉間者，其實際只是奪民產，劫民力以爲之。若使建廳不作修路報銷費，或僅略作「派遣小隊監修費」之報銷，則吾於其所行，絕對無所非議。寧犧牲一時之民力，以謀永久之交通也。然各省建設政費，其數當不在少，

其建設之及於鄉者，又只有公道一事，胡爲虐民至是耶？是可忍也，孰不可忍？總之，今日民無死所，非「民不聊生」一語所可形容。民無死所矣，雖有田，何能耕？且今鄉間，皆不勝田之累，捐稅重重，皆按田畝攤派。人民皆餓殍之餘，日食太苦，其身手已疲困，難趨耕作（此層最不可忽）。又無資以備糞壅，又時遇匪亂或兵禍爲之阻，又時有水旱蟲荒之災。故今日農民耕作，其所收穫，日趨減少。即此至少之收入，本已難敷日食，而官吏催迫租稅，凶逾猛虎，穢如糞蛆，欲應其苛求，又不得不售其不堪糊口之穀。然穀價又奇賤，則愈不得不盡其穀以供苛稅。盡其穀以供苛稅猶不得，則相率欲棄其田。此「無吃」之云，所以純爲真實，而非故甚其辭以駭人也。闊官，偉人，名流，學者，仰天俯地，亦有念此者乎？如其激發天良，而稍一念之，則此神州浩壤，除少數都市生活之人立於剝削農村之地位而外，其被剝削之最大多數農民既已髓枯血盡如是，長此衍進，有能保其種類而不滅亡者耶？（此所謂種類，是舉吾國內共同生活之民族而言，即合漢滿蒙回藏而言。狹義的種界主義今所不取。凡共同生活於一定之地域，依平等及互助之性欲，爲共同生活之組織，即同爲構成一國家之份子，而絕對不容外國與外民族之侵凌

而違害其共同生活者，是即爲同一民族，是之謂同其種類。友人林烈敷競昔官西北，亦發抒此義。一種類垂亡，而吾猶營私縱欲如是，何其大惑不解耶？從政者不去其營私縱欲之惡根而空言救濟農村，是將陷於借亡之慘而已！新近吾聞一事：南京中大之附設實驗小學，其入學者，皆開人之子也，每日上課下課，都用汽車接送，汽車之多，至於途爲之塞。嗚呼，爾曹獨非人類耶？非出自田間耶？億兆之衆既苦無吃，而爾乃恣其子女以奢逸至是，清夜捫心，胡可忍耶？又闕人家宅，廚役買菜，亦用汽車，爾僕誠豪，不思汝汽車一動之費，足以贍濟鄉村數口之餐。舉此一事，其他不必言，亦不忍言。孟子曰，儉者不奪人。吾欲闕人了解農村無吃之苦，少奢侈一分，即少剝削一分。居官者真做到不剝削，而後農村可以言休養。吾欲略說鄉間無吃之苦蓋以此。

次言無教。往昔所謂老童，與夫秀才舉貢，以至官吏退休者，皆號士人，即今云知識分子。此皆在鄉居家，又大抵聚徒講學，弦誦聲聞井矣。又此輩知識分子既與羣衆朝夕聚處，而其行誼知能，又多足爲羣衆領導。每地方上有公利公害事件發生，即因此等領袖之會議而立予解決。至地方上許多通行之公共信條，如孝弟忠信，禮義廉恥

，與力田等等，亦因此輩知識分子以身作則。至於家弦戶誦，莫不服膺，倘有違者，予以處分，則莫敢抗。蓋其時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即鄉塾），與社會教育，胥有一貫思想聯成一氣，毋稍隔闕。即貧民有不能讀書識字者，其耳目亦有所熏陶，而不至蠢然破壞地方公同生活之紀律。當時雖無國立與省縣官立之學校，而鄉村實無無教之民。此吾國秦漢以下，凡號爲修明時代者，其治象大抵如此。自清末廢科舉，設學校；辛亥革命，國體改制，一切更張；加以科學之研究，多非鄉間私塾所能行；種種因緣會合，遂造成學校設於都市，鄉村子弟無從受教之局。距今十年前，猶有鄉塾出身之士類，一方面猶知古義，一方面能購閱新書，得一點新知識，略識時變。此輩在鄉，亦足爲一般農民矜式，如女子放足等事之通行，大抵此輩之力。而縣府或頒一紙新條例，亦賴此輩唱導。顧數年以來，此輩已零落殆盡。其年事稍晚而僅存者，又大抵習攀援而活動於政途，不復守其鄉。蓋世變之久而且劇，無論若何窮僻之縣，皆有參加政變，而僥倖以暫居權要之人，或由軍界出身，或由匪類出身，或由商界出身，或由幕僚出身，或由黨派出身，一旦因緣時會，得遇而煊耀一時。此等得志之流，其鄉之讀書稍解世故者皆蟻附於彼，以求活動，無

復有如昔時安貧樂道於鄉者。况復世變愈劇，鄉間絕少生機，雖在可以糊口之家，欲送子弟入學校，求出路，而卒困於經濟，不遂其志。彼私塾無出路可言，誰肯組私塾令子弟作抱膝長吟事耶？故前之士類既已凋亡，其稍後出而僅存者又皆出鄉以謀利祿於都市。而世變至今，則青年既無力就學校，又勢不能有私塾，於是鄉間近年幾無讀書識字之人。古義既無傳授，新知識亦莫由灌輸。鄉間所沾染之風氣，約略言之，一則貪污凶酷荒淫敗度之官僚所播煽之腥臭；某也作官幾時，刮地皮幾萬，幾百萬，幾千萬，此爲農村男婦所爭羨而艷稱者。次則知識分子首先破壞舊道德，其風被於都市，而漸遍於鄉村。距今八年以前，有一山東友人爲余言：向者山東土匪頗有守不淫之戒者，雖劫奪而猶戒姦邪；今則匪亦開通，劫淫並舉，無復顧忌矣。又民十五以來，離婚之風大倡，始於都市新貴，而漸及於僻鄉男女。法庭於此等案件，亦多虛慕文明，輕判脫離。此風一開，於是貧農家庭生活根本動搖。鄉婦無知，廉隅一喪，無望回頭。鄉間又添出多少女流氓。其影響於農村經濟及社會風習者甚大，誠非細故。此願士大夫持清議與法官有裁判權者注意及之。夫婦有別，不獨保全貞操，亦亦生理宜然。今日離甲結乙，明日亦可離乙結丙。甲乙

丙雜交，能無害其生乎？此特略舉一二事，其他凶殘，狡詐，偷惰，荒淫之事，千態萬狀，不可勝窮。昔時勤耕力作，孝友廉讓淳樸之風，今殆掃地盡矣。而目前爲害最烈，不容不及時挽救者，則莫如賭博之習。吾鄉向時偶有爲此者，必爲族黨所不齒。然爲此者亦於年終偶爾行之，往往一夕傾其產而終身淪爲乞丐。今則徧地皆有賭博之風，每屆秋冬，即假演戲爲名，聚衆大賭，亦有不假演戲而徑行聚賭者。地方所駐保安隊，時派偵騎，藉爲訛索發財之絕好機緣；贓款交安，則公然聚賭，無復顧忌。農村殘破至此，而賭風不戢，則間有良善，亦無法安生樂業，唯有同爲盜匪，以相殘相殘已耳。又次則土豪劣紳一派勢力，盡量縱橫，絕無對抗，自民十五以來，共黨日以殺土劣相呼號，土劣之受殺戮者亦復不少。然老土劣未殺盡，而新土劣之繼起且無窮。此甚耐人推究也。昔明太祖見犯罪者衆，因欲以『殺』使之畏懼，殺之多而犯罪者亦愈多，既殺不勝殺矣，彼思其故不得，遍求之六經而不得，後讀老子而有悟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吾觀於今日七劣不畏共黨之殺，亦與明祖有同感也。土劣之所以多，因與貪污官吏及絕無紀律之軍隊聯爲一氣。貪污之官與凶暴之軍非多植土劣，不足資以肆其欲。土劣何知，憑勢



而姑縱，遑恤其後，其不畏死，亦有以也。土劣之勢既盛，間有善良，亦謹伏首受命，而莫敢與之抗。吾聞講村治者首感此事之困難。吾居鄉，亦覺唯此莫可如何。實則鄉間猶有善良，只是善良一切被壓迫於土劣之下，而絕無意識之存焉者，是以謂之無善良而唯有土劣橫行云爾。鄉間既無教育，農民之自覺心無啓發之機，將一任萬惡之風氣流行無有止境，此非可哀可懼之至耶？

總之，今日鄉村之痛，則以無吃無教互爲因果，將卒底於滅亡而後已。無吃故，不能有教。無教故，益不能有吃。所以互爲因果也。夫自無吃不能有教言之，則必看重物質方面；管氏倉廩實而民知禮義，衣食足而民知榮辱，與今日流行之思想相符也。自無教益不能有吃言之，則必歸重心靈方面；尼父雖言足食，而卒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也，此信字之意義甚爲深廣。信者，實也。充實其在己者而無一毫虛僞，所以謂之信。人失其信，即失其生命，而不足爲人，雖有食，其得而食諸？今民德衰絕至於此極，雖欲與之謀相生相養之宜，其奈彼絕無自覺心何？其奈彼之本身已無生命何？其奈彼無信何？此言經濟問題者所不可不察也。然則欲改善農民經濟，必先謀喚起農民之自覺，即必先恢復農民之生命力，如孔子所謂有信。

誠欲如此，則今日對於鄉間無教之問題，必急謀解決，而不可以一夕緩。須知龐大之中國，純爲農村構成之國家，而農村殘破至此，其何以能立國保族於天地之間耶？

吾意都市學校宜盡量減少。於每縣設一模範中學，內分置辦公處與各科。各科內容，實皆爲獨立之一枝。辦公處即由縣教育局長兼之。其各科，則相其地產民生之宜，如農林科，漁業科，牧畜科，商業科等等，各科皆設在鄉村。學校所教，與其社會生活爲一致。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今日在鄉所修習之學，亦即今日與他日在鄉所操持之業。豈若今日學生所學非所業，又習染都市奢華，卒業必離鄉而趨都市以爭官祿，至大亂無已耶？又凡各科仍如舊置修身一課，宜聘名儒，就該縣固有之良好信條，切實發揮，融攝新義，而去其泥古而不適於今之蔽。如離婚之事，今日猖狂胡亂之行，固當痛戒，然必如老生執着，凡絕對不適宜之婚姻，亦令其忍恨沒世，而不許脫離，此亦大不可也。其他種種，準此類推。又除各科之專講實業者外，每縣至少必設國學預修科一所，爲養成經濟力不足，而其天才又特別宜於在國學方面深造之人才。至其基本課目當爲詳議。此等卒業生徒，可以鄉居自研，公家助其書籍，使成爲國學方面之專家碩學。既可以其德業淑善鄉黨，

又可爲學校教師之選或國家之用。又每縣或設升學科一所，窮僻縣分，或以兩縣以上聯合設一所，即取青年子弟之天資特別，宜於英算等課，而家資又可勉強升學者，令入此肄業。卒業之後，即令其攷大學之理科或工業科等。其有天資特別宜於自然科學而家資不能升學者，縣府得以公欸助之，但限於特別天才乃可耳。今都市所有一切高中初中，其教課皆爲升學計，卒之能升學而治自然科學者乃寥寥晨星，特斷送許多青年，使之虛度光陰，蕩廢家產，卒歸無業，而成流氓已耳，豈不惜哉？設如吾所擬之辦法，則因材而教，可免除今日百弊，亦何病而不爲？至於大學

理科或工科，爲養成自然科學人才之最高學府，其儀器設備，以就都市爲宜。然如生物學之研究，亦有宜在濱海之鄉者，或亦不妨在窮荒之鄉，利於發掘古生物之遺蛻也。地質學又不必在都市，不待言也。其他準知。大學法科，爲養成社會科學人才之最高學府，亦可於交通便利之縣

分設置，使於都市鄉村皆可觀察。尤當令赴窮鄉僻壤實地攷察，毋徒讀死書，卒業之後，徒慕西洋享受，而忽却民生疾苦。古今中外，豈有徒鑽書本空洞理論，而不了解與同情本身生長之社會之一切疾苦與種種情形而可以言學術耶？吾對於現行學制，所欲變更者略如此；其詳，則有待於同志之共爲搜討。

吾自昨孟秋迄今正，鄉居大半年，所感至苦。而根本救濟，不能不望現行學制之變更。此事雖不能望之今日當局，但使知識分子皆能虛心而熟籌利害，爲一致之主張，則其事終必有實行之一日，而固吾國以延吾族者，其道必在於斯。敢以質之適之先生，佈之獨立評論。國人之肯聽與否，一切不計。吾奉吾之良知，不敢不以鄉居所感，一爲傾吐也。

弟熊十力啓 三月二十日

## 爲新生活運動進一解

胡適

蔣介石先生近日在南昌發起新生活運動，一個月之中

新生活的呼聲好像傳遍了全國，各地都有軍政各界的領袖

出來提倡這個運動。前天報載中央黨部決議「交中央組織宣傳民運三委員會及內政教育兩部會同擬具新生活運動推

行辦法」，很像是要用政府的權力來推行這個運動了。

蔣介石先生是一個有宗教熱誠的人；前幾年，當國內許多青年人「打倒宗教」的喊聲正狂熱的時代，他能不顧一切非笑，毅然領受基督教的洗禮。他雖有很大的權力，居很高的地位，他的生活是簡單的，勤苦的，有規律的。

我在漢口看見他請客，只用簡單的幾個飯菜，沒有酒，也沒有烟捲。因爲他自己能實行一種合於常識的生活，又因爲他自己本有一種宗教信心，所以他最近公開提倡這個新生活運動，想在三個月之內造成一個「新南昌」，想在半年之內「風動全國，使全體國民的生活都能普遍的革新」。我們讀他二月十九日的講演，字裏行間都使我們感覺到一個宗教家的熱誠。有了這種熱誠，又有那身體力行的榜樣，我們可以想像他在南昌倡導的新生活，應該有不少的成績。

我們看南昌印出來的「新生活須知」小冊子，所開九十六條（規矩五十四項，清潔四十二項）都是很平常的常識的生活，沒有什麼不近人情的過分要求。其中大部分是個人的清潔與整飭，一部分是公共場所應守的規律，大體上誠如蔣介石先生說的，不過是一些「蔬米布帛」，「家常便飯」。一個民族的日常生活應該有一個最低限度的水

準。蔣先生這回所提倡的新生活，也不過是他期望我們這個民族應該有的一個最低限度的水準。這自然是我們應該贊成的。

但我們觀察最近一個月來這個運動的趨勢，我們不能不感覺一點過慮。我們很誠懇的提出一點意見，供這個運動的倡導者的考慮。

第一，我們不可太誇張這種新生活的效能。「須知」小冊子上的九十六條，不過是一個文明人最低限度的常識生活，這裏面並沒有什麼救國靈方，也不會有什麼復興民族的奇蹟。「鈕扣要扣好，鞋子要穿好，飯屑不亂拋，碗筷要擺好，喝嚼勿出聲，不嫖不賭，不吃鴉片煙，……」做到了這九十六條，也不過是學會了一個最低限度的人樣子。我們現在所以要提倡這些人樣子，只是因爲我們這個民族裏還有許多人不够這種人樣子。九十六件，件件俱全，也只够得上一個人的本分。即如做官不貪污（不在這九十六條之內）乃是做官的本分；此外他還得有別種治事安人的本領，方才可以做出治事安人的成績。救國與復興民族，都得靠智識與技能，——都得靠最高等的智識與最高等的技能，和鈕扣碗筷的形式絕不相干。認清了目標，大家勉力學一點最低限度的文明人樣子，這是值得鼓勵的。

但是過分誇張這種常識運動的效果，說這就是「報仇雪恥」的法門，那是要遺笑於世人的。

第二，我們要認清楚，新生活運動應該是一個教育的運動，而不是一個政治運動。生活是習慣，道德是習慣。

古人說：「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這個說法是不錯的。朝一個方向走，久而久之，成了習慣，成了品行，就是道德。宣傳的功用只在指明一個應該走的方向，使人明白某種目標是應該做到的，某種習慣是應該改革的；使人把不自覺的習慣變成自覺的努力的對象，這是改革習慣的起點。但生活習慣改革，不是開會貼標語所能收效的。政府必須明白什麼是它能做的，什麼是不能做的。把一些生活常識編到小學教科書裏去，用一些生活常識做學校考績的標準，用政府力量舉辦公衆衛生，用警察的力量禁止一些妨害公安與公共衛生的行爲，官吏公僕用一些生活標準來互相戒約，——這些是政府所能做的。此外便都是家庭教育與人格感化的事，不在政府的勢力範圍之內了。近二三十年中，許多生活習慣的改革，如學校運動場上的道德，如電車中的讓坐給婦女與老人，如婚喪禮的變簡單，都是教育進步的自然結果。若靠一班生活習慣早已固定的官僚政客來開會提倡新生活，那只

可以引起種種揣摩風氣，虛應故事的惡習慣，只可以增加虛偽而已。十年前山西的洗心社和自省堂，不可以做我們的好鏡子嗎？（民國八年我在太原一個自省堂裏參觀，台上一位大官正講經書，我面前一個中學生正拿着粉筆在他的同學制服上畫一個烏龜！）

第三，我們不要忘了生活的基礎是經濟的，物質的。許多壞習慣都是貧窮的陋巷裏的產物。人民的一般經濟生活太低了，決不會有良好的生活習慣。「拾到東西，交還原人」（九十六條之一），在西洋是做到的了；我們看歐美車站上和報紙上「拾物招領」的廣告，看他們鄉村裏夜不閉戶的美俗，回憶中國勸善書上所記載的許多「拾金不昧」的果報故事，我們真十分感覺慚愧。生活提高了，知識高了，不但「道不拾遺」，拾了遺物還會花錢去登報招領。在我們這個國家，父母教兒女背着籃子，拿着鐵鎚，到處向垃圾堆裏去尋一塊半塊不會燒完的煤球，或一片半片極污穢的破布。雖有「拾金不昧，拜相封侯」的宗教，有何益哉？儒林外史說萬雪齋家的鹽船擱了淺，就有幾百人划了小船來搶鹽，却沒有人來救人。貧窮的鄉下人自然不足怪。儒林外史又寫一位品學兼優的余大先生，出去「打抽豐」，州官教他替一件命案說人情，可以得百餘兩銀子

，他就高高興興的拿了銀子回家去替父母做墳。做書的人毫不覺得這是不道德的事。又如今日的大學學生——甚至于大學教授——假期回家，往往到處托人弄火車免票，他們毫不覺得這樣因私事而用公家的免票就是貪污的行爲。

## 編輯後記

編者

凡此種種，都是因爲生活太窮，眼光只看見小錢，看不見道德。提倡新生活的人不可忘記：政府的第一責任是要叫人民能生活，第二責任是要提高他們的生活力，最後一步才是教他們過新生活。（錄大公報三月廿五日星期論文）

△「如何提高中國行政效率」的作者趙錫麟先生在他的文章裏，已介紹他自己了。他是全國經濟委員會的一位專員。他提出的九項辦法，我們特別注意他的第四項——限定人數。我們應該記得，在明清兩朝的法律裏，都有不准添設官吏的嚴格規定。清律的「吏律」有一條云：

凡內外各衙門，官有額定員數，而多添設者，當該官吏（指典選者）一人杖一百；每添三人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徒三年。

現在屁股可以免打了，但這條法律的精神似乎還有恢復的必要。

△熊十力先生是北京大學哲學系的特約講師，是研究佛學很有心得的學者。他在去年五月曾有五千字的長信給我，登在獨立第五十一號，題爲「要在根本處注意」。

△章元善先生在華洋義賑會服務了十三年之久，他是最關心農村問題的。他在獨立發表過「國難中救災問題」（第十二號），「皖贛農賑」（第四四號）兩篇文章。

△我們收到北平郵政管理局第七二一一號公函，知道獨立第九十一號被南京郵電檢查員扣留了一百三十九包。我們自己檢查那一期的內容，猜想扣報的原因是一篇論「溥逆竊號與外部態度」的文字。

△上一期獨立因爲印刷所機器損壞了，所以印刷誤了一天半，我們希望讀者原諒。

△我在第九十期的編輯後記裏談起翁文灝先生受傷以後的狀況，其中有這樣幾句話：

當消息最壞的第一天，他的一位北平朋友寫信給人說：「如此天才，如此修養，豈但是一國之瑰寶，

真是人世所希有！」還有一位朋友對人說：「翁詠  
竟五十萬條性命換不來的！」

我不料這幾句話引起了一位「子明」先生的抗議，他寫信  
來說「這很像一個青年男子跪倒在他底愛人面前所說的話  
，……未免有些肉麻吧？本來在這『台裏喝采』，『互  
相標榜』（引用貴刊同期頁一七語）盛行的今日中國，我  
們是用不着多說的。但這見於貴刊，却不能不使人驚訝了  
。」

我很感謝「子明」先生見教的好意。但我要借這個機會向  
他說一句話。一個人在他的朋友受傷的消息最壞的時候說  
的悼惜那個朋友的話，就和他眼裏滾出的熱淚一樣的神聖  
，是值得人類的同情的，是不應該受輕薄的嘲笑的。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不是至今還能得我們的同情嗎  
？——至於說的話是否過火，自有說話的人負其責任。

（迺）

## 本刊前二期的要目

### 第九十三號

中古式之中國經濟	何廉
提高銀價對策之商榷	張茲園
無為政治的討論 (三篇)	
(一) 答擁護無為政治的主張者	弘伯
(二) 擁護建設 (通信)	薛典會
(三) 擁護無為 (通信)	瘦吟
編輯後記	編者

### 第九十四號

建設與無為	胡適
求有為無為之界說	孟森
閒談 (十一)	江敏熙
憲法草案初稿商兌	徐道鄰
家庭職務與婦女解放	吳景超
好妻子 (新書介紹)	衍哲
編輯後記	編者

## 第二卷交通雜誌第四期要目

交通論壇(三篇)	王洸等
統制經濟下之交通企業論	章勃
整頓裏運河航運計畫	沈百先
平漢路黃河鐵橋	王之翰
日內瓦國際廣播無線電公會及洛水恩歐洲	徐節元
無線電會議	陳賢鼎
電政的危機及其補救方法	羅英
美國航業政策	王洸
法國在華航業之地位	蔣用莊

鐵路機廠分區設立問題	楊毅
鐵道經濟原理	李續勳
日本國有鐵路運價政策之概況及其實施	劉敦譯
運輸成本之計算	高鹿鳴
芝加哥世界博覽會中交通事業展覽的概況	王升庭
平包快車一年來之回顧	王聘之

定價：月出一冊零售三角預定半年連郵一元六角  
全年連郵三元  
發行：南京大石橋新民坊五號交通雜誌社



論憲法初稿

愈貧弱愈要有爲

「定縣主義」論

談廣西的民團制度

新舊交替時代的遊移性

救救四川！（通信）

編輯後記

胡適

伯莊

巫寶三

心吾

壽生

古舞

編者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平 | 西單商場！大學出版社<br>業所 君中書社 嘉陵書社<br>增華書社 長光書社<br>霖甫書社 平和書社<br>安市場！佩文齋（代定）<br>吳華書社 福華書社 侯<br>記書社 王府井！民智書<br>局 宣內！佩文齋 廠甸<br>現代書局 星雲堂 沙<br>灘！北大！院 景山書社<br>海運倉！朝野書店 朝<br>大消費社 | 天津 | 清華消費社成府鏡道分社<br>天津書局（代定）南開大學<br>大生書局 文元書局<br>紫房子書報部 博古書局<br>現代書局（總代售及代<br>定處） 亞東圖書館 光<br>華書局 新中國書店 | 上海 | 新中華書店<br>鐘山書局 正中書局 中<br>央書局 大中書局 花牌<br>樓書店（代定）天一書店 | 南京 | 鎮江書店<br>徐州廣告社<br>三友書店（代定）<br>振華書局<br>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 新 | 蘇州 | 漢口 | 武昌 | 時代書店 真文善書店<br>新生活書局（代定）胡正<br>興源報社 新光書局<br>南昌書局 圖書消費社<br>廣州 | 汕頭 | 大東書局 新民書店<br>興寧書局 黃勝和堂派<br>梅縣 | 瓊州 | 海南書局<br>永昌公司<br>東方書社（代定）<br>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br>青島 | 威海 | 吉昇昌書局<br>荷澤書報代辦部<br>臨清 | 文衛書局<br>世界書局<br>匯海書局<br>甘一學社 中華書局<br>綏遠 | 太原 | 小書報社<br>覺民書報社 統一派報所<br>開封 | 西安 | 甘肅書報社<br>現代文化社<br>文寶書局<br>新川書店<br>朋友書店<br>東方書店<br>新友書店<br>現代書店<br>萬有圖書公司<br>開明書店<br>衡州派報社 | 成都 | 重慶 | 雲南 | 貴州 | 杭州 | 福州 | 廈門 | 衡州 |
|----|---|----|---|----|--|----|--|----|----|----|--|----|-------------------------------|----|---|----|------------------------|---|----|---------------------------|----|---|----|----|----|----|----|----|----|----|

# 獨立評論

第九十六號

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十五日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一角以下爲限）代洋九五折。



## 論憲法初稿

胡適

我們讀了立法院公布的憲法草案初稿，在評論之前，應該先想想這個憲法之下的中國政治制度是個什麼樣子的。依我的淺陋的了解，這個憲法要給我們的是這樣一個制度：

①先從最低層說起：人民直接選舉縣議會，直接選舉縣長（縣長候選人以經中央致試及格者為限）。

縣長可由縣議會彈劾，經縣議員四分之三之議決，得請縣民罷免他。縣民若否決了彈劾案，縣議會應即改選。（市與縣同。）

②第二層是省。省無議會，只有一個省參議會；參議員每縣市一人，由人民直接選舉。省長由行政院提出五個候選人，由省參議會選出一人，由國民政府任命之，任期三年。但省參議會無彈劾省長之權。省長受中央政府之指揮，但對於省參議會不負責任。

③第三層是國民政府，其組織成分有六：

①總統。任期六年，由國民大會選舉罷免。

②行政院。行政院長由總統提經國民大會或國民委員會之同意任免之。行政院長遇立法院提出不信任案經國民委員會接受時，或被監察院彈劾經國民委員會接受時，都應去職。

行政院設各部及各委員會，其各部長與各委員長均由行政院長提請國民政府任免。

③立法院。立法委員不得過二百人，任期三年，由國民大會選舉罷免。立法委員互選其院長副院長。

立法院對於行政院有質詢之權，並有提出不信任行政院長案之權。

立法院的議決案，由總統署名及主管院長副署後公布。總統得將議決案提交復議；但立法院若以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維持原案時，總統不得再交復議。

④司法院。院長副院長由國民大會選舉罷免。

⑤考試院。院長副院長由國民大會選舉罷免。

④ 監察院。監察委員不得過五十人，由國民大會選舉罷免。監察委員互選其院長副院長。

⑤ 最上一層爲國民大會，由每縣市選出代表一人，及蒙古西藏代表，國外華僑代表，組織之。國民大會每三年開會一次，其會期以一個月爲限。國民大會的職權很大（第五十一條），但其職權「於閉會之日終了」。

國民大會閉會期間，設國民委員會，置委員二十一人，由國民大會選舉之。國民委員會並不代行國民大會的職權，只在平時接管大會秘書處，並籌備下屆大會；此外得受理監察院對於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及各院院長副院長的彈劾案，及立法院對於行政院長的不信任案。國民委員限於四十五歲以上有特殊功德，頗像一個元老院。

⑥ 中央與地方採均權制。

這是這個憲法初稿準備建立的政治制度。我們把這個政治體系總括起來看，想像他的各部分的連絡，想像他在實際行使時的效能，我們可以看出他有可以批評的幾點。

第一，我們感覺這個制度有許多地方缺乏連絡，實行

時有許多障礙。試舉一個例。既許人民直接選舉縣長了，又限定縣長候選人必須經中央考試及格。今日中央考試院考取的縣長人數够分配一千幾百縣嗎？每縣都有本縣人在中央考試及格的嗎？假如我們績溪縣只有一個中央考試及格的縣長候選人，是不是只有他可以候選？又假如績溪縣沒有一個中央考試及格的候選人，是不是我們還得請攷試院或省政府交下一個候選名單，才可選舉？這個名單上的人，當然不是我們本縣的人了，我們本縣人民又如何能知道他們的資格與人格而選擇他們呢？這個制度可謂奇怪極了。爲什麼不規定縣長候選人的資格，讓各縣人民去推舉候選人呢？

再舉一個例。省長候選人須由中央政府提出，如果省參議會覺得中央提出的五個候選人都不能滿意，省參議會可以請中央另提候選人嗎？選出的省長，省參議會又何以絕無彈劾之權呢？萬一省長有違法或瀆職的行爲，難道省參議會還得靜待他三年任滿，才可以不連選他嗎？

中央政制在實行上的困難更多了。行政最高權在行政院長，而行政院長可以被監察院彈劾，可以被立法院投不信任票，時時可以動搖。這一點已有許多人指出了，我可以不必詳說。國民政府公布法律，發布命令，由總統署名

，並須經主管院院長副署；萬一總統同意，而主管院不副署，又怎樣辦？（看獨立第九三號，陳受康「讀憲法初稿」。）立法院的議決案，總統可以提交復議；監察院的彈劾案是不是（除了彈劾總統副總統各院長副院長及立法監察委員另有第五十八條的規定之外）都算最後的決定呢？現在監察院的彈劾案，送交懲戒機關之後，往往不執行。憲法初稿將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設在司法院，這個懲戒會對於監察院的普通彈劾案是否有提交復議的否決權呢？是否彈劾案出了監察院的大門就完全由懲戒委員會處理呢？又如第八十六條說：

行政院院長遇有左列情形之一時，應行去職：

一，立法院提出不信任案，經國民委員會決議接受時。

二，監察院提出彈劾，經國民委員會議決接受時。

据此條文，是國民委員會可以議決不接受此項不信任案及彈劾行政院長案。又據第五十八條，監察院彈劾總統副總統，須經國民委員四分三以上之決議，方可召集臨時國民大會。若不得四分三的決議，國民委員會也可以不接受彈劾總統案了。以上三種重大案，國民委員會不接受時，立法院怎麼辦呢？監察院又怎麼辦呢？他們是不是就此收兵

了回頭來重新擁戴那曾被彈劾的總統和那曾被不信任的行政院長呢？還是另有方法可以使彈劾案和不信任案發生效力呢？

第二，我們感覺這個制度是一個七拼八湊的百衲本，缺乏一貫的政治理解，更談不到什麼一貫的政治信仰。初看那下層的縣，似乎是直接選舉產生的代議制的民治。到了省的制度，只有一個權限極少的省參議會，連彈劾省長的權都沒有了，只成了省長的一個諮詢機關了。再看上去，到了中央政府，只設一個一千幾百人的國民大會，三年之中集會一個月；閉會之日，職權就終了了。這一千幾百人，來自全國各縣，平日素不相識，更無組織，到了首都，真成了劉老老初入大觀園！這一大羣劉老老，如何能負擔那國民大會的極重大的職權呢？這豈不是在憲法裏先就準備叫他們被少數伶俐的政客牽着鼻子跟人瞎跑嗎？為什麼不老老實實的叫各省人民選出他們本省的立法委員來組織一個代表全國的立法院呢？既已拘泥了孫中山先生的「國民代表大會」的主張，又何不老老實實的讓他們每年在首都多住幾個月，多得一點政治經驗，實行建國大綱說的「參預中央政事」呢？如果大家明知中央政府此時不能常年擔負這一兩千人的旅費和俸給，或者明知各縣代表每年

來往奔波爲太困難，那麼，又何不老老實實指出「每縣得選國民代表一員」的制度不能實行，而另想更易行的制度呢？

這個政制所以這樣七零八落，毛病在於起草諸公不會詳細研究國內現狀需要何等樣子的一個政治組織，却只拘拘的用建國大綱做他們的綱領。其實他們又全不會了解孫中山先生的建國大綱的理路，只拘執着他的文字。建國大綱是有一貫的政治理想的。依孫先生的理想，憲政必須有個漸進的程序，先做到自治的縣，次做到自治的省；某一省全數之縣完成自治了，這一省就開始憲政；全國有過半數省分都開始憲政了，然後開國民大會決定憲法而頒布之。建國大綱的程序如此，試問今日草成的憲法初稿是不是依此程序呢？既不依此程序，又如何可以拘執建國大綱的條文？這樣割裂孫先生的條文，非但失了他的精神，並且毀了他的一貫的政治理想。

中山先生沒有想到他死後幾年之中我們的國家就會陷在空前的危急狀態裏，所以他的建國大綱是假定一個可以從容漸進的時勢的。現在既無此時勢，我們只能把他的理想計劃暫時留作一個供後來人研究的歷史文件。我們只應該考察此時我們如要行憲政，應該從如何下手，應該建立

何種制度。如果我們此時需要的是一個鞏固的中央政府，我們就不應該拘泥某種歷史文件，造出種種機關來網住他的手脚。如果我們需要各省來參預中央的政治，因以造成一個維繫全國的統一局面，那麼，我們就不應該拘泥某種歷史文件，造出一個三年集會一個月的空虛的國民大會來叫各省失望。如果我們此時實無堅強的信心可以信任一縣的人民能推出幾個縣長候選人來，那麼，我們就更不應該拘泥某種歷史文件，驟然一跳就做到全國的民選縣長；我們就應該認清國內的現狀與需要，先從改善省政府下手，吃緊訓練縣長人才，一面先行省政府考試任命縣長，一面建立各省的省議會和巡行的監察制度來監督各省各縣的政治設施。——總而言之，中山先生的建國大綱的文字上的程序是由下而上漸進的，但他的精神是要政府「訓導人民之政治知識能力」，也還是由一個有知識能力的中央政府出發到各地方的。我們在今日不可拘泥他的文字，應該活用他那一貫的精神。

關於憲法初稿的其他部分，我們認爲大都是空頭支票，尤其是經濟與教育兩章。這些一時無能力兌現的空話，放在憲法裏，只可以使人民輕視國家的根本大法，不如全

行刪去，而提出一項兩項——如平準糧食，如普及教育——用全力實行起來。在憲法裏說欺騙人民的大話，就是褻瀆憲

法，罪過不小。

廿三，四，九。

## 愈貧弱愈要有爲

伯莊

「他們明白自己不配建設，然後能安分無爲，做一點與民休息的仁政；等到民困稍蘇國力稍復的時候，等到專門人才調查研究有結果的時候，方才可以有爲。」這是胡適之先生對於「盲目建設」的判詞。建設的風氣，近來已從宣佈計劃轉到調查研究。做調查研究的是否都是專家，雖有疑問。第二個等候的性質究屬簡單，而第一個等候，還要討論一下。

已往的計劃，空泛錯誤，言過其實之處，在所不免。從前曾有一位部長對我說：「以我的年齡經驗，在近代國家當然不配做部長。但是國民政府是革命的產物，我身當其衝的，祇得勉爲其難。」總之，①建設成爲一種風氣，不論真誠的或別有用心的都愛談建設。②其中有些當局確具純潔熱誠，而且從失敗經驗，漸漸高明些。這兩者都是事實。胡先生論民主政治，說阿斗可以從此漸學高明。但是對於經濟建設，却不許阿斗盲目亂動。

經濟枯竭至此，不可再來瞎耗民力！不錯。但是現在國庫省庫的收入，用於建設的，若和軍費比較，實在微乎其微。就目前論，民力的耗喪本不在此。假如這種「盲目」的有爲是害民的，也祇是不多。

漢家休養，曹參無爲，昭蘇生息了數十年，才有武帝的大有爲。不錯，就當時的經濟組織，和國際環境而論，曹參飲酒和打兒子的屁股都對的。讓老百姓安事耕桑，輕其賦役，藏富於民，在自足經濟時代，尤其是當時土廣人稀，却是有莫大的功用。匈奴王討了個把漢宮美女，便認親家認相好，不再動粗動武，讓天朝慢慢的休息。當時沒有迎頭趕上到近代化的必要，不必與時爭命，所以曹參飲醇酒實在有功。

但是我們現在的運氣差多了。民亦勞止，迄可少休，休息一下也是對的，不過同時該知道休養的功用是有限量的。平均一人有幾畝田，儘管一個大的稅也不抽，也還是

草棚文明。

胡先生說斯賓塞的話還用得著。只要政府能學得租界政治，民間的工商業自然發達起來。不錯，在利潤經濟價格權威之下，有利可圖的企業，自然有人做的。但同時不要忘記中國企業家愛用少爺姑爺，不愛用專家。儘管讓自由經濟去盲目試驗，他們現在雖不去築賠錢的公路，不去計劃基本工業的鋼鐵鹼酸，他們自然會各打各算盤去使用人力和地利。個人算盤雖十分精明緊湊，但從社會觀點立論，是盲目的浪費的，却誰也不能否認了。我們貧弱至此，其生產能力，除供給牛馬生活的消費之生產外，尚有餘力若干，可供資本物的生產，誰也不知道。但從經濟發展（資本物的生產）的需要而論，需要的種類如此之多，需要的量數如此之大，這有餘生產力之供給，真是杯水車薪。力量既如此有限，又要與時爭命，該如何精明慎重的計劃

## 「定縣主義」論

巫寶三

及分配其用途。原則上我們該採用計劃經濟，斷不宜讓盲目的私企業來浪費這生產能力。

我們的農邨早已脫離自足經濟的時代。商品作物（Cash crop）日見增加。花生，芝麻，黃豆，棉花，桑都是國際市場的商品作物，小麥也是商品作物，稻米是半商品作物。世界農產跌價，使農民收入不到從前一半，這是當前最嚴重的一件事。試問飲酒的曹參，有何辦法？

工業呢，也是疲癯殘疾，效率低，負債重。其所以致此者，政府的苛擾，在各因子中，祇是比較很輕小的。

經濟進步是極緩慢的。有國家的積極獎勵，有國際資本的鉅量挹注，可以把速度加快些。加塞爾 G. Cassel 計算產業革命後歐西各國的富力增加每年也祇 3%。現在國際環境，迫得與時爭命，不可要政府當局學飲酒的曹參，而要他學史丹林的計劃經濟（斷章取義的）。

上月中旬我和幾位同事到定縣參觀平教會的實驗工作，整整聽了看了三天，可說是乘興而來，載興而回。平教會定縣的實驗工作，蜚聲中外，無須我來介紹，這篇文章

章所要討論的，是個人在定縣三天對於平教會實驗工作的所見和所感。因為新近有一個外國人 Edgar Snow 名平教會的實驗工作為「定縣主義」，遂取之名吾文。

第一，我要說的，「定縣實驗的目的，是要找出一套縣單位的教育與建設的原則，方法，技術，與制度，希望能推行到各縣」，既然着重點是在原則，方法，技術，與制度的發現與實驗，則在社會事實已經調查清楚，工作方向以及實施方式已經確定之後，凡公私機關對於該種事業的建設已有相當成績，平教會大可利用其過去經驗，請其擴充其事業於定縣，不特平教會本身可以減少許多人力物力的困難，少扯許多無謂的釘子，並且辦理該種事業的機關，也可以比較定縣與其他地方該種事業的進展情形，看出其他原素的連鎖關係。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說，平教會已經發見了農民窮的問題，而決定用生計教育去救治，及用社會家庭學校三種方式去推行，其中包括植物生產改進，動物生產改進，農村經濟改進，農業工藝，及農業工程五項，則我以為動植物的育種試驗，如果國內其他機關辦理有成績而可以利用時，不妨委託辦理，其他農村合作等，皆可由此類推。固然，平教會所做的種種實驗，不一定國內各公私機關可以受委託，但我敢說，國內公私機關可以幫助定縣實驗者，不是絕對沒有。若謂委託其他機關，將妨碍縣單位整個一套的實驗，則我以為不必是個事實，儘管有其他機關來定縣辦理農村合作，平教會仍然

可以使之與其他方面聯繫起來，及以三種方式推行。所以我以為定縣實驗的目的既如是，則在所釐定方案之下，求一其他人才經驗很富的機關從事推行實驗，只有與其事業的進行更為有效，而於將來的推行，更可增加其適應性與系統性，同時其他機關於此亦可獲得參加實驗的教訓。有些人批評定縣說，定縣用的錢太多，我則以為定縣有些實驗工作不經濟。

第二，我要說的，農村建設，是不是要以教育為出發點？換句話說，農村建設，是不是要先做除文盲的工作以後，而後始能談到健康以及經濟的建設？定縣的實驗，是由千字課的平民教育演進而來的，因為主持人大多是主張教育救國論的教育家，所以至今雖然發展到經濟健康等建設，但仍然以除文盲為一切建設的前提。「農民接受四大教育，以加入平民學校為開端」。這是他們的口號。他們在生計教育中又說，「我們灌輸給男女青年成人一切文字上基本智識，使他們將接收生計教育的工具弄好，同時也就是在鄉村裏培植了能够接收學科生計教育的種子，使將來的鄉村經濟建設，由他們的基礎上發揚出來。」我個人的觀察，農村建設，不必有這種先後的關係。有了識字運動，固然可以從事合作組織，沒有識字運動，也可以從事

合作組織，河北省各縣農村合作社的發達，可以做我這個說話的證明。當然，我也不否認文字教育可以幫助農村各種興革的發展，不過我可以說，中年男女農人已經都是成日和實際生活接觸的人，他們所渴求的，是痛苦的解除，和生活的改善，他們不能看到識字對於他們的生活有什麼幫助，他們對於文字教育遠不若實際生活問題之有興趣。同時，我們不要以為農民是最蠢笨的，他們的世故，他們的打算，也許比我們高明得多，他們所缺少的，是一種新的組織，一種新的訓練，一種新的教育。有許多新的變遷，屬於他們本身力量範圍所能做到的，他們很能迅速的適應。舉一個例子說，近兩三年來，深澤蠡縣等地農民因種棉花比種小米高粱有利得多，皆相率而種棉花。又定縣的波支豬，現在也不脛而走，深澤等地，這其間並沒有任何機關從中宣傳教導。但如果是些關於社會關係的事，農人或者是力量不够不能做，或者是缺乏知識無法做，或者是明明知道而不敢做，這就非有機關來領導不可。而如果有了一個機關能真正的幫助他們做一些實際生活改善的事，農民會很快起來接受的，中間不必經過文字教育，關鍵還是在你賣的藥是不是真實靈驗。農村中不會全是文盲，而農村建設的初步，所需要的是少數公正熱誠的領袖，一種真

正有利於農民的組織，不難使鄉村熱心的農民興奮起來，一人起呼，衆山響應，組織既成，然後對少數領袖予以知識上及能力上的訓練，藉團體組織使各個分子獲得新生活的教育，此種與農民實際生活問題關聯而為其自動要求的組織，若是辦理得法，則許多方面應與興革之事，皆可由此以推行。所謂文字教育，固然在此種組織過程之中可以推行，即衛生教育公民教育生計教育，亦皆可藉此組織以實現。定縣的一些成功的實驗，多立基於平校同學會的組織，其實這個組織，合作社即能代替之。合作社的組織，直接代表農民的經濟利益，在組織上比較簡捷。平校同學會的組織，則為農村建設上一個過渡，必須在平民學校畢業後始能組織，其在便利上在經濟上以及在農民興趣上，似乎都不及合作社。是不是農村建設，一定非先辦平民學校及設立同學會不可呢？平教會諸先生，也許實驗還未告成，不能肯定答覆這個問題，但我以為這個問題很可注意。

第三，我要說的，是四大教育聯鎖的問題。平教會在定縣的實驗之所以被稱為「定縣主義」，也許就是在聯繫公民，文藝，衛生，生計四大教育而以家庭，學校，社會三種方式推行的這個特別地方。我也承認，一個社會要成為健全的機構，單靠一方面努力是不成的，人民的生計，健



康，組織，以至思想，全非加以改造不可，而依照定縣的四管齊下，誠然易收實效。不過農民的病態，照平教會所說，雖有愚，私，貧，弱，但其分量則有輕有重，其性質有最重要次重要，其救治亦有緩急本末。據平教會社會調查的結果，發現一個事實，即最富的村莊，就是最受教育的村莊，這是愚與貧的關係，也就是愚之來源一部分是由於貧。我個人的觀察，現在中國農村的最重要的病態是貧，是無組織，能够領導農民成立救貧的組織，其他愚私皆可由此獲得改進，即弱的方面，只要政府有新的醫藥設施，也可很順利的推行。而所謂組織者，蓋又非如平教會所稱非化愚爲智化私爲公不能救貧的聯鎖關係，農民識字的人數誠然少，知道新的事物更少，但對於介紹一件有利於自己的事的判斷並不很弱。農人質樸重信義，其私的程度

，除在缺乏組織一點，比都市人要小得多，但如果對於其實際生活的需要上介紹一種組織，善爲指導，結果每能成爲一種很強固的團體。人生的需要，雖是多方面的，然輕重本末之不同，所關甚大。凡此並非我的懸想，而是我看了深澤蓋縣等地農村信用合作社以後的所得。尤有進者，一國國民教育的基礎，在於學齡兒童的普遍受教育，中年之人，爲實際生活所煎迫，受環境的牽制，其生活大半已

成定形，所謂愚私等等，只能就其生活的改善上而從旁輔導之，始能收宏大之效。定縣的家庭會，以我耳目所及，貧苦農民之參加，皆有敲鑼肩旗之感。何者，生活尙無餘裕，又有何興趣開會談閒！根本說來，學齡兒童之受教育，亦皆爲其生活所決定，此固平教會諸先生所深知者。所以我們爲四大教育固有關聯，三種方式固可同時推行，但關聯之中，有基本的，有附隸的，方式之中，亦有自然的，有勉強的，平教會之實驗，在找出一種制度，以便推行各地，推行之時，當不能花費如在定縣一樣的人力物力，則於上列諸點，似應加以深切之考慮。

第四，我要說的，是生計教育工作方向的問題。平教會生計教育部主任姚石菴先生說，農村經濟建設的基本工作，一爲消極的控制環境，一爲積極的改進生產，前者工作之一，爲縣單位最低限度的經濟統制，後者爲根據實施原則，在縣單位自足自給的經濟計劃之下，從事動植物生產及農民經濟之改進（見大公報鄉鄰建設副刊第四第五期）。這個縣單位自足自給的經濟計劃，以我在定縣所見，確實已成爲他們工作的方向。他們在動物生產改良方面，則有豬，羊，雞的改良，在植物生產改良方面，則有棉花，小麥，玉蜀黍，穀子，高粱的育種選種，及梨樹，白菜，

葡萄的整枝栽培，在農村工藝方面，則有棉毛紡織的訓練，及麵粉榨油等的農產製造，在農村經濟方面，則有經營技術及經濟組織的改進，此外尚有農業工程改進，及土壤肥料研究等等，這個改進農村經濟的方案，可說是很完備了。凡該縣重要生產及有關生計諸端，可以說是都包括進去了。我在這裏不能不懷疑，這樣多的項目，同時並進，定縣的人力物力可以項項做得很圓滿嗎？定縣的出產，當然有主要的與次要之分，我們不能集中精力於最關農民經濟的少數幾項嗎？定縣的出產，那幾種是佔有生產上的利益呢？那幾種是居於不利的地位呢？那幾種是可以改良成爲有利的生產呢？那幾種是雖改良而無望的呢？對於這些論點，定縣的生計教育中沒有加以考慮。在農業生產上，一個科學家的看法，是如何增多生產，而一個經濟學家的看法，則爲如何增加利得。農人的生產品是要拿出去賣的，同時換回其他生產品，他拿出去賣的東西如果能賺很多的錢，則他日用諸物雖全購自他方，在他也是一種福利。反過來說，農民所生產的東西如果賣不掉，而日用諸物可以自給，就其生產以及享受來說，也是一種不利。社會經濟結構到了交換經濟階段，不但不能禁止廉價商品的輸入，而且也不必抵制廉價商品的輸入，要緊的是如何有利的

生產其他貨物以與之交換。我們要記着，縣是中國的一個省以下的政治單位，在各種條件上，都不能構成一個自給自足的經濟單位，並且在以國爲經濟單位的情形下，這種計劃，於該縣及其他地方生產者都是有害的。（現在許多省區倡統制經濟之論，皆缺乏此種認識。）當然，在現在農民經濟艱窘之際，利用農暇，自己織布自己穿，我也不反對，不過若提倡者在這方面企圖作大規模的推廣，則無疑是個失敗。事實上，這個勉强的存在，一至其他生產方面有利時，這方面立即被拋開了。我們是不是應該費許多精力於這個勉强的存在呢，還是集中精力於他途？

以上所提出的四點，是我對於平教會在定縣實驗的意見，我是就可討論的幾點來說，其他可贊美的地方很多，我想無庸我這拙筆來描寫了。我的總印象是，他們確確實實是在那兒幹，有幾位先生且以宗教的精神在那兒幹，醫藥制度很成功，實驗學校很富創造性，文藝創作與編輯，在將來亦必發生重大影響，不過幹的方面太多，重心不立，農民是不是會覺得無興趣，太麻煩？將來其他縣份是不是很圓滑的推行？

最後，我要申明，如果我所提出的意見，有什麼偏見的話，那是受我所學的學科的支配。二十三年四月二日

## 談廣西的民團制度

心 吾

年來廣西的建設，很爲世人所稱道。就我個人觀感所得，我以爲在今日廣西所有的一切建設中，目前已經立了卓著的成績而對於國家的前途又種下了無限的希望種子的，却無過於其民團制度。

說起廣西的民團制度，實在就是一種「全省皆兵」的制度：凡廣西壯丁年滿十八歲以至四十六歲的，無論爲農爲工爲商都要受過軍事訓練；初中學生則六個學期的學業規定五個學期教完，第六學期則全施以軍事訓練（高中，專科學校大學仍有軍訓）；以前在政府機關服務的人員可以免役，最近據報載，也須一體受軍訓。廣西政府的目的的是要寓兵於民，寓將於學；同時，對於那班政府機關人員又要把他們訓練成爲「乃武乃文」的人材。所以這種民團制度和從前那種招募鄉勇而成的人民自衛的民團絕不相同。我們與其稱之爲民團制度，不如稱爲「軍訓制度」還確當些。至其組織方法也一依軍制。同時，每縣的縣長就是民團的司令官，全個廣西劃分爲若干個民團區，每個民團區有一個民團指揮官，這若干區的民團指揮官，都隸屬

於廣西政府。所以這個組織方法又易收統一集中之效而和從前那種由團紳辦團的辦法絕不相同。我們知道，以團紳辦團有兩種最不妥的地方：第一，各地團紳各自爲政，互不相屬，政府決不能收臂使指應的功効。第二，遇到貪污的團紳，他們便會借民團的勢力來欺壓平民。現在，廣西現行的民團制度的民團指揮官，他們都是現任的官吏，政府當然易於指揮，而所謂民團，就是地方上的人民，也可以說是政府的一種軍隊，故又不致爲私人所利用。這乃是中國民團的制度史上的一件大進步。

這種民團制度，廣西施行結果，到今日，在安內方面，已顯出卓著的成績。從前東蘭百色等處都會淪爲匪區，自民團制度施行後，各股匪都次第被撲滅。又如拿貴縣來說吧。貴縣的位置東通梧州，西通南寧，北通柳州桂林，南通鬱林，是廣西一個臨江之上的中站的地方。這個地方，在從前自然是軍隊駐防的重地。可是，這次回到貴縣去，除了看見過一次軍隊經過外（據說那次是開往江西剿匪的），在貴縣，兩年的時間，我不曾看見過正式的軍隊。

貴縣地方的治安，只由民團維持，而四境晏然，不聞匪警。在這個小小的縣分裏，如果只從治安這一點看去，很使人會憧憬到那歷史上所謂昇平盛世的境界。民團不但可以消滅土匪，而且可以防範叛軍。白健生將軍告訴過我們一些叛軍給民團繳械的故事：他說，他的部下有一次叛變了一連軍隊，這連叛軍，走不到幾天，便通通給民團繳了械。他又說廣東也有過一次叛軍走到廣西來，後來也給廣西民團繳了械把槍送回廣東去。從前叛軍便會變成土匪，一個個的村莊，甚至市鎮來給他們蹂躪。現在叛軍却逃不出民團的網羅。這還不算怪事。年來廣西因受世界不景氣的影響，去年「早造」收穫後，穀價暴跌就演一幕「豐收成災」的慘劇。因此當舖裏的典當品祇有「上架」的，而少有「落架」的；當舖祇有放出的資本，而少有收回的現金。據去年冬南寧民國日報登載廣西民政廳長出巡回粵後的談話，內中有一則舉貴縣為例，說貴縣全縣當舖未贖存架的典當品約值銀二百萬元之多。這是一個多麼驚人的數目！但是，在這樣的一個整個的社會經濟衰落的當中，我在貴縣裏，所見所聞，無論城市與農村都依然安寧如故。這固然由於今日廣西政治清明所致，而自民團制度施行後，人民都有了自衛的能力，使奸梟之徒不敢生心，更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至於在國防方面，白健生將軍常常對人民訓話，他說土耳其有一千多萬的人，在歐戰時候可以抵抗列強的侵略，廣西也有這樣多的人口，我們也應該為國家擔起這一個責任。現在民團的訓練，就是為了要擔負這個責任的準備。白將軍的話是最值得國人注意的。因為假使國際風雲果有爆發的一天，萬一我們沿海的省分給敵人毀滅了，我們國家最後的防線便要退到腹地去做最後的抵抗。現在，腹地的廣西就凡有這種準備，給我們國家種下奮鬥的種子。我以為這算是一件關係我們國家生存的大事。

本來，民團制度並不是今日廣西新創的制度，乃是中國歷史上有一種人民自衛的制度。這種制度，在中國近世史上尤其顯出絕大的效果。川楚白蓮教之役，太平天國之役，都是民團制度在歷史上所建的不拔的紀功碑。這是誰都知道的。現在廣西施行的結果，已有如此功效，而且並可以做應付將來國際間非常事變的準備。我希望全國人士對於廣西現行這種民團制度加以了解，同情與幫助！

【註】本文所引白健生將軍的話，都見白將軍對廣西宜山省立中學的訓話。這篇訓話，曾登去年冬南寧民國日報，手邊無原文，我這裏只得略述大意，這是應該聲明的。

## 新舊交替時代的遊移性

壽 生

前幾年，主義這個玩藝，不論什麼人，不說牠，不拉一個來作靠柱，就不能存在似的。三民主義，馬克司主義，及一切花花綠綠的主義，只要佔上主義兩個字，就不愁無人歡迎。至於三民主義，我們那個「山卡拉，鬼都不下蛋」的小縣城裏，也可找出好幾部來，在最近，又好像稍有獨立性的人一說到主義就要臉紅似的。這是怎麼了？

什麼馬克司主義也好，孫文主義也好，信奉的人有幾個是曾經下過一翻研究功夫的？有幾個曾經拿自己的社會來分析過的？現在一般鄙視主義者，又有幾個是曾經分析過牠們的，曾經考察我們的社會情形國家處境的？就以三民主義來說，以研究的態度作系統的討論文章，簡直可說沒有。有的是一些盲目的奉承，無聊的打趣。

前些年以爲舊政制打倒了，老官僚無用了，來，造新官兒吧。於是這裏的法政專門學校成立了，那裏的簡易法政開辦了。一般青年好似要爲國家爲自己求出路都得進法政學校，社會一般人士也覺得唯有法政生可貴。而現在呢，又理科呀，實業呀的叫起來了。我們的政府甚至于有停

辦文法學院之議。官費留學的名額裏文科生無份。好似我們中國「文」方面的人才已够多了似的！

然而，我們「文」方面的人才站在國際舞台上不紅臉的有幾個？不給外人當圈因般擺弄的有幾個？有獨立性的中國學者有幾個？從前提高法政的人真明白政治法律是怎麼回事的怕不多吧？現在鄙薄「文」的大約是知道「文」是怎麼回事的了？曾想過國家的需要，人類的要求？曾想過國家是一個多方面的東西？只要取消了「文」學院，自然科學就會好了？一進理學院就成科學家了？

其實什麼主義文理，像我們這樣的好牠，舍牠，牠只好好笑。我們從牠得不了什麼，牠從我們也得了什麼。

眼看人家的國家那麼好，自己的這麼糟，真叫人眼紅。那麼要好當然只有學人家了；人家是有主義的，我們就當然歡迎主義了。主義就是一個主義，牠的活動是靠人的；要不然的話，我們拿一本馬克司學說拋進羊羣裏去，牠們也組織起蘇維埃政府了。有主義了，而國家還不好，於是主義是騙人的，無用的，害人不淺！但是外人爲什麼會

好呢，總有原因的，這回找得了「實業」。這工商業的世  
界誰能否認，我們還不需要「理科」嗎？那嗎大家「理」  
起來呀！

我們事事都是這樣搖晃的，上二例不過較大者耳。

我們要知道，一個健全的國家不是某一部分好，就成  
功的，而是各部分都有特自的健全而後成功的。人類的要  
求也不那麼簡單。我們現在的害處不在「文理」的消長，  
而是凡事只在皮面上踟躕，不有深入的研究，因之缺乏正  
確的了解，自然對於自己本行的什麼，就無熱烈的情緒了  
。所以今天是三民主義者，明天許就是反三民主義者了，  
後天許又是三民主義者。從前崇拜主義是盲動，現在鄙視  
主義是瞎鬧。就以三民主義而論，現在的一切牠有什麼責  
任可負呢？牠所主張的在中國實行過嗎？現在的現象是實  
行牠的主張而生的嗎？怕誰也不能說「是」吧。那麼我們  
鄙視牠的根據是什麼呢？這不該我們鄙視牠，該牠鄙視我  
們。

現在只聽人說，要這樣要那樣。從無人要求，這樣我  
們要做到怎樣好，那樣要做到怎樣精進。前幾天大公報說  
，翁詠霓先生在杭州醫院裏與醫生鬧要出院辦公。他在病  
榻上還未忘記他的責任，他的探求，不管他神志是否清楚

，這總是他追求不已的精神的表現。我們如能個個都如他  
這樣不忘責任，邁進不已，我們雖無他的天才也不會事事  
像現在這樣糟了。前天，我在圖書館看報，見說翁先生有  
腦膜炎了，甚危。我回來去找一個朋友向他說這事，他正  
在看大公報，我還未坐下，他就慘然的對我說，翁文瀾不  
甚好。翁的好不好，實在有一部分青年天天懸念着的。他  
的精神實值得青年敬愛。我們各方面的事業都需要這樣的  
人物，都需要比他更進的人物。我們不問人學「理」學「文  
」，我們只問他的成就怎樣。一個國家各方面成就的人多  
，也就更有望。翁先生雖可愛，但如這一次銀價的變動要  
他來對付還是不行的。你看美麥的落價，一次我們就虧千  
萬，我們有多少個千萬給我們的財政家去丟？經濟學者還  
不需要嗎？更可笑的是，我們現在還根本沒有一個哲學家  
，已經有人在叫哲學呀你破產了！好像哲學在他們手裏會  
經大富大貴過來似的。實則是我們對哲學真有研究的人是  
很少的，至於有獨立性的哲學家簡直可說還沒出現。這樣  
就讓哲學破產，真叫人不耐。我們現在這個遊尸似的民族  
，任風飄蕩，不就是因為還沒有建立一個新哲學把握住人  
心嗎？有人說歐洲大戰，斐希德，尼采，要負點責任，這  
話我們聽來很可異吧？現在且不忙讓破產，先給一點財富

足以與歐美學者媲美的與我們看看再說。而這些嚷哲學破產的，又多是從前高嚷革新思想的人口裏吐出的呀！那還不是表現他們靈魂的搖晃，從前就未認請思想的重要，哲學是怎麼回事，現在一遇外誘當然要打「翻天印」了。他們現雖又在實驗室呀，進實驗室呀，的咄，但以他們這樣的态度到實驗室去，只要兩下硫酸氣就要把他沖昏。一遇外面起甚變動他又會叫快出實驗室呀，那是多麼蠢的事！或者說什麼——我們洗練我們的靈魂吧，你看嚙那自然之神廟，是多麼的美麗——的。搖晃，搖晃。遊移，遊移，終歸一無成就。

「執着」！在某些場合時是不必的，但對於我們自家研究的學科，所從事的事業，我們既選定了牠，就要把牠緊握，死生以之。像翁詠寬先生似的，在不知死活中還不忘記他的泥把石塊。你要是個詩人，嘴角吟哦出血了，還不住吟哦，雖有個金塔在前要你去取，你也不顧。你要是個哲學者，一元二元的本體論把你的腦袋想破了，你還是滿頭血胤的追求你的真理。你要是個化學家，你的手雖被化學藥品咬爛了，穿不成一件無孔的好衣，如北大化學系主任曾昭掄先生那可敬的破樣，你也不管，再發現一個原子那是你的快樂。你要是個經濟學家，毛票換銅子，標金

的漲落，這類一般人不注意認爲無聊的瑣事你要視如玫瑰花般的美麗，檢拾推敲。你要是個政治家，是個政府員司，你就要努力研究一切政治問題，少作威作福，更不要災民遍野，內亂外患的時候，你還要登高賦詩，悠哉遊哉的。「執着」，緊緊的「執着」！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我們如能大夥這麼傻幹，千萬人中必定會出個把大人物的。那時東開一朵茉莉花，西開一朵牡丹花，我們的國家就有望了。什麼日本鬼，羊眼睛人，唉！何足畏哉。咱們有這麼大的本錢——四萬萬人，做世界的主人，做世界的奴才，權在我們自己。我看見一個牧童驅一大羣水牛，我就想到我們民族的命運。

甲午戰爭以還，「歐風美雨」一陣陣的逼來，把我們這個關在金箱箱裏的民族嚇昏了，如一個打悶頭的雞，左衝右撞莫明其妙。舊的丟不掉，新的拉不到，一直攪擾到現在。此時我們已到該清醒的時機了，我們不可再遊移了。新舊交替時代的遊移性，可以說是必然的，不足怪的现象。唯吾人若長久沈於其中而不自知振拔，爲害就烈了。遊移性不去，我們的一切事業將無大成就之日的。我們雖處這樣的窘境，我們不必悲哀；我們此時就如佛陀一樣，感人生無常，發狠要修道，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一

頭找着這個仙人，解決不了；一頭找着那個仙人，解決不了；終歸得自己努力溶合一切，悟了大道，解除了一切。我們現在已到組合一切的時候了！這時，真是一髮千鈞，成佛入魔完全視我們努力如何而定。我們現在要大家「執

## 救救四川！（通信）

古 舞

適之先生：

去年春天，共匪第二次竄入通，南，巴，胡政之先生對我說，四川人恐怕要當白俄，勸我即歸川努力。我便離開了北方，返川已十一個月了。這十個多月都在四川匪區附近跑來跑去。我同幾百青年朋友的任務是：宣傳匪禍，救濟難民，工作是非常之苦，但是爲怕當白俄和同情於難民，大家都還能吃苦。（這些青年朋友大半是盧作孚先生訓練過一年的，很有條理，有精神。）現在匪勢已殺，但尙作困獸鬥，與劉湘的隊伍在下東拚得很利害。我今天又起身赴匪區——剛收復的巴中去——視察難民的狀況，一切都準備好了，同行的朋友還未齊，故趁此幾十分鐘與你寫這一封信，望你注意我下面陳述的事情：

我這回的工作，所謂「險阻艱難備嘗之矣」，這且不

着」自憫從事的那點點兒，力求精進，使我們這些「點點兒」匯合，成一個大流，衝出一條我們國家的光明大道！

廿三，三，三一。

必說。因爲要在鄉村工作，並且在收復的匪區，當然該是這樣生活。我所要說的是，四川這個天府之國，現在變成地獄了！共匪殺了八十萬到一百萬人，這些良民都死得很慘，但是死者已矣，尙有生者二百多萬人，家產蕩然，顆粒無存，春耕下種已遲，這兩天草根樹皮都吃完了，把肥白的可愛的小孩子偷來煮起吃。我們親見此情景，真正傷心得狠！打了幾次電與蔣介石先生，承他答應匯三十萬元來，但是至今未到。打電與紅卍字會，華洋義賑會，回電說，他們只救天災，不救人禍。四川的事，真正是人禍！第一，匪來而讓他長大直到佔十六縣，而軍隊還不去努力打匪，這算是人造的禍。第二，對於難民官廳照例不理，軍隊棄城棄地時毫不通知老百姓，等匪將入城老百姓才逃，——逃得真狼狽——一點東西都未帶出來，有產立刻



變爲赤貧，這也是人造之禍。第三，軍民的糧食毫不統籌

，軍隊雲集到三十萬人，而只知向匪區附近十餘縣購米，甚至封倉『打糧』，弄得現在不但收復的匪區不得絲毫生活之資，就連匪區附近，如梁，大，渠，廣，岳，南西兩充，以至兩開，老百姓都沒有吃的，一如會陷的匪區慘狀一樣：餓殍載道，逃荒拾人。我們每天都親眼看見餓死幾十幾百人！——餓死的狀態比被殺慘得多啊！——匪區還救不了，匪區附近又成這樣，而且軍隊有時還要障礙救濟的工夫，所以盧作孚先生賣了一陣氣力，因此灰了心。

四川連年兵禍，民不聊生，並且人口過剩，這種原始的農業出產早已不能供給，到了現在，又有至少四分之一的三四十縣完全生活無着，所以這個現象是非常危險的！

聽說外面很注意開發四川的天富，宋子文先生也要來考察，那就好極了！但是宋先生好像又到西北去了。

一旦太平洋戰爭爆發，四川確是一個國家最後的出路

我們就讓他永遠成地獄嗎？

開發四川，我希望不是一個空口號，拿兵來征服四川，我認爲無辦法，實苦吾民而已！拿錢來開發四川，我認爲有辦法，絕無阻碍，我敢保險，——因爲大家都在等資，本家實業家來救命啊（連飢兵在內）！如果四川真有開發的事實出現，我個人本是個愛吃苦做實際工作的人，我願意作一個工人，當一個鄉導，做一個『尖兵』。如果外面只是空喊一陣開發，而始終不兌現，或者當局還別有用意，要在四川來動干戈，挑內亂，以便爲別省軍隊找出路，找飯碗，那只有將全四川變成匪區了事。那嗎，我也只好早點離開家鄉，只好當『白俄』算了！

適之先生，我這幾個月，看見了中國老百姓，豈但如你所說窮病愚……等五鬼附身，他們簡直比螻蛄的生活還不如啊！我這幾月爲老百姓灑的眼淚太多了！

我的朋友來約我動身，我又向匪區去洒淚去了，我希望你給我一個安慰！

古舞 三月廿九日

# 編輯後記

編者

△「愈貧弱愈要有為」的作者「伯莊」先生，許多朋友一定認得他是陳伯莊先生，他是經濟學者，現在為國防設計委員會來華北調查交通事業。

△「定縣主義論」的作者巫寶三先生現在北平社會調查所服務。獨立評論創刊以來，登載過許多關於定縣平民教育事業的文章，最近一期(九五)有章元善先生的「從定縣回來」，讀者可以參看。

△談廣西民團制度的「心吾」先生是廣西人，最近兩年在廣西一個中學教書。

△談「新舊交替時代的遊移性」的「壽生」先生，在獨立第八六號有過一篇「試談專制問題」，又在第九十號有過一篇「做好做歹，連拖帶打」。他來信說他是一個不

滿二十歲的青年。

△「古舞」先生從四川來信，談四川的情形有「變成地獄」的危險。我因為這種喊聲是應該讓全國人聽見的，所以不會得他的同意，就發表在此地。

△我在「建設與無為」(第九四號)裏，曾說，「據專家的估計，浙江全省的清丈，必須有二千四百萬元，才能完事。」現在我們收到何廉先生來信，他說：

浙江省辦理清丈，已花費了一百二十萬元。若把全省清丈完成，最低估計，需要七千五百萬元。此數較該省全年預算，約多四倍。先生文內所云「二千四百萬元」之說，恐係訛傳。

我謝謝何先生的指正。

第五卷	第一期	本期刊目
交通經濟	濟彙刊	第一期
卷頭語	一九三三年中國之鐵道	趙樹敏
一九三三年中國之航空	陸慶溢	陳慶溢
一九三三年中國之郵政	王德仁	陸慶溢
一九三三年中國之公路	趙述	王德仁
一九三三年中國之金融	馮承	馮承
最近日本之航業及造船業	周探	馮承
同蒲鐵路未來之展望	楊汝耕	周探
定價	每冊二角	國外四角
本期刊目	本期特價	三角
定價	全年四冊	六角
定價	國外	一元二角
出版	交通經濟學會	
出版	北平府右街	交通大學

